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  
阳明文化

贵  
心学胜境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学胜境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主编.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5. 3.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221-17837-4

I . B248.2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5GH5485 号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阳明文化

## 心学胜境

XINXUE SHENGJING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编

出版人 朱文迅

策划编辑 谢丹华 汪琨禹

责任编辑 陈章

装帧设计 陈电

责任印制 尹晓蓓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25年3月第1版

印次 2025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8.5

字数 300千字

书号 ISBN 978-7-221-17837-4

定价 68.00元

如发现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胡忠雄 王 宏

成 员 戴建伟 邓 谦 汪延皓 刘丽先 李 波  
宋庆松 何谋军 胡 琳 杨 菲 沈 兵  
何 丹

总 审 订 史继忠 郑荣晴 文思宛 杨 青 彭文俊

办公室主任 邓 谦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学术委员会

顾 问 陈祖武 顾 久

主 任 史继忠 郑荣晴

## 《心学胜境》编委会

主 任 连玉明

副 主 任 何 丹

成 员 何 丹 罗雅馨 韦倍艳 王 敏 王文君

熊乃柱 汤文瑞

指导专家 史继忠 杨 青 郑荣晴 文思宛 王剑平

彭文俊 龚晓康 张 明

## 《心学胜境》编辑部

主 编 连玉明

执行主编 何 丹

副 主 编 罗雅馨

撰 稿 何 丹 罗雅馨 韦倍艳 王 敏 王文君

熊乃柱 汤文瑞

编 辑 何 丹 罗雅馨 王 敏

图片提供 阳明文化（贵阳）国际文献研究中心

向昌桃 储 越



# 总序

胡忠雄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而镶嵌在云贵高原的明珠——贵阳，更是被一代代文人迁客所推崇和追捧。五百年前，一代圣贤王阳明初到筑城，便对贵阳山水发出“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无劳羨九华”的赞叹，后来龙场悟道又对贵阳气候给予“檐前蕉叶绿成林，长夏全无暑气侵”的盛赞。山水之城与避暑天堂完美邂逅，让人在如春凉夏的惬意中尽享如诗时光，爽爽贵阳就这样在夏日的徐徐清风中向我们走来……

徜徉于这座有着山水禀赋和文脉传承的城市，攀黔灵山，感叹“野禽五色仙裙蝶，山黛千盘佛髻螺”的天地造化；游南明河，体悟“水从碧玉环中出，人在青莲瓣里行”的天人和谐；登甲秀楼，领略“烟雨楼台山外寺，画图城郭水中天”的城市韵律；访文昌阁，见证“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的城市文脉，一山一水尽显气韵，一楼一阁各展风流。

爽爽贵阳，贵在爽身。盛夏时节的贵阳，没有骄阳似火，唯有凉意满怀，阵阵清风浸润身体的每个毛孔，犹如置身茂密林荫之下，又似身处空山幽谷之中，尽享天然空调、生态氧吧的舒爽清凉。“砧坐万竹中，凉风生静衣”，是黔中贤士竹林畅游对清风送爽的感慨；“虹霓蒸海气，烟雾洒春岚”，是明朝文人送友赴任对宜人生态的赞誉。大自然对贵阳格外偏爱、不吝馈赠。北纬 26 度、平均海拔 1100 米，最佳的纬度与高度在这里相拥，造就了地球上最美的风景和最适宜人居住的环境；夏季平均气温 22.3℃、相对湿度 76% 至 79%，最佳

的温度与湿度在这里相遇，让人体机能良性运转、肌体活力充分焕发；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1万多个、平均风速每秒3米以下，最佳的浓度与风度在这里相逢，让人沉浸氧海、吸氧畅游。无与伦比的“六度”，孕育了这方独一无二的康养胜地，成就了贵阳蜚声中外的避暑美誉。

爽爽贵阳，贵在爽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跨越浩瀚的历史长河，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多彩文脉在这里激荡。四万年前，贵州先民在高峰镇招果洞建造了“洞穴家园”，创造了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通体磨光石器之一，被考古学界誉为解开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革命之谜的一把钥匙。两千年前，秦通楚道，汉置牂牁，神秘的夜郎古国融入了汉帝国，成为汉文化天空中一颗灿烂星辰。一千二百年前，自唐代开始，开阳兴起丹砂开采，逐渐成为中国丹砂采冶的重镇，为中华文化增添了一抹绚丽的“中国红”。一千年前，从宋代以后，青岩古道成为茶马互市的重要通道，形成商品贸易的大动脉，无数传奇故事、历史沉浮都在马帮的声声驮铃中回响不息。六百年前，水东土司女杰刘淑贞“卷裙走马四千里”，远赴南京觐见朱元璋，化解了西南边陲战乱危机，留下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千古佳话。五百年前，王阳明在修文龙场参学悟道、开宗立派、教化民风，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裂变，塑造了贵阳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核。近百年来，无数黔中英杰“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以身证道、改天换日，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百宜红军烈士陵园，一处处红色地标熠熠生辉，留给贵阳人民厚重的红色基因。六十年前，“悬崖险绝通铁道，巍山恶水齐变样”的“三线”建设者，以青春抒写家国情怀，铸就了砥砺前行、艰苦创业的精神丰碑。古往今来，渊深厚重的历史根脉和人文精神，滋养着贵阳儿女、浸润着黔中大地，造就了“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精神品格，生生不息、历久弥坚。

爽爽贵阳，贵在爽眼。贵阳是一个青山如屏、水鸣如琴、别有洞天的大山地公园、大森林公园，“溪瀑峡石洞城”浑然天成、“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共生。看扶风山泉清树古，茂林掩名祠，奇山藏书院，体悟“雨滋苔藓侵阶绿，露洗



松阴满院清”的幽静雅致。看天河潭飞瀑流湍，水自天上泻，雾从云中生，沉浸“空山闻水声，碧潭衍飞瀑”的壮阔景致。看森林公园林木蓊郁，立黔南首关，俯重峦叠嶂，饱览“一山高耸翠微巔，突兀穿云欲到天”的钟灵毓秀。看十里河滩水明如镜，流潺潺岁月，忧芸芸苍生，尽享“真山真水到处是，几步花圃几农田”的田园风情。看红枫湖一碧万顷，织河道沟汊，集旧沙湾洲，欣赏“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的诗情画意。看高坡云顶碧草连天，草长莺飞绿，奔马驰浩瀚，沉醉“倚空千嶂横起，银阙正当中”的静谧灵动。还有弦歌不辍的孔学堂，碧水苍山的鸭池河，童趣盎然的云漫湖，浪漫温情的花溪公园，古朴幽深的青岩古镇，绚丽绽放的万亩樱花，玉水金盆的底窝八寨，烟雾缭绕的南江大峡谷……延绵百里的环城林带，穿城而过的南明河水，星罗棋布的绿地公园，缓缓铺展出“十里山水半入城”的美丽画卷。城是一幅景，景是一座城。居于闹市高楼也能品山水之味，游走林间田舍也能赏城市之美，寄身市井巷陌也能享湖草之乐。崇尚天人合一的贵阳人，早已将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浸透血脉、融入灵魂。

爽爽贵阳，贵在爽口。贵阳，一块神秘又独立的风味自留地，一座汇聚四方佳肴的美食博物馆，山城的韵味和人情的意味在这里相互交织，酸辣的刺激与奇鲜的柔美在这里激烈碰撞，造就了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人间风味。辣，构成了贵阳美食的底色。糟辣椒、糊辣椒、油辣椒、烧辣椒、糍粑辣椒，辣得酣畅，软糯香滑的辣子鸡、麻辣松脆的香酥鸭、行销全球的“老干妈”，成为无数游子的“乡愁”寄托。酸，勾勒了贵阳美食的特色。酸可与一切相溶，红酸、白酸、鱼酱酸、晒醋酸、杨梅酸，酸得过瘾；酸可与一切相遇，鲜鱼、牛肉、猪蹄、肥肠，热气腾腾的酸汤火锅，既开了胃又暖了心。奇，增添了贵阳美食的亮色。贵阳有数百种小吃，肠旺面筋道弹牙、牛肉粉汤鲜味美、糯米饭咸甜相宜，在每个早晨唤醒沉睡的味蕾；清新的丝娃娃肚容万物、热辣的豆腐果外焦里嫩，在每个小摊等待逐味的老饕；滚烫的糕粑稀饭甜糯香浓、冰凉的玫瑰冰粉沁人心脾，在每个街角惊艳疲惫的心灵；爽脆的折耳根其貌不扬，

却能在每碗蘸水中释放奇特的口味。鲜，体现了贵阳美食的绿色。最优良的环境、最洁净的土壤，造就了绿色生态的山野之味，牛肝菌、羊肚菌、鸡枞菌等“黔菇”，雷竹笋、方竹笋、楠竹笋等“黔笋”，香椿、阳荷、蕨菜等“黔芽”，与甘甜井泉不期而遇，完美诠释了“人间有味是清欢”。辣、酸、奇、鲜，在此起彼伏的吆喝、摩肩接踵的喧嚣、流光溢彩的夜市中，绽放出“千家万户店铺开”的市井烟火。

爽爽贵阳，贵在爽购。曾经“地无三尺平”的贵阳，早已架起了千山万壑上的“高速平原”，随着天堑变通途，“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黔货”走出大山、“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贵品”走向世界……这里有贵酒黔茶。“贵山贵水迎贵客，好山好水出好酒。”酱香白酒醇香浓厚、手工米酒清香甘甜、生态果酒蜜香飘逸，“风来隔壁三家醉，雨过开瓶十里香”，贵酒已凝成时光的幽雅细腻，汇成岁月的回味悠长。“南方有嘉木，黔地出好茶。”唐代陆羽在《茶经》中盛赞黔茶“其味极佳”，滋味香浓的都匀毛尖、不疾不缓的湄潭翠芽、汤色红艳的普安红茶，在沸水升腾中奏响自然的韵律、释放大地的芬芳。这里有贵银苗绣。

“传统的也是时尚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千年非遗历久弥新，“纹、珠、饰”美轮美奂，“绣、画、染”出神入化，千锤百炼的银饰，巧夺天工传“绝活”，银丝万缕间闪耀民族艺术之光；大美无言的苗绣，绣出时尚新“国潮”，飞针走线中编织民族无字华章。这里有黔药贵果。“黔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苗岭山脉间，孕育着一座“天然药物宝库”，56个中药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95种黔产道地药材遍布黔中大地，成就了以杜仲、灵芝、天麻为代表的“贵州三宝”黔草名片。“奇山秀水出珍果”，猕猴桃、刺梨果、蜂糖李、红樱桃、火龙果……这些蕴山水之灵秀、领自然之神韵的绿色食品，是“舌尖上的贵州制造”，也是献给世界的健康礼包。

爽爽贵阳，贵在爽游。贵阳无山不青、无峰不险、无林不茂、无水不秀，东西南北皆有美景，老幼中青各得其所。纵情山水之间，没有案牍劳形、车喧马嚣，只有逍遥自得、从容悠然。这里，让莘莘学子神往，革命圣迹、儒学基

地、地质公园，是感悟精神、研学心修、探索奥秘的宝地，可在“行万里路”中“读万卷书”。这里，让年轻一代心动，奇峰峭壁、清溪飞瀑、深涧幽洞，是攀岩探险、漂流露营、山地运动的天堂，可在“忽魂悸以魄动”中饱览鬼斧神工。这里，让不惑一族躺平，民族风情、古镇文脉、乡村民宿，是都市休闲、农耕体验、亲子游玩的乐土，可让“久在樊笼里”的身心“悠然见南山”。这里，让银发老人忘忧，天然药谷、生态氧吧、矿物温泉，是理疗康养、候鸟旅养、修身颐养的福地，可在“游目骋怀青山间，物我两忘绿水中”享受最美夕阳红。每一位旅者都能在这里找到深埋心底的诗和远方。

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让我们通过《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穿越重重关山，冲破氤氲云雾，相遇“爽爽贵阳”，共赴心灵之约、共鉴山水之美、共品人间之味、共享“六爽”之魅！



## 编写说明

本书主要通过发掘王阳明在黔行迹，将历史人物活动和山川名胜相结合，使各地读者在探寻贵阳历史遗迹的过程中，更加了解王阳明谪黔期间的足迹、交游事迹等。

全书分为引言、正文、附录和后记四大部分。其中引言部分主要阐述王阳明和贵阳的关系。正文部分按主题划分为六个章节，每章节由若干小节组成，大体上以时间先后为序。其中第一章“王阳明谪贬龙场”，主要从王阳明被贬、入黔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感为线索，展现平溪卫（今玉屏县）、兴隆卫（今黄平县）、清平卫（今凯里市）、平越卫（今福泉市）等地的山明水秀。第二章“阳明先生遗爱处”，聚焦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的交往，全方位讲述王阳明在龙场生活的点点滴滴，展示王阳明与贵州人民的深厚情谊。第三章“龙场悟道”，从石洞玩《易》、静坐、默记“五经”等方面入手，还原王阳明在龙场悟道的过程，并聚焦对王阳明心学的阐释。第四章“王阳明与贵州教育”，展现王阳明在贵州开办书院、广集弟子、讲学论道等一系列教育活动，阐述王阳明及其心学对贵州民风、学风、教育的深远影响。第五章“王学胜境在贵阳”，主要讲述王阳明在贵州游玩山水、遍访名胜古迹的相关内容，对文化地标阳明祠也将有所概述。第六章“王学研究 with 回响”，通过深挖阳明文化的时代价值，论述贵阳近年来在阳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的重要举措，包括阳明文化的研究、传播、转化与运用，也包括阳明心学在东亚，尤其是在日、韩的传播与影响。

本书的撰写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资料翔实，使用权威、可靠的文献资料进行撰写。二是论从史出，从权威、可靠的文献资料中得出结论，对没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事件进行合理推测，不妄下结论；对有争议的史实问题或争议观点采取存而不论的方式处理。三是吸收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展示阳明心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四是照顾大众读者阅读，力求行文简洁、通俗易懂，做到内容丰富、文字优美，旨在还原一个鲜活的、接地气的儒家圣人形象，让读者跟随王阳明的足迹，深入了解贵阳的历史。

# 目录

## 引言 01

---

### 第一章 王阳明谪贬龙场

---

直谏获罪	/ 05
千里赴谪	/ 09
玉屏获慰	/ 13
黄平月潭寺论“君子之政”	/ 18
凯里思索“安民之道”	/ 25
福泉七盘岭生“归隐之意”	/ 29

### 第二章 阳明先生遗爱处

---

结草为庐	/ 35
寻得“阳明洞”	/ 42
智治病仆	/ 50
请学于农	/ 55
乔迁新居	/ 61
龙场受辱	/ 70
安氏济困	/ 75

乡民献方	/ 81
象祠劝善	/ 86
书信止乱	/ 91

### 第三章 龙场悟道

---

静坐“玩易窝”	/ 96
大悟“心即理”	/ 105
默记“五经”证圣道	/ 111
始论“知行合一”	/ 115
“致良知”发端贵州	/ 120

### 第四章 王阳明与贵州教育

---

龙冈书院授学	/ 125
主讲文明书院	/ 131
镇远话别弟子	/ 136
后学兴建书院	/ 141
黔中王门兴起	/ 147

### 第五章 王学胜境在贵阳

---

闲游天生桥	/ 151
游渡六广河	/ 157

达德学校留诗	/ 161
二游仙人洞	/ 167
春访太慈桥	/ 173
通济桥畔送别	/ 177
秋游翠微园	/ 183
垒“三人坟”	/ 189
贵阳阳明祠	/ 196

## 第六章 王学研究与回响

---

阳明心学的贵阳声音	/ 202
“四大文化工程”之阳明文化转化运用	/ 210
心学胜境，文明远播	/ 216

## 附录一 王阳明大事记

---

## 附录二 王门后学

---

## 参考文献

---

## 后 记

---



## 引言

王阳明“龙场悟道”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贵阳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借力阳明文化，贵阳一跃成为西南文化重镇，成功地在中国文化史上争得一席之地，同时，阳明文化也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核。遇见贵阳，是王阳明人生触底反弹的幸运；邂逅阳明，是贵阳文教事业崛起的契机。贵阳和王阳明是互相成就的关系。

贵阳是王阳明人生的转折地。正德元年（1506年），在京任职的王阳明因言获罪，被权宦刘瑾陷害，贬为龙场驿驿丞。在这一刻，他的人生陷入了最低谷。起初对于被贬一事，王阳明是持悲观态度的，认为远赴贵州是去了一个必死之地。他说：“冲冒雾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抵达龙场之后的境遇，也似乎印证了王阳明的担忧。在这个偏远的驿站，没有可供遮风避雨的居所，没有可供果腹的充足粮食，因为水土不服，主仆三人相继病倒，甚至当地官员还来找他麻烦，派人来折辱他。这些大概就是王阳明对于龙场谪居生活不那么美好的回忆。在龙场，王阳明也收获了慰藉和感动。淳朴善良的龙场乡民教他种植庄稼、帮他新构屋舍，当他生病时热情地献来药方，也曾仗义地为他驱逐前来羞辱他的官吏。这些善意的举动给了王阳明的灵魂莫大鼓舞，正是这些在他看来“黔舌难语”的土著居民助他度过了人生中至暗的时刻。在生活步入正轨之后，王阳明还相继在龙场驿的龙冈书院和贵阳的文明书院开展讲学活动，师生

朝夕相处，砥砺学问，也给予了他很大的宽慰。

此外，贵阳当地的官员、文人也很敬佩王阳明的学识和为人，常与他有往来。比如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在得知王阳明生活困难后，遣人送来粮食、肉类等生活物资接济他，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以说，在龙场的谪居生活是王阳明否极泰来的关键节点。在这里，王阳明没有被一系列艰难困苦所击倒，在自身坚定的心志和来自各方的帮助下，逐渐走出阴霾，并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升华。在离开龙场后，王阳明仿佛是获得了主角光环一般，走向了其事功的巅峰。他在南赣平寇，又在宁王之乱中，在极短时间内消除了这一威胁国家的大祸害，最后又在人生暮年出征两广，平思田盗匪之乱。这一系列功绩，让他实现了安邦定国的理想。事实也证明了，当年蛇虺出没、瘴疠横行的龙场驿对于王阳明来说，不是一个万劫不复的绝境，而是一个可以抚平心灵、磨炼意志，让人重新燃起希望的福地。当王阳明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担负起平定“匪寇”的重任时，有人说他此行必定立功，原因在于其“触之不动”。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处境都能宠辱不惊，不因得失而动心，这样的心境，正是王阳明在贵阳的收获，为其立功提供了强大的心灵力量。

王阳明在贵阳立德、立言，奠定了其心学宗师的地位。明代中后期，僵化的程朱理学不但无法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反而弊端丛生，已逐步丧失了学术生命力。以“致良知”为核心的阳明心学应时而出，仿佛是黑暗中的一道亮光，照亮了人们心中的迷茫，又或是密闭已久的空间里透进来的新鲜空气，让萎靡消沉的人心为之一振。晚明学者张岱形容阳明心学是“暗室一炬”，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形容阳明心学是“雷霆启寐，烈耀破迷”，足见阳明心学对于解放思想、鼓舞人心之作用。这也足以解释为何阳明心学诞生后，迅速形成了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局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尽管王阳明“良知说”大成是在其江西讲学期间，但这一火星的初燃之地正是在贵阳。王阳明说：“往年区区谪官贵州，横逆之加，无月无有。迄今思之，最是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又说：“及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然后能有所见，始信孟氏‘生于忧患’之



言非欺我也。”王阳明创立的“良知说”，自然有其深厚的儒学积累，在龙场的居夷处困则是直接的外部刺激因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阳明的向死而生，的确是其在忧患中对心性的磨炼。对于一个谪官来说，早已是一无所有，唯一还未让王阳明看透的是生死。而龙场的困顿生活彻底让他冷静下来，静心澄意地来思考这一问题，最终“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历史时刻——龙场悟道。

儒家认为立德、立言是内圣，建功立业是外王。从内圣外王两方面来说，贵阳对王阳明都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无怪乎，当王阳明启程赴任江西庐陵知县时，提笔写下《舟中除夕》一诗，“也知世上风波满，还恋山中木石居”。这一去，人世间的险恶是无法预知的，他不禁怀念起在龙场平凡又快乐的山居生活。

如上所述，贵阳于王阳明是其人生转折地；王阳明于贵阳，则是这座城市文脉的重要塑造者。王阳明在龙场和贵阳大开讲学之风，让更多的黔籍平民子弟、少数民族同胞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王阳明到来之前，贵州的文教事业远远落后于全国，甚至在很多中原士大夫看来，贵州还是一个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王阳明在龙场创建了龙冈书院，后又主讲贵阳文明书院，培养了数以百计的优秀学子。王阳明去世后，以黔籍弟子为主体的黔中王门继承先师遗志，在贵州全省各地开办书院，传播阳明心学。到了明嘉靖年间，贵州的书院数量从两三所增加到30余所。生员数量的增加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朝廷批准贵州具备了单独乡试权，此后贵州的学子再也不用千里迢迢赶往云南昆明参加乡试，而在省城贵阳即可参加考试。这不得不说其中有王阳明和其黔中弟子的贡献。此外，王阳明还为贵州的文教事业带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王阳明的讲学，不仅仅是教育学子读书做官，更是要践行“君子之学”，这是内圣外王的统一。他留下的《教条示龙场诸生》《重刊文章轨范序》等文章，深刻阐释了其讲学、治学理念。王阳明对贵州学子的教化是深入人心的，在他去世后没多久，王门弟子王杏巡按贵州，“闻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

奠，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始知师教入人之深若此”。甚至到近代贵州人才的井喷，追根溯源，仍是王阳明的遗泽。清代贵州官员罗绕典对王阳明于贵州文教之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十三郡人文，此为根本；五百年道统，得所师承”。贵阳人对于王阳明的恩泽是永远铭记在心的，经过多次重修的阳明祠至今还雄踞在扶风山麓，供人们世代瞻仰。

斯人已逝，圣迹犹存。王阳明与贵阳的特殊缘分，让阳明文化深刻于黔中大地，并且内化于心，构成了贵阳的城市精神。在阳明文化热不断升温的当下，作为阳明悟道之地的贵阳，传播阳明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走进多彩贵州，体验爽爽贵阳，想必是众多阳明文化爱好者的心愿。王阳明的足迹遍布黔中大地，他观望过溱阳河的灯火，领略过飞云崖的奇绝，涉险于七盘岭的古驿道。在贵阳，栖霞山、仙人洞、天生桥、南庵（翠微园）、南霁云祠（达德书院）、太慈桥、头桥、二桥、三桥，王阳明的足迹随处可见。探寻圣人足迹，感悟阳明文化，这是我们编写这本书的初衷。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贵阳作为心学胜境，其中的胜境不仅是“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的山水之境，也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大成心境。让广大读者在黔山秀水中接受阳明文化的熏陶，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心愿。

## 第一章

# 王阳明谪贬龙场

### 直谏获罪

正德三年（1508年）春，满脸疲惫的王阳明与其仆人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终于抵达贵阳城西北七十里的龙场驿（今修文县）。自上古时期以来，贵州一直被称为“荒服之地”。龙场地处偏远，环境恶劣，且少数民族杂居，民风尚未开化。“富水绕前，贵山拥后，沃野中启，复岭四塞”，群山拱卫、溪流环绕，一块天然膏沃的宝地，这是当时贵阳的真实写照，也是王阳明初至龙场所见所闻所感。身处异乡，举目无亲，生活条件艰苦，从京城的后起之秀，到地方的小小驿丞……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他，此时心绪万千，不由得回想起人生的至暗时刻。

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朱祐樞病重驾崩，太子朱厚照即位，庙号“武宗”，次年改年号为“正德”。武宗即位时年仅15岁，十分宠信刘瑾、谷

大用、马永成等八名宦官，人称“八虎”。“八虎”以执掌钟鼓司的大太监刘瑾为首，他们假借职务之便，终日进奉鹰犬、歌舞、角抵之戏，引诱武宗纵情享乐、不顾朝政。正德元年（1506年）九月，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因“八虎”弄权祸乱朝纲，便联络司礼太监王岳，同时安排六部九卿，准备集体上书弹劾刘瑾等人。但是，这一行动却被礼部尚书焦芳泄露给了刘瑾。于是，刘瑾等人连夜进宫，环跪在武宗四周哭泣，说动武宗先发制人，抓捕王岳等人，由刘瑾接任司礼太监，再任命马永成和谷大用统领东厂、西厂及宫中军务。文官弹劾“八虎”的行动由此失败，刘健和谢迁反遭罢免辞官。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轩然大波。刘秋佩、薄彦徽、蒋钦、戴铣等北京、南京的六部官员纷纷上疏乞留二人，并弹劾刘瑾、高凤等“八虎”罪状。刘瑾知道后大怒，假托武宗诏命，将戴铣等人视为奸党逮捕入狱。

当时，王阳明担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只是一个六品官员，听闻此事后心中愤慨不已，于是向皇帝上书一封，题为《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请求武宗皇帝宽恕戴铣等言官，近忠臣远小人。“臣闻君仁则臣直。大舜之所以圣，以能隐恶而扬善也……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谏之路。”在奏疏中，王阳明言辞恳切，开篇便以“君仁则臣直”直抒胸臆，提到戴铣等人身居言官之任，以言为责，监督百官、规劝皇帝是其职责所在。如果戴铣等所上奏章合理，就应该欣然采纳；即使不合理，也要宽容大度，不能严厉责罚。若是责罚过甚，就会堵塞言路，令百官为之寒心，以后谁还敢不畏权贵，直言进谏？又说此时天寒地冻，南京距离北京有千里之遥，万一戴铣等人病死途中，陛下就要背负残杀谏官之名，致使群臣议论纷纷，到那时就来不及了。所以，希望陛下收回成命，赦免他们。

《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篇幅不长，但王阳明写得入情入理，条分缕析、议论细密，是短篇奏疏中的精品。奏疏全文没有涉及弹劾刘瑾等人的词句，就连“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之名，也有人推测原来是没有的，为



后人整理时所加，可见王阳明当时只想救人，并不想刺激刘瑾，使局势变得更糟。然而王阳明的拳拳之心，换来的却是被关进诏狱的摧辱。“天寒岁云暮，冰雪关河迢。幽室魑魃生，不寐知夜永。”此时正值隆冬时节，狱中阴暗潮湿冰铁透骨，王阳明内心备受煎熬，心灵和身体上的痛苦时常交织在一起，胸中郁闷无处倾诉。一日，抬头望见那皎洁的月光，一时悲从中来，思乡之情爬上了心头，挥笔洒墨作《见月》一诗，诉说着对故乡的深深衷情，“客子夜中起，旁皇涕沾裳。匪为严霜苦，悲此明月光。月光如流水，徘徊照高堂……”

王阳明在狱中一共写了十四首诗，但留世的只有八首。这些诗歌，一方面描绘了王阳明在狱中的凄惨生活，表达了他落寞的心情和对故乡的深深思念；另一方面记载了王阳明不为奸党所动、忠心爱国的坚定决心。尽管狱中生活无比艰辛，但好在结识了狱友林富、刘秋佩等人，他们一同讲学论道，学周文王讲《易》演《易》，作《读〈易〉》诗咏怀，以此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文王被囚禁期间推演的《周易》，充满了忧患之辞，不管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还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都在强调君子应时刻勤奋努力，保持居安思危的警惕性，激励了一代代的仁人志士。而《周易》所说的阴阳变化，揭示了宇宙万物并非一成不变的。因此，困厄与逆境也只是暂时的。这种信念成了王阳明在狱中的重要精神支撑。

历时一个月的囚徒生涯即将结束，十二月二十一日，武宗皇帝正式下诏，宣布对王阳明的定罪结果，并将其带到午门外廷杖四十，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载：“疏入，亦下诏狱。已而廷杖四十，既绝复苏。寻谪贵州龙场驿丞。”王阳明所受廷杖之刑，始于东汉光武帝刘秀杖打大司空刘据，其后的历朝历代都有关于廷杖或与之相似的记载。时至明代，廷杖作为一种法外刑，“杀人至惨，而不利于法”，愈演愈烈，不断规模化、制度化，逐渐成为皇帝惩罚忤旨朝臣的一种平常手段，武宗正德时期，对廷杖的施用达到了顶峰。王阳明受此刑罚，还能安然无恙，可谓不幸中的万幸。

出狱前，王阳明与狱友一一告别，并作《别友狱中》诗以咏怀。“讲诵未

能辍”“至道良足悦”，只要能在追求圣贤的道路上前行，即便身陷囹圄，王阳明也充满了乐趣与满足。“行藏未可期，明当与君别。愿言无诡随，努力从前哲”，直至诗的结尾，王阳明仍不忘自己依循正道、追随先哲的志向。这是他对好友的话，也是自我的内心独白。前方这条漫长而未知的旅途，注定充满曲折与挑战。还未整理好心中的思绪，王阳明就踏上了离开京城的路程，准备前往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贬谪之地——贵州龙场。



中国阳明文化园内王阳明雕塑像



## 千里赴谪

彰义门是金代中都城的西门，到了明代虽已废弃，但在民间，人们仍然称呼这一带为彰义门。历史上，这里是从陆路进出北京的重要通道。正德二年（1507年）的闰正月初一日，被驱逐出京的王阳明正是从这里开始了他千里赴谪之路。与他一同被贬的还有李梦阳这位挚友。两人结伴出京后，过白沟河凭吊古战场，行至卫水后分手。之后，王阳明独自一人南下，在三月抵达杭州北新关。此时的江南已是莺飞草长，在绮丽的春光里，舟车劳顿的王阳明迎来了一个意外之喜，他的三位弟弟守章、守俭、守文早已守候在杭城，迎接着他的到来。九死一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没想到还有机会和家人团聚，劫后余生的王阳明又悲又喜，提笔写下了《赴谪次北新关喜见诸弟》一诗来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已分天涯成死别，宁知意外得生还”。

兄弟久别重逢本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可是此时守章等人却给王阳明带来一个坏消息。原来，京城中的政治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王阳明南下的途中，受到刘瑾等人蛊惑的武宗皇帝，将一众仗义直谏的官员列入“奸党”名录，予以公示。而王阳明之父王华也受到牵连，降为南京吏部尚书。此时的王阳明犹如风暴中心的一叶孤舟，其命运已非自己能掌握了。他知道，历史上的“党禁”是残酷无比的，被贬的官员无一不是被驱逐到烟瘴之地，永不叙用，政治生涯终结，自身性命也朝夕难保。根据《赴谪次北新关喜见诸弟》一诗推测，或许就在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单”的那一刻起，王阳明对赶赴龙场驿之事产生了迟疑，他说“携汝耕樵应有日，好移茅屋傍云山”。“我们弟兄不如躲起来过着隐居的生活吧”，匆匆忙忙又慌慌张张，王阳明无奈做了一个抉择。

待心情稍微平复后，王阳明暂时留在杭州的南屏、净慈、胜果等寺庙养病，这时徐爱、蔡宗尧等人正式前来入门拜师。从三月到七月，王阳明与诸弟

子讲学论道，遍游杭城山水名胜。然而看似风平浪静的生活背后，实则暗流涌动。在这期间，王阳明正酝酿着他的隐遁计划。八月中旬，王阳明突然诡称投江自沉，实际上却溯钱塘江而上，取道江西，遁入武夷山中。王阳明的这段经历，颇有传奇色彩。据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记载，王阳明抵达杭州后，刘瑾随即派刺客来监视其一举一动。王阳明自度免不了要遭毒手，于是托言投江，然后乘船去了福建。上岸后不小心误入虎穴，后又被一寺僧收留，在寺中偶遇了二十年前在南昌铁柱宫结识的道人。道人为他指明利害关系，称如果王阳明一走了之，万一刘瑾迁怒其家人该如何是好。于是王阳明问卦，得“明夷”，意为在面对困境时，应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勇敢面对，而不是选择逃避或者放弃。因此，王阳明决计赴谪。王阳明的这些奇遇当然不是事实。多年后，其好友湛甘泉道破了真相，他说王阳明杜撰出这些奇遇是为了“佯狂避世”，两人在滁州会面时，王阳明也吐露了其打算隐遁避祸的实情。有学者考证后认为，王阳明本想逃入武夷山中，但当他实地考察后，认为武夷山并不是个好去处，于是就放弃了这个念头。王阳明此举弄巧成拙，于是在归来后，为掩盖其逡巡滞留，不赴龙场之“罪责”，而神化了此次游历。后人之所以津津乐道于王阳明的这些神奇经历，主要原因在于钱德洪将之视为信史，记录在了《年谱》之中。

总而言之，王阳明经过一番波折后，最终还是决定远赴贵州龙场担任驿丞。他沿着原路返回，至浙江金华后又取道安徽芜湖，前往南京为父亲祝寿，然后才返回家乡绍兴，为赴谪做最后的准备。在此期间，王阳明的心理还有过波动，他或许考虑过以死明志，其心路历程可从其所作《田横论》窥见一斑。田横为战国时齐国贵族，齐为秦所灭。秦末爆发陈胜、吴广起义后，田横也称王，起兵反秦。中原逐鹿，汉高帝刘邦成为最终的胜利者，田横不肯向汉称臣，于是便率500门客逃到海岛上居住。刘邦遣使招抚，不愿受辱的田横在赴洛阳谒见的途中自杀，其500门客闻讯后亦皆自杀。对于田横，王阳明如是评价说：“知死之为义，而不权衡乎义，勇有余而智不足者也。”他认为，即使知



道了为义而死但又不用义来权衡生死，是勇有余而智不足。王阳明又说：“死生利害攸于吾前，吾惟权之于义，则从违可否自有一定之则，生亦不为害仁，死亦不为伤勇。”他所面临的生死抉择，与当年的田横如出一辙，是舍生取义、保住名节，还是顽强生存、自强不息？在他看来，无论是生是死都有一个权衡的标准，那就是是否符合“义”。如果符合心中的道义，那么委曲求全，保全有用之身，是智且勇的做法，并不会损害道义，“生亦不为害仁，死亦不为伤勇”。处于这样的心境，王阳明在次年的正月初一日启程，勇敢地踏上赴谪的旅途。

王阳明西行的路线是这样的：他依旧沿着钱塘江逆流而上，从浙东的绍兴来到浙西的衢州；进入江西后，于元宵节抵达广信府（今江西上饶市），然后又经南昌、分宜、宜春、萍乡，进入湖南境。在长沙停留多日再度动身，他渡过沅江，又相继过武陵、溆浦和辰溪，最终于当年的三月初进入贵州境。虽然此时的王阳明是一个流离文士、天涯逐臣，但经过隐遁失败的风波后，他逐渐将失落、恐惧等不良心态慢慢放了下来。从他这一路所作的诗文来看，这几千里的路途，非但不是令人望而却步的畏途，反而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清游。在单调乏味的旅途中，王阳明用一副热心肠来观凡物，发现其中别样的乐趣，如留宿在浙江开化的草萍驿时，“山行风雪瘦能当，会喜江花照野航”，在江西上饶时，“楼台灯火水西东，箫鼓星桥渡碧空”。这些普通的景致，在他的笔下变得如此妙不可言。

一路上，王阳明还随处游览所经之地的名胜古迹，借古抒怀。在宜春，他游览了渴慕已久的仰山和宜春台，他在诗句中写道：“却笑韩公亦多事，更从南浦羨滕王。”韩公指的是唐代大诗人韩愈。韩愈被贬到此地时，也凭借着此地怡人的山水风光来纾解愁苦。王阳明又比韩愈要乐观、豁达一些，他开玩笑地说，韩愈竟然以没到滕王阁一游为遗憾，言下之意是，这里的风光比滕王阁更好呢。在萍乡，他拜谒了纪念北宋先儒周敦颐的濂溪祠，表达了敬仰之情，“千年私淑心丧后，下拜春祠荐渚苹”。在湖南洞庭湖畔，他以饱满的感情凭吊屈原，并以这位贤哲自比，将自己报国无门、反遭奸佞迫害的忧愤之情表现得淋

滴尽致，“累不见兮涕泗，世愈隘兮孰知我忧”。

更为重要的是，王阳明这一路走来，不断访友论学，一直进行着对重新建构儒学体系的思考。在长沙，王阳明在故人的陪同下，游览了岳麓书院，探寻了北宋大儒朱熹和张栻在此讲学的足迹，之后又写了一首诗，隐晦地说出自己对程朱理学的质疑：“两贤去邈矣，我友何相违？吾斯未能信，役役空尔疲。胡不此簪盍，丽泽相邀嬉。”他多么希望有机会能和士子们切磋学问，辩论朱学是非呀！同样是在长沙，王阳明在写给学者淡然子的序中，更为直接地表达了他的心学思想，“人，天地之心”，“尽己之性，而后能尽人之性，尽万物之性”，“人物各有禀，理同气乃殊。曰殊非有二，一本分澄清”，分别阐述了“心本体”“万物一体”“心即理”的哲学思考，成为其日后构建心学的重要基础。

王阳明的千里谪途，不仅仅是欣赏了大好河山，增长了见识，更是进行了一次对心性的磨炼和对学问的思考。他的心学犹如一颗刚种下的种子，等待着阳光雨露的滋润，从而破土而出。这一契机正是他进入贵州后的谪居生活。

## 玉屏获慰

在今天的贵州省铜仁市南面，有一个玉屏侗族自治县，湄阳河贯穿全境。河之北是高耸入云的武陵山主峰梵净山，河之南则为绵延不绝的苗岭。玉屏在明朝时被称为平溪卫，清雍正五年（1727年）才改为玉屏县，县名取“流水如玉、青山似屏”之意。王阳明千里赴谪，进入贵州的第一站就是平溪卫。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朝时的贵州地图，平溪卫在贵州布政使司思州府（治所为现贵州岑巩县）辖境内，东边紧挨着湖广行省。从地理上来说，王阳明抵达平溪卫是“初入黔地”，但从实际辖区看，又可以说还“未入黔地”，这就和明朝的卫所制度有关了。《明史·兵志》载：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

明太祖朱元璋通过武力扫平群雄，建立明朝后，对元朝的军事制度进行了一番改革，从京师到全国各地的军事要地均设置了卫所，并安排了数量不等的驻军。这些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管辖，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又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划片管辖，都指挥使司下辖若干个卫，卫下辖一定数量的千户所和百户所。平溪卫是洪武年间所建，是当时贵州境内的军事驻地。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明朝的地方治权是“三权分立”，管民政的叫布政使司，管军事的叫都指挥使司，管监察的叫按察使司，三者互不统属。布政使司辖区和都指挥使司辖区不一定重合，例如平溪卫虽然在贵州布政使司境内，但其军事管辖权却属于湖广都指挥使司，镇远、偏桥等贵州境内的卫所同样如此。这样的地方制度设计，有何深意呢？

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中原后，将目光移到了西南边疆，欲将云贵高原纳入版图。按照他的部署，明朝大军从湖南出发，途经贵州，一举平定云南。此役后，朱元璋深刻认识到贵州对于稳定西南边疆之重要性，正如明朝地理学家顾祖禹指陈天下形势时所说，贵州虽然偏处一隅，但为西南诸省驿道的必经之路，具有很大的军事价值。驿道从贵州东部的平溪卫、清浪卫（今贵州镇远）一路向西北方向延伸，有一千六百余里。贵阳作为省会，犹如人的胸腹，其东西方向诸卫所犹如人的双臂，起到保护胸腹的作用。其中偏桥卫（今贵州施秉）和铜鼓卫（今贵州锦屏）正当湖南沅州、靖州要冲，守住这里可以阻挡从沅、靖方向来的军事威胁；普安卫（今贵州盘州）和乌撒卫（今云南镇雄）临近广西和云南，守住这里，则从邻省来的军事威胁就难以奏效；扼守住平越卫（今贵州福泉）和永宁卫（今四川叙永），则可以压制住来自巴蜀方向的军事威胁。这是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布局的。如果从主动进攻的角度看，命一军出沾益（今云南宣威），牵制湖南方向的援兵，另外出疑兵逼近湖南的辰、沅两地，实际上大军奔向湖北，如此湖南武陵、澧阳一带的防御力量两不兼顾，不知其所守。这样一来，攻克中原的腹心荆襄地区就变得容易了，控制了荆襄就等于控制了天下的要害之处。如上所述，鉴于贵州为西南诸省交通枢纽的地缘特征，朱元璋在贵州境内设立了数量众多的卫所，分布驻扎了30万大军。这些卫所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东西向较多，南北向较少，显然这些卫所是沿着从贵州通往云南、四川的交通要道而设立，一旦西南有变，朝廷可迅速调动军队和物资平叛。因此，川、滇的稳定有赖于贵州的稳定，贵州的稳定有赖于强有力的军事控制。明朝地方上“三权分立”原则，使贵州与湖广交界处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平溪等卫所就像是湖广都指挥使司伸向贵州腹地的一只触手，其用意就是从军事上更好地控制贵州，从而达到遥制西南诸省的目的。处于军事要冲的平溪卫，虽然人少城小，但修得固若金汤，易守难攻。该城“周围一千一百二十丈，高一丈二尺，宽一丈二尺，垛九百五十一个，城门楼五

座，月城三座，转角楼四座，得胜楼一座，水窠七处。城下有马道，便巡。东北城垣倚水可守，西南跨山，人烟稀少，四方城垣坚固”。这就是当时平溪卫的概况。

既然贵州的卫所是沿着交通要道而设，往来于贵州的谪宦、商贾通常会选择这些大道赶路，一是有坦途可供行车、骑马，二是有官驿可供歇脚，三是有汉族军民驻扎，人身安全也更有保障。王阳明入黔的路线就选择了从湖广至贵州的必经之路，沅水驿——平溪卫，“其地咽喉于滇黔，其界交错于铜（仁）黎（平）”。正德三年（1508年）三月上旬，就在这个地理节点上，王阳明结识了一位新朋友，他叫王文济。从王阳明抵达龙场后，两人来往的诗文推测，他的这位新知可能也是一位谪官。王文济本来在湖广任职，是一位知县甚至知府。王文济在任时，因普遍的苛政引起了农民的反抗。他体恤民瘼，主张安抚，结果遭到镇压派的非难，追究他的责任，上级便拿他问罪，他因而被降职，贬到贵州做参议。该官职为布政使的属官，从四品，无定员，分守各道，并分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等事，俗称“少参”，因此王阳明称呼他为“王少参”。“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样的遭遇让王阳明和王文济两人惺惺相惜。两人曾经在驿馆里有过一番促膝长谈，互相倾诉自己的苦衷，并以诗歌来相互宽慰。王文济首先抛砖引玉，写了一首诗赠予王阳明，这首诗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王阳明的“和诗”题为《平溪馆次王文济韵》。

“和”指的是唱和，有点类似民间的“对歌”，一方先写一首叫作“原唱”，另一方需要赋诗作答。答诗分为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叫“次韵”，即用“原唱”的原韵原字，且先后次序都需相同。“和诗”既是朋友间表达友善的文学方式，也是极有难度的才艺比拼。不过这对深谙此道的王阳明来说是信手拈来，他的诗是这样写的：

山城寥落闭黄昏，灯火人家隔水村。

清世独使吾职易，穷途还赖此心存。  
蛮烟瘴雾承相往，翠壁丹崖好共论。  
畎亩投闲终有日，小臣何以答君恩？

溧阳河对岸的小山村闪烁的灯火预示着黄昏过后，夜幕降临，卫城的城门在此时也关闭了，四周陷入一片寂静。这首七律的首联通过“山城闭”“黄昏”“灯火”等意象，营造出孤寂清冷的气氛，恰如两人此时此刻的心境。颔联借景抒情，是自嘲也是自我安慰。清平盛世处处美好，本来可以大展抱负，为何我们却落得个贬职的下场呢？此时的王阳明想必会想起自己少年时做圣贤之志和经略四方的宏图远猷，抑或是在京城供职时以文会友的欢快惬意，如今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下一句笔锋一转，王阳说明说，穷途末路但初心不改，他不会就此消沉下去。安慰了自己之后，王阳明也没忘记和他同病相怜的王文济，他在颈联中说道：“在这样蛮烟瘴雾的恶劣环境下，感谢有你的相伴。我们一路互相扶持宽慰，共同欣赏那翠壁丹崖的美景，也是快事一件呀！”王阳明好不容易平复的心情，在尾联突然急转直下，对未来的前途表达了深深的担忧。他反问自己：“归隐田园的日子总会到来，可是报答君恩的机会还会再有的吗？”在这样的境遇下，王阳明思考的仍然是为国效力，为君父解忧，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夫为人臣者，上有益于国，下有益于民，虽死亦甘为之”。王阳明表达出的情绪，绝不是失去仕禄的遗憾，而是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封建纲常伦理的熏陶下，心迹的自然流露。这首诗的感情基调一波三折，充分表现了王阳明的矛盾心理。

带着王文济的宽慰，王阳明将要重新启程，在前方的龙场，等待着他的会是什么呢？在600多年前，唐代大诗人韩愈曾因谏迎佛骨，触怒了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对于贬谪生涯，韩愈万念俱灰，他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中写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

边。”同样是直谏被贬，但面对这一巨变时，王阳明与韩愈两人的心境却大不一样。韩愈自认为等待自己的将是必死之地，而王阳明早早就坚定了要活下去的信念，等待他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生的不仅仅是他身体的躯壳，更是他不朽的思想。

## 黄平月潭寺论“君子之政”

兴隆卫，即现今的黄平县，位于贵州东南部。此地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且兰文化，是贵州历史上郡、府、州治所及县置较早的地区之一。黄平之名源出旧州，因旧州地平土黄而得名。在黄平县城东北方向的东坡乡圣果桥畔，有一组别具特色的古建筑群——飞云崖，为贵州著名的游览胜地。从古至今因其独特的自然风光，让游览之人无不身心愉悦，流连忘返。

飞云崖，最初名为东坡山和月潭，是一个巨型钟乳形成的奇特窟窿，窟窿垂珠滴乳，如云朵漫天天际，因此又得名“飞云”。在明代以前，飞云崖周围荆棘密布，人迹罕至。直到明朝设立兴隆卫，驿道经过崖前，才逐渐有行人到此游览。正德三年（1508年）春，在赶赴龙场的路上，王阳明经过兴隆卫，登临飞云崖顶，一幅异域风情画卷尽收眼底，令其惊叹不已。突然，他想到贬谪之路依然艰险难行，每前行一步，便离家乡又远了一些，思乡之情愈发浓烈，于是题诗于墙，慨然写下《兴隆卫书壁》。诗云：

山城高下见楼台，野戍参差暮角摧。  
贵竹路从峰顶入，夜郎人自日边来。  
莺花夹道惊春老，雉堞连云向晚开。  
尺素屡题还屡掷，衡南那有雁飞回？

王阳明的这首《兴隆卫书壁》，既描绘了边地山城的瑰丽景致，又抒发了他对故乡的深深思念。透过诗文，仿佛跟随王阳明的目光，一起俯瞰这山城的楼台参差、戍所错落、暮角声声的壮丽；一起欣赏着春花夹道、雉堞连云、晚霞



绚烂的柔美；一起感受着苍凉的意境和悲凉的心境相融合；一起体味着一步步具体化、形象化的思乡之愁。“尺素屡题还屡掷，衡南那有雁飞回”，一封饱含深情的家书，他写了扔、扔了又写，因为他深知黔路之险，连传书的鸿雁也不肯来。这种无人倾诉也无可言说的失意与悲愁，以具象化的笔触，在这个夜晚被刻画得细致入微，深入人心。

飞云崖的山脚下有一寺庙名为月潭寺。月潭寺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600 年前。那时的月潭寺还不叫月潭寺，只是一个僧人结庐修行的地方，名为普陀寺。正统年间，有游僧来此兴建寺庙，因为寺前有月潭，因而取名为月潭寺。



月潭寺

为了修建月潭寺，当时的兴隆卫指挥使常智带头号召民众一块捐资，建设正室，并在中间塑了一法像。自此，月潭寺就因“金碧丽美，茂林修竹，环拥芳翠”逐渐被世人所知晓。

在飞云崖选址建寺，除因四周风景之秀美外，还因为飞云崖有着独具一格的清净和安宁。清代官员田雯在贵州任巡抚期间，曾作《黔书》二卷，记载了有关于飞云崖的一则有趣故事，说“岩性好洁，昔有信宿于此而身垢者，既去，则瀑水突至，弥漫山椒而浣之。再垢，复浣”，意思是飞云崖生性就爱干净，曾经有人身着污垢在此连住两夜，待此人离开后，崖上突然落下一股瀑布，并浸满了山椒，以此涤除污垢。之后，飞云崖上只要沾染上了脏东西，就会出现瀑布冲洗岩石的奇观。在田雯笔下，飞云崖仿佛一个拥有了强大净化力的生命体，时刻保持着清澈和纯净的模样。她不排斥世人的到来，反而让人心情平和，不自觉地驻足停留。细细品读，仿佛就能理解为何会在此地修建佛殿。

作为明清时期西南几省的冲要之地，官员士卒、商旅行人途经飞云崖时，大多会在月潭寺歇脚休整。但几年后，因南方少数民族入侵，月潭寺也遭受了一定的破坏，虽然没有完全被毁，但也由此冷落了下來。王训《东坡月潭寺记》里详细记录了此事，当面对入侵者，寺院僧人舍生忘死，正襟危坐，大喊“愿杀我于郊，勿秽佛宫”。对他们而言，佛门乃清静之地，要禁绝一切荤腥，所以尽管是面临自身的死亡，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鲜血玷污了佛门。或许正是因为僧人们誓死以守的大无畏精神，才使得月潭寺得以保存下来。而这与田雯所述飞云崖“岩性好洁”故事的精神内核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到了正德三年（1508年），贵州地方官朱玘到此地任职，有感于飞云崖之美景，过往行旅之艰，于是号召当地人重建月潭寺，供百姓祈求福佑，并在此建楼三间，供过往之人休息，名为月潭寺公馆。在重建过程中，僧人正观和指挥逃远各司其职，一个指挥调度，一个估算工程；各家各户也毫不吝啬，有力的出力，不到两个月就大功告成了。碰巧这时王阳明路过此地，住宿在公馆

内，僧人正观请他为重建月潭寺一事作记，王阳明便写下《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这篇名文。

王阳明历来不喜应酬诗文，故此记虽是应他人之邀约创作的文章，但却没有应酬之文那言过其实的恶习，一字一句都是王阳明的真实感受。在记中，王阳明不仅将月潭寺重建一事详细地记载了下来，还字字珠玑，使月潭之玲珑奇妙跃然纸上：“其上湏洞玲珑，浮者若云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楼殿门阙，悬若鼓钟编磬，檐幢缨络，若抟风之鹏，翻集翔鹤，螭虺之纠蟠，獠猊之骇攫，譎奇变幻，不可具状。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测之洞，环秘回伏。乔林秀木，垂荫蔽亏。鸣瀑清溪，停洄引映。”

云贵地区虽然是西南边疆，有“一夫当关”之险，明代吴维岳更曾言：“贵州遐壤杂夷，中原土彦非膺命不莅，商旅非入滇不经。”但飞云崖拥有的丰富而独特的山水景象，不仅让王阳明为之倾倒，还留下了徐霞客、何绍基、林则徐、和珅、郑珍、鄂尔泰等人的足迹，成了贵州境内史籍记载最详、文人题咏不绝的名胜之一。清代官员钮祜禄·爱必达在贵州任职时，称月潭寺为“黔中第一奇境”。贵州巡抚都御史邓廷瓚有诗句曰：“幻出南海释伽景，移来西筑兜率宫”，“门前流水更清澈，仙源似与银河通”。贵州监察御史王鉴将月潭寺的景色和个人心境之变化娓娓道来，“半空宝刹云中见，一脉芳泉石罅流。竹色满窗侵酒肆，梅花几点落茶瓯。只因方外无尘鞅，消尽胸中万古愁”。还有贵州按察副使沈庠、贵州按察僉事罗昕、郡人周瑛等等，都用极其细腻的文字将月潭古寺的自然风光与浓厚的寺院氛围描绘得生动传神，令人心生向往。

关于重建月潭寺之缘由，王阳明记载得颇有深意，他说：“寺渐芜废，行礼无所。宪副滇南朱君文端按部至是，乐兹岩之胜，悯行旅之艰，而从士民之请也，乃捐资庀材，新其寺于岩之右，以为厘祝之所。”明朝洪武年间，贵州出现了一次移民高潮。这些移民绝大部分是汉族人，主要通过军屯、民屯、商屯的方式，从四川、湖南、江西、湖北等地迁入贵州。他们的到来，

一方面扩大了屯堡人占有的土地和势力范围，稳定了军心；另一方面，来自内地的先进文化冲进尚在半原始状态的贵州，极大地带动了贵州的发展。“俗尚如实，士君子秀而文，其氓勤而务本。人多气节，不异中州。文教丕振，风气和平。不喜争讼，乐于恬退。”大概意思是说，当地民风淳朴，对文化教育十分重视，其人多有气节，并不亚于中原汉人……贵州宣慰司的中原移民在日常事务中还多采用“朱氏礼”（《朱子家礼》），“冠婚丧祭，多用朱氏礼”，“布政周瑛崇用朱氏家礼，冠婚丧祭悉举行之”。这正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相互融合带来的和谐景象。大规模的移民，实际上是以人为载体的“文化大搬迁”，将农耕技术、工艺制造、中原式建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整个汉文化体系完整地移植到贵州这块土地上，从而改变贵州的文化面貌。其中，岁时、岁事、时节、时令等事，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一种重要习俗活动。

月潭寺是由僧人建造的场所，每当岁时节令之时，附近的居民就会到此祈求福佑。可见，月潭寺是民间百姓进行祭祀礼仪的一个重要场所，也是实行“朱子礼”的一个重要途径。“不学礼，无以立。”因此，重新整修渐渐荒废的月潭寺，除了想让来往之人得以休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恢复当地百姓的礼仪活动，让他们得以在井然有序的礼仪秩序中继续开展社交活动，不至于忘却“尊君亲上之礼”。在朱玘看来，重修月潭寺就是顺应天道的一个行为，他想不到不做这件事的理由。王阳明也对此事表示了较高的认同，称赞道：“自是饥者有所炊，劳者有所休，游观者有所舍，厘祝者有所瞻依，以为竭诚效诚之地，而兹岩之奇，若增而益胜也。”

初至月潭岩，在感受此地山水之美的同时，王阳明感怀朱玘重修月潭寺，恢复礼节一事，更触景生情，发出了“君子之政”“君子之教”的感慨：“予惟君子之政，不必专于法，要在宜于人；君子之教，不必泥于古，要在入于善。是举也，盖得之矣。”这句话的意思不难理解，王阳明认为君子之政，不在于法而在于人；君子之教，不应该墨守成规，只要是教导人向善就好。这是对当

地百姓风俗习惯的有感而发，也是王阳明由朱子之礼延伸的一种新的思想，即主张为政以德，重视道德教化的思想，是王阳明对政治最为理想化的一种期待，也是其心学对政治的基本立场。

“人”与“善”一直是王阳明所重视的对象和处事原则。人即是仁，良知即是善。因此需要以德去为政，以良知来教化。即便是在远离中原的少数民族地区，礼俗的本质与中原是一致的，所以当权者要以人为本、开导教化、引人向善。《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中提到的“君子”，和王阳明晚年所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中的“大人”可看作一类人。可以说，关于“君子之政”“君子之教”的论述，不只是王阳明想对国家统治者们说的，也是他对朱玘等千千万万个地方官员所说的，更是王阳明一直身体力行的实践。被贬入黔的王阳明虽然一直被贵州那独特的自然风光所治愈，但始终有种弃置荒凉的疏离感。在这种环境下，他却仍能思考“君子之政”“君子之教”，着实令人钦佩。正是王阳明对民众教化的这一独到理解，才使得他后来和龙场的百姓相处得如此融洽。

在《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的结尾，王阳明戏谑地说道：“如果法律过于严苛，众人无时无刻不在担忧恐惧，动辄担心遭受触法之牵连，无一不坐立难安，那又如何在水山美景中享受独属于自己的那份恬静与安宁。而想要一举一动都无愧于心的人，也只能遵循世俗之常情，不能做到把外来的（利害）看得轻，而自己的心中有定见了。”这段话一方面以打趣的口吻，表达了其对时局的不满，抒发了无辜被贬的孤寂苦闷与抑郁忧伤之情；另一方面又隐隐道出了对未来谪居生活的期许和憧憬。可以预见，前所未有的龙场生活所带来的心境变化，势必会不断磨炼王阳明的心志，为他践行“知行合一”创造源源不断的机会和条件。

如今的飞云崖古建筑群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踏入景区，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古朴、雄伟壮观的石砖结构牌坊式大门，“黔南第一洞天”六个金色大字赫然在目。崖内建筑高低错落，掩映在参天的古柏与银杏之中，颇

有“深山藏古寺”那深邃而悠远的意境。登临崖顶，直入云霄，极目眺望，无边景色。崖间有三个形态各异的古洞，分别坐落在崖左、崖右和崖半。“莲蕊洞”因洞顶倒悬一株“石莲”，如含苞吐艳，故有此名；“嘉禾洞”洞内滴乳，形成了“千丘田”的奇观；“螺蛳洞”曲径幽远，深邃神秘。每逢黄平“四月八”传统节日，方圆数公里内的各族人民还会来此举办集会，着盛装吹芦笙、跳踩鼓舞、对唱苗族古歌，共庆佳节，热闹非凡。

## 凯里思索“安民之道”

凯里市炉山镇在明代称作清平卫，位于贵州东部。彼时，这里既是一个县级地方行政区划，也是一个军事卫所，系卫、县军民同城同治。“凯里”地名始于元代，是苗语音译，意为“木佬人的田”，也有“开垦田地”之说。洪武五年（1372年）置凯里长官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置清平堡，弘治七年（1494年）改设清平县，隶属贵州布政使司都匀府管辖，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之地。

当王阳明沿着崎岖的贵州山道进入清平卫时，正赶上雨后初霁。在清平卫，王阳明考察了军屯治所一带的景致和少数民族生活状况，恰巧碰到一起少数民族间相互械斗的仇杀事件，便将所见所闻所感以诗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创作出这首《清平卫即事》：

积雨山途喜乍晴，暖云浮动水花明。  
故园日与青春远，敝缁凉思白苎轻。  
烟际卉衣窥绝栈，峰头戍角隐孤城。  
华夷节制严冠履，漫说殊方列省卿。

贵州素来是多雨地区，民谚有“天无三日晴”之说。从此诗中可以推测，王阳明连日来行走的山间小道上，又受到雨水侵袭，湿寒入骨，心情自然较为低落。到了清平卫，突然雨过天晴，天空澄碧，纤云不染，和风散发着暖意，其心境便舒畅明快了许多。但天气渐渐转暖，而王阳明还穿着旧棉衣，一路走来，愈发觉得炎热难行，于是不由得感慨道，如果此时身穿苧麻单衣，肯定会更加轻盈舒适。在这首诗里，王阳明巧妙地运用季节的变化来衬托旅途的漫长

和久远，从而引出思念故乡的情绪：这一路已经走了很久，离开故乡的路也越来越远了，怎么能不日夜思念呢？

抒发一番客途愁绪之后，王阳明看到了让他忧心的一幕：远处燃起烽烟，被山峰遮挡的孤城响起了号角，这是即将发生武装冲突的一种警示。在当地，不同部落的少数民族之间常有相互仇杀的行为发生，造成地方上的动荡不安。如当地的仡佬族就“有仇则提戈相戮，或剝牛召众为报复”，而黑苗族亦“有不合，虽父子亦相攻杀。屠牛召兵，不可以德化”。经过此事，王阳明发现，清平卫虽已纳入中央郡县的治理体系，但由于治理方式的问题，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致使此地治理效果不佳。于是他提出“华夷节制严冠履”的观点，强调要加强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教化和管理工作的。

王阳明为何有此感慨？这就要从清平卫是时的具体情况来看了。明代中期，当地汉族“语平讼寡，力田务本”，民风淳朴，敦尚礼仪，鲜有诉讼，男子耕读，女子纺织，这是典型的汉族文化特征。而少数民族“附卫诸夷，风俗异尚”，如“仡佬”“杨黄”“仲家”“大家”，虽然在某些方面与汉族风俗存在相似之处，但依然保留着自身的民族特色。“黑苗”“东苗”“西苗”则几乎完全保留着原始民族风格的服饰，有着极具特色的生活习惯和民族特点。

据史料记载，清平卫早在正统八年（1443年）就设立了卫学，传授礼、乐、射、御、书、数等儒学六艺课程。时任贵州宣慰使司儒学教授的王训曾专门撰文以记此事，提到当时治理清平，先是用兵威，后又施以教化，认为“自后德化及民，日趋于礼法之中”，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系列的教育改良政策效果会愈发显著，儒家文化的影响也会愈发深远。但现实却并非如此。王阳明认为，当地治安混乱的状况，与官员的不作为或履职不到位有着直接关系，对此他间接地提出了批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作为来自中华文化核心圈的代表人士，初次踏入贵州，没有和少数民族同胞一起生活过的经历，当然也就缺乏对他们的深入了解，因此他在《清平卫即事》中所提出的民族政策，还是基于传统的观念与认识。他此时主张的少数民族地区教化观也仍然是站在中原

王朝和传统民族观的角度说的，也就是中国古代史上常说的“华夷之辨”。但“华夷之辨”中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少数民族常常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

王阳明抵达龙场驿后，渐渐地融入了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之中，被他们热情、正义、善良、勤劳的品性所感染。王阳明一方面传授当地土民歌诗习礼，一方面也积极地向他们学习生活、生产技术，真正实现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他的民族观也是来到贵州后才逐渐形成与完善的。通过梳理王阳明的一生成迹，可知他曾与贵州的彝族、苗族、侗族、仡佬族，江西的畲族，广西的壮族、瑶族同胞都有过频繁而深入的接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形成了自己对少数民族的基本认知和对民族问题的基本看法，并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民族地区治理政策，最终形成了自己灵活有效地处理民族问题的思想体系，即平等性与包容性，这就是真正以民为本的“安民之道”，值得继承与发扬。

其实王阳明“安民之道”的精髓在“亲民”思想，而“亲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我国的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阐述，其中的代表是朱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王阳明“亲民”思想显然上承古本《大学》之要义，早年批评朱熹改“在亲民”为“在新民”重教不重养，晚年在《大学问》中形成完整的“亲民”学说，成为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要旨和一生的执政理念。

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学习与汲取了尧舜、孔孟以来的圣贤思想精华，同时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王阳明认为“亲民”的核心道德是“仁”，并用于教化民心。而“孝”是行“仁”之本，是仁道的工夫起点。尽孝不是仅仅爱自己的父母，还要推己及人，爱天下所有人的父母。晚年王阳明在“越中三记”（《尊经阁记》《亲民堂记》《浚河记》）中，更是把亲民思想发扬光大，推向了极致。经过王阳明的点拨指教，绍兴知府南大吉命名其莅政之堂为“亲民”，每日在“亲民堂”自励勤勉，并以“亲民”为毕生职责，成为绍兴历史上的著名清

吏。王阳明为其写下《亲民堂记》。另一篇《浚河记》，同样是为兴修水利做实事的政绩观鼓与呼，为民心树碑，为历史作证。

在现代社会，面临着多元文化交融、不同民族和谐共处等诸多课题，王阳明的“安民之道”所体现的平等性与包容性思想体系犹如一盏明灯。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我们应秉持平等的态度，尊重每个民族的传统和发展需求，为各民族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同时，也要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各民族文化的差异，积极促进文化交流互鉴，从而构建一个多元一体、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种“安民之道”的传承与发扬，不仅是对历史智慧的尊重，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 福泉七盘岭生“归隐之意”

在黔中腹地，有一座被称为“大明边城”的历史文化名城——福泉。福泉古称平越，早在先秦时期，这里是且兰古国的故地。进入郡县制时代后，汉朝又在且兰故地设立了牂牁郡且兰县。这是贵州较早有郡县建制的地区之一。明清时期，平越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清水江界其西，重安江环其南，岩门江贯其中，境内诸水多汇焉以达于乌江。作省会之藩篱，据楚蜀之要害”。平越境内江河众多，诸水汇合后注入乌江，有山河之险。因此，平越是省会贵阳的东部屏障，是朝廷经略楚蜀的要害之地。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朝廷在元朝平月长官司故地置平越卫军民指挥使司，其卫城为指挥李福所建，起初为土城，洪武三十四年<sup>①</sup>（1401年）改为砦石，城墙周长有一千五百丈。在距卫城东五里处，有一座高山，官道蜿蜒经其上，是平越东大门。该处地势“高险崎岖，折旋凡七坡”，故名七盘坡，又有说法称“以盘回七里而名”。无论哪种说法，七盘坡的得名主要突出一个“险”字，有人称“七盘萦纡，高峙城东，险于蜀道”。狭义上的蜀道是指周秦汉唐时期从长安（今陕西西安）翻越秦岭、大巴山，经过汉中盆地通往成都平原的古道交通网络。蜀道蜿蜒于秦巴山地的深谷险峡之中，须伐木架栈行走，故又称之为“栈道”。李白诗《蜀道难》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七盘坡之险更甚于蜀道，从旅客的角度来说，经过此地时最好别骑马，否则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以诗为证：

建节鸣镳度七盘，无人不道马行难。

<sup>①</sup> 此年实为建文二年，朱棣称帝后革除建文年号，故称此年为洪武三十四年。

正思岭表梅关过，误作云中栈道看。  
晴日映林云气紫，晚风吹帽鬓丝寒。  
阳春白雪人难和，一字真成两日安。

尽管七盘坡如此险要，但因其为驿道所经，王阳明在正德三年（1508年）三月离开平溪卫前往平越卫时，不得不以身犯险，直面七盘坡的险要。路逢险要处必有奇景。王阳明由湘入黔后，在平溪赏游了翠壁丹崖，在兴隆惊叹峰顶来路，在清平领略了烟际绝栈，尽管一路上逐渐习惯了贵州的奇山异水，但当他路过七盘坡时仍旧发出了“地多奇景”的感叹：

鸟道萦纆下七盘，古藤苍木峡声寒。  
境多奇绝非吾土，时可淹留是谪官。  
犹记边峰传羽檄，近闻苗俗化衣冠。  
投簪实有居夷志，垂白难承菽水欢。

在这首《七盘》诗里，王阳明把崎岖的山路称之为“鸟道”，意为只有飞鸟才能通过。这里引用了李白《蜀道难》中的一个典故“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用于形容狭窄陡峻的山间小道。山上古藤老树构成了一幅美丽又静谧的画卷，山下的峡谷深处，溪流湍急，轰隆的溪鸣由远而近，逐渐打破了宁静，空气中的水汽也让人顿生寒意。这个峡谷现在是福泉闻名遐迩的游览胜地洒金谷，以“奇险古幽”著称。这里河水潏洄，飞瀑涟漪，细雨蒙蒙，雾气腾腾，白云在岩际间缭绕，山鹰在半空中盘旋，真可谓“人间奇景”。面对这样的奇美之景，王阳明的心思有点动摇了，自己本就是贬官，有的是时间在这里驻足欣赏，可是这里毕竟不是自己魂牵梦萦的故乡，终究不是久留之地。但当他听闻当地的治安环境大有改善之后，又萌生了弃官在此隐居的念头。原来在平越一带，地方不靖，土著居民相互仇杀和叛乱时有发生，犹记当年，烽火不



熄，深山里不断有紧急的战事传到朝廷。正统四年（1439年），平越苗民金台因土官大肆剥削，奋起反抗，纠众进攻卫城。赖尚书王骥拯救之，卫城得以保全。正统十四年（1449年）四川后洞黑苗乱，战火波及贵州平越、黄平、石阡、思南诸处，此次叛乱直到景泰四年（1453年）才彻底平定下去。弘治四年（1491年），都匀、清平一带的苗酋乜富架、重恶龙等人劫掠乡里，朝廷调川、湖、云、广、贵五省军讨平。此后，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平越当地的治安状况开始好转：

卫中军士多中州缙绅之裔，崇文尚礼，不失其旧。其郊外之民，乃苗、佬、仲家，性凶狠好斗，轻生易死，不知礼义。迺来渐革其旧，服役公庭，衣服言语稍如华人焉。

在平越，汉族和少数民族居民杂处而居。卫城中的士兵大多为中原缙绅士大夫的后裔，仍然保持着崇文尚礼的旧俗。城郊则是苗、佬、仲家等少数民族居民，仍保持着本民族的原始风尚，凶狠好斗，轻生易死，不知礼义。随着和汉人的交往日渐加深，他们的习俗也慢慢改变了，有些人在公家的衙门服役，服饰和语言也和汉人接近。王阳明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说“近闻土俗多改观”，就是指当地居民习汉族语言、服饰、礼仪，原来的“蛮荒之地”，逐渐有了中原礼仪之邦的气象。自然风光旖旎，民风淳朴向善，当“投簪居夷”的念头一闪而过，王阳明又犹豫了起来，“垂白难承菽水欢”。古代官员的帽子是由一条簪子横插进去把它固定在头发上的，“投”，就是丢掉固定帽子的簪子，也就是丢掉官帽，即抛弃官职。但他又想，如果在这里长住下去，又怎能对长辈尽孝呢？这又使他陷于矛盾之中。“垂白”，指白发下垂，形容年老的长辈。“菽水”是豆和水，指粗茶淡饭，生活清苦，“菽水欢”旧时用以称晚辈对长辈竭尽薄力供养尽孝。《礼记·檀弓下》中说：“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谓之孝。”“菽水欢”就是尽菽水之欢，尽供养老人的孝心。那么在

这里长期住下去，要对家中的老人尽孝就难了，怎么不让他矛盾踌躇呢？

王阳明的矛盾心理是其亦儒亦道思想性格的反映。站在儒家的角度看，孝悌是仁之本。作为儒家的忠实信徒，王阳明自然是无法彻底放下“孝悌”二字，这不仅是儒家伦理纲常的体现，更是人的本性，也是王阳明良知学说的起点，“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而在入世和出世的态度上，王阳明则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共同的文化心理，可进可退，始终具有巨大的灵活性，其祖父竹轩翁就是一位“视纷华势利，泊如也”的“隐儒”。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又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自幼熟读儒家经典的王阳明深知，无论顺境还是逆境，迷茫不安的心灵总是会找到一个归宿的。既然当下政治黑暗，何不做一个“隐儒”，将自己藏起来呢？可以仕则仕，可以隐则隐，这样的心态贯穿了王阳明的一生，无论是其政治生涯遇到挫折之时，还是在其匡扶社稷、建功立业之际，隐退的念头时常流露出来，不能自己。而当国家和朝廷又迫切需要王阳明出山“救火”时，他又表现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阳明在滁州任太仆寺少卿时曾写过一首《梧桐江用韵》，为他心灵上的冲突下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凤鸟久不至，梧桐生高冈。  
我来竟日坐，清阴洒衣裳。  
援琴俯流水，调短意苦长。  
遗音满空谷，随风递悠扬。  
人生贵自得，外慕非所臧。  
颜子岂忘世？仲尼固遑遑。  
已矣复何事，吾道归沧浪。

凤鸟就是凤凰。在古代，人们视凤凰为祥瑞，凤鸟至意味着圣王出，从

而天下太平，政治清明。而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时代，孔子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其礼治的政治理想，因此绝望地发出“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感慨。王阳明此诗亦借用了孔子的典故，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他说，在礼乐崩坏的衰世，孔子为实践其政治理想，四处奔走，惶惶不可终日。而我呢，登上高冈，终日静坐，伴着水流声抚琴消遣，让那悠扬的琴声随风飘扬，传遍山谷。没有了外物的牵绊，自得其乐，我的志向就是归隐。

王阳明的隐逸思想还和他青年时的道教情结脱不了干系。道家的修习之术曾是王阳明早年追求的理想之一，湛甘泉将其早年的学术生涯概括为“五溺”，其中第四“溺”即为“溺于神仙之习”。王阳明的道教情结具体表现为：17岁入南昌铁柱宫，向道士请教养生之术；27岁偶然听到道士谈养生，遂有了遗世入山之志；30岁上九华山向异人讨教修习之术；31岁在家乡绍兴的阳明洞，修习导引之术。可以说，道教的隐逸思想在王阳明的内心深处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来到平越后，王阳明头脑中各种思想倾向的平衡，可能会进一步被打破，从而倒向道教了。因为平越是道教圣地，有着深厚的道教文化遗存，传说这里是张三丰的修行之处：

张仙人不知何许人。洪武间来寓高真观，与指挥张信善，教信以葬地，曰：“远远长龙自北来，脉流成右建僧台。前峰凹处堪为冢，若葬真泉步玉阶。”已而，别信曰：“武当山再会。”信恳留，闭之室中。未久，寂然不知其所往。后信以功封隆平侯，监修武当宫观，果再会其人焉。

这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之十二记载的张仙人与平越卫指挥张信的交往过程，极富传奇色彩。张仙人在洪武年间来到福泉，居住在高真观。他与张信交厚，并为张信选了一块风水宝地作为墓地。张仙人离开福泉时跟张信说：“我们武当山再见吧。”张信恳请他留下，并把他关在了屋子里。神奇的是，没多久张仙人竟然不知所踪了。后来张信凭借军功封为隆平侯，奉命监修武当山

的宫观，果然又见到了张仙人。这位神通广大的张仙人，在后世的地方志中被认为是张三丰，并且在当地留下了众多仙迹，例如“福泉山在城内，明张三丰修仙处。山形灵秀，上有高真观、礼斗亭，前有浴仙池，夏不盈，冬不竭……池水云可疗病，四方汲者不绝。亭有三丰手书联。名人题咏、碑刻颇多”，又“仙影岩在城西之倒马坡。坡半见隔山石壁如屏，上有张三丰遗影，首戴华阳冠，侧身杖策西行”。高真观、礼斗亭、浴仙池和仙影岩这些张三丰遗迹至今犹存。尽管未发现文献可直接证明王阳明曾经探访过平越的这些道教遗迹，但以其喜好游历山水名胜的性格，可以推测张三丰的这些仙迹早已被他纳入了游历计划。在畅快的游历之后，王阳明的内心必然会泛起一阵阵涟漪：觅得佳地，在此归隐可好？

综上所述，王阳明在《七盘》诗中流露出来的归隐倾向，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以及其家族文化中“隐儒”的传统和其自身个性气质上的追求等。王阳明隐逸情结中所交织着的进与退、仕与隐、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反映了其所包含的亦儒亦道的思想性格，体现了一种儒道圆融互补的人生境界。值得庆幸的是，王阳明的儒家底色还是要更深一些，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他还是朝着龙场驿出发了，否则历史上会多了一个不知名的清高隐士，而少了一个内圣外王的大儒。

## 第二章

# 阳明先生遗爱处

### 结草为庐

“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又闻天下泉，半落黔中鸣。山水千万绕，中有君子行。儒风一以扇，污俗心皆平。我愿中国春，化从异方生。”唐贞元十一年（795年），“诗囚”孟郊从浙江人的视角远观黔中山水，宽慰好友王楚，并希望他能教化黔中。七百多年后，他的同乡，另一位浙江王姓谪官应命运的安排，用双脚一路丈量黔中大地，在“黔中”腹地——贵州龙场——完成了数百年前他对王楚的寄望。

相传，龙场之名最早出现在宋代，原为每逢辰日互市赶集之所，民间习惯用对应的生肖命名，一般会按十二生肖设置十二个场名。生肖场起源与我国古代干支计时法和民间以十二属相计算人们出生年份的习俗有关，大量存续于唐宋时期，贵州因受汉文化的影响比较晚而多流行于明清时期。贵州至今仍沿用

的十二生肖场镇多达两百处。其中马场居首位存 39 个，龙场排名第二，存 36 个，其余生肖场存数相对较少。“龙场”之名从宋代一直沿用下来，足见此地受汉文化影响是比较早的。

王阳明到达龙场还有很多与“龙”有关的巧合，首先是“龙场”因当地百姓逢辰日赶场而得名，与生肖龙有关；其次，王阳明本人生于成化八年（1472 年），这一年干支纪年是壬辰年，即王阳明本人生肖属龙；再者是王阳明到达龙场时间为正德三年（1508 年），这一年干支纪年为戊辰，亦是龙年，正好是王阳明 36 岁本命年。在汉族传统习俗中，本命年常常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年份，“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的民谣，就是关于本命年不甚吉利的最好写照。故汉族民间通常把“本命年”也叫作“坎儿年”，即度过本命年如同迈过一道坎儿一样。在龙场度过的这个本命年于王阳明来说，也的确算人生中的一道坎儿。

书归正传，龙场驿诞生之前，元朝统治者已在此设置了落邦扎佐等处长官司，并驻重兵守卫。洪武初，贵州水西土司霁翠和水东土司宋蒙古歹归附明廷，朝廷建立贵州宣慰使司，以霁翠为宣慰使，宋蒙古歹为同知。龙场承元制改设为扎佐长官司。《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载，洪武十四年（1381 年），宋蒙古歹和霁翠相继去世，两人职务分别由他们的夫人刘淑贞和奢香代袭。先是同年九月，朱元璋派傅友德为征南大将军，带领蓝玉、沐英等大将举兵 30 万，意在剿灭元朝在南方的最后势力，完成统一大业。南征大军进入贵州后，时任贵州卫指挥使的顾成随傅友德大军出发镇守普定，顾成用计在普定大败元军残余，因此被朱元璋任命为普定卫指挥使，贵州卫指挥使由是暂缺。于是，朱元璋将陕西都指挥使马烨调至贵州，补贵州卫指挥使空缺。

马烨算是贵州历史上不可多见的“基建狂魔”，他在顾成的基础上继续为明廷开拓贵州，组织修建了贵州诸卫城堡、驿传、铺舍、桥道等，且极为坚固雄伟。嘉靖《贵州通志》记载：“（贵州）省城：洪武五年（1372 年）镇远侯顾成、都指挥马烨建甃以石。门五：东曰武胜二卫共守之；南曰朝京；次南

曰德；北城楼三，城铺二十三、水关一，长七百六十丈，贵州卫守之；西曰圣泉；北曰柔远，城楼二，转角楼一，城铺一十七，水关一，长六百一十二丈，前卫守之，南临河，东北有池。”在贵州新建石城耗费巨大，马烨功不可没，难怪后世讹传他要向奢香夫人增收赋税。

民间传言，马烨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一心想用武力灭掉贵州的大土司，建立流官制度，一则便于朝廷的直接管理，二则建立个人功勋，以作升官发财的筹码。正好奢香有一些小问题需要配合调查审问，马烨便借机将奢香抓起来，脱去衣服鞭打一顿，企图借此激怒奢香及其部属，从而引发反叛，最终达到对水西土司用兵并改土归流的目的。此事最早的官方记载来自嘉靖年间田汝成所写的《炎缴纪闻》：“时都督马烨镇守贵州，以杀戮慑罗夷，罗夷畏之，号‘马阎王’。霁翠死，奢香代立，烨欲尽灭诸罗，郡县之。会奢香有小罪当勘，烨械致奢香，裸挞之，欲以激怒诸罗为兵衅……奢香遂与其子妇奢助飙驰见太祖，自陈世家守土功及马烨罪状。太祖曰：‘汝等诚苦马都督乎，吾将为汝除之，然汝何以报我？’奢香叩头曰：‘若蒙圣恩，当令子孙世世戢罗夷，不敢生事。’……奢香既归，以威德宣谕罗夷，罗夷皆帖然慑服。奢香乃开赤水、乌撒道以通乌蒙，立龙场九驿，马匹禀饩，世世办也。”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黔记》对此事的记载与田汝成所言如出一辙。由于田汝成是一位任职过贵州兵巡僉事的谪官，他书中所记的内容常被人们视为信史，后人若不多加考证，很容易以讹传讹。如清代万斯同、王鸿绪撰《明史稿》，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乾隆年间编修《贵州通志》，道光年间编修《贵阳府志》《大定府志》等文献，基本采用了上述说法。

然而，记录明太祖政务日常的第一手资料《明实录》，以及在《明实录》基础上详加考证补遗而撰的《国榷》两书，皆未记录此事，甚至所记多有相互抵牾之处。如《明实录》所载洪武十六年（1383年）正月，“贵州宣慰使霁翠、黎州安抚使苟德、金筑安抚使密定等俱遣使来朝，贡马。”同年六月，“贵州宣慰使霁翠、宋诚贡马。赐以文绮、纱錠。”洪武十八年（1385年）正月，“贵

州宣慰使霭翠上表，贡马及方物。”与田汝成一众人等所记内容对比，此两个事件时间点上，霭翠已经去世数年之久，怎么可能入朝觐见朱元璋？

其实，无论是田汝成还是郭子章之言，都是“具体事件”发生近百年后的记载，信息加工失真乃不无可能之事。如明太祖口中“马都督”这一称呼就经不起历史的推敲，明太祖“遂斩马烨”的时间也不是历史上马烨的真实死亡时间。然而，田汝成和郭子章记奢香夫人向朱元璋揭发马烨的罪行后，朱元璋惩处了马烨，奢香夫人遂返黔，凿山开道、复建龙场九驿，大大改善贵州交通状况。这一真假参半却又颇具戏剧色彩的事件经过不断流传，却不失为国家稳定边疆秩序的一种有效途径，即作为处理明廷流官和地方土司“冲突”的折中方案，既稳定了边疆，又彰显了民族大义。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奢香带领下复开的龙场、陆广、谷里、水西、奢香、金鸡、阁鸦、归化、毕节等九个驿站，成为当时黔中与黔西北的重要交通要道。此后，明廷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强化了黔西北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为后来贵州建省提供了历史契机。同时，龙场驿作为九驿的第一站由此步入贵州历史舞台。《明史·职官志》云：“驿。驿丞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廩糗、庖馔、裯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支直于府若州县，而籍其出入。”可见，理论上驿站要负责解决过往官员和公差食宿，给他们提供马匹，把他们送到下一个驿站，驿站的运转是需要经费、马匹和人力支撑的。龙场九驿设立之初便由贵州地方管理，其中龙场驿和陆广驿直接隶属于贵州宣慰司。各驿站设有的人员看守，分为驿丞、吏、夫三个等次，走马和供馆均由固定的土目或头人负责，驿道管理人员由水西安氏独立出办，管理上似乎没什么漏洞。

时隔一百多年后，王阳明及其两名仆人拖着疲惫的身体抵达龙场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此时龙场驿不仅没有驿馆、驿马和相应驿务人员，甚至连供给驿丞日常生活的基本物资也没有，初来乍到的王阳明连个落脚之处都没有。王阳明弟子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载：“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

魑魍魎，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馘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没有亲自到过贵州的钱德洪笔下的龙场环境实属荒凉。王阳明本人在给毛科的《答毛宪副》信中亦言：“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魎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王阳明给毛科介绍自己在龙场的情况，说经常会有瘴气弥漫，会有毒蛇在周围爬行，如同和山间各种害人的妖魔鬼怪一起游走，每天都有无数种可能让自己殒命，足见当时自然环境之恶劣、条件之艰难。

嘉靖《贵州通志》对龙场驿的记载极为简要：“驿马二十三匹，铺陈二十三副。”对于驿站的运作方式则没有详细展开。到万历郭子章著《黔记》一书时，对龙场驿及周边驿站管理方式的记述便十分具体：“龙场驿：城西北七十里，额马二十三匹，今一十五匹，脚力二头，系宣慰安疆臣下夷目花獐猪八苗民承走。供馆安宣慰设馆田三百六十分，每日一分，田户自备答应……札佐驿：供馆系札佐司夷民田户自备答应……底寨驿：供馆系底寨司夷民田户自备答应……谷里驿：供馆系头目熊阿白等自备答应。”

所谓“自备答应”，“自备”即安宣慰所设的“三百六十分”馆田由指定的田户准备好粮食，“答应”则是田户在准备好粮食的基础上，将粮食做成饭菜，招待过往驿站的官商客人，并提供住宿的地方。自备答应，巧妙地解决了驿站的食宿功能，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酒店服务。“苗民承走”则对应驿站的交通向导业务，相应地，龙场的苗民承担了驿站养马职责，当有官员客商路过驿站，他们便为其换驿马，做向导，甚至护送他们抵达下一站。

由此可见，龙场驿确实可以不建驿馆、不用喂马，甚至也不用储粮，这是基层灵活管理智慧的体现。驿丞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调度”工作，一旦有官员商贩过境，需要吃饭借宿、换马引路的，联络附近居民准备好相关事宜即可。王阳明《瘞旅文》载：“维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仆，将之任，过龙场，投宿土苗家。”土苗，即当地少数民族百姓，吏目直接是投宿“土苗家”，而没有提到驿站。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当时的龙场驿确已不能为过往官商提供食宿服务，合理猜测，王阳明到任之初

或许也是投宿在“土苗家”。

另外，王阳明任龙场驿驿丞的报到流程至今是个未解之谜，比如他到底有没有先到过贵阳？或者接触过安氏土司的管理层？当然，这里的管理层肯定不是当时的宣慰使司安贵荣，因为王阳明在后来给安宣慰的第一封书信中曾对安贵荣坦白过“经旬月而不敢见”，可知他们先前确实没有见过面。按照一般惯例，即便是贬官，也应有向上级管理部门报到述职的简单形式，但查遍史料，均无相关记载，有的只是《答毛宪副》中所陈述思州府差人到龙场凌侮王阳明的后续遭遇。

然而王阳明作为一名外来且“无限期”派驻驿丞，长期寄住在百姓家中确实多有不便，也非长久之计。于是，在当地百姓帮助下，王阳明在龙场的第一个住所——草庵——建成了。为此他欣然赋诗《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以记：

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  
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  
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  
灵籁响朝湍，深林凝暮色。  
群獠环聚讯，语庞意颇质。  
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  
污樽映瓦豆，尽醉不知夕。  
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

从诗文描述可知，王阳明的这个草庐真的很矮小，进出都得低着头。尽管如此，王阳明对这个草棚还是颇为满意的，当地百姓在围观中窃窃私语，虽然他听不懂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但从表情上看得出大家对他很友善。特别是从饮酒到天黑这一细节描写，我们可以清晰感知到当地百姓对他物质上的馈赠和情

感上的慰藉。有感于当地人的天性淳朴与无私，王阳明不禁联想到上古时黄帝与尧帝住的也是茅屋草庐，但他们所化育和引领的民风，是后世文人士大夫们永远向往的精神家园。

中国古人对草庐的情结是特殊的，草庐虽简陋，但向来是文人高士修身养性的推崇之所。传说周武王时，匡裕等兄弟七人结庐于山中修炼。后来他们得道升仙，只剩下一个空空如也的草庐。因此后人称匡裕隐居的那座山为庐山。晋代以来，失意文人、文官亦多有“结庐”现象，如晋代陶渊明，三国时期诸葛亮，唐代杜甫、白居易等等，都曾作为“草庐”“茅庐”“草堂”的主人，借居草庐以表达他们向往自由、淡泊世事、自我救赎的心境。正如刘禹锡《陋室铭》中所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王阳明亦言：“他年贵竹传遗事，应说阳明旧草堂。”预言成真，龙场草庵成为王阳明龙场生活的真正开端，也是他拟圣化俗的精神空间。

## 寻得“阳明洞”

王阳明主仆一行在草庵里没住多久，就感受到了来自贵州“倒春寒”的小小震撼。贵州的初春经常是一连数十天细雨绵绵，阴冷不堪，而“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的草庵，在风吹雨淋之下，更显得破败简陋，王阳明主仆三人顶着那无尽的寒气，苦不堪言。于是王阳明一边熟悉龙场周围的地理环境，一边留心寻找更适合的居所。不久，他便寻得一心仪之处——东洞。后来，王阳明将寻找山洞的过程写进了《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一诗中，诗文如下：

群峭会龙场，戟雉四环集。  
迳觐有遗观，远览颇未给。  
寻溪涉深林，陟巘下层隩。  
东峰丛石秀，独往凌日夕。  
崖穹洞萝偃，苔骨径路涩。  
月照石门开，风飘客衣入。  
仰窥嵌窦玄，俯聆暗泉急。  
惬意恋清夜，会景忘旅邑。  
熠熠岩鹞翻，凄凄草虫泣。  
点咏怀沂朋，孔叹阻陈楫。  
踌躇且归休，毋使霜露及。



修文阳明洞

让我们跟随王阳明的诗文内容，重走一遍他的寻洞之旅。

一天，王阳明登上了龙场的高峰眺望远方，只见四周群山环绕，这些山的形状很奇特，有的看起来像战戟，有的看起来像野鸟。在群山的丛林深处，还掩盖着一些祠、僧舍等遗观。王阳明时而沿着山泉溪流寻找，时而在草丛林木中探索，或攀峰而上，或跨山而下，很快他就走遍了龙场附近的每一处角落。日暮时分，横亘于千顷田野中的一座小山——东峰，吸引了王阳明的目光。东峰上的山石林木异常秀美，王阳明便独自来到这里，想要一探究竟。经过一番探寻，终于在明月高悬时，王阳明意外地在东峰半山处发现了一个山洞——东洞。此洞洞口四周藤蔓缠绕，山石上的苔藓非常湿滑。王阳明扒开洞口的古藤

进入洞内，抬头察看洞中的景象，他发现此洞昏黑高阔，洞内有流水之声，似乎有暗泉流动。洞内的生物被王阳明这位不速之客突然间的闯入所惊扰，岩鹑上下翻飞，羽毛在月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草丛里的虫儿却凄凄地鸣叫，仿佛在轻声哭泣。王阳明沉浸在这景色清幽、风景宜人的夜色中，暂时忘却了自己还是戴罪之身、迁谪之客。

王阳明对此洞甚是满意，便决定搬入洞中居住。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他们开始平整地面，安放床具和书桌，王阳明就寝的床边还放置了堆放书籍的平台，一切都是那么适宜，那么井然有序。他们把崭新的灶台修建在洞内通风处，洞内的鼠洞也被悉数堵上。他们还在洞口种上了松柏，并在从洞口通往居所的岩壁上凿出了一些小洞，用于摆放油灯，照亮夜晚步行的道路。没用多久的工夫，这简陋却温馨的“新家”便初具模样，呈现在大家面前。那两个小仆人乐呵呵地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赞叹这个山洞实在太好了，既无须搭建又无须修葺，就是现成的房子！更为难得的是，出门便是潺潺小河，吃水也方便，总之一切都好！

看着眼前陌生又熟悉的景象，王阳明不免回忆起了那段在浙江阳明洞养病读书的过往。那是弘治十五年（1502年），31岁的王阳明因旧病复发，便向朝廷请假回乡养病。钱德洪在《阳明先生年谱》序中说：“吾师阳明先生出，少有志于圣人之学。求之宋儒不得，穷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筑室阳明洞天，为养生之术。”其实，王阳明早年便与佛、道结下了不解之缘，只因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未能去洞中修行。此次，他“卒遇危疾”，正好以养病为由回到故乡，于是便筑室阳明洞天，学习养生之术。阳明洞天在绍兴会稽山的宛委山南麓，道家把修仙之地称为“洞天”，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这阳明洞天为三十六洞天之第十一洞天（或说为第十洞天），也称极玄太元洞天，是仙圣天人都会之所，被道家列为“洞天福地”修炼之地。后来，王阳明自号“阳明子”，以求达到洞人合一的修养境界。

想到这里，王阳明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或许他觉得，在这远隔千里之

外的西南一隅，只有此洞和自己的故乡有那么一丝丝的关联，也似乎只有在此洞，才能让自己感受到那一点点故乡般的温暖。于是，他将“东洞”改名为“阳明小洞天”，并将移居的过程和感受都写在了《移居阳明小洞天》三首诗中，诗文如下：

古洞闕荒僻，虚设疑相待。  
披莱历风磴，移居快幽垞。  
营炊就岩窦，放榻依石垒。  
穹室旋薰塞，夷坎仍洒扫。  
卷帙漫堆列，樽壶动光彩。  
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  
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

童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  
人力免结构，天巧谢雕凿。  
清泉傍厨落，翠雾还成幕。  
我辈日嬉偃，主人自愉乐。  
虽无柴戟荣，且远尘嚣聒。  
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

我闻莞尔笑，周虑愧尔言。  
上古处巢窟，杯饮皆污樽。  
互极阳内伏，石穴多冬暄。  
豹隐文始泽，龙蛰身乃存。  
岂无数尺椽，轻裘吾不温。  
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



修文阳明洞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移居阳明小洞天》题下的三首诗在《王文成公全书》中被误题为《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而原本的《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一诗，是《王文成公全书》失收的一首佚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嘉靖三年（1524年）本的王阳明《居夷集》均收录了以上诗作。根据《居夷集》中的丘养浩序文“嘉靖甲申夏孟朔丘养浩以义书”可知，该书刊刻于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至于刻书者丘养浩，乾隆《福建通志》卷四十五有记载：“丘养浩，字以义，晋江人。正德辛巳进士，授余姚知县。”由此可知，丘养浩时任余姚知县，而余姚又是王阳明的家乡。嘉靖元年（1522年）二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离世，依据礼法，王阳明须回家乡守孝三载，以尽孝道。所以，王阳明此时还在老家余姚丁忧，与知县丘养浩有所交往。丘养浩要刊刻《居夷集》，应该也是曾征得了王阳明的首肯，刊刻之后也理应会呈送王阳明，所以该诗确为阳明之作无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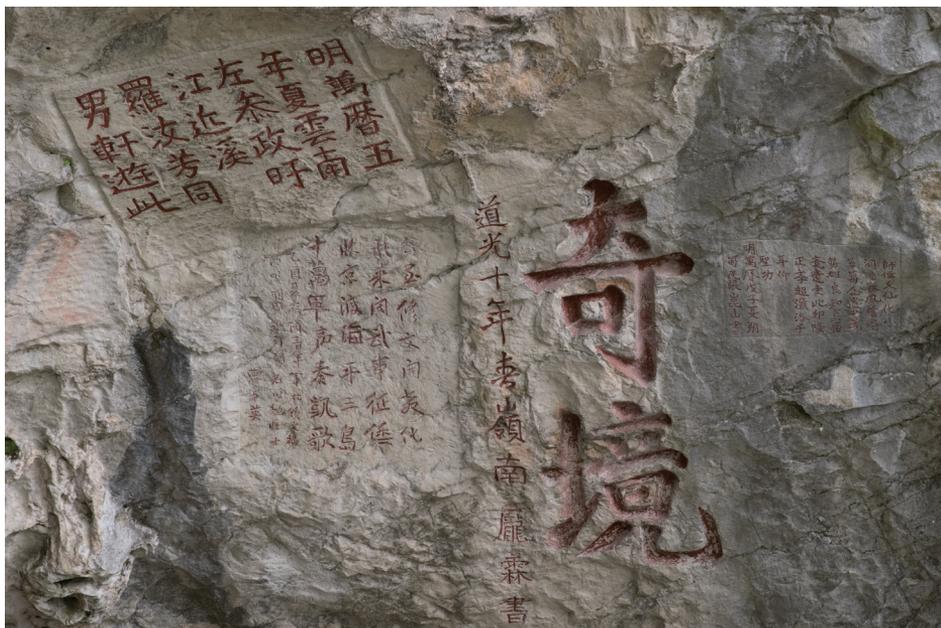
《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和《移居阳明小洞天》，记录了王阳明寻找东洞的过程，刻画了龙场周围的景致，描述了岩洞的环境，反映了谪居时的艰难境况，表明了王阳明豁达而积极、忧道而不忧贫的情怀和心态。藏在荒僻深山中的岩洞，在王阳明眼里仍然是清泉翠雾，犹如一幅优美宁静的自然画卷。他没有因为个人的不幸遭遇而自怜自哀，而是挂念自己的爱徒徐爱等人，担心他们睽违良师，失去归依，害怕他们会因自己的贬谪而受到牵连，影响他们进京会试，中断他们的圣贤之学；他也没有因为贬谪之地的荒僻便怨天尤人，而是积极地去面对、去改善恶劣的居住环境，把生活当作磨炼自己的工具，在生活中修行。

从“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豹隐文始泽，龙蛰身乃存”和“邈矣箴瓢子，此心期与论”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以先圣的教诲来安慰自己、鼓励自己，做到隐藏锋芒，韬光养晦，以待时机。他告诉自己，既然已经身处困境，就要根据现实的条件让自己保持快乐心境，绝不可悲观失望、怨天尤人。这是一种在通达儒家圣贤境界之后，自然流露出来的精神境界。此外，初入东洞时，洞内岩鹞与草虫的遭遇引起了王阳明的注意，也引发了他的深思：同处一个山洞之中，同在一个环境之下，这两种生物的境遇为何会大不相同？进而联想到自身的境况，同样是身处环境恶劣的贬谪之地，自己却能够保持身心的良好状态，不受外界环境影响；而他的仆人们，却是郁郁寡欢，接连生病。虽然环境相同，但境遇并不相同，王阳明此时似乎隐约体悟到，决定人生悲喜忧惧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内心的精神，或者说是在心而不在境。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王阳明一生对洞穴似乎情有独钟。除上文谈到的“阳明洞天”和“阳明小洞天”外，还有两处明确可知可考的“阳明洞”：一处是在江西南部，后来王阳明去江西赴任，他来到龙南玉虚洞之后，特别喜欢这里的景致，便取名“阳明别洞”，并在此后多次故地重游。其中王阳明诗作《回军龙南小憩玉石岩双洞绝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阳明别洞之号兼留此作三首》《再至阳明

别洞和邢太守二首》即是最好的佐证；另一处在广西平果，王阳明奉命前往广西平乱时，曾泊舟于此，命工镌“阳明洞天”及《征抚思田文》一篇于石，此洞被后世称为“平果阳明洞”，又称“万人洞”。

这些分布在不同地方的“阳明洞”，都承载着王阳明的思乡之情。当然，除了思乡，“洞”也体现了王阳明的道教情结，他在洞中修行，究极仙经秘旨。在众多“阳明洞”中，最重要的还要数会稽山的阳明洞天和修文的阳明小洞天。这两个阳明洞虽相距数千里，但都是阳明心学思想孵化的温床，对王阳明而言，意义重大。前者主要是相对“身”而说的，即有调理身体、修身养性之功，同时也埋下了一颗阳明心学的种子。后者虽然也给王阳明提供了一个遮风挡雨的港湾，但更多是相对“心”来说的，它是阳明心学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土壤。



阳明洞洞壁上庞霖题刻“奇境”

王阳明离世以后，人们对他思念不已，“阳明小洞天”也声名远播，后人把这里称为“阳明洞”。如今，我们通过实地探访可知，此洞高约四米，洞外是后世精心布置的青石小院，长约十二米、宽约九米，青石铺就，平整而古朴，岩坎边缘还有青石栏杆如守护者般环绕；院南石阶两侧，两株古柏参天，直指云霄，相传是王阳明当年亲手所植，名“文成柏”。洞口处，苔痕苍绿、藤萝密布，仿佛是岁月精心编织的挂帘。洞顶有下垂的钟乳石，千姿百态，造型各异。洞内宽敞明亮，空气流通，四壁石乳凝结。洞深二十多米，最宽处有十余米，可容百人，而且洞内还有分支，主次分明，动静相宜。此外，洞壁之上还有大量摩崖石刻，行、楷、隶、篆等书体各具，风格迥异，既有七言五言之佳作，亦有单句箴言。如明代贵州宣慰使安国亨题刻的“阳明先生遗爱处”，笔力雄浑；明代罗汝芳题写的“阳明别洞”，清秀雅致；清代庞霖题刻的“奇境”，气势磅礴……这每一笔、每一画，都或深或浅地镌刻在洞壁之上，犹如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静静地向世人诉说着过往的沧桑岁月。

2006年，阳明洞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阳明洞作为中国阳明文化园的核心景区，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无数学者、名人来此拜谒。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秀美的自然景观，还能领略到阳明心学的独特魅力，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获得心灵上的洗礼。

## 智治病仆

早春的黔中深山，寒意还未消尽，一位身形消瘦的男子肩负一捆薪柴，手携零星蕨芽，颤颤巍巍地行走在布满荆棘的山间小道上，白霜和露水打湿了衣裳，凛冽的寒风从脸颊划过，不禁让他微微一颤。这就是因言获罪，被贬到贵州龙场驿任驿丞的王阳明。此时的他，上山砍柴、摘取野菜，为平日里照料他生活起居的仆人殚精竭虑。想当初，王阳明千里谪戍，历经磨难，备尝潦倒之苦，能顺利抵达龙场驿，实属不易，也少不了仆人的陪伴和照应。不幸的是，刚在龙场安顿下来，两位仆人便一病不起，王阳明不得不担负起照顾他们的重任。关于这一事件，钱德洪在《年谱》中如是记载：

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翘翘，蛊毒瘴疠，与居夷人缺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

两位仆人究竟为何病倒？虽然《年谱》中未直接点明，但据钱德洪对龙场自然环境的描述，似乎有了答案，即“蛊毒瘴疠”。一直养尊处优，习惯了京城和中原地区生活的王阳明主仆三人，面对贵州龙场荆棘丛生、毒瘴弥漫、疾病肆虐的自然环境，身体和心理都备受折磨。这让王阳明感觉“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于是暗自发誓说：“我就接受命运的安排吧！”豁达乐观的心态无形中支撑着王阳明，他或因此逃过一劫。但仆人就没有他这样的境界，舟车劳顿、身心俱疲的情况下，又遭受瘴疠侵袭，于是就病倒了。瘴疠又叫瘴气，是我国古代南方多种疾病的综称，包括疟疾、出血热、黄疸等。又有一说，瘴疠是我国



南方山林间湿热环境下因动植物腐败等而产生的一种能致病的有毒气体。古人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就统一称之为“瘴气”。这和贵州处于亚热带温湿季风气候区有一定关系，这样的气候区雨热同期，降水丰沛。据记载：

黔地窳而土瘠，气沴而候愆，不可以中州例也。岚气上蒸，肤寸之云，即能致雨，故有漏天之号。山高箐深，亏蔽日月，一日之间，乍寒乍暖，百里之内，此燠彼凉。

长期潮湿闷热又封闭的环境，导致贵州一带多有瘴气出现。历史上的贵州，瘴气分布较广，贞丰州（今贞丰一带）、罗斛州（今望谟、罗甸一带）“皆多瘴气，人病疟者多死，江西之贾于罗斛者，必经三疟乃可保”。永宁州（今晴隆、关岭一带）箭眉山“多烟瘴，不敢久居，惟土著仲家夷居其中焉”。而在与湖南接壤的黔东地区，“即晴日，亦将午而后朗，晡及未而已暝；但遇稍阴，即飞雾迷蒙，寻丈莫辨。计其阴雨十常六七，盖山岚瘴湿，气候郁蒸之所致也”。每每瘴气发生之际，绿色的烟雾像翻腾的波浪一样，散开之后，又犹如弯曲的彩虹和斑驳的云霞，交织在一起；摸起来像是碰到了刚刚蒸熟的米饭或者菌菇类植物上那层湿润的薄膜一样，黏黏糊糊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毒蛇潜行，蜈蚣匿迹，蚊虻肆虐，毒物遍生，其害无孔不入。人若涉足此地，极易染病，发病起来“太阳痛、发热不止、眩晕呕吐；误服发散凉剂，多致不起”。如此看来，浓度大、毒性强的瘴气，不免让人闻之色变，文人骚客和官宦名流对黔地更是望而却步。明万历年间，临海人应朝卿任贵州巡按御史，深知瘴气之厉害。他在为邹元标《云中存稿》作的序中，将都匀称为“瘴毒之乡”，可见其对瘴气的恐惧。郭子章在《黔记》中有所载录，可供一览：

应柱史朝卿序略曰：顷被上命，观风于黔，乃从中丞江公所得公《云中稿》。卿受而卒業，公故以忤权相谪戍黔之匀。黔于职方，号徼外遐夷，

最硗狭之区。而匀又黔之所最，号为瘴毒之乡，而蛮苗出没，荒落之藪也。

除了应朝卿，在历史的长河中，诸多文人骚客旅迹黔地，或耳闻瘴疠之酷烈，或亲历其苦毒之境，无不心弦震颤，悲从中来，挥毫泼墨，将满腔凄楚，化作文字间流淌的哀歌，留下了关于瘴气肆虐的千古绝唱。他们以诗为舟，以词为桨，穿越那层层毒雾，让后世之人得以窥见那段被瘴气笼罩的岁月，感受那份超越时空的悲凉与哀愁。杨慎说：“可怜盘江河，年年瘴疠多。”糜鸿远描述：“孤城矗兀倚南天，匹马登程且著鞭。野瘴腾空飞蜚雨，山岚触地卷蛮烟。”王阳明的诗文中也有“夫冲冒雾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无死乎”的感叹。瘴毒充斥、山高岭险是许多中原人士对贵州的印象，历史上的贵州被视为“蛮荒之地”，流放到此，意味着生命岌岌可危。可以试想，当仆人病倒时，王阳明难免会联想起是瘴气所致。

对于这样的险途，起初王阳明的心中也有些许恐惧，《答汪抑之三首》中的“去国心已恫，别子意弥惻……良心忠信资，蛮貊非我戚”便道出了他甚是惶恐。来到龙场，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主仆三人，面临着对西南异域环境的极度不适、随时可能丧命的危险和对故乡亲友的深切顾念之苦。而相较两个仆人，王阳明还饱受才华无处施展的煎熬，蒙受进谏被贬的冤屈。但是作为三人之中的主心骨，王阳明必须得镇定下来，表现得从容不迫。仆人病倒了，但他不能倒，于是他亲自上山砍柴、溪间取水、生火煮粥，喂食给仆人，细心地照料他们生活起居，完全没有主仆、尊卑之分。除了生理上无微不至的照料，王阳明还非常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担心他们郁结难解、忧思成疾，于是以歌诗愉悦他们的心灵。但这一招并不见效，眼看仆人依旧郁郁寡欢、愁眉不展，王阳明又心生一计，给他们哼唱起家乡的小调，以缓解思乡之情，其中还夹杂着诙谐的说笑取乐，慢慢地，仆人们忘记了自己身患疾病、身处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逐渐康复起来。

从“疗愈”仆人的记载中，至少可以窥探到王阳明的三个品质：一是对生命的无限关怀，二是善于以“乐”教人，三是拥有强大的内心。而这些都是王阳明最终悟道成圣的重要因素。

首先，对生命的无限关怀。《孟子·尽心上》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王阳明继承儒家思想，对草木、鸟兽、山水、瓦石等自然万物都有一种深厚的生命关怀，强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在他看来，世间万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和人之间自由平等，“人人皆可成圣贤”。面对病倒的仆人，他对生命的无限关怀和敬畏，让他能够放下身段、一丝不苟地照顾他们。这一时期，虽然“良知”二字尚未“破题”，但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他的“仁爱”之心和“良知”之旨，这也正是他终极目标的具体实践。王阳明对生命的敬重和对个体的关怀，在其两年居黔时光中多有体现，再如，破除文化隔阂，同当地乡民友好地交往；不卑不亢地与贵州各级官员打交道等。

其次，善于以“乐”教人。《礼记·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在儒家的礼乐文明传统中，乐律具有通达天德的内涵。王阳明认为：“永言和声，俱本于歌。歌本于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极也。”心是歌的根本，音乐的本质来自于心中的中和，心和则乐和。他认为人的意识是音乐本身存在的条件和基础，人的情感转变可以自然地体现在诗歌中，“先养得人心和平，然后作乐”就能使“听者自然悦怿兴起”。在他看来，“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所以，在仆人的康复过程中，王阳明不仅以“雅歌之诗”温润其心，更兼“越曲之复调，间以诙谐笑语”，运用音乐与情感的细腻织锦，不着一丝刻意雕琢之痕，而能自然与人之心弦共鸣，施展出“心灵之愈”的妙手回春之术。此术非但疗愈肉身之疾，更自内心深处播撒欢愉之种，令仆人心怀豁然开朗，身心共融于康健之境，实乃大道至简、润物无声之典范。

最后，拥有强大的内心。王阳明青年时期就曾在阳明洞天修习静坐，也曾出入佛、老多年，深受佛道二教精神修炼方法的影响，在静坐修养方面有相当

丰富的体验。正是往日静坐澄默的精神修养功夫，让他有了对自我意识的掌控能力，使他在被贬龙场后，能够超脱外在的“夷狄患难、得失荣辱”，达到内在心定澄明的状态。心境之宁静与坦然，使他不曾因艰难困苦而怨怼天命，沉沦于忧思愁绪之中，反以圣贤自勉，悠然发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此番自问自省，源自对儒家理想中至高圣贤人格的深切向往，遂以斯格面对世间万般艰辛与挑战，这正是“龙场悟道”得以璀璨绽放最为深邃之根源与不竭之动力也。



## 请学于农

很多古圣贤都有饿肚子的经历。春秋时，孔子带领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在此期间，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经常遭遇各种困难和挫折，在陈国和蔡国的交界处（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一带），更曾面临绝粮七日的困境。正德三年（1508年）春，被贬谪到贵州龙场的王阳明，刚解决完住的问题，就同孔子一样，也面临绝粮的危机。祸不单行的是，随王阳明同行的仆人皆相继病倒了。此时的王阳明要想活下去，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王阳明自小家境优渥，从来只用读书做学问，十指不沾阳春水。但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与崇山峻岭中的龙场驿，终究是有天壤之别。于是贬谪龙场之后，王阳明明白他不只是一个读书人，更是一个需要自力更生的普通人。仆人生病，就要悉心照料，煮粥而食。没有粮食，就要亲自耕田种地，拾柴做饭。但在古代开垦荒地本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明代贵州龙场又是一个苗族、彝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聚集之地，他们与汉族杂居，风俗各异。而王阳明作为一个从京师（今北京）而来的读书人，初至龙场，人地两疏，语言不通，习俗也不同，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日常沟通都难，更别提开荒种地了，正如钱德洪所说：“与居夷人馥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但好在当地百姓中，有通汉人文字和语言的少数民族，“曰仲家……通汉人文字，以十一月为岁首”，“曰龙家……亦用汉人文字，以七月七日祭先祖，甚敬”。

或许正是某个写得汉字、说得汉语的淳朴百姓，偶见王阳明今日之困境，便满腔热情地充当起了“农业培训师”，为王阳明分析贵州气候、讲解农事知识。尽管今天已经无法考证王阳明到底是通过何种方式学习农活的，但个中艰辛可想而知，王阳明本人更是刻骨铭心。他首先花费几日考察了数亩荒芜的山地，接着又拼凑置办了一些农具。一切准备就绪后，王阳明憧憬着“遗穗及鸟

雀，贫寡发余羨”的丰收景象，格外激动地等待着他的首次开荒种地，并写了一首诗以作记录：

谪居屢在陈，从者有愠见。  
山荒聊可田，钱镈还易办。  
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  
及兹春未深，数亩犹足佃。  
岂徒实口腹？且以理荒宴。  
遗穗及鸟雀，贫寡发余羨。  
出耒在明晨，山寒易霜霰。

刀耕火种是一种古老而原始的耕作方式，明朝贵州的少数民族仍多沿用此种方式。彼时，王阳明的四周到处都是野草荒地，所以种地第一课，他首先要学习的就是火耕：先用火将空地上的杂草烧掉，开辟一处田地。然后赶在春天结束之前，播种育苗。明代贵州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一直落后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使用的农具较以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在《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中，王阳明所说“出耒在明晨”的“耒”，就是他在实际耕地过程中使用的一种农具。这是一种形状像木叉的翻土农具，也就是“犁”，其刃称“耜”，用铁制成，嵌入的曲木柄称为“耒”，可以用牛拉，也可以用人推。春季正是播种灌溉的好时节，对贵州龙场的百姓而言，牛的劳动力可谓供不应求，因而不大可能再腾出一头提供给王阳明，所以王阳明和两个仆人多半是亲自上场翻土播种。翻土过后，王阳明一行又需要上山下山挑水灌溉，忍耐贵州冬末春初冻雨时节的冰霜和小冰粒带来的寒冷，用锄头除草。如此反复，静静等待庄稼成熟。

“田功三月始犁，四月播种，五月插禾，九、十月纳稼。东作稍迟，则苗不茂；夏初无雨，则收必歉；入秋有大风，则秀不实，谓之青空。”贵州虽然

多数地方都处于北纬 25° 至 35° 之间，气候条件不错，雨水充足，但农作物生长周期长，农耕技术相对来说落后些，农作物产量较低。加上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农人终年劳苦，往往是付出的多，收获的少，还要定时上缴粮食作为田租，因此，基本不会有隔年的余粮。这也就不难理解，王阳明到贵州龙场之后为什么会一度面临粮绝的困境。而与江南开春便开始耕种相较，贵州春耕、播种要晚许多。因此，王阳明在此时学习种粮食，可以说是时日正好。如果王阳明晚点到龙场，赶上孙应鳌所写的“黔州城下江昼昏，六月六日雨倾盆”的夏季多雨时节再播种，或是播种之后频繁经历旱灾、水灾、虫害等自然灾害，那么他的首次开荒或许会以失败告终。

王阳明的开荒种地，是因三餐不继采取的自救行为。因此，王阳明首先种植的一定是可以解决吃的问题的谷物和蔬菜等。据嘉靖《贵州通志》卷三记载，彼时贵州有稻、黍、稷、麦、豆、荞、麻等谷物，芥、苋、茄、芋、笋、葱、韭等蔬菜，柑、橙、桃、李、杏、梨、柿、香橼、金橘等水果，紫苏、薄荷、豨薟、苍耳、栝楼、商陆等药草。据王阳明诗云“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推断，王阳明所种谷物很有可能就是稌和稷。其中“稌”指的是水稻一类的作物，又特指糯稻和粳稻；“稷”则是现在俗称的高粱。从种植周期来看，稌和稷所需的时间比较短。春季播种，一般等五到六个月之后，夏末秋初就可以收获了。如果种植的是粳稻（又称为“救公饥”）等早熟的品种，还能更早收割，正好可以解王阳明的燃眉之急。但庄稼成熟非一日之功，靠天吃饭也并非一帆风顺，那么在此期间，王阳明又是通过什么办法自我补给的呢？清人姚燮曾言“但有野菜食，论年已不荒”，这句话放在王阳明的身上也同样适用。在农事闲暇的时候，王阳明和他的仆人就经常上山采摘野栗子和蕨芽等野菜，以备不时之需。虽然野菜没有什么太多的营养价值，但相比普通蔬菜，野菜具有一种独特的口感和味道，倒也还不至于难以下咽，如此王阳明一行也算能勉强维持生存。

对很多文人墨客来说，下地劳作、砍柴打水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龙场

亲自下地做农活亦是王阳明的首次尝试。事实证明，王阳明虽生于宦宦之家，却并非娇惯的柔弱书生，他既能吃苦，也愿意学习，很快就掌握了许多种植庄稼的知识。在王阳明看来，庄稼的收成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看到禾苗长势良好，即使有再多的杂草也会欣然锄去。播种、育苗、浇水、除草、翻田、施肥，这一系列农事占据了王阳明的大部分时间，琐碎而又充实，不仅让他渐渐融入于百姓生活，还使身处异乡的他获得了短暂的安慰。但开荒种地毕竟不是王阳明的长项，因此难免有些不熟悉，用起农具来也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少不了被人笑话。对此王阳明并不在意，而是转换心情，用一句“可以相天子，众稚诘足识”进行自我调整与自我安慰，并不断丰富自己的农业知识。对王阳明来说，躬耕南亩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他观察天地、自我重组的一个重要契机。从王阳明所作《观稼》一诗，即可窥见一二：

下田既宜稂，高田亦宜稷。  
种蔬须土疏，种藟须土湿。  
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螣。  
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  
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  
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穡！

一方面，因为有着亲身下田种地的劳作生活经历，王阳明的诗不同于陶渊明这类文人墨客的田园诗风格，也不同于白居易、张羽等人所作之《观稼》，诗中没有作为旁观者的那份闲情雅致，更多的是具有实战经验的田家翁对农业技术和躬耕经验所做的细致的观察、认识和总结。作为宦宦世家成长的士人阶层，王阳明谪居后不鄙农事、躬身田园，摒弃原生成长条件下形成的阶层观念及生活习惯，将渴望居有所安、食能果腹的愿望转为开棘成篱、西山采蕨的实践，并得到“薪水良独劳，不愧食吾力”的自我认同，这是贵州带给王阳明的

难能可贵的行为变化。

另一方面，劳动也对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形成带来了启发。在田间劳作时，王阳明没有停止对世间万物所蕴含的发展变化规律的思考。他早年曾在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上苦练功夫，格竹七天，后来虽然治学的道路有所变化，但观察入微的作风依旧如故。《三国志·魏书》中对归隐山中的胡昭有这么一段叙述：“（胡）昭乃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闾里敬而爱之。”在贵州龙场，躬身田园的王阳明在各种琐碎俗事中来往如梭，同样“以经籍自娱”，更在耕地中苦修“参赞功”。对大多数人来说，种田只是种田，但王阳明却能将其与经籍相联系，在躬耕中实践儒学。这既是一种向外格物追求世间之道的方式，又是一种内在心性的实践。就如《观稼》一诗中王阳明观察发现地势高低不同、土壤疏湿有别、气候寒暑区分等对种植作物各有影响，感慨道“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穡”，正表明此时王阳明已不再执着于格土壤、格农事，而是在此基础上将万物之理的机要归结为内心参悟。在王阳明看来，事物变化的机理可以通过亲身实践、深入探究来认识和把握。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辅佐治理国家的实践，所以一定不能轻视种庄稼这样的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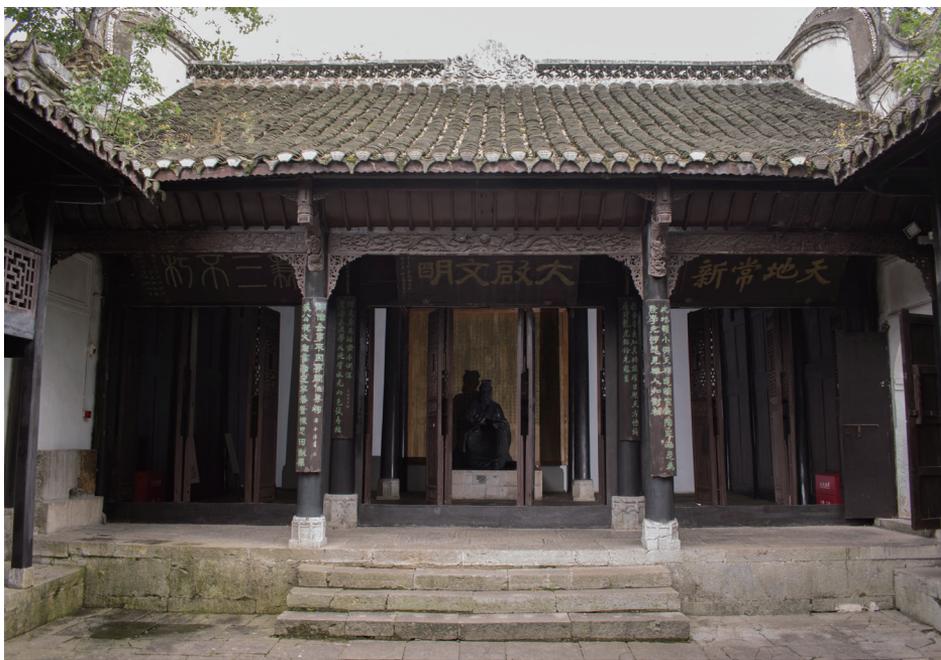
自此以后，劳动就成为王阳明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后来王阳明搬到龙冈书院，又在书院中建造了西园。虽然园子面积不大，但好歹算有一处固定场所。于是王阳明就更加时常打理，除谷物蔬菜外，也种植一些花卉和药草。从南山种植时候的手忙脚乱，到在西园的得心应手，田园生活越发令王阳明闲适自得，颇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学境界。

最后回到王阳明首次开荒种田的地方——南山。这个“南山”与陶渊明诗句中“悠然见南山”的“南山”不是一个地方，但谁又能肯定王阳明在南山种植的时候没有想到陶渊明呢？关于“南山”，既可以理解为南边的山，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象征。在陶渊明看来，“南山”象征着他对自然、自由、快乐和安宁的追求。当他悠然自得地眺望南山时，就仿佛看到了自然的真意，也看到

了自己的理想境界。它代表着陶渊明心中的理想生活，是陶渊明内心的投射，那是一种远离世俗喧嚣、自由自在的生活。当他看到南山时，就仿佛看到了理想的自我。在京师入狱的那一段至暗时刻，王阳明也许同陶渊明一样厌倦了官场上的钩心斗角。贬谪到龙场的王阳明，时常对官场、对人生有新的感悟和体会，选择在南山开荒种地，或许也正表达了他对世俗生活的不满与对自由和安宁的向往。

## 乔迁新居

在现在的修文龙冈山，有一组雄伟的建筑群，主体建筑是王文成公祠。这是一座包含正殿、仓圣宫、元气亭在内的四合院式的建筑，享堂中供奉着王阳明的铜像。清咸丰八年（1858年），看管阳明洞的僧人寂禅认为“文教之开由于阳明，文字之始由于仓圣”，因此建仓圣宫，以纪念传说中汉字的创造者仓颉，作祭祀舞乐之用。现存的王文成公祠即在仓圣宫的基础上，经多次修缮和扩建而成。



王文成公祠内正殿

王文成公祠的前身即是大名鼎鼎的龙冈书院，王阳明亲手创办的第一所书院。龙冈书院初建时，还有一系列配套设施，分别是君子亭、宾阳堂和何陋轩。如此庞大而繁复的土木项目，单凭王阳明及仆人几个人，定然力所不及，其中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出力甚大。正德年间，龙场驿一带的居民主要是仡佬、苗、彝等少数民族。王阳明谪居于此，与他们朝夕相处，互助互帮，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当热情善良的乡民看到王阳明长期居住在阴暗潮湿的石洞里，无论是生活起居还是读书讲学都甚为不便，于是主动提出帮助他择地建居。新居落成后，王阳明创作了《龙冈新构》两首，以记此事：

其一

谪居聊假息，荒秽亦须治。  
凿岫薙林条，小构自成趣。  
开窗入远峰，架扉出深树。  
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  
畦蔬稍溉锄，花药颇杂蒔。  
宴适岂专予，来者得同憩。  
轮奂非致美，毋令易倾敝。

其二

营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  
初心待风雨，落成还美观。  
锄荒既开径，拓樊亦理园。  
低檐避松偃，疏土行竹根。  
勿剪墙下棘，束列因可藩。  
莫损林间萝，蒙笼覆云轩。  
素缺农圃学，因兹得深论。  
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



从这两首诗的基本格调来看，有了新居所后，王阳明的心情大好，第一首诗一开头竟自嘲地说谪居就如同度假一般。在新居的建造中，王阳明作为明代江南士大夫的代表，对自己的楼堂居室设计有其独特的审美理念。怎样才能使房舍整体造型和龙冈山的景致相协调呢？这应是王阳明要重点考虑的问题。首先要开凿岩石，清理草木，这样才能有一个较理想的地基。接着就是布局，房屋虽然建得较为简易，但却饶有情趣、别有洞天。窗子对着远山，远望青山绿水，让人心旷神怡。搭起门框来，房子高出群树，说明选址的海拔较高，可俯视山下蜿蜒曲折的景致。在目光所及的近处，竹木交织，茂盛多姿，别具一番风情。当然，王阳明可不是真的来这“偏远之地”度假。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他还得通过自己的劳动，开荒种地，丰衣足食。菜畦要时常浇水锄土，还要种几种药草，以备不时之需。王阳明对自己亲手参与打理的“一亩三分地”颇为得意，凡是来客都可以与其分享。他认为，虽然这里谈不上多么漂亮，但也不能让它衰败凋敝。这首诗充满了浓厚的乡村田园生活的气息，从中可以看出，与初至龙场时的各种不顺遂相对比，此时王阳明的心境已经大有改观，一个豁达自适、热爱生活的王阳明形象跃然纸上。

第二首诗说的依然是忙碌却有味的田园生活，不过在诗的最后，王阳明对这样的生活进行了升华，他说：“千万不可轻视这些农事，大道即在其中呢。”王阳明再三强调“毋轻稼穡”，这一观点既是我国古代以农为本治国理念的体现，也蕴含了其“俗事亦俗学”的心学思想。从这两首诗中看出，王阳明营建新居的初衷并不是单纯打造一所传道授业的书院，而是一个供其生活和读书的场所，讲学只是闲暇之时的活动。而随着新居的落成，王阳明讲学活动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如诗的小序所言，“诸生闻之，亦皆来集”。学生多了，王阳明的私人住宅反而像个学堂了，于是学生们就请求将小庐命名为龙冈书院。从而，王阳明的居室就具备了生活和教学的双重功能。

随着书院的落成，王阳明又陆续修建了一系列功能各异的附属建筑物。据



龙冈书院



钱德洪《年谱》记载，王阳明在当地乡民的帮助下，“乃伐木构龙冈书院及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以居之”。且分别为这四个场所作记，其中前三篇被后世称为“龙冈书院三学记”，通过命名阐述了其所倡导的君子之学。

“宾阳堂”是王阳明的迎宾会客之所，位于王阳明居所的一隅，面向东方，寓意迎接初升的阳光，因而取名“宾阳”。这个名字源自《尚书·尧典》中的“寅宾出日”，寄托着对光明与希望的向往。在《宾阳堂记》中，王阳明探讨了“光明”的概念——君子内心深处的光芒，他着重诠释了“宾日”的含义，认为羲仲用迎接宾客的虔诚之心来迎接日出。他从“日”的象征意义出发，解释了君子的品质和风范。最后以“宾日之歌”作结，表达了对太阳的礼赞，呈现了君子之心熙熙如日的意象。他在这里礼赞太阳，正是赞美君子的光明心态。此记通过对“宾日”的解读，揭示出“君子之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周易·泰卦》中所说的“内君子而外小人”。

“何陋轩”是王阳明讲学授课之所。王阳明在《何陋轩记》中说：“予尝圃于丛棘之右，民谓予之乐之也，相与伐木阁之材，就其地为轩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桧竹，莳之以卉药，列堂阶，辨室奥，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具。”何陋轩的外围种满了花卉竹子以为点缀。堂前有阶，屋内则分为“室”和“奥”，前者是讲堂，后者则是指屋内的西南角，为长者所居，应为王阳明讲学之余的休憩之地。此外，室内还摆放着琴和各种书籍，讲诵游适的各种教材和教具也一应俱全。“何陋轩”的命名体现了王阳明“君子化人”之责。在这篇记中，他对中原人士关于苗彝地区的传统看法予以驳斥。他说，曾有人认为，他从礼仪之邦的中原地区被贬谪到贵州，是去了一个没法居住的“陋地”，但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并没有发现当地人有什么“可陋”之处。他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说着难懂的语言，穿着羊皮做的衣服，居所也简陋，出行没有装饰华丽的马车，居所也没有高大宽敞的宫室，更没有那一套繁文缛节的中原礼仪，但这些仅仅是上古时代法制未备的质朴遗风，而不是什么“陋”。相反，一些“文明人”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何陋轩

表面上彬彬有礼，难道这不是真正的“陋”吗？在王阳明看来，龙场驿的少数民族同胞质朴率真，世人仅仅因他们不善于表达、不事雕琢就说他们“陋”，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他们就如未经雕琢和加工过的璞玉和木材一样。

“君子亭”是王阳明与诸生游憩论学之所，其命名体现了王阳明所提倡的君子之德，他亲手设计并建造了这座亭子，在周围种植了许多竹子，赋予其“君子”之名，借此传达他对君子美德的崇高追求。王阳明通过竹子的形象，诠释了君子的四种美德：君子之德、君子之操、君子之时、君子之容。竹子的中空代表了君子的谦逊与宁静；其挺直坚韧的身躯，象征着刚直不阿的品格；其四季常青的特性，展示了审时度势的智慧；而竹叶在风中的声音和姿态，则体现了内外兼修的风度。每一片竹叶、每一根竹竿都在无声诉说着君子的美德，使君子亭成为自然美景与人文思想相结合的典范。



王阳明自谦地表示，自己还在学习如何做一个君子，并且告诫弟子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含义，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结合《君子亭记》上下文的语境来判断，其主张与程颐“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的说法或更为近似。程子认为，君子儒做学问是专心在自己身心上下功夫，关注自己切实进步，不求出名；小人儒做学问则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有学问，意在求名。王阳明教育弟子不拘模式，随时随地启发点拨，可以想象，



君子亭

在当年的君子亭中，王阳明与弟子们席地而坐，其乐融融，或偃仰啸歌，或冥然兀坐，一问一答莫不是有关君子之道。清风不时而至，风鸣翠竹，如玉敲击，如乐之作，不禁让人想起《诗经·卫风》中的名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讲学之乐、修身之乐、山水之乐，在师生们互相切磋学问之中融为了一体。

龙冈书院建筑群最终成为王阳明与其黔中弟子的精神家园。“葺何陋轩、君子亭，自为记。诸生从之游，始知性命之学”。他在这里实践其心学理论、讲学布道，使龙冈书院成为阳明心学的发源地。王阳明离开贵州后，龙冈书院逐渐衰败，直到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前后，由修文两任知县秦睿与宋铎捐出自己的养廉钱，率当地绅士和民众重建龙冈书院。后历经咸丰、光绪、民国年间多次维修增补。1991年火灾后，贵州省文化厅拨款修复，使其重焕



生机。檐下挂“宾阳堂”木匾，堂内挂王阳明大幅画像，陈列书法墨迹拓片，后重刻《宾阳堂记》碑，立于庭院。何陋轩和君子亭也是清代重建的。何陋轩为歇山顶抬梁式砖木结构，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屋脊两端塑有龙形兽吻，中间为宝顶，翼角用卷草和鱼作装饰，檐下四周为回廊。君子亭是一座六角重檐、攒尖式的清代建筑。它高 9.6 米，五方有走廊，并有栏杆式的靠椅供游人休息。门窗系汉纹木雕，门楣上雕有“双狮抢宝”“二龙戏珠”，周围亭壁刻有“春游芳草地”“夏尝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东篱傲霜”“香充幽谷”“荷塘清趣”等精工木雕图案。亭内有扶手板梯上亭楼，扶梯柱上雕有麒麟、狮、象等，形态逼真。亭的东北岩坎竖有清代道光年间云贵总督贺长龄书录王阳明所著《君子亭记》的石刻。龙冈书院建筑群在历经多次维修维护后，于 200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天中国阳明文化园里的新龙冈书院是为满足现代文化研学、交流、培训、体验等需求而易地复建的，距原龙冈书院旧址约两里。新龙冈书院的建设，旨在为阳明学研究者来龙场“寻根溯源、体验教化”提供“此心安放”的地方。宾阳堂、何陋轩和君子亭原建筑早已坍塌，现存建筑均为后世重建和修缮。

如今，龙冈书院内的翩翩君子早已随着时光的流逝成为历史记忆，但它默默地伫立在龙冈山上，见证着王阳明用尽一生之力所践行的君子之学、倡导的君子之风、形成的君子遗韵仍然萦绕在此，并将永远留存。

## 龙场受辱

来到西南边陲的贵州龙场，本以为远离政治风暴中心，能寻得一方心灵之净土，获得片刻的恬淡与安宁，但却始终逃不过权势的纷扰。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和两位仆人刚到龙场不久，便遭到“太府”官差的欺辱，让王阳明行“跪拜之礼”，这一“挟势擅威”、仗势欺人的行径引起了当地乡民的不满，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最终以“太府”官差落荒而逃收场。这些官差回去后，添油加醋地告了王阳明的黑状，“太府”大怒，将此事上报到贵州提学副使毛科那里。毛科闻言，遂致信王阳明，要求他登门谢罪以平息此事。但王阳明不为权势所屈，在回信中严词拒绝这一无理要求，颇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气节。书信中王阳明字字珠玑、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彰显了儒家不屈不挠气概和坚守忠信礼义等信念。王阳明颠沛流离中未曾稍夺其志的气节，让毛科惭愧得无言以对。

据道光《贵阳府志》载，彼时，王阳明被贬到龙场当驿丞，巡抚王质派人去羞辱他，结果反被当地少数民族围起来打了一顿。那些人回来向王质告状，王质一听就火了。可王阳明既不辩解也不道歉。巧的是，提学副使毛科和王阳明是老乡。于是，毛科就给王阳明写了一封信，劝他谢罪。这一史实记载中，直接指明遣人侮辱王阳明的是当时巡抚贵州的王质。那么，王质何许人也？为何其官差会对王阳明心生怨怼？甚至要让他行跪拜之礼。据《掖垣人鉴》记载，王质是“万全都司怀来卫籍，山东济宁州人”，正德元年（1506年）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王阳明与王质，本无交集，为何会引发这起纠纷呢？这或许与明代的官员管理制度有些许关系。

我国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对官员的管理，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对地方官员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亲自颁定《授职到任须知》，“共三十一项，开列



极为具体，要求府州县官到任之日始，便向前任官、首领官及六房吏典咨询明白，以掌握入仕的门径”。地方官到任的程序，涉及授职领凭、入境到任、到任祭祀、参见僚属、官员交接。按照礼制，官员到任要同官吏举行简单的到任仪式，也就是参见礼。参见礼的内容大致为：“先从皂隶、次更典、各行两拜礼。新官坐受，次合属官参见，亦行两拜礼。新官拱手答礼。次首领官见、行两拜礼。新官起身拱手答礼。次佐二官行两拜礼。新官出公座答礼。”新任的地方官员到任后要行参见礼，一般按照官职高低的顺序进行。

龙场驿驿丞，可谓是不入流的小官，王阳明抵达龙场之后理应按规定完成相关到任程序。但因舟车劳顿，且当时的龙场凋敝不堪，王阳明的当务之急是先安顿下来，解决眼前的生存困难，因而有可能忽略了这一礼制。在王阳明的诗文中，也仅仅只有“正德戊辰，守仁谪贵阳，见公于巡抚台下”的记录，双方是否按礼制完成到任仪式，已不可考。但可以推测的是，两人既已见面，王质就算心有不满，也不至于特意派人羞辱王阳明。或许只是下属会错意，才产生了“侮辱”阳明的误会。关于这一推测，王阳明给毛科的回信可证一二。

毛科是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人，按察使毛吉的长子，与王阳明是同乡，承父荫庇入国子监，成化十三年（1477年）参加乡试，第二年中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弘治十五年（1502年），毛科调任贵州提学副使。知晓王阳明与王质的纠纷后，出于同乡情谊，毛科给王阳明书信一封。虽然毛科写予王阳明的这封信现今已不可查，但从王阳明的回信中可以看出，毛科在去信中围绕此事向王阳明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福祸得失，无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见他对此事是颇为上心的。所以王阳明在信首就提出，“近日承蒙您派人前来，用祸福利害的道理开导我，还嘱咐我前往‘太府’请罪。如果不是出于深厚的道义和真挚的情谊，是绝不会做到这一步的。我内心真是无比感激，以至于用言语都难以完全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在对毛科表示感谢后，笔锋一转，王阳明就向王质“请谢”一事委婉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并表示“官差到龙场来侮辱我，这完全是那些人仗着权势擅自

作威作福，并非‘太府’的授意。而龙场当地民众与他们发生冲突，也是因为民众感到愤怒和不平，并非我指使的。这样看来，‘太府’其实并没有侮辱我，我也并没有傲慢地对待‘太府’，那么我何曾有什么罪过，需要如此急迫地去请罪呢？”可见，在王阳明看来，官差的行为并不能上升到“太府”身上，他也相信仗势欺人和迫使他行跪拜之礼并非“太府”之意。而龙场百姓“出手相救”也并非他本意，只是见不平之事出手相助。这一段话将整件事解释得非常清楚。

此外，王阳明自幼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对“忠信礼义”甚是笃信。除了还原事情原貌，他又从另一角度谈了自己对“祸福利害”的想法。“我这个被贬谪的小臣，心中所坚守、准备为此赴死的，唯有‘忠信礼义’罢了。如果连这些都抛弃了不再坚守，那将是最大的祸患。关于祸福与利害的种种说法，我也常讲的。在君子看来，‘忠信’就是利，‘礼义’就是福。如果‘忠信礼义’不复存在，即便拥有万钟的俸禄、贵为侯王般的显赫地位，君子也会视之为祸患与灾难；而只要‘忠信礼义’还在，即便需要剖心碎首，君子也会义无反顾地去做，并且自认为是福祉所在。”他深知生死由命，“‘太府’若想要加害于我，如果真是我有罪责招致，那应该说是我自己不争气、罪有应得；如果并非我的错而非要强行施加在我身上，那不过跟遭遇了瘴气、瘟疫、被蛊毒所害，又或是被魑魅魍魉这样的鬼怪侵扰一样，都是外界强加于我的不幸。”最后，他还对毛科的“调护”表示了感谢。

王阳明在回信中的措辞严谨婉转，可谓“井井兮其有理也”，表明了他坚守忠信礼义的决心。即便遭逢命运之外，身处卑微之境，他亦未曾向权势与富贵低头，其坚韧不拔、刚正不阿的人格魅力，深深触动了毛科的心弦，更令王质为之震颤，羞愧之情油然而生。昔日之误会，如同冬日寒冰，在这光辉人性的照耀下悄然消融，二人终得摒弃前嫌。经过这一风波后，毛科也对王阳明越发崇敬，两人由此建立起深厚的情谊，常有书信往来。而王质与王阳明的矛盾“终不深怨”，居黔期间两人也有交往。从王阳明为之作《卧马冢记》便可发

现，两人关系匪浅。

卧马冢是王质父亲之墓。王质在父亲去世后，多次外出为亡父寻找墓地，都不满意，最终来到宣府城西北方向十多里处，环顾四周，徘徊良久，与这里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仿佛得到了神灵的指引。本打算回去占卜再做决定，但就在这时，他心爱的马匹眷恋地跪卧在地上，时而打喷嚏，时而嗅着地面，围着墓地盘旋不去，还发出缠绵的嘶鸣声，似乎在用这种方式来启发他的心意。于是王质感慨地说：“啊！不必再回去占卜了，先父的英灵已经指示我，这就是最佳之地。”故立此地为父亲之墓，并称其为卧马冢。王阳明在拜访王质时，曾听其同乡说起“卧马冢”的故事。有人认为，王质费尽心思择一宝地，是为了后代官运亨通，位极人臣，有享不尽的福泽。王阳明听后，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王质为父亲奔波选址，并非为了子孙的吉凶祸福，只是想让亲人身后安稳，以此求得心中无憾。同时，王阳明说：“上天是不会不亲近、不保佑仁爱的人和孝顺的子女的，这福气并不是从外面求来的。只要亲人安乐，自己也尽心尽力，内心就能安宁。心安则气顺，和顺之气能招来吉祥，从而带来更多的福祉，并且这种福祉会绵延不绝，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再见到王质，王阳明与其交流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王质认为王阳明的理解深得其心，便委托“遂志之，以训于我子孙”。嘉靖《宣府镇志》中的《祠祀考·附古冢遗迹》也记载了此事：“惟镇城西王都御史卧马冢其异可记焉。正德戊辰，阳明王守仁记曰……”可见，前述风波并未对两人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关于“龙场受辱”，王阳明也与门人弟子稍有言语。钱德洪在《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思州守遣人至驿侮先生，诸夷不平，共殴辱之。守大怒，言诸当道。毛宪副科令先生请谢，且喻以祸福。先生致书复之，守惭服。”黄绾执笔的《阳明先生行状》则记：“时思州守遣人至龙场，稍侮慢公，诸役夫咸愤惋，辄相与殴辱之。守大怒，曰宪副毛公科，令公请谢，且喻以祸福。公致书于守，遂释然，愈敬重公。”

钱德洪与黄绾的记录，都将矛头指向了“思州守”，但并未道明所谓何人。

而据史书记载，“李概，丰城人，举人。正德间知府。行政宽大，惟务绥怀，时有桔榴复荣之异”。因此，关于王阳明在龙场受辱一事，学界有不同的声音，认为或是李概所为。但无论是王质还是李概，从王阳明的书信内容都可以断定，这就是一个误会。阳明受辱，当地老百姓挺身而出、群起而殴之的行为非王阳明授意，从侧面反映了这位被贬至“蛮夷之地”的中原人士，已经在日常相处中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认可，而王阳明也将他们形容为“未琢之璞，未绳之木”。龙场百姓的淳朴热情和无私帮助，在王阳明的低谷时期，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和鼓舞。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龙场遭遇的这场风波，稍有不当地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与此同时，他也感受到黔中人民的善良和温暖。最终以一封情真意切、正气凛然的回信平息了这场祸事，还收获了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而这一切，或许都为他心学思想的萌芽和成熟提供了养分。

## 安氏济困

昔日孔子周游列国困于陈蔡绝粮七日，同样作为儒家圣人的王阳明，在龙场的贬谪生涯中，也遭遇了绝粮之困。不同的是，孔子受困时，整个中国大地各诸侯国间战火连连，而王阳明所处的明代，大一统进程已经推进到纵深阶段。王阳明作为因直言进谏遭人陷害、从繁华的京城贬来黔地的汉人官吏，他的遭遇可能比春秋时的孔子更糟，也可能比孔子更好。决定王阳明在西南边陲龙场驿丞生活境遇的因素有两个：一是王阳明本人的心境与自力更生的能力，二是当时龙场驿的土著最高实权者——安贵荣——的态度。

安贵荣是奢香夫人的第八代孙，贵州宣慰使赐正三品封昭勇将军安观之子，西南彝族“六祖”默部落水西第七十四世君长。周洪谟于《安氏家传》评价其“好读书史，通大义，设庠序以明礼义。旧染陋俗，浸变华风，用夏变夷之功，日见其盛。”出生在明代水西推行汉化教育约一百年后的安贵荣，自幼便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和熏陶，汉学积养深厚。在王阳明被贬谪龙场并在贵州大兴儒学之前，安贵荣曾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在水西永兴寺造钟，并刻汉字铭文曰：“皇图巩固风调雨顺，帝道遐昌国泰民安……大明国贵州宣慰使，水西日革信官宣慰使安贵荣、同缘夫人奢脉、男安佐。是以夫妇谨发诚心……铸造钟一口于本寺，朝暮声鸣，以镇一境。尚祈保佑，俾我子孙代代。”可见安贵荣崇尚佛法，有着较高汉文水平，对明王朝持较强的认同感。事实上，安贵荣自成化十年（1474年）袭父职任贵州宣慰使到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辞世，在位四十年间，曾十七次派遣使者到京朝贡，与中央王朝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此外，明廷以北方蒙古绕道西南灭亡南宋为前车之鉴，历代统治者都愿意重视西南战略地位，以维护穿越贵州湘黔滇驿路的安全，从而达到巩固川西

及云南稳定的目的。明廷除沿途设置卫所屯军外，还积极委派土司维护驿路安全，奢香开“龙场九驿”就是明廷这种战略思想的产物。为使土司心服口服地为朝廷镇守边疆，明廷甚至将土流并治中的流官选拔延伸到了土司群体中，启用土司士官出任流官，像安贵荣这样的大土司便成为明廷培养的首选对象。

正德初年，对安贵荣这位年近花甲的大土司来说，也算是多事之秋。在王阳明抵达龙场前一年，他刚好参加了震慑西南的贵州普安“米鲁之乱”，也有学者说他还参与了平定黔东南凯里香炉山一带的苗民叛乱。田汝成《炎徼纪闻》中载：“贵荣多智略，善兵，以从征香炉山加贵州布政司参政，犹怏怏薄之，乃奏乞减龙场诸驿以偿其功，事下督府勘议。时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谴谪龙场驿丞，贵荣甚敬礼之，守仁乃贻书贵荣……既而驿竟不减。”但是作为记录凯里香炉山苗乱最详尽真实的文献《清平县志》一书，并没有安贵荣参与平叛的记录。安贵荣从征香炉山一事很可能是田汝成误记了。

但安贵荣因协平普安“米鲁之乱”，维护西南稳定有功而获准享有流官职衔却是有史料为证的。《明实录》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癸丑条有记载，“贵州土官宣慰使安贵荣以普安功进昭勇将军，复乞改授职衔，以便公会行礼。兵部拟授都指挥僉事散官，有旨，特命为右参政”。“米鲁之乱”爆发于弘治十四年（1501年），当时贵州镇守、巡抚调集官方军队前往普安平叛，军官死伤惨重，惨败于米鲁叛军，都指挥吴远被俘；米鲁叛军纵容部下剽掠抢劫，普安州几近沦陷。于是镇守太监杨友、总兵官丰润伯曹恺、巡抚都御史钱钺请发湖广省永顺、保靖，四川省酉阳、播州，广西省泗城州及贵州宣慰司土兵全面讨伐米鲁部众。从调兵结构看，明廷调动了西南诸省军队进行围剿讨伐，然而，或因官方军队进剿不力，平定“米鲁之乱”的主要兵力实则是周边土兵。且据兵部议复太监杨友奏折所称，当时湖广苗寇未宁，其保靖、永顺及泗城土兵方在调用，不可再调，只能调播州土兵五千，酉阳及湖广两江口长官司土兵各三千与贵州宣慰使司土兵二万前往讨伐米鲁，并增派云南汉、土官军五千则营于界上要地，堵截叛军向西窜逃的可能性。据此调遣方案所言“贵州宣慰使司土兵

二万讨之”，那安贵荣所领贵州宣慰司士兵是绝对的主力，如此军功卓著，无外乎安贵荣战后所获得的话语权和封赏的不同寻常。

安贵荣协助明廷平定地方叛乱前后，曾被授予三种流官职衔，其中“都指挥僉事”为都指挥使的副职，官阶正三品；“参政”为布政司的副职，有左右之分，“右参政”，官阶从三品；“昭勇将军”则是明代武选正三品武官。在明朝职官系统中，此三项流官职衔职务算是比较高的。然而，相较种种因参与平定叛乱收获的“殊荣”，安贵荣似乎更为土司间的互相伤害感到痛惜。因为在此之前，西南彝族各部本是同气连枝，乃至互为姻亲的关系。明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七月，太祖朱元璋遣使赍敕谕征南将军颍国公傅友德时曾称，“东川、芒部诸夷，种类虽异，而其始皆出于罗罗，厥后子孙蕃衍，各立疆场，乃异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从族群归属与部族未来命运出发，安贵荣对同为彝族的水西土司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

正当安贵荣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龙场驿新任驿丞王阳明的到任给安贵荣带来了新的期待。安贵荣对王阳明的贬谪经过早有耳闻，他打心底敬佩王阳明的直谏之举，同时也想以拉拢王阳明的方式向明廷释放某种信号。他深知龙场驿经过上百年经营调整，王阳明的到来对当前驿站管理来说纯属“可有可无”的存在。龙场驿的生活环境对王阳明这个家境优渥的江南世家子弟来说，绝不仅是身体上的磨难。从王阳明的被贬一事，更可窥朝廷及刘瑾一党对王阳明的用心之狠毒。当龙场土民向安贵荣说起王阳明如何向龙场百姓请教耕作，又不时地还要靠采野菜果腹时，他内心再次被这位传闻中想当将军的书生所深深折服，同时也很快找到了如何与王阳明进一步交往的“敲门砖”。他决定以感谢前些时日请王阳明为象祠作记为由头，给王阳明送去大量的生活物资，以及足以改善他生活窘境的财物和人马。

王阳明千里赴谪，抵达龙场，最先要解决的问题莫过于在陌生的环境中如何稳定下来，生存下去，而解决生存问题最迫切的莫过于柴米油盐。作为水西

土司最大的土官，龙场驿的最直接的管理者，安贵荣有绝对的实力给到王阳明有效的保障。于是，他派下属和前来报信的龙场土民为王阳明带去了米、肉等生活物资，可供王阳明使唤的仆人，包括管理粮仓的“廩人”，负责伙食的“庖人”，负责养马放牧的“圉人”等，照顾王阳明在龙场的生活起居。从安贵荣为王阳明配备物资及人员标准看，这是此前龙场驿驿丞不可能享受到的礼遇。王阳明对此感激不尽，这些物资可谓雪中送炭，但一想自己谪臣身份，受此礼遇多有逾越，此外也怕此事传到京中让刘瑾一党曲解后，对安贵荣及水西土司施压，造成西南一方黎民百姓再次深陷战事的局面，他便婉言谢绝了安贵荣的所有馈赠。

然而，正是王阳明这不合常理的婉拒行为，再次加深了安贵荣对王阳明的敬重。试想，在如此艰难的状态下，依然能保持高尚气节与个人操守，是多么难能可贵。于是，安贵荣第二次派遣部下前往龙场给王阳明加赠物资。此事曾被郭子章写入《黔记·迁客列传》：“宣慰使安贵荣窃敬慕公，龙场又其境内驿，馈金币、鞍马、粟肉，又使圉人代薪水，公辞谢金帛，而与之书。”安贵荣部下在第二次送礼时，坚持请求王阳明收下礼物，王阳明万般无奈之下，终于勉强收下了米、肉，鸡、鹅等物资，将金、帛、马匹、仆人等悉数退回。因担心安贵荣的手下回去无法交差，也为了避免以后安贵荣源源不断地送礼，王阳明决定亲手写一封信给安贵荣，一方面表达真挚的谢意，另一方面为其不能收下的礼物做一个具体的书面解释，随即巧妙递出他与安贵荣往来的第一封书信《与安宣慰书》。

王阳明于信中先是对自己抵任而未去拜见安贵荣解释为“谪臣之礼”，给予安贵荣第一份十足的尊重。作为顶级的语言大师，王阳明剖析自己因得罪朝廷来到龙场驿，是有罪的结果，自己只有躲进阴暗幽森的山谷之中，被鬼怪吃掉，才是应有的惩罚。所以即便早已耳闻安贵荣明义理、重感情，但自己来了几个月也不敢前来报到，或许旁人看着是自己高傲，实则是心中自责，自觉不能与正常的官员相提并论，贸然前去报到述职——这是贬谪之臣应有的礼仪。

继而又以“使君不以为过”解释自己第一次全面谢绝安贵荣馈赠的原因，以“使君复不以为罪”说明第二次收下部分生活物资的感动和感谢。行文上环环相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对于安贵荣的第一次物资馈赠，王阳明以“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惧不敢当”再三推辞。他敬安贵荣为“守土之大夫”，对其为维护西南稳定所做的贡献表达赞许，是客套，也是事实，而自己是“罪人”（是阶级身份的表达，也是处境客观的认识），故惶恐不敢受礼而辞谢。而安氏则“礼益隆，情益至”，安贵荣二次送礼，王阳明最终接受了日常生活所需。安贵荣对王阳明的馈赠，是一种超越“礼法”的上宾礼遇，放眼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传统社会，安贵荣与王阳明的交往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王阳明用短短 300 余字，将自己感激安贵荣的高义，来到龙场不敢登城拜访之由跃然纸上。对于安氏所赠礼物，从公的层面看，作为罪臣他断然不能收受守土大夫安贵荣之礼，可难却安贵荣一再派遣下属为他送礼的盛情，所以他只能从个人层面，作为一个身处困厄的读书人，接受部分安贵荣的礼物。确实，从私的层面看，饥寒交迫的王阳明真是太需要这些物资了，而以私人性质收礼，顺理成章促成两人建立良好的私交关系。这或许也正是安贵荣真正想要的结果。

《礼记·檀弓》篇云：“‘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荀子·荣辱》云：“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视，重死持义而不挠。”道义所在，君子不会倾倒于权势，也不会屈服于私利。王阳明对安贵荣馈赠行为展现的是一种身处困厄，仍然能持节守义的儒者风骨，交接以德君子礼节，以及心存圣志的良知自觉。他因坚守儒者节义，为了人格尊严和崇高理想，放弃了安氏馈赠的唾手可得的“大礼包”，这也正是孔子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的大丈夫气节。王阳明说：“不幸适遭其穷，而当吾道之厄，则前之不可伸也，后之不可追也，左之不可援也，右之不可顾也。抑之则生，扬之则死，呼吸之间，而死生存亡系矣，其时亦岌岌矣。君子于此，将依阿以为同也，将沉晦以为愚也，畴昔所养，何为而乃为此也？是故

君子之不得已也。”对其而言，明道、行道是神圣的使命。因此，当其内心的“道”遭受外在的困厄之时，他能独立道中而不出卖气节，即便深知身处安氏辖境，也不屈膝顺从，而始终保持君子的浩然之气。

也是通过这封信，王阳明坦诚的为人和有礼有节的处事作风，折服了安贵荣，两人从此便经常有书信往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为后来安贵荣对王阳明推心置腹并向其询问政事埋下了伏笔。

## 乡民献方

被贬至贵州龙场那年，王阳明 37 岁，本该是年富力强的年纪，他却已疾病缠身，身体羸弱不堪。外人有所不知，他的身体状况其实在抵达贵州龙场前就很不好。

王阳明的病根早在少年时期就已埋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年，王阳明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在院子里对着竹子苦思冥想七天七夜，结果非但没悟出什么道理，反而病倒了。弟子们普遍认为，这次“格竹”失败导致了王阳明劳思致疾，诱发了他的肺癆疾病。

28 岁科举中第之后，王阳明的勤奋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案牍劳累、挑灯夜读，身体每况愈下，开始出现咳嗽、呕血等症状。王阳明的大弟子黄绾描述道：“日事案牍，夜归必燃灯读五经及先秦、两汉书，为文字益工。龙山公恐过劳成疾，禁家人不许置灯书室。俟龙山公寝，复燃，必至夜分，因得呕血疾。养病归越……”他说王阳明日夜案牍不断，除政事之外，为了让自己的文笔练达，深夜归家还要燃灯苦读五经及先秦两汉之书。父亲王华担心他经常熬夜导致劳累过度，甚至禁止家人在书房里置放灯具，然而还是抵不过王阳明的勤学刻苦劲头。待父亲睡下，王阳明马上又偷偷燃起烛火，通宵达旦彻夜苦读，因此加重肺病，导致咯血不止。后来，王阳明步入仕途，政务繁忙，身体更加吃不消。他的《乞养病疏》一文，记录了当时忙于政务、积劳成疾的经过。31 岁时任刑部主事的王阳明奉命到直隶、淮安等地审案，返程途中感染风寒，刚开始症状为虚弱咳嗽，之后王阳明服了药，使用了针灸等治疗手段，稍有好转。但又急于赶路，行至扬州时，病情复发，“冲冒风寒，恬无顾忌，内耗外侵，旧患仍作”，王阳明形容此后病情不断加重。长时间的患病导致他胸背

弯曲、身形瘦弱，耽误了行程三月之久，最后无奈向皇帝乞求回老家养病。由《乞养病疏》一文可见，正值青壮年的王阳明已经病弱不堪，咳喘虚癯，再也离不开医药了。

雪上加霜的是，王阳明下狱前还挨了要命的四十廷杖。廷杖在明朝是处罚官员的一种重刑，轻则皮开肉绽，重则当场毙命。明朝初年，廷杖之刑还很轻，受廷杖的官员可以穿着棉衣棉裤、垫毛巾，远不至于毙命，主要是起到折辱的作用。然而，从刘瑾当事开始，杖刑升级为他整治官员的私刑，越发变本加厉。廷杖不仅不垫毛巾，还要在朝堂之上、文武百官众目睽睽之下，脱光官员裤子杖责，以示羞辱。对于文臣而言，这几乎是对精神与身体的最大折辱，许多敢于上书直言的官员也因此成为死谏之臣。王阳明上书申救的戴铣，被廷杖三十，当场毙命，而自己也因此被牵连杖责四十。虽然王阳明意志顽强，扛了下来，但也免不了元气大伤。廷杖后，王阳明还被打入大牢月余。大牢阴暗潮湿、腐烂恶劣的环境显然不易于身体恢复，他从这时起就落下了严重的病根。

至王阳明九死一生到达龙场时，生存环境的恶劣也远超想象。龙场地处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瘴气弥漫，毒虫出没，湿气很重，对王阳明的肺病疗养极为不利。加上地处偏远，远离中原地区，缺医少药，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王阳明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这时期，他时常流露出久病思归的情绪：“吾今则有间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当时龙场的学生问王阳明为何如此思归，王阳明回答说，自己出来这么久了，现在又生病，所以想回家。短短三言两语，道不尽的人生辛酸。此后，在《龙冈漫兴》一诗中，他也言明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路僻官卑病益闲，空林惟听鸟间关。地无医药凭书卷，身处蛮夷亦故山。”其中“地无医药凭书卷”一句，即是说当时龙场购买医药困难的实情，王阳明只能依靠自身顽强的意志力挺过病痛的折磨。

居夷期间王阳明最严重的一次犯病，据他自述有月余。当时王阳明严重到卧床不起，龙场的百姓们见王阳明如此虚弱，心中都十分担忧。他们纷纷前来探望。尽管身体抱恙，王阳明依然坚持披上外衣，勉力起身坐在榻上，回应着

大家的关切。有乡民看到王阳明神色憔悴、身形消瘦，担心他的身体和病症，带来各种土俗偏方，争相推荐当地的巫医给他治病，以盼他早日康复。此事，他详细记载在《却巫》一诗中：

卧病空山无药石，相传土俗事神巫。  
 吾行久矣将焉祷？众议纷然反见迂。  
 积习片言容未解，舆情三月或应孚。  
 也知伯有能为厉，自笑孙侨非丈夫。

信奉神巫是当时贵州民间流行的习俗，乡民们生活起居、婚丧嫁娶、疾病疗愈等重要事宜，多喜用巫术行之。在自然科学认知低下的时期，神巫、鬼魂、神灵等神秘力量，一直支配着人们的认知。明清时期贵州的巫医现象较为常见，《贵州图经新志》中就记录了很多当时少数民族神巫风俗：“疾病不事医药，惟用鸡卜、瓦卦以占吉凶，屠牲祭鬼而已。自入本朝，夷俗不变……疾病不服药，惟祭鬼而已。”这表明了当时贵州少数民族崇尚鬼神的疾病观。王阳明《何陋轩记》一文中也写道，“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言明了当时贵州龙场崇尚神巫的传统。“巫医”利用人们相信鬼神存在的心理活动，行巫医之术的同时，运用各种植物药、动物药治疗疾病，在占卜祈祷时加以实施，使人们从心理认知上更加崇拜巫医，并对鬼魂、神灵坚信不疑。但巫医也并非全盘不可取，部分巫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掌握了一定的疾病的发生规律，了解到部分动植物医治疾病的作用。正所谓“巫医合一，神药两解”，神巫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手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不过，王阳明是从中原文明开化地区前来的儒者，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自身精研医道，养生之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对当地乡民缺乏科学观念所行的巫医之术，他有自己理性清醒的认知，《却巫》一诗中流露出他对巫医理性的态度。一是作为儒家学者，他历来就有“不怪力乱神”的理性精神，对神巫等

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认为死生有命，病安在天，不可能通过祈祷、巫祝等方式消灾祛病。但他同时也理解龙场乡民长期以来信奉巫医的积习，这种根深蒂固的认知，是短时间无法用只言片语解释明白的。所以《却巫》诗中，他自嘲说许多乡民反复数次、长达多月对他进行巫医之术的劝说告诫，可他始终没有同意，乡民还反嘲笑他迂腐，这也是王阳明不怪力乱神理性精神的重要体现。二是《却巫》诗中王阳明连用了两个历史典故来表达自己的立场。第一个是孔子“丘之祷久矣”之语，王阳明借用孔子“慎疾”的观念，表达患病无药可医之时，更应放宽心胸，在心上善加调治，信奉巫医祷告之术恰恰是慌乱无措、意志不坚的表现。同时，死生有命，王阳明对自己的病情了如指掌，他自知肺疾日积月累，已成沉疴，必须长时期治疗调养，并无立竿见影之灵丹妙药。所以所谓神巫祈祷祛病，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罢了，哪里蛊惑得了他？第二个是《左传》“伯有为厉”的典故。伯有是春秋时期的郑国大夫，他主持国政时，和贵族驷带发生争执，被杀于羊肆，死后变为厉鬼，众人害怕极了，只有公孙侨敢抚其背，与之交谈。公孙侨即郑国的名相子产，孔子称赞他有君子之道。对于这样一个杰出人物，王阳明仍笑他不是大丈夫，原因在于子产持鬼神之说，王阳明认为这是很荒谬的事。所以，《却巫》一诗从诗题就可看出王阳明坚决的态度，并通过此诗表明了对神巫之事敬而远之，体现了儒学者“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的理性生命态度。

王阳明虽不信奉神巫之术，但他依然被龙场当地乡民的热情所感动。《却巫》诗中“积习片言容未解，舆情三月或应孚”一句，体现了当地乡民对王阳明的关怀之感情。虽然“治病之方”的方式他不认可，但也深知身在异乡能遇到这样的善意和关怀，实属不易。而当地乡民伸手相助的仁义之心，挺身相救的正义之举，环聚守望的敦厚之情，给了王阳明极大的鼓舞，让他充满了安身立命的勇气。为报答当地乡民的厚爱，王阳明不知疲倦地“讲学化夷”，他亲善友好、毫不轻视少数民族的圣人心性，弥合了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他与少数民族深厚的情谊正是其圣人心性的生动实践。

王阳明的龙场岁月，虽然饱受疾病折磨，但他以顽强的意志、乐观的心态、博爱的胸怀，赢得了乡民的敬重和爱戴。所以，王阳明离开龙场后，当地人民对他非常怀念，把龙冈山奉为圣地，约定不在山上放牧采樵。今天龙冈山上树木茂盛青翠，正是王阳明与龙场人民友情万古长青的不朽见证。

## 象祠劝善

坐落于贵州黔西市灵博山深处的古象祠，是中国唯一现存的象祠。象祠之所以保存至今，就不得不提王阳明那篇流传千古的佳作——《象祠记》。

为什么会给象祠作记？王阳明开篇言明：“灵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诸苗夷之请，新其祠屋，而请记于予。”他说，灵博山上有座象的祠庙，那里住着苗、彝等少数民族，他们都把象当作神来祭祀。可世道变迁，战火不断，水西象祠荒废不已、荒草丛生。时任贵州宣慰使的安贵荣，顺应当地人民请求重修象祠，并邀请自己作记。起初王阳明对安贵荣的这份邀请表现得很为难，因为他并不理解为什么要重修象祠，不理解的原因是象祠奉祀的对象十分有争议。

象祠所供奉的神，可不是什么大仁大义的正面人物，相反，颠覆常人认知，是素有恶德的舜的同父异母弟弟——象，他不仅不仁不义，还多次欲置舜于死地，所以祭象这一行为历来颇受斥责。唐朝曾开展过大量拆毁象祠的活动，以薛伯高和柳宗元为代表的士大夫和官员认为，如象这样有恶德的人，是不应为他立祠的，于是湖南道县等地的象祠、鼻神亭被大量拆毁。柳宗元还专门写了《道州毁鼻亭神记》一文叙述千年象祠被毁经过：“于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于江……州民既谕，相与歌曰。”当时拆祠引起的反响非常大，百姓中还有广泛传颂的赞歌。也因此，祭祀祠亭随象的事迹一起，大都毁灭殆尽，只留得一个名称，残存在历史的记忆里。至明中叶王阳明入贵州时，象祠理应已消失殆尽，王阳明不理解为什么水西地区的象祠香火还那么旺盛，人们为什么要供奉这样一个人。

要了解水西祭象的由来，得从中国古代舜和象的关系说起。《书·尧典》记载：“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烝乂不格奸。”意思是说，



舜是瞽叟的儿子，他的父亲瞽叟心术不正，后母暴虐，弟弟象从小傲慢不好相处，在父亲瞽叟的怂恿下，象多次企图杀害舜，皆未得逞。可舜不为他们的邪恶行为所影响，不断用孝行美德感化他们。这段历史记载中，象素有恶德，这与王阳明的传统认知一致，他说：“象之道，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即是说，历来人们对象都是斥责与批驳的。此外，关于舜与象的关系还有一段重要记述，说舜继位后，不仅不计前嫌，还封象为西南国国君。象被封国君后，建都有庠（即今湖南道县北）。在受封有庠后，象感恩舜的大德，从此弃恶从善，勤于政务，励精图治，薄税轻赋，把一个蛮荒之地治理得井井有条，受到人民的景仰。所以在象死后，他的后裔子孙与百姓为纪念他才建立象祠。这也是传说中祭象的大致由来。

而象的一族是生活在湖南西南部，贵州水西为什么要祭象？两者有何渊源？这一点上，安贵荣与水西百姓一样说不清原因，“斯祠之肇也，盖莫知其原。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举之而不敢废也”。他们只知道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人民，从父亲、祖父，一直追溯到曾祖父、高祖父，都虔诚信奉象，水西“夷人”历来有立象祠、祭象的传统。为什么会有这个传统？一是万历《贵州通志》有载：“黔博灵之山，有古象祠，夷人世祀之，莫知其始，斯亦有虞格苗之一征也。”即是说，“夷人”一直有祠象的传统，虽不知道来源，但可能是把象的存在看作舜德化南方少数民族的象征。二是象的都城有庠，紧靠云贵高原，距贵州黔西仅600多里，可能这里也曾有象的后代生活，于是贵州黔西地区也有了祭象的传统。三是学界有水西安氏彝族与舜、象存在族属、祖源关系的说法，《广舆记》中说：“安氏为傲象之遗种。”贵州黔西有关部门曾在素朴镇一带做社会调查，据当地老人回忆，灵博山上的象祠，又有“安氏宗庙”“安氏祠堂”“夷王庙”“罗祖庙”等别称。《黔西县志》也记载，象祠首建于隋代，是为崇奉舜的同父异母兄弟象而立，每年都有苗彝上山朝拜，香火不绝，故长久以来成为苗彝族人禋祀之祠。这一切都表明贵州黔西一带的苗彝同舜、象有着族属及祖源的关系。因此，水西安

氏祭象，实际为祭祖；象祠，就是当地人的祖祠。

在深入了解了贵州黔西地区为什么还有象祠留存，以及当地人民的祭象传统后，王阳明改变了原先否定的看法。他对祭象一事进行了深刻的伦理分析与道德思考，引经据典，层层深入，提出了超越性的“性善论”见解，同时欣然写下千古名篇——《象祠记》。

王阳明认为，祭象行为的第一层面是爱屋及乌。“我知之矣：君子之爱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然则祀者为舜，非为象也。”他认为，君子之爱人，必然推而及之，何况是圣人的弟弟呢？百姓是因为爱戴伟大的舜才推及供奉其兄弟象，他们祭祀象，其实是为了怀念舜。“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后乎？不然，古之桢桢者岂少哉？”王阳明还推测，象死的时候，舜用干羽舞感化了其后人。这些传说也好，故事也罢，无不体现出舜德行之高，感人之深，流泽之远，传世之久。王阳明所说，也并非夸大之词。时至今日，中国文化的基因里都还传承着舜的高尚德行，先贤圣哲的言行举止，至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镌刻在灵魂里，流淌在血液中，转化在行动上。所以，王阳明分析，苗民祭象，实际上是对舜帝德行的崇拜。

接着，王阳明转入深入论证，他引经据典，条分缕析，用《尚书》和《孟子》中的言论从理论上阐明其推想的合理性。先是引用《尚书》“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为据，说明“舜善化人”。王阳明认为，舜的美德，莫大乎尊亲，他对父母做到了大孝，对弟弟象做到了大“让”，不但对他们不心存怨恨，反而以自身的美德感化，没有让亲人走上邪门歪道，反而让他们改过迁善，使家庭关系变得和睦融洽，这种大仁大德，最终感化了象。接着，他援引《孟子》“天子使吏治其国，象不得以有为也”之语，想让人们理解舜对象这种苦心孤诣的处置所彰显的大仁大德，看似以象写舜，实则借象扬舜。之后，王阳明还用周公作比，他认为像周公那样圣明的人，在任贤使能、治人管理上，都不如舜思虑周详，导致周公当政时，有了管蔡之乱。即是说，周公还不能感化管叔、蔡叔，导致祸乱。而象被舜感化后，安于其位，泽加于民，所以他去世



后，才会被后世祭祀、怀念。

由此，通过论述象被舜德感化，从而弃恶从善的事例，王阳明对儒家“性善论”有了更为透彻深刻的思考，首倡“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之论，强调人人良知本具，鼓舞人心向善，使良知复归。他认为，象那样的人都可以被感化，是因为性善是其前提，而这种性善因子的存在是人本体的良知。所以哪怕像象这样的十足坏人，当心有良知，分清善恶，不再自暴自弃、执迷不悟，将本心之善实践于日常生活中，都能改过自新。再者，王阳明通过舜感化象的例证，阐发了“化人”是君子成德的必然。他认为，人性本善，但大多数人心中的善是需要有人感化、教化、引导才能实现的，就像舜感化象一样，这就是君子的责任。所以文章最后，王阳明总结道：“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君子修养要以德行感化恶人，而恶人也应被君子的德行所感化，即便有象这样劣迹斑斑的人，如果德行修养如舜一样深厚，照样也能感化他；如果对方未被感化，则应反诸其身，反思是不是自己的德行努力不够。王阳明提出了他对“君子修德”的要求，“化”字体现出他认为这份修养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自我完善过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如同舜善化象的过程一样，所以化民是君子成德的必然，也是君子为道的必经途径。

此时，还在贵州龙场的王阳明，良知思想已显发端，“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之论与他后来的“满街都是圣人”的思想异曲同工，挺立了个体良知的道德主体，这也成为他后来提出“致良知”思想的重要滋养。他论证舜德化象的思辨过程，即是阐明致良知的功夫。致良知不仅要自信良知，还要信他人之良知，更要让他人信良知，即自信—信他—他信。所以《象祠记》不仅仅是一篇应邀之作，其中提出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之论，承袭孟子“性善论”脉络，又浸润了自己的良知思想，极大发展了儒家“性善论”的内涵与外延，绽放新的人性光芒，超迈前哲。所以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将此文收入《古文观止》中，并高度评价道：“傲弟见化于舜，从象祠想出，从来未经人道破。”是以赞赏王阳明独树一帜的心学见解。

象祠，一座曾经不被人重视、备受斥责的祠堂，因为王阳明的《象祠记》一文，得到前所未有的历史关注，成为人心教化、道德修养、致良知思想实践的标识，并见证了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萌发过程，这正是象祠的大幸。而唐人摧毁象祠的800年后，贵州黔西地区依然保存有完好的象祠，这当中不无阳明之功。1996年5月，黔西象祠遗址被黔西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为期3天的王阳明与象祠文化高峰论坛在黔西举办，国内40余位专家、学者云集论坛，论坛活动硕果累累。2012年秋，由企业家慷慨解囊斥巨资修复象祠，2013年夏，主建筑顺利落成。2015年5月，象祠被列为贵州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象祠景区获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2020年9月，贵州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发布“阳明·问道十二境”文化符号及经典游学线路，象祠正式纳入“阳明·问道十二境”之水西论象，象祠景区成为贵州省人文社科示范基地。象祠景区建成以来，研学价值逐渐彰显。该景区有着奇特的自然景观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概括起来即“一祠三馆，九龙八景”：“一祠”即象祠；“三馆”即水西馆、阳明馆、养心堂；“九龙”即九龙山的九条山脉，名称依次为麒麟、睚眦、嘲风、蒲牢、椒图、霸下、狻猊、负屃、貔貅；“八景”即九龙阁、灵博寺、抗战纪念亭、奢香公主亭、阳明书院、奢香古驿道、九龙湖、牛场大街。如今，象祠景区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这里感受历史的脉动、沐浴文化的光辉。刻印其中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心学名言，犹如一缕金色光芒，穿越数百年历史，照亮每个人的心灵。

## 书信止乱

正德三年（1508年），在贵阳附近的水东土司宋然领地之内，发生了以西长阿贾和阿札为首的土著居民叛乱。这场叛乱原本有望及时得到平息，但因水西土司安贵荣迟迟不肯派兵平叛，导致局势失控，愈演愈烈。此时，王阳明给安贵荣写了一封信，劝他立即出兵平叛。安贵荣听从了王阳明的劝告，迅速出兵，平定了叛乱。这一事件史称“尺牍止乱”。

安贵荣为何先前不愿出兵平叛呢？这得从土司制度说起。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地方管理制度，明朝在继承元代土司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系统化、规范化。土司作为地方管理者，其态度和行为对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当时贵州的两大土司为水西土司安氏和水东土司宋氏。

据乾隆《贵州通志》及《明史》记载，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军声势浩大，所向披靡，大有一统全国之势，贵州水西土司霁翠（后被朱元璋赐姓安）和水东土司宋蒙古歹望风而降，率部归顺。明廷在他们归顺之际，恢复了他们的职权，并进一步规定了贵州宣慰使一职由安氏世袭担任，官阶为从三品；而宣慰同知一职则由宋氏世袭罔替，官阶为从四品。同时朝廷还规定，宣慰使安氏负责掌印，但须驻守在水东领地内的贵州城，除非有特殊情况并获得批准，否则不得私自返回水西地区。这样一来，水东宋氏虽然官阶不如水西安氏，但实际上却可以牵制安氏。朝廷让安氏掌印，宋氏掌文书，旨在让他们双方共同合作、同舟共济的同时，亦可以相互牵制，以达到权力平衡。这样的安排既体现了朝廷对地方势力的认可，同时也加强了对贵州地区的管控。

然而，这一切在水西安贵荣继任贵州宣慰使后，发生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变故，水东、水西土司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随着明朝政坛的日渐混乱，民族

矛盾逐渐激化，战乱频发，卫所屯军的作战能力又大不如前，朝廷和地方流官不得已要更多地依仗土司出兵助战。这无形中加强了个别贪婪土司的权势，安贵荣则更是想方设法一步步挣脱朝廷对他的控制。他通过时任总兵向朝廷申请暂还水西之地，方便办理进贡和赋税等事务，并把官印交给宣慰同知宋然，以代理其职。通过这一安排，安贵荣便不再受到水东宋氏的节制，可以返回自己的水西领地处理事务。随着战功的不断累积和权力的逐步提升，安贵荣的贪婪也越发明显。他开始对执行了百余年的旧制感到不满，意图排挤宋氏家族并取而代之。

关于这次阿贾、阿札的叛乱，从乾隆《贵州通志》及道光《大定府志·旧事志三》中有关记录可知，叛乱是由水东土司首领宋然的贪婪造成的。宋然管辖的陈湖等十二个马头的人民因不堪忍受其迫害和科敛，揭竿而起，攻占了多个寨堡，甚至武装包围宋氏土司的住宅，宋然只身逃了出来。直至督府三下檄文，安贵荣才派兵解洪边之围。但是在斩杀了叛贼首领阿麻后，安贵荣又秘密撤回自己的军队。叛军内部有人泄露消息称，此次叛乱实际上是安贵荣暗地里唆使的，于是贵州政坛一片哗然。然而，鉴于当时安贵荣兵强马壮，势力根深蒂固，仅凭贵州的卫所兵力难以将其制服，因此在朝政混乱的背景下，朝廷不得不对安贵荣养寇自重的行为视而不见，贵州则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王阳明得知此事后，决定亲笔致信安贵荣，写下了《与安宣慰（三）》。

这是王阳明写给安贵荣的第三封信。信中，王阳明言辞恳切，义正词严，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江山社稷、黎民百姓的深深忧虑。他深知安贵荣在上表请求撤驿失败之后，对朝廷仍有怨气，于是剖析了四个关键点，直切要害。

首先，王阳明指出了安贵荣的助乱之罪。在一开始王阳明就旗帜鲜明地表明安贵荣指使叛乱实为谣言，“或出于妒妇之口”。但接着指出，安贵荣“虽无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的状态，即为叛乱定了调，也给了安贵荣台阶下。但是王阳明又进一步说明，阿贾、阿札他们的毡刀、弓弩等武器确实确实是安贵荣先前赏赐的，正是这些武器，使得叛军如虎添翼，屡战屡胜。而且在督府



连发三道檄文催促后，安贵荣才勉强派兵解围，拖延之久，已达三月有余。身为朝廷命官的安贵荣，即便没有助乱之心，但已有了助乱之实，朝堂之上对此“众论纷纷，疑者将信”。封建社会的官场，是一个险象环生的漩涡之地。一方面，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生怕言多必失，做到自保已属不易；另一方面，官场中派系林立，明争暗斗，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因此，一旦落入当权者的猜疑之中，想要洗清自身的嫌疑可谓难上加难。历史上，被错判、误杀的案例数不胜数，足见官场之险恶，人心之难测。王阳明提醒安贵荣，唯有全力以赴出兵平定叛乱，方能通过实际行动洗脱朝廷对自己的猜疑。

其次，王阳明揭露了安贵荣的纵兵之罪。在解洪边之围后，安贵荣称病归卧，其部下军队也悄然撤退，致使叛兵得以喘息，并重新集结，导致乱事延绵三月有余。安贵荣所部不但没有捕杀贼寇宣扬国威，反而明火执仗，肆无忌惮公开劫掠，导致百姓苦不堪言，民情激愤。这种无视朝廷法令和百姓期望的行为，使得要求处罚安贵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再次，王阳明还指出了安贵荣的固守割据之罪。安贵荣曾自大地称其坐拥四十八万之众，沃野千里，城高池深，固若金汤，鸟不能越，猿不能攀。他自恃地广人多，妄图割据一方，与朝廷分庭抗礼，并扬言不为宋氏出一兵一卒，朝廷也奈何他不得，可见安贵荣还沉睡在他的春秋大梦中。然而，王阳明却用事实给安贵荣泼了一盆冷水，他指出，纵使安氏领地绵延千里，但与广袤无垠的中原大地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即使安氏麾下有四十八万之众，但与整个中原的土司相比，亦难言兵多势众；哪怕安氏有高山深谷，然而在安氏四周，这样的土司就有上百个！可见安贵荣能夸下如此海口，实在是有些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

最后，王阳明提醒安贵荣要注意流言传播的危害。这种流言蜚语不仅加剧了安氏的危机，也给整个水西地区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王阳明直指要害地说，假如不是朝廷所封，没有“六年诏霁翠位各宣慰之上”这把“尚方宝剑”，朝廷一纸令下，那么安氏周边早就虎视眈眈的各大土司，一定会共同瓜分

安氏的财产及地盘。那么，安氏必因朝令而夕亡。而且安贵荣所面临的局势并不乐观，外患之下亦有内忧。在水西内部，安贵荣麾下的四十八部头领均系同宗血脉，他们各自握有重权，亦具备足够的实力，足以取安贵荣而代之。如有可乘之机，难保这些人不会怀有异心，图谋不轨。在这样的警示之下，即便是再懵懂无知之人，想必也应该能领悟其中的利害关系了。王阳明最后规劝安贵荣将功赎罪，用实际行动展现其对朝廷的忠诚，破除众口谰言，以期能够弥补先前所犯下的过失。

王阳明其实对安贵荣想吞并水东土司的意图，以及种种助叛行为早已洞若观火。按照明朝律法，安贵荣所犯之罪昭然若揭，但考虑到当时贵州需要和平安定，大明王朝的西部亦需贵州驿路畅通无阻，以固疆土。诚然，朝廷可以调动十万雄兵征讨安贵荣，亦可下令让周边土司瓜分安贵荣的领地，甚至可以依律法捉拿他。然而，深为可虑之处在于，不能错将安贵荣的个人行为归咎于整个安氏家族，更不应将整个彝族牵连其中，殃及池鱼。况且无论是发起征讨还是依法审理，都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耗费时日无数。而贵州地处西南防线的关键节点，其动乱不仅关乎一隅之安危，更将波及西南边防的稳固，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何况，一旦大规模动员土司参战，必将打破现有的势力平衡，进而诱发新的动乱，使局势更加扑朔迷离。至于安氏家族内部，若欲易主，绝非易事，如四十八部头领皆觊觎承袭之权，水西将永无宁日，贵州也难享安宁。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心怀黎民，不忍见当地百姓因此而遭战乱之祸，故才以个人的名义对安贵荣展开攻心战，期望他迷途知返，避祸趋福。

王阳明的这封信，虽然都是对安贵荣喻以祸福利害，然而，他真正维护的却是朝廷大计。他深知，他所列举的安贵荣即将面对的种种险恶，对于朝廷而言，也都绝非轻易可以决断的。王阳明能做的只有循循善诱、谆谆告诫，使安贵荣自己意识到，背离祖制、谋求私利的后果不仅祸及自身，还将祸及整个水西。这种触及家族和宗族利益的真挚劝诫，才最终打动了安贵荣的内心，促使整个事件得以和平解决。不仅如此，此后一百余年，安贵荣的后代也没有发

动叛乱，甚至安氏土司一直成为明廷平定贵州和西南战乱的重要依靠力量。比如后来，安氏土司就曾帮助平定了明末播州之乱和清初吴三桂叛乱。《黔记》称：“终贵荣之世，不敢跋扈者，公之功也。”试想一下，假若王阳明没有及时劝导安贵荣，那么这位土司的鲁莽行为可能引发的后果，实在是难以想象。施邦曜曾对此评价道：“开导利害，详明警切，安氏邪谋，能不寢息？所谓一纸书贤于十万师者，此书足以当之。”这封书信之所以能够发挥胜过十万雄兵的力量，全仰仗王阳明对明朝全局的深刻洞察，对贵州风土民情的细致了解，以及对人心向背的精准把握。王阳明这份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深沉热爱与高度负责的态度，才是真正令人钦佩之处。

从《与安宣慰》到《与安宣慰（二）》再到《与安宣慰（三）》，这三封书信，既是王阳明和少数民族水乳交融的见证，也是王阳明将悟道后的思想用于处理民族关系的具体实践，彰显了王阳明卓越的治理能力及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当时的王阳明作为一个小小的龙场驿驿丞，一个赤手空拳的小吏，在民族大义面前坚定信念，坚持原则，反对纷争，力促团结，为国家消除灾祸于无形，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和维护地方的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堪称古今楷模。

## 第三章

### 龙场悟道

#### 静坐“玩易窝”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阳明困而玩索易理。王阳明九死一生，抵达贵州龙场，又遇到了居无定所、粮食短缺、卧病草堂等重重困难，使我不禁发出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其间，他访山问水，发现了一个深广各二三丈的洞穴，是为东洞；又在东洞的不远处，寻得一个天然小溶洞。于是，便常栖身于岩洞，静坐体悟，反复玩味《周易》，观象玩辞，观变玩占，研究易理，分析命运，以穷理尽性。因此，将岩洞取名为“玩易窝”。

“玩易窝”，地方史料中多有记载，乾隆《贵州通志》记：“玩易窝，在修文县南二里，石上镌有‘阳明玩易窝’五字，洞口有‘阳明小洞’四字，洞中空敞，可坐百人。”《修文县志》记：“城南里许有玩易窝，昔阳明子谪居龙场时读《易》之处。”“玩易窝”位于今贵阳市修文县城南，为地下洞穴，即所谓的



玩易窝

“石榫”。这个小溶洞高3米，最宽处4米，深30余米。它的东面是清秀挺拔的天马山，南面是三足相峙的三角山，东南临巍峨秀丽的九层坡，洞左侧不远处有终年不竭、碧波荡漾的陶家龙潭。王阳明在此的经历为它增添了不少文学色彩，吸引古往今来的无数心学爱好者游历、拜谒。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安贵荣的后代——贵州宣慰使安国亨——曾到此寻觅圣人足迹，在石壁上留下“阳明玩易窝”五个大字，并题诗一首：“夷居游寻古洞宜，先贤曾此动遐思。云深长护当年碣，犹似先生玩易时。”清人潘文芮曾在诗中吟诵：“蛮荒来北学，混沌辟南天。易自窝中玩，心从洞里传。”1985年，玩易窝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修文较早的一处历史文化遗迹。2006年，玩易窝被列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修文县政府以玩易窝为核心，规划打造玩易窝遗址公园。玩易窝外，还有玩易亭、王阳明诗碑、心源广场等景点。玩易窝也已成为贵州阳明文化旅游的重要“打卡点”。

值得关注的是，王阳明贬谪到此时，用钱德洪的话来说，当地就是“蛇虺魍魎”之地。如此艰难的环境下，王阳明何以还有闲情逸致品圣贤书？更何况还是在一个湿冷的溶洞里。这或与其当时的心境有些许关系。此时的他，已经看淡了荣辱得失，唯独没能参透生死问题。因此，如何认知生死、践行圣人之学和君子之道，是他当时面临的重大人生课题。而在宋、明文雅士的传统中，素有习静之风，主张通过静坐来体察天地万物。青年时期，王阳明曾追慕长生之道，时常静坐修身。据钱德洪《年谱》记载，弘治元年（1488年）新婚当天，王阳明曾至铁柱宫，与道士谈论养生之道。后更是沉迷道教养生之术，与尹真人一起畅谈心性修炼之功，并常常在会稽山阳明洞内，自行修习尹真人的“真空炼形法”。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中记述道，王阳明回绍兴养病期间，开办阳明书院，深入探究道教经典中的深奥教义，通过静坐修行来探索长生不老的方法，长时间坚持后，竟能够预知一些事情。

龙场之困，生死之念，王阳明依然选择静坐。他认为，在困苦幽闭的环境里，他之所以常常动心焦虑，是因为还没有去除“有我之私”，即私欲。换言之，就是没有完全放下“躯壳的己”（“小我”），尚未达到“真己”（“大我”）的状态。而静坐就是他破除“有我之私”这层虚妄执着的不二法门。于是，他遵循儒家静坐的原则——“端而虚，勉而一”，让心中保持正念，养浩然之气，通过克省察治的功夫，打磨出德性之知。正如钱德洪在《年谱》所载：“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所谓“静一”，指的是周敦颐在其《通书》中所言“无欲故静”的境界。也就是说，王阳明通过静坐功夫，想要达到圣人的本体境界——无欲。

除了静坐，王阳明还效仿周文王姬昌，在溶洞中澄心研读《周易》，领悟其中的性命之道，体会天地人三才之道的真谛。为记录此事，他还作《玩

易窝记》。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自己研读《周易》分为了“未得”“得之”和“得而玩之”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状态都有所不同。刚开始他一片茫然，俯仰之间都在思索这一学问。只因《易》涵盖天地四方、深入精微，但又茫



然没有具体所指，以致各家解说纷纭，需要自己参悟。后来，他好像有所感悟，就像是江河决堤般畅快，又像拨云见日般清晰，困扰他的疑惑和阻碍都被冲刷掉了，而《周易》中的精华则深深地融入了他的内心。到了第三阶段，他彻底领会了《周易》之主旨，反复涵泳玩味，故而“优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达到了“精粗一，外内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也”的境界。

同时，王阳明还留下了研读《周易》的心得体会。他指出，《周易》包含了天、地、人“三才”之道。古代的君子静居时，会观察《周易》中的卦象，细细玩味卦辞，以领悟深意；行动时，会观察事物的变化，并运用《周易》占卜来预测和指导自己的行为。通过观察卦象和玩味卦辞，就能深刻理解并确立“三才”的基本框架；而观察事物的变化和玩味占卜的过程，就是将“三才”之道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当“三才”的体系确立之后，人的内心就能保持宁静而深邃的状态，仿佛与天地相往来；当“三才”之道得以实践，人的行动就能顺应自然，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达到这种“神”的境界，人的智慧就能周遍万物；而达到“化”的境界，人的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影响天地万物，不留一丝痕迹。没有固定的方向，是《周易》中卦象和卦辞得以立足的基础；不留痕迹，则是《周易》中占卜和变化能够产生的奥妙所在。在研读《周易》的过程中，王阳明感叹道：“倘若苍天再赐我数十载以深研《周易》之奥，我深信必能于世事纷扰中，洞悉先机，规避重咎，使人生之路少却诸多憾事矣！”

参透《周易》中蕴含的哲理，不仅抚慰了王阳明的心灵，还让他对君子之命有了新的理解，走出焦虑、苦闷和迷惘，从而在心理上获得了解脱。关于《周易》，王阳明曾在与弟子论学过程中多次提及，其中一次便直言：“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良知如《易》之道，变化无端，难以把握，故难有人参透，参透者即为圣人。现代易学家朱伯崑先生认为：“王氏心学的基本命题，虽非出自《周易》经传，但其思想体系亦

受易学影响。”可见,《周易》对王阳明龙场悟道有着重要的意义,读《周易》的过程就是他悟道的过程。那么,王阳明为何对《周易》如此情有独钟呢?这就得从其家世渊源说起了。

据钱德洪《年谱》记载:“(先生)高祖,讳与准,精《礼》《易》,尝著《易微》数千言。”由此看来,王阳明的高祖王与准喜好读《周易》,其学《周易》是有家传的,加之出生在书香世家,王阳明自幼便受到祖父和父亲的熏陶,五岁便能“诵竹轩公所尝读过书”,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周易》。所以王阳明对《周易》手不释卷也就不足为奇了。纵览王阳明的一生,即便在人生低谷,他也不忘研习《周易》,足以看出他对读《周易》的痴迷。正德元年,他抗谏下狱后,在狱中曾作诗《狱中十四首》,其中题为《读〈易〉》一诗曰:

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  
 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  
 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  
 包蒙戒为寇,童牯事宜早。  
 蹇蹇匪为节,兢兢未违道。  
 《遁》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  
 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  
 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  
 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

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在作《送别省吾林都宪序》时曾提及这段经历:“在正德初年,我因得罪了权臣刘瑾,被捕入狱,关押在锦衣卫的诏狱中。同时,省吾(林富)也因担任大理寺评事时触犯了当时的忌讳而被囚禁。我们两人囚禁期间,在枷锁和囚具的束缚下,共同研习《周易》,整整一个月,几乎昼夜不停,勤奋不懈,以至于忘记了自身正处于被拘禁的境地。”在身陷囹圄的

人生至暗时刻，王阳明与林富切磋交流，讲《易》不怠，暂时忘记了自己已沦为“阶下囚”的事实。显然，《周易》在此时成了王阳明的精神支柱，给逆境中的他指明了一条可以乐以忘忧的大道。

除此之外，王阳明的诗文中，读《易》的踪迹随处可寻，尤其是赴谪途中，他多次在诗歌中提到读《易》之事。如《杂诗三首（其三）》：

羊肠亦坦道，太虚何阴晴？  
灯窗玩古《易》，欣然获我情。  
起舞还再拜，圣训垂明明。  
拜舞詎逾节？顿忘乐所形。  
……

这首诗作于王阳明从分宜到袁州的途中，体现了他醉心于读《易》玩辞，在坎坷中去人欲而深入探究天理之妙的追求，也凸显出他超凡入圣的心态。王阳明在湖南醴陵期间，曾暂居城西的泗州寺，一路上风雨泥泞、舟车劳顿，可谓身心俱疲，但他并没有立刻卧榻休憩，而是挑灯夜读《周易》。《醴陵道中风雨夜宿泗州寺次韵》一诗中，有这么一句：“水南昏黑投僧寺，还理羲编坐夜长。”这里的“羲编”便是《周易》。由此我们便可一窥王阳明对读《易》的执着。赴谪路上，他除了《易》不离手，还时常回忆昔日与京中好友探讨和把玩《周易》的趣事。如，《忆昔，答乔白岩，因寄储柴墟三首（其一）》：

忆昔与君约，玩《易》探玄微。  
君行赴西岳，经年始来归。  
方将事穷索，忽复当远辞。  
相去万里余，后会安可期？  
问我长生诀，惑也吾谁欺！

盈亏消息间，至哉天地机。

圣狂天渊隔，失得分毫厘。

又如，他在京时曾与挚友汪抑之、汪器之兄弟及湛甘泉、崔铣等人研习《易》道，你一言我一语的热闹场景让他十分怀念，以至于他连做梦都念及此事，并作有《梦与抑之昆季语，湛崔皆在焉，觉而有感，因记以诗三首（其二）》：

起坐忆所梦，默溯犹历历。

初谈自有形，继论入无极。

无极生往来，往来万化出。

万化无停机，往来何时息！

来者胡为信？往者胡为屈？

微哉屈信间，子午当其屈。

非子尽精微，此理谁与测？

何当衡庐间，相携玩羲《易》。

通过诗文不难看出，当时王阳明与友人玩《易》论道已臻入玄境，也可看出他对《周易》的用心与痴迷。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阳明还做过一个晋代忠臣郭景纯悲愤指责王导是奸臣的奇梦，并作诗以记。诗中也提及了《周易》：“烛微先几炳《易》道，多能余事非所论……我昔明《易》道，故知未来事。时人不我识，遂传耽一技。”王阳明直言，“我昔明《易》道”，袒露他很早以前就已与《周易》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可以说阳明心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周易》的色彩。李贽在《阳明先生道学抄序》中言：“先生之书为足继夫子之后，盖逆知其从读《易》来也。”由此可以想见，《周易》对王阳明影响之大。在王阳明的生死时刻，《周易》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据钱德洪《年谱》

记载：

寺有异人，尝识于铁柱宫，约二十年相见海上；至是出诗，有“二十年前曾见君，今来消息我先闻”之句。与论出处，且将远遁。其人曰：“汝有亲在，万一瑾怒逮尔父，诬以北走胡，南走粤，何以应之？”因为著，得《明夷》，遂决策返。

前往龙场之前，王阳明一路颠簸，关于是否赴谪迟迟未定，甚至产生了“远遁”的想法，直到在武夷山偶遇昔日的铁柱宫道士，为其卜筮得《明夷》卦后，才决定赴龙场驿。虽然湛若水说这一经历为王阳虚构，但在虚构中也不忘提及卜卦之事，也可看出他对《周易》之重视。而自龙场大悟后，王阳明“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刚刚悟道的王阳明以“五经”之文来印证省察自己之所思所得，并且皆能吻合，这其中显然也包括《周易》。纵观王阳明的一生，无论是在危难关头，还是生死之际，王阳明与《周易》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和碰撞，读《易》对阳明心学的诞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 大悟“心即理”

毫无疑问，王阳明一生当中最高光的时刻，当数 37 岁时的“龙场悟道”。这惊天一悟，不仅开创了影响深远的阳明心学，其本人也一举奠定了儒学宗师的地位。王阳明龙场之悟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悟出了“心即理”，不过这个概念是他后来才提出的，其悟道的原话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关于王阳明“龙场悟道”的经过，各种传世文献多有记载，内容大同小异，可举数例，以供一观。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一夕，忽大悟，踊跃若狂者。以所记忆五经之言证之，一一相契，独与晦庵注疏若相抵牾，恒往来于心，因著《五经臆说》。”黄绾说，王阳明在某个晚上大彻大悟后，以所记五经中的内容来印证自己的所悟所得，结果一一契合，而与朱晦庵也就是朱熹的注解有矛盾，于是就写下了《五经臆说》，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读来阐释自己的心学思想。

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钱德洪的记载，则将龙场悟道的内容更具体化了，说王阳明在睡梦中感觉有人在和他对话，于是就悟到了“格物致知”的真正含义，就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外部事物去求理是不对的。

黄宗羲《明儒学案》：“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黄宗羲与钱德洪的说法比较一致，只是把“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改成了“不假外求”，都是向内求理的意思。

更为传奇的是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所著的历史小说《王阳明出身靖乱录》：“忽

一夕，梦谒孟夫子，孟夫子下阶迎之。先生鞠躬请教，孟夫子为讲良知一章，千言万语，指证亲切，梦中不觉叫呼，仆人伴睡者俱惊醒。自是胸中始豁然大悟，叹曰：‘圣贤左右逢源，只取用此良知二字。’于是默记五经，以自证其旨，无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冯梦龙在钱德洪《年谱》的基础上又添油加醋了一番，将“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说成是王阳明梦到了孟子，后者为其讲良知一章，受到启发后，王阳明提出了“良知说”。其实王阳明的“良知说”是后来他在江西讲学时才明确点破的，冯梦龙用小说的笔法写王阳明，自然是不可尽信的。

总而言之，王阳明龙场悟道始末颇具神秘色彩，“一夕，忽大悟”“忽中夜大悟”，似乎是在那个夜晚，王阳明的头脑中突然灵光一闪，然后就大彻大悟，一下子就明白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个道理。这当然与事实不符，从史实推断，王阳明的悟道不是“顿悟”而是“渐悟”，是自身学术积累和外部环境刺激的结果。从内因来看，王阳明的学术经历虽然较为曲折，但一直未脱离儒学的熏陶。他自幼就立下了要做圣贤的远大志向，17岁时又在江西上饶拜访了当时的大儒娄谅，娄氏以宋儒格物之学教他，并告知“圣人必可学而至”，王阳明深感认同，于是“始慕圣学”。21岁时，王阳明专心于宋儒格物之学，他在京城侍奉父亲王华时，曾遍寻朱子遗书读之，并留下了“亭前格竹”的典故（另有15岁格竹之说）。在青年阶段的学习中，王阳明已逐渐感受到朱熹的“格物说”行不太通，并且有了心学的倾向。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阳明在写给诸阳伯的诗中说：“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吾待。”在这首诗里，王阳明不仅指出当年自己沉溺于释、道的不是，更是提出了“大道即人心”的观点，可谓是“吾性自足”或者是“心即理”的先声。此时的王阳明或许已经意识到“吾心”的主体作用，只是还未曾找到理论支撑。这个契机还有赖于外部环境的刺激。王阳明被贬谪至龙场之后，政治上的不得意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不得不让他从自己的内心去寻找可供依靠的力量，于是他“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唯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槩，自誓曰：‘吾



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最后悟得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大道。

如上所说，王阳明悟到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是针对“格物致知”而发，并且与朱熹的解释不同。两者的区别在于“理”是向内求，还是向外求。朱、王二人都是通过《大学》这一儒家经典来阐释自己思想的。众所周知，“格物致知”是儒家经典《大学》中的内容，而《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朱熹注《大学章句》的基本结构是“三纲八目”，“三纲”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八目”这部分，朱熹认为是经。另外还有对“三纲八目”的解释，朱熹把他们叫作传，并且认为经、传应该都是一一对应的。朱熹根据这一原则研究《礼记·大学》篇的时候，发现几个问题，一是经、传不是按顺序对应的，二是解释“格物致知”的“传”也没有，一开头就是“诚意”。朱熹主观地认为，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是《大学》的文本在流传的时候出现了“错简”和“阙文”，于是就做了一些补救工作。他重新编排了《大学》文本的顺序，并根据二程的意思，补了一个“格物”传，这样一来，从“格物”到“平天下”，不论是经还是传，表面上看起来总算是首尾一贯了。从格物到致知，再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不断进阶的过程。朱熹补的“格物”传有几个要害的地方。

一是“即物穷理”：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朱熹把“格”解释为“尽”，把“致”解释为“推开去”，一直到尽头。他认为，天下万事万物，包括自然之物和社会道德伦理，都有理的存在，都需要我们去探究，这就是“格物”，也就是“即物穷理”。“即物穷理”的目的是“致

知”，让我们掌握的知识一直到尽头。如果天下事物的理还没有被完全弄懂，那么“求知”的过程也是无穷无尽的。

二是“豁然贯通”：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粗精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

掌握知识一直到尽头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朱熹说，待到“即物穷理”用功长久，终有一天大大小小的理会豁然贯通，那时万事万物的里外巨细都会被认清，心的体和用也能得到充分发挥。

这两个要害之处会给人造成一定的困惑。一是怎么把“格物致知”和“诚意”给衔接上，因为这里从逻辑上讲是不太好理解的，就好比一个知识很渊博的人，不能说他一定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我国近现代著名国学大师唐文治在幼年读书时就遇到了这个困惑，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诚意”之前先要“致知”呢？意在内，知在外，这两者没有必然联系的呀！二是穷理穷到什么程度才算豁然贯通？如果贯通不了，那就要一直穷理下去。比如看到一张桌子，就去求个桌子的理，看到一张椅子就去求椅子的理，根本就是无穷无尽的。

王阳明本来也是信奉朱熹的“格物说”的，所以他去格竹子，格了七天七夜，没得出个所以然来，自己反而累垮了。在说出一句“圣贤是做不得”的丧气话后，王阳明不得不放弃做圣贤的伟大事业，转而去研究辞章。其实王阳明会错了朱熹的意思。朱熹说的格物是先格万物之理，然后将这些大大小小的理融会贯通，成为一个普遍真理；王阳明则想从竹子这一形而下的具体事物中格出一个形而上的普遍真理，路子走错了，自然是事倍功半。王阳明在求理的路上的确是南辕北辙了，但即使正确理解了朱熹的“格物说”，在他看来，要格尽天下事物，这些工夫做起来也未免太劳心劳力了。因此他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王阳明把这种鸡零狗碎的格物叫作“支离”，



他认为儒学本来是很简单的，就因为后代不断地去解释，结果搞得这么复杂了，“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所以王阳明提出“心即理”就是想把复杂的儒学重新变得简单化。为了重新解释格物致知，王阳明也注解了《大学》，他用的文本就是《礼记》中的《大学》原文，也叫《古本大学》。他赋予了格物致知新的含义，他说，格是正的意思，物是事的意思，致知就是致良知。“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这样一来，格物致知都被纳入“心”的范畴，最终与“诚意”构成一个整体。

总的说来，朱熹说的格物，是向外求，用的是归纳法，集合万事万物的理得到一个普遍的天理，是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王阳明的格物，是向内求，每个人的心中本来就有一个理，运用到万事万物身上自然就合理了，是从普遍性到特殊性。《传习录》中有一段关于徐爱问学的故事，王阳明用非常形象生动的语言解释了“心即理”：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徐爱对王阳明的“心即理”还没有完全领悟，就提出疑问，“至善”也就是“天理”，如果只从自家身心上求，恐怕是不能够涵盖天下事理的。王阳明就告诉他：“心即理。天下没有心外之事，也没有心外之理。”说到这，徐爱还是没明白，他又问：“事父的孝，事君的忠，交友的信，治民的仁，这些事物中也有许多理，恐怕不能不去探究考察吧？”其实徐爱还在朱子“格物说”里兜圈子，还没跳出来，仍然是把心和理看成两件事，需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去格，然后才能得到至理。王阳明告诉他，孝忠仁信这些理都在此心中，心即理。只要心是没有私欲的心，此心就是天理。把此心用到侍奉父母上，体现的就是孝的理；用到侍奉君主上，体现的就是忠的理；用到交友、治民上，体现的就是信

和仁的理。只要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可以得到“至善”和“天理”了。这就是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的不同阐释。朱熹说的“格物”是“即物穷理”，是在事事物物上求定理，是析心与理为二。王阳明说的“格物”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因为良知就是天理，所以在事事物物上致良知，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这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这就是王阳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所悟出来的道理。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是王阳明“良知说”的基础，龙场的这一悟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朱子学发展到明代已经失去活力，陷入僵化，已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在此情况下，学者仍死板地抱着朱熹“格物说”不放，而没有真正从自家身心上去探求、发现其中隐没的大道。王阳明说：“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王阳明顺应时代要求，赋予了格物致知新的含义，逐渐打破了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思想的大解放。另一方面，王阳明的学说增强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信心。圣人之道，本就存于吾心之中。每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作用于自己的身心上，则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正如王阳明所说，“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 默记“五经”证圣道

《五经臆说》一书，是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为印证自己的心性证悟——“格物致知之旨”——所得。当时龙场环境恶劣、文化滞后，王阳明身无长物，整日坐在石洞里，背诵默记“五经”，并结合自己的领会对“五经”原旨进行注释注解，后来集成著作，取名为《五经臆说》。中国历代大儒在阐释和传播自己的心得和见解时，通常采用注疏古代儒家经典的方式。《五经臆说》一书亦是如此，其通过经典注释的方式，记载了王阳明“圣人之道”的思想结晶。可惜的是，这部意义非凡的专著后来被王阳明一把火烧了，只留下一篇序言和十几条残篇。

作为龙场悟道的重要成果，《五经臆说》具体说的是什么呢？随着《五经臆说》被付之一炬，其内容很可能就此湮没了。所幸王阳明去世后，钱德洪整理先师遗著时，从废稿中发现了13条注解，即《五经臆说》十三条，其中涉及《春秋》的内容有三：“春王正月”解、“元年”解和“郑伯克段于鄆”解；面向《周易》的内容有四：《易传·彖辞传·咸卦》解，《易经·恒卦》卦象义理解，《易经·遁卦》卦辞与《易传·彖辞传·遁卦》解，《易传·象辞传·晋卦》与《易传·彖辞传·晋卦》解；涉及《诗经》的内容有五：《时迈》《执竞》《思文》《臣工》《有瞽》五首疏解。从中可以窥见，王阳明“以心注经”的具体运用。

以第一条“元年春王正月”为例，它是《春秋经》中的第一句，只是单纯地告知时节的，历代经师对其均有解释。但王阳明把它解释得别出心裁，言：“元者，始也，无始则无以为终。故书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则有人元焉。”着眼于“元年”的“元”意味着“开始”或“根源”这一关切，把“元”与天地、天下、国家及人的根源连接起来，认为“元也者，在天为生物之仁，而在人则为心”。“元”，

于天而言，是生成万物之仁；于人而言，则为主宰万物之心。因此根本的功夫处必然是心。又言：“正也，有未尽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过迁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王阳明把“元年”解释为“人君正心的起点”，并指出“正心”功夫没有终点。

王阳明在《玩易窝记》中高度赞叹《易》的功用，于是对《周易》中《咸》《恒》《遁》《晋》四卦卦象或爻辞共做七条注解。以注解《晋卦》“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为例，王阳明先是从卦象上注解“晋”，即“进”，重君子“自昭明德”，言：“日之体本无不明也，故谓之大明，有时而不明者，入于地则不明矣。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无与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人的本心光明自照，有时候变得晦暗，是因为被私欲遮蔽了，去除私心，自然就能回归光明。就像太阳每天从地面升起，是其本有的规律，并不是受“天”的“操控”；同理，君子明明德也是“自明”“自昭”“自去私欲”，而非受制于他人。故君子自明明德，与《晋》卦卦象相合。接着又对《晋》卦初六爻辞“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进行注解，言：“初阴居下，当进之始，上与四应，有晋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进，不暇与初为援，故又有见摧之象。当此之时，苟能以正自守，则可以获吉……”认为得此爻者，有“进”之象。但阴爻居于阳位，刚开始前进就遇到了阻碍，且孤立无援，所以应当以正自守，从容不迫，涵养品德，修炼内功，最终便会获得信任、被赋予使命，进而走向成功。

王阳明疏解“五经”紧紧围绕两个要点，一是人的本心充满了“仁”和“明德”，也可以这样说，本心就是仁和明德（本心 = 仁 = 明德）。二是真正的功夫就是驱除私欲使身心回归到原来的状态，这恰好与他龙场所悟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形成具体映照。特别是对《春秋》和《周易》的疏解，他总能反观自身境遇阐发，展现出极强的“龙场特色”。贬谪龙场，身处荒野，却始终心在庙堂，期待人君“正心”、改过迁善，期待自己也能如“康侯用锡马蕃庶，



昼日三接”。然虽有晋如之心，却亦是“晋如摧如”之象，他深知“若忠诚未显，上之未信，若汲汲于求进，则有失身枉道之耻”，时机尚未成熟。于是，深怀戒慎之心，只是自昭明德，“宽裕雍容，安处于正”。最终王阳明迎來庐陵升任和后续一系列的人生转机及其心学思想的不断精进完善。

既然《五经臆说》是王阳明龙场所悟之心得，如果将此书流传下去，必定能让众多士人接触到王阳明的思想，更利于心学的传播。可王阳明是基于什么考虑，将这本书给烧掉呢？其中或许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王阳明对自己所立之言十分谨慎，他担忧后世学者会对其文字不断进行阐释，反而偏离了本意。徐爱首刻《传习录》时，王阳明就曾说：

“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他认为，圣贤之教如看病，依着病情立方子，一人一方，是因材施教；用同一个药方治不同的疾病，那便与杀人无异。钱德洪在《刻文录叙说》中也记录了王阳明反对门人弟子刊刻其文章之事，言：“嘉靖丁亥四月，时邹谦之谪广德，以所录先生文稿请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党学问，幸得头脑，须鞭辟近里，务求实得。一切繁文靡好，传之恐眩人耳目，不录可也。’”他担心大家过于关注文字功夫，以致心学思想支离破碎而贻害后人。

另一方面，阳明心学简易直截，主张直接体认本心。王阳明在《五经臆说》序中写道：“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王阳明将“五经”及其所蕴含的圣贤之道，用鱼和美酒作了一个形象比喻。他说，捕到鱼之后，可以忘了捕鱼的工具；酒酿好了，可以把糟粕扔了。王阳明想表达的意思很简单，“五经”只是学习、获得圣人之道的工具或者原料，虽然这些经典所记载的圣人之学已经很完备了，但对于已经闻道的圣人来说，“五经”就像捕鱼的工具和酿完酒后的糟粕，是可以不要的东西。

王阳明没有采用汉唐经学家和两宋理学家的解经传统，不提倡在经典的文本上咬文嚼字，而是沿用陆九渊“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体证路径。“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这是王阳明撰《五经臆说》的写作宗旨。在他看来，这本书是将自己的体验印证“五经”，凭着自身记忆玩味研习而成，更多的是他自己的内心想法。“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体认到了本心，也就领悟了常道。在王阳明看来，所谓的“五经”也好，“六经”也罢，都是“具于吾心”的常道。正如他在《尊经阁记》文末感慨所言：“世之学者既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由此观之，无论是龙场悟道，还是《五经臆说》，抑或《尊经阁记》，都只是王阳明“以经学印证心学”的体证实践，而就其一生思想和实践而言，王阳明如是说，亦如是做。



## 始论“知行合一”

公元1509年，龙场悟道的后一年，王阳明龙冈讲学的名气越来越大，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对他仰慕已久，不断邀请他来贵阳讲学。多次恳请之下，王阳明应席书之邀，来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在贵阳这一年，王阳明的思想又有了重大突破，他首倡“知行合一”之说，成为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五百多年来享誉海内外，影响深远。

王阳明是怎么提出“知行合一”的？其弟子钱德洪编著的《年谱》中记载：“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提出，是在与席书的一来一往问答中渐悟的。席书在认识王阳明之前，沉迷于朱子格物之学，但越钻研内心越茫然，苦于一直无人拨开他心中的迷雾。王阳明到文明书院讲学后，席书趁此便利，与王阳明交流心中所惑。席书以“朱陆异同”之辨请问王阳明，“朱陆异同”是明朝学术界绕不过的话题，绝大多数学者都是追捧朱熹，倡导朱子学，而远离陆象山，贬抑象山心学。对此，王阳明没有直接言及“朱陆异同”，而是提出“知行合一”，证诸“五经”，使席书逐渐觉悟，往复数次才大悟：朱熹、陆象山各有得失，无须为圣人争辩，求之自己性体便一清二楚。

在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前，更深入浅出的理论是程朱理学“先知后行”的知行观，“知”为认知，“行”为实践，先要格物致知，不断接触事物，然后实践总结，才能体悟天理。那么，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该如何理解？

首先，王阳明认为知行本一，“知”与“行”本是一体，不要把“知”与“行”分作两件事。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知行”原是一个功夫，即知行本一。有怎样的“知”，就有怎样的“行”。有错知，就有错行；有浅知，就有浅行；有深知，就有深行；有真知，就有真行。一般来说，“知”是一个标志主观性的范畴，“行”则是标志人的外在行为的范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其基本观点是知先行后，王阳明则持“知行合一”的观点，反对将知行割裂，从定义上杜绝了知行之间的一致。他说：“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摩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针对两种弊病的一剂“对病的药”，无论是“行”而无“知”，还是“知”而不“行”，都不可取。只有“行得是”而又“知得真”，才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知”与“行”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并非此消彼长，体现了道德行为与道德认知的一致性。但在践行知行的过程中，人们却常常发生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上的矛盾。所以，王阳明常用行孝作例子，给弟子阐释“知行合一”。他的弟子徐爱就很疑惑，“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在徐爱看来，现在的人都知道应该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但是却做不到，这“知”与“行”之间分明是两件事。而王阳明回答：“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

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认为徐爱所说知而不孝、知而不悌，并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这样的“知”已经被“私欲”阻隔了，并非知行的真正本体。王阳明常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内心有什么样的认知，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只是知道行孝这个事，但是没有行孝的行为，那就证明这个人其实是未知。他们所谓的这个“知道”，只是停留在头脑里的知识，并非自己内心的真知。正如很多人都明白的一句话：“听过很多大道理，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其实，你之所以过不好这一生，就是因为你没有真正践行这些大道理。之所以未能践行大道理，是因为内心深处并不真正认可这些大道理。人的内心深处常受浅知浅行、错知错见主宰，它们影响了思维和行为模式，成为错误的根源。这些内心深处隐藏至深的错知错见、偏知偏见，正是被“私欲”阻隔、被“小我”所控制，使得人的本心被蒙蔽，导致知行分离。所以，“知行合一”的本质即是知行本一。

再者，王阳明认为，真知即行，不行不知。真正的“知”，是必定要落在“行”并且已在“行”里的，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本心与行为绝不会是两派作风。真知必须在实践中体现出来，否则似是而非，欲盖弥彰，行不出来，就是没有领悟真知，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可以说，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要领就在于“体究践履，实地用功”。《传习录》中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属官，听了王阳明的讲学很有收获，他找到王阳明说，很想深入学习他的心学，但是由于公务繁忙，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学习，如何是好？王阳明听了之后告诉他：“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王阳明认为，这个属官想离开工作去修行，恰恰是知行分离，其实最好的修行就在工作之中，“知行”的修养工夫就藏在这些日常事务中。比如你官员断案，要学会不掺杂自己的主观情绪去判断，依据客观证据，不能因为有人送礼了，就网开一面，也不能因为他顶嘴了，就心生怒火。王阳明此意，意在说明为官之学，不可脱离具体的

实践，“知行合一”不是作壁上观，更不是坐而论道；抛开具体实践去修行，反而会处处落空，领悟不了“知行合一”的真谛。所以对于“真知真行”的功夫，王阳明谈道：“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功夫。”如果在行动的时候，不能“精察明觉”，这种“冥行”不过是糊里糊涂的行动。就像只学习却不进行深入思考必然导致迷茫，学了很多知识和理论却没有内化于心，不将知识转化为仁爱、智慧、力量，缺乏行动，这样的“知”也只是一种妄想，只是口耳之学，听过之后不留痕迹。人生的真知，不是轻易能够体证的，唯有在心上真正明白了，在实践中做到，才不会变成无用的大道理。因此，“知行合一”是“真知真行”。

最后，“知行合一”合于“天理良知”，“知”从心出，是为“良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落脚点是“致良知”。王阳明认为追求美好的事物是人之本性，是符合天道的，符合天道即是“良知”，而“良知”是“知行”的本体，所以“知行合一”的“知”特指心中的“良知”，是一种符合天道的德性之知，就是每个人都天然知道的善恶是非。正如王阳明所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知行合一”中的“知”，是以“良知”的标准去“知善知恶”，“良知”是每个人的“心之本体”，它本身就是知晓善恶的，就像每个人外在言行举止的内在监督者，对善恶的好恶本身就是一种“行”。而“知行合一”，不管是“知”还是“行”，都需要“一念发动”，“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这个“一念”由心产生、由心催动，是一种天然的德性，也就是“良知”本体。譬如犯有贪污之罪的人，他的内心虽然知道贪污是犯罪的，但他“一念发动处”，却不能够把这不善的意念克倒，而是走向良知的反面，去贪污了。换言之，如果没有良知导引，知识的增长不但不能用于良善之目标，反而会使人沉溺于私欲，乃至泯灭天理。“私意障碍”会使“知行”与“良知良

能”分割开，“都是一个私心，便不当理”，从而无法达至“知行合一”。因此，“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在于良知良能的实践。“知良能，是良知；能良知，是良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通过“知行合一”，破除自私意欲对于良知良能的遮蔽，使良知回归心中，求得内心光明。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后的又一大思想成果，它把“心即理”与“致良知”有机地结合起来，是“致良知”的必由之路，被后世称为王学“三大要”之一。在贵州的这一年，由于大悟“心即理”与“知行合一”，王阳明的心性更加豁达乐观，原先被贬谪的郁闷，对生死的恐惧，全都一扫而空，内心一片澄明。虽然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学说后，饱受同时代和后世学者的质疑，可他反复论辩、倡导“知行合一”，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知行合一”思想来扭转明朝官场社会空谈学术、忽视实践的不正之风。而五百年后的今天，“知行合一”的理念之所以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为人们所接受，更重要的是王阳明以自己的“行”、以自己的事功，向人们展示出“知行合一”真正的行动力量，以“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的彪炳事功，展示了“知行合一”的心学真谛。虽然王阳明故去已很遥远，但他的思想深深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时至今日，“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还在黔中大地上激荡回响，广开黔中学智，革鼎千年儒风，培育万民良知，为贵州乃至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 “致良知”发端贵州

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今修文县）成功悟道。自此，阳明心学有了自己的逻辑起点。在此之后，他于贵阳讲学期间，首次提出了“知行合一”命题。而后，心学思想在讲学论道、为政行道中日趋成熟起来，并最终总结凝练了“致良知”命题，形成了完整的心学体系。其中“心即理”“知行合一”均是王阳明谪居贵州期间的思想结晶，“致良知”则是其晚年论学的宗旨，也是其心学思想的最终归宿。他在写给儿子王正宪的家书中直言：“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概括为“致良知”。那么王阳明的这一思想是始于何时、成于何地呢？或许我们可从其一众弟子的记录中寻觅答案。

王阳明弟子王畿在《刻阳明先生年谱序》中记载，良知之学始于龙场：“及居夷三载，动忍增益，始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黄绾则认为自正德九年（1514年）起王阳明的讲学方以“良知之旨”为中心，“甲戌，升南京鸿胪寺卿，始专以良知之旨训学者”。钱德洪则在《年谱》中记载：“（正德）十有六年辛巳……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闻前月十日武宗驾入宫，始舒忧念。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可见他认为，王阳明的良知之教是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提出的，此时的王阳明经历了宸濠之乱和忠、泰之变，更加坚信良知的力量足够让人忘却患难，超脱生死。

在《答论年谱书》一文中，钱德洪直言，王阳明在辛巳年经历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之后，就只信奉“良知”这一学说。此语再次点明，王阳明独信“良知”是在平定宁王叛乱之后。而《刻文录叙说》中，钱德洪还有这样一段话：“‘良知’学说兴起于正德辛巳年，大概是因为先生再次遭遇了宁王朱宸濠的叛

乱以及张、许之难，使他对学问又有了深层次的领悟，所以所著的《正录》一共有三卷，其中第二卷起始于辛巳年，意在标志这一学说的确立。”表明“‘良知’之说发于正德辛巳年（1521年）”。与此稍有不同的是，紧接着，钱德洪在此文中还有一段阳明之言：“自龙场悟道之后，我的学说就没有离开‘良知’二字这个主旨。只是没有直接点明罢了。但再讲学论学中，也是花费了很多言辞去阐述的……”可见，王阳明在与钱德洪日常交往中，曾谈论过自己“良知”命题的发轫问题。他认为，“良知”思想在龙场悟道之后便已萌芽，此时提出的“心即理”中已经蕴含了对“良知”的体悟，其在贵州期间所著的《象祠记》《瘞旅文》等名篇无不蕴含着他的“良知”思想。在龙场悟道之后，他的论学、传道、行道的过程中，均有“良知”的因子，只是还没有用“良知”来概括其心学宗旨，这期间他所倡导的“知行合一”“诚意”“心外无物”等思想，无不是对“良知”的探索。

从以上记载来看，钱德洪关于“良知”思想的记载看似自相矛盾，但结合他与王阳明的对话交流，实则已经把“良知”思想的发端、发展和成熟都说得十分清楚了。简而言之，王阳明点破“良知”二字及这一思想的成熟都是在江西，即钱德洪所言的“正德辛巳年（1521年）”，但“良知”思想早在贵州之际便已萌芽。可以说，从有“此意”到最终点破“良知”二字，经过了十三年的锤炼，这也是对龙场悟道成果的高度总结与升华。

那么王阳明说的“良知”到底是什么呢？王阳明在日常论学中对“良知”多有论述和阐释，诸如“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就是当下此心的本然状，良知是人本心的表现。然而，“良知”一词并非王阳明首提，而是源自《孟子》，据《孟子·尽心上》记载：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通俗地讲，也就是人无须通过学习就能做到的事情，就是良能；无须经过思虑就能知道的事情，就是良知。小孩子没有不知道亲爱父母的，长大后也没有不知道应该敬重兄长的。亲爱自己的父母是仁；敬重自己的兄长是义。做人没有其他的，只是把这种“仁义”推行于天下罢了。在孟子看来，“良知”就是“不虑而知者”，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孟子这一思想，在与徐爱论学中提出：

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王阳明认为，见到父亲自然而然知道要孝顺，见到兄长自然而然知道要敬重，见到孺子掉进井中自然而然会生出恻隐之心，这就是“良知”，是不假外求的。他指出：“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良知是每个人心中的“道”，是本然存在的，所有人的良知都一样。不同是普通人的良知会受到私欲的障蔽，使天理不能显现；而圣人则会在去人欲上下功夫，从而正面天理。这就是为什么人需要“致良知”。

“致良知”是王阳明结合《大学》中的“致知”与《孟子》中的“良知”凝练的重大命题。关于“致知”的理解，朱熹认为：“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可见，他将“致知”理解为不断追求和丰富知识，以达到无所不知的境界，无所不知就意味着所掌握的每一分知



识都能完全、深入地理解并得以应用。与朱熹的阐释不同的是，王阳明认为：“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致”就是达到的意思，就像常说的“丧致乎哀”的“致”字，《易经》中说到“知至至之”，“知至”就是知道了，“至之”就是要达到。所谓的“致知”，并不是后来的儒家学者所说的扩充知识的意思，而是达到“我”心本具的“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天理便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改正事物使之符合天理，才能达到事物与心与理的合一。他在《答顾东桥书》中曾对“致良知”进行过阐释，直言：“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也。”即致本心之良知于所感知到的具体事物上，赋之以心中之理，使事物符合天理的规范要求，也就是事物为天理所化，达到合而为一。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概念，王阳明以温清奉养为例进行了说明，他说：“了解怎样调节寒暖来使父母舒适，懂得如何恰当地侍奉赡养父母，这只是所谓的‘知’，但还不能称之为‘致知’。必须将关于如何调节寒暖使父母舒适的知识付诸实践，真正地去让父母感受到温暖适宜；将关于如何恰当地侍奉赡养父母的知识付诸行动，实实在在地去尽孝赡养，这样之后才可以说达到了‘致知’的境界。”简而言之，知温清奉养，是知而不是致知；而行其良知之知，才是致知。“有人会说：‘谈论孝顺父母，如嘘寒问暖、早晚问安这些礼节，有谁不知道呢？’然而能够将这些知识真正付诸实践的人却很少。如果说只是粗略地知道嘘寒问暖、早晚问安的礼节形式，就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致知’，那么所有知道君子应当行仁的人，都可以说自己已经做到了致仁之知；所有知道臣子应当尽忠的人，都可以说自己已经做到了致忠之知。这样看来，天下岂不是人人都是致知者了吗？由此可见，我们可以明白，‘致知’必定在于实践行动，而不付诸行动就不能算是‘致知’，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因此，“致良知”之“致”除了有

扩充、推极之意，更重要的就是“行”，就是要在实地用功、事上磨炼。

“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从“心即理”到“致良知”，中间必然需要“知行合一”。良知的真切笃实处就是有良知的行，行有所反思并不断改正便是良知在引导，知行的功夫原本便不能一分为二。王阳明强调，良知是在行动中启动，行动就是良知的表现。成为圣人主要因素在于人能够精察本心具足的天理，致其良知，核心关键在于知行合一。

## 第四章

# 王阳明与贵州教育

### 龙冈书院授学

书院是儒家讲学传道的场所。龙冈书院落成后，王阳明就此在黔中大地开启了传道的伟大事业。渐渐地，远近诸生皆会集于此，负笈求学。除这些学子之外，王阳明的讲学也很受当地乡民的欢迎，他们常常成群结队，数十人一同围观，聆听王阳明深入浅出的授课。王阳明则不辞辛劳地致力于“讲学化民”，他凭借朴实的言辞和独到的见解，深受诸生及龙场百姓的崇敬。一时间，龙冈书院声名鹊起，成为贵州书院讲学的主阵地，及至盛时，人来人往，有若“通衢之都”，为贵州史上所未见。有关龙冈书院的讲学盛况，嘉靖年间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写道：“先生抵龙场，履若中土。居职之暇，训诲诸夷。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王阳明在闲暇之余讲学授课，龙冈书院竟然被前来听讲的士子和乡民围得水泄不通。

王阳明在《诸生来》一诗中详细记叙了他给诸生讲学时的情景：

门生颇群集，樽俎亦时展。  
讲习性所乐，记问复怀颯。  
林行或沿涧，洞游还陟岫。  
月榭坐鸣琴，云窗卧披卷。  
澹泊生道真，旷达匪荒宴。  
岂必鹿门栖，自得乃高践。

“鹿门”是鹿门山的简称，位于今湖北省襄阳市。相传汉末名士庞德公，为了推脱荆州刺史刘表之邀，携家眷登鹿门山采药不返。后世因以“鹿门”喻指隐士所居之地。在被奸臣构陷贬谪龙场之后，王阳明被当地百姓淳朴的民风所感动，无处寄托的思亲之情，也随着讲学授课得以排解，所以他才说不一定要像庞德公那样隐居在鹿门山。像现在这样，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怡然自得，有何不可？可见王阳明是发自内心地以教学为人生乐事。他在诗中提到，这些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莘莘学子，让龙冈书院门庭若市，师生之间时而推杯换盏，时而探洞登山，在无拘无束的氛围之中，互相交流对各种问题的理解和看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逐步积累学识；但同时，他也告诫门下诸生，既要抚琴月下，感受本我，也要倚窗观书，明心见性。唯有如此，方能磨砺独立思考的能力，提升内在修养的底蕴。王阳明在龙冈书院讲学很受欢迎，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他所讲的内容并非举业，而是圣人君子的“心性之学”，他倡导的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的教化之学，这种教学以人文素质培养和道德教育为核心，同时兼顾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正因如此，王阳明的教学受众广泛，无论是老弱妇孺还是士子农人，都能从中汲取养分，学以致用。

无规矩不成方圆，王阳明认为，尽管学生和听众的群体多元，但是讲学的规矩必须统一。他自谦地表示，因为担忧自己的教学对学生没有什么帮助，所



以就为龙冈书院的学子制定了一些学习的规矩，希望学生们以此相互规劝，这就是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为教学纲领的《教条示龙场诸生》。在该文中，王阳明将“立志”放在修身治学的首位，并强调“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王阳明从小就立志做圣贤，后来他又说：“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可见在这里他所说的立志也是立志做圣贤，而勤学、改过、责善均和学圣贤、做圣贤有关，并以立志为前提。在“立志”之后，王阳明紧接着提出了“勤学”，王阳明所说的“学”，“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也就是相比聪慧、机警、敏捷等优点，他更看重勤奋、踏实、谦逊等品质。在践行“立志”与“勤学”的道路上，即便是圣贤也难免会有过失和错误，而勇于面对错误，及时纠正，才是求学成君子之道。所以，王阳明指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改过与自省是相辅相成的。王阳明教导他的学生们要常常“自思”，反思自己在日常行为中是否有所缺失，是否在廉耻忠信等方面存在不足，如果有就需要及时改正，“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此外，王阳明还特别强调了朋友的重要性。对于朋友之间相处的准则，王阳明给出的答案是“责善”。所谓“责善”，就是朋友之间要相互监督、相互提醒，帮助对方在品格上达到“至善”的境界。而“至善”，即是后来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总而言之，“龙场四教条”是致良知的途径，四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构成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的教学理论体系。

在龙冈书院，王阳明为学生制定的教条是郑重严肃的，但其教学方式却是活泼灵动的，始终贯穿了孔子的“寓教于乐”思想。孔子教学没有固定的场所，随处借物喻理；不硬性灌输，注重循循善诱。王阳明的教学同样如此，其《诸生夜坐》一诗详细列举了讲学中的“真乐”。

谪居澹虚寂，眇然怀同游。

日入山气夕，孤亭俯平畴。

草际见数骑，取径如相求。

渐近识颜面，隔树停鸣驺。  
投箸雁鹜进，携榼各有羞。  
分席夜堂坐，绛蜡清樽浮。  
鸣琴复散帙，壶矢交觥筹。  
夜弄溪上月，晓陟林间丘。  
村翁或招饮，洞客偕探幽。  
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  
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

夜幕时分，弟子们骑着马带着美味佳肴，前来向王阳明问学，这给王阳明带来了喜悦。师生们相聚在一起，饮酒、抚琴、投壶、赏月，好不自在快乐。师生相处，虽然从表面上看只是嬉戏游乐，但这就是王阳明不拘形式的讲学方式，通过游乐活动，向学生灌输其君子之学与君子之教的思想。

以山水涵养君子之心。王阳明讲学并不是把弟子们成天关在屋子里读书穷理，而是经常与他们畅游山水之间，随时随地点拨弟子，使他们获得启示。“夜弄溪上月，晓陟林间丘”，“林行或沿涧，洞游还陟巘”，通过亲近大自然，王阳明教导弟子要放松身心，与自然万物进行交流，培养君子的仁心，体悟“万物一体之仁”。因此，钱德洪总结道：“盖先生点化同志，多得之登游山水间也。”以音乐陶冶君子之性。《礼记》中说：“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音乐不仅仅可以陶冶性情，甚至还有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王阳明也认识到音乐对培养弟子德行和智慧的作用，他在《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写道：“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须遣认教真。”他认为咏歌也是研讨实学。甚至对于街头巷尾的戏曲，王阳明也认为其中蕴含着忠臣孝子的故事，能够激发人们心中的良知，教化作用同于古代的雅乐，他说：“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又说：“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王



阳明意识到，在施展乐教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受教者的心理是否能够接受，提倡要顺从学生的心理原则与情感需要开展因势利导的教育。

以燕义饮酒品君子之雅。在《诸生夜坐》中，王阳明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夜晚宴会的场景：“分席夜堂坐，绛蜡清樽浮。”这不仅展现了宴会上热闹的氛围，更通过对细节的刻画，传达出君子雅致的品性。《礼记》中说：“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举办宴会也是王阳明展示儒家礼仪的重要手段。他坚持儒家礼仪，以此来示范和推广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

以射礼交觥习君子之礼。射艺，作为古代儒家六艺之一，不仅是技艺的展现，更是君子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王阳明在讲学过程中，巧妙地融入了这一传统元素，通过射艺来教导学生践行君子之礼。《诸生夜坐》中“鸣琴复散帙，壶矢交觥筹”还描绘了王阳明与弟子投壶的场景。“投壶之礼”是古代宴会上的—种娱乐活动，源自射礼。王阳明提倡以射艺来修心，强调“故君子之于射，以存其心也。是故躁于其心者其动妄，荡于其心者其视浮……不存也者，不学也”。王阳明本人也擅长射艺，并将“射”作为日常治学内容，教导学生在“弓矢取挟”的身体实践中，达到“君子之学”的身体规训目的。

王阳明不仅注重对成年人的君子之教，还注重对童蒙的启发，而其原则依然是寓教于乐。比如王阳明写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二文，充分体现了他对儿童启蒙教育思想的独特见解。王阳明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在这句中，他直接指出儿童的特点是喜欢嬉戏游乐，而讨厌受拘束，这是儿童的天性。就好比刚萌芽的草木，让其自由生长才会长得茂盛，如果横加干涉则会枯萎。针对这一特点，他接着指出：“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也就是说，要让儿童在受教育中感到快乐，注重“兴趣培养”，自然而然就会进步了。在教授儿童时务必顺应其心理特征，潜移默化地教导。这些都是王阳明寓教于乐教学方式的进一步体现。

如上所述，王阳明在龙场立言垂教，让贵州的学风为之一新。王阳明的贡

献还远不止于此，他在龙冈书院首倡的君子“心性之学”，逐步深入各民族各阶层之中，起到了敦风厉俗的作用。原先被中原士人视为野蛮、落后的民俗民风，在王阳明的教化下，逐步得到了改观。嘉靖十三年（1534年），监察御史王杏巡按贵州，“闻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始知师教入人之深若此”。王杏观察到，原本“结题鸟言”的贵州人，此时风俗大变，歌诗习礼成为常态，甚至人们的歌声中都带着王阳明的江南乡音。人们对王阳明也是充满了感激之情，每当岁时，赶往龙场祭奠，还有的在家遥祭这位先贤。到了万历年间，在黔中王门的助推下，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传播深入人心，《贵阳府学碑记》称：“东越（王阳明）讲良知，故馆诸士服习已深。”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民德归厚”。

始贵阳人士未知学，先生群诸弟子，日与讲明良知之旨，听者勃勃感触，日革其浇漓之俗，而还诸淳，迺者衣冠济济与齐鲁并。

王阳明在贵州讲良知之旨，倡“君子之学”，在潜移默化之中敦风厉俗，“革浇漓，还诸淳”。到了明朝后期，贵州已是衣冠济济，可与孔孟的故乡齐鲁相提并论了。由明入清后，贵阳俨然已具有中原礼仪之邦的气象，“贵阳一府所领诸州县，民俗尤淳……弦诵之声遍于境内”，“（贵阳）士敦诗书而多彬雅”。王阳明在贵州立言垂教，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清代名臣田雯在《阳明书院记》中称赞道：“黔之士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彬彬然盛矣。”在贵州的士人中，成人有德行，后生小子也有所成就，文雅之风盛行，实为阳明先生教化之广、影响之深的大功绩所造就。

## 主讲文明书院

唐代中后期，韩愈和柳宗元先后因“抗疏忤时”，被贬两广，谪居期间重教兴学，文风蔚起，英才辈出，“二广之人感其道化，至今庙食无穷”。有明一代，王阳明谪居黔地期间，辟龙冈书院，主讲文明书院，传道授业，首次提出其心学核心理念——知行合一，心学发展迎来新的高峰，也为贵州文化教育事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自此黔学始兴，黔中人民无不铭感五内。

贵阳文明书院，今已不存。在贵阳市府路市府桥西侧，立有一石碑，此为文明书院旧址。据郡人都御史徐节记载，王阳明主讲的书院，与其同乡毛科有着不解之缘。

贵州按察司宪副毛公，由名进士扬历中外，贤誉四达，简奉玺书，提督学校、屯田兼理词讼。公乃尽心所事，无一不举，首以学校为务。恒念贵阳士子虽涵濡圣化之久，人才未底其盛。况初学小子立志不确，问学罔进，深以为虑。乃建书院，择师儒以陶镕之。弘治十七年，公于省城中，因择忠烈桥西胡指挥废宅及四旁民居易得，遂官给以值而开拓之，右为提学分司，左为书院。

弘治年间，毛科调任贵州提学副使，深感贵州教育落后，认为“尽管长时间地受到儒家的熏陶和涵养，但人才还没有达到极其兴盛的程度”，于是兴建书院，大兴文教。文明书院，是在元顺元路儒学故址上修建而成，嘉靖《贵州通志》记：“文明书院，在治城内忠烈桥西，即元顺元路儒学故址。本朝弘治间，提学副使毛科建。嘉靖间提学副使蒋信重建。中为敬宽堂，左右为斋舍，后为厨。”万历《贵州通志》有载：“府治，省城中，旧为提学道及文明、正学

两书院，隆庆四年改建。”文明书院建成于正德元年（1506年），于隆庆四年（1570年）改建，自此文明书院不复存在。文明书院虽只存世短短64年，但却因王阳明于此讲学，名震一方、辉煌一时。

那么，王阳明是于何时应何人之邀主讲文明书院呢？关于这点，学界一直颇有争议。据史书记载，正德四年（1509年），毛科致仕归乡，四川人席书接替了他的职位，担任贵州提学副使，主管教育。弘治十二年（1499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席书与王阳明在京同朝为官，任工部主事，但曾“观政工部”的王阳明与他并不相熟。席书到任之后，继承了毛科的教育理念，重教兴文，虽与王阳明不相识，但早已听闻其卓绝的文才。这一点，席书在《送别王守仁序》中就有印证：“旧知阳明，知其文也，知其才猷勋业也。”眼前就有一位“名师”，席书当然不会错过，便致书信给王阳明，诚邀其至文明书院讲学传道，率领诸生，行拜师礼。钱德洪在《年谱》中记：“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岁，在贵阳。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

文中所言“贵阳书院”即为“文明书院”。关于王阳明受席书之邀主讲文明书院，在许多史书中均有记载。《黔南识略》在言及贵阳府时记：“明正德间，席书以按察司副使提学贵州，时王守仁谪龙场驿驿丞，书乃敦请入文明书院主讲。”乾隆《贵州通志》中有关名宦席书的记载为：“在正德四年，他（席书）担任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天性喜欢静养，学问的根基源自周敦颐和程颢、程颐。在教育上，他首先强调德行，然后才是文学才艺。当时，王阳明被贬为龙场驿丞，他亲自致书诚恳邀请其到文明书院讲学，公务之余还前去与王阳明讨论学问，有时甚至谈到深夜，周围有几百名学生围观聆听。从此以后，贵州的士人开始了解心性之学。”

席书之前，潜心兴建书院的毛科，在被王阳明的《答毛宪副》折服后，对其钦佩有加，也曾书信邀请王阳明到文明书院讲学，以泽诸生。相关记载参见王阳明《答毛拙庵见招书院》一诗：

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  
 岂有威仪堪法象？实惭文檄过称扬。  
 移居正拟投医肆，虚席仍烦避讲堂。  
 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

短短数十字，无不透露着王阳明对毛科“文檄”之招的婉拒，缘由有二：其一，是时他身体欠佳，“书卷长抛旧学荒”。其二，作为戴罪之身，认为自己没有值得士子效仿的风范和威仪。从史料记载和这首诗来看，面对毛科之邀，王阳明是婉言拒绝了，那么他主讲文明书院当是受席书之托。但从席书与王阳明的书信往来中，又有着与之矛盾的记录：我深知您的文章才华与高尚气节，在全国都享有盛誉。如今您被贬谪到贵阳，这对于当地的文化界来说，无疑增添了光彩，使得这片偏远之地也迎来了盛大的喜庆。从前，当毛科在职之时，对您极为敬重，并邀请您客居书院，亲自教导这些学子。这些学生正满心期待着在您的教导下有所成就，不料毛科突然离职，您也随即返回了龙场，使得这些后学失去了依靠和指引。

这是席书写予王阳明的第一封信，开篇就盛赞王阳明才华横溢、气节高尚，并表示王阳明被贬谪到贵阳，为当地的文化界增添了不少光彩，也是这片偏远之地的幸事。席书说，往昔，王阳明曾在毛科任职期间“旅居书院，俯教承学”，毛科致仕之后方返回龙场。据此，有学者指出，王阳明于文明书院的讲学活动早在毛科任期便展开了。至今，这一争议尚未盖棺定论，但王阳明在文明书院讲学是事实；其与席书论学，于文明书院首提“知行合一”是事实；他开创了贵州讲学之风，培育了一代文人学士亦是事实。

存世的席书代表作——《元山文选》——中收录了5封他与王阳明的书信，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席书对邀请王阳明主讲文明书院是做足了功课的，颇有志在必得之势。首先，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对王阳明的尊重和对其学识的认同，丝毫不避讳王阳明是戴罪之身、被贬之人，将之比作韩、柳。其次，席书

深知王阳明对“举业之学”的态度，在书信中指出，“今举业之学，与古圣贤之学，诚不同科矣”。“知误天下之豪杰者，举业也。然使天下士借是而知所向上者，亦举业也”。现如今，书院诸生学习当然主要是为了科举，不过请阳明先生在讲学中兼顾“举业之学”与“德业之学”。

执事早以文学进于道理，晚以道理发为文章。倘无厌弃承学，因进讲之间，悟以性中之道义；于举业之内，进以古人之德业，是执事一举，而诸士两有所益矣。

席书不畏权倾朝野的刘瑾，力邀王阳明讲学就足以令人动容，他对“举业”与“德业”的态度又深合王阳明之意，因此，王阳明不再借故推辞，欣然应了席书之请。在文明书院期间，王阳明一边与志同道合的席书论学，一边采用讨论、咏歌、闲聊、记问、问答等形式给诸生授课。钱德洪编著的《年谱》中有如下记载：

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

而这段岁月中，最为人称道的当是，在与席书一来一往的论学问答中，王阳明于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为何席书在讲学问道方面与王阳明如此惺惺相惜呢？这就要从席书的家世渊源说起了。

席书的六世祖席福“学博而邃，尝游元草庐吴先生（澄）之门”，而席书“读书信道学，求理性，穷探苦索，务窥蕴奥”，“性嗜静养，学问根本周、程。课士先德行，后文艺”，在学术上早已倾向于陆学。他到贵州走马上任之时，正

囿于朱陆异同之疑，于是欣然与王阳明探讨对朱陆异同的看法。对此，王阳明并没有正面回复，而是谈论自己近期所悟。起初席书心中有疑，王阳明以“知行合一”证诸“五经”，反复多次，席书恍然大悟：“朱陆各有得失，无须争辩，求之自己性体便一清二楚。”席书与王阳明对“朱陆异同”等学术问题的切磋，不仅在精神上收获了彼此的支援，而且在学问上实现了相互提升，“知行合一”便是在这样的教学相长中诞生的。

王阳明讲学之余，遍访贵阳名胜古迹，与诸生酬答论道，留下不少诗篇，诸如《徐都宪同游南庵次韵》《南庵次韵二首》《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书庭蕉》等。其中，《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集中反映了王阳明在文明书院讲学的情景。诗云：“阶前细草雨还碧，檐下小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须遣认教真。”大意为：台阶前细嫩的青草经过雨水洗涤后更显青翠，篱笆下的小桃树在晴天里绽放着更新鲜的花朵。无论是坐着还是起身吟咏歌唱，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其中细微的差别也定要让人辨认清楚，教导求真。《书庭蕉》中的一句“檐前蕉叶绿成林，长夏全无暑气侵”，更是明代圣贤为“爽爽贵阳”“背书”的最佳佐证。

总体而言，于文明书院传道授业期间，王阳明匠心独运，提出了“知行合一”之学说，此乃阳明心学之精髓所在。他在文明书院的讲学活动，不仅培育了一大批贵州才俊，更将这片热土推向了“心学高地”的神圣地位，成为研究与传播阳明心学的璀璨明珠。

## 镇远话别弟子

正德四年（1509年）腊月，王阳明谪戍期满，升任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知县。他即将离开贵州的消息在书院门生中很快传播开来，友生纷纷前来送别、饯行。据史籍载，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曾有“诸生环而观听者以数百”的盛况。可知王阳明在黔中的弟子数量相当可观。而他在黔所创作的诗作中，就有10余首是关于“诸生”的，“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这些诗歌几乎都表达了一个主调，诉说着王阳明与诸生之间相处的愉悦和浓浓的师生情谊。

在接到朝廷擢升的诏令后，王阳明作《将归与诸生别于城南蔡氏楼》与诸生告别，他在诗中写道：“天际层楼树杪开，夕阳下见鸟飞回。城隅碧水光连座，槛外青山翠作堆。颇恨眼前离别近，惟余他日梦魂来。新诗好记同游处，长扫溪南旧钓台。”这首诗记叙了他与文明书院诸生告别的情形。此时王阳明的心情既喜悦又惆怅。在诗的开篇，天开云散，王阳明在蔡氏楼隔着树梢遥望远处的层楼，正巧这时夕阳西下，鸟儿们都在纷纷归巢，贵阳城墙下碧绿的南明河水映照在蔡氏楼下，栏杆外那翠绿的山峦又映入眼帘，此时此刻这里的一切都使王阳明不舍与留恋。风景虽美，但时光匆匆，离别之日来临，王阳明也不能继续逗留，面对眼前众多送别的朋友，他深知此番一走，多半不会再返黔中，只有他日在梦里相聚了。因此，他最后对弟子说，不要忘记我们一起走过的黔山秀水，还要经常打扫溪南的旧钓台，时时以诗会友，睹景思人，以便记起往日我们一次次的欢快同游。

在王阳明离开贵阳的那日，天空忽然下起了漫天大雪，冬日的寒风将雪花吹得四处纷飞，飘洒在山间高低不平的小路上。弟子们冒着严寒与风雪，一路向南，将王阳明送到了龙里卫（今龙里县）。龙里处于云南和湖南往来的关键

通道，是进入和离开贵州的重要关口。它背靠群山，水源丰富，山水交错在一起，一方面形成了一种美丽的景象，别有一番大自然的神奇与魅力；另一方面也使得路途变得更加险峻陡峭，更别提雪后的山路了。在离黔的道路上，王阳明看着众人衣帽和鬓发间的寒雪，不禁为他们真挚的情感所打动，于是决定在龙里留宿一晚，与诸位门人秉烛夜谈。可惜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翌日清晨，众弟子尽管百般不情愿，也只能止步于此，目送恩师踏雪渐渐远去的背影。

地处黔东南的镇远县是贵州东大门，也是王阳明离黔的最后一站。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四年（1277年）至1949年的近700年间，镇远一直为州府所在地，亦是兵家必争之地，民间多有“欲据滇楚，必占镇远；欲通云贵，先守镇远”之说。自黔入湘者多以镇远为始站，然后沿沅江顺流而下。因此，镇远素为湘黔水陆中转之重镇，客商往来、物资集散之地。正德四年腊月，王阳明离开龙场，从陆路驿道途经龙里、清平、黄平等卫所抵达镇远，即放舟入湘。据考证，王阳明抵达镇远卫的具体时间当在正德四年腊月（1510年2月）除夕之前一日。根据《舟中除夕二首（一）》中“扁舟除夕尚穷途，荆楚还怜俗未殊”句来看，除夕（1510年2月8日）这一天他所乘的船已驶入湖湘境内，“荆楚还怜俗未殊”是其入湘所见所闻所感，而“舟中”则当是在沅水之上。从这首诗中还能看出，王阳明在除夕这天还在赶路——他为什么不在此多休息几日，等过完除夕、春节再出发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命在身，上任报到时间定下来了，耽搁不得，所以他一路都是“风雨兼程”。

王阳明在镇远滞留的时间较短，其中情形可从《镇远旅邸书札》中探究一二。书札中说：“出城时遇二三人于道旁，亦匆匆不暇详细。”这二三人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推测可能是王阳明镇远籍的学生，或许曾在贵阳文明书院向王阳明问学。因此得知老师经过镇远时，也赶来相送。见面时，也只是“匆匆”话别，并没有做过多的叙谈嘱托，他对黔籍弟子的详细交代都写在了书札中。



镇远溁阳河

《镇远旅邸书札》是非常具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一方面，它充分证明了黔中王门是王门正宗学派之一。书札中所列黔中王门弟子的名单，除了过去学术界比较熟悉的汤伯元、陈宗鲁、叶子苍三人（三人事迹皆收入钱德洪编的《阳明先生年谱》里），另外 19 人均不见于目前所能见到的任何史料中，是首次发现的。黄宗羲在其名著《明儒学案》中未列出黔中王门这一重要学派，而比其稍晚的毛奇龄的《王文成传本》续补本中所辑门人籍录同样也未曾提到这一学派。黔中王门最早开始传播阳明心学，并开拓一方文明，作为一个地域性阳明后学学派，毫无疑问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后世的学术史著作，例如《明儒学案》《王文成传本》等却未予只言片语的介绍，致使黔中王门长期隐晦不彰，鲜为学术界所知。现在，“此信正可补王阳明先生桃李旧籍及在黔友人之不足”。

另一方面，书札也提到了一些生活细节，对研究王阳明在贵州及明代黔人的生活情况皆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观三通镇远书札的具体内容，多谈生活中的琐细之事，如王阳明叮嘱“所买锡可令王祥打大碗四个，每个重二斤，须要厚实大朴些方可，其余以为蔬碟”。这里的“令王祥打”，是让留下来的仆人去市集上找匠人打造，所谓的“打”即是订制。“粗瓷碗买十余”，“粗瓷碗”就是黔人口中的“土碗”。王阳明即将赴江西省就职，却还要买黔地的大粗瓷碗，或许是喜欢“粗瓷碗”纯朴大气的外观。“水银摆锡箸买一二把”，“锡箸”指镀上银锡的筷子。“梨木板可收拾，勿令散失，区区欲刻一小书故也”。王阳明在贵州唯一的著述是《五经臆说》，“梨木板”即是书版。或是此时王阳明准备将此书刊刻，因此特别交待要把书版保存好，勿使其散失。“汪原铭合枳术丸乃可”，应是说汪原铭的身体状况适合用枳术丸这种药品。在途中给弟子写信，末尾还不忘添上这一笔，颇见王阳明对弟子的关怀，也反映出其具有一定的中医知识。

书札还体现出王阳明的待人之道，具体表现为对朋友的热情和对弟子慈父般的关怀。如书札提到的阎真士，王阳明怜其客房卧病，遣马迎他来养病，还叮嘱给观上内房门送去制酱用的盐，在旅途中还惦记着朋友的日常起居，细心安排，足见他非常重视友情。此外，信中致以“道意”的“朱克相兄弟”“朱氏昆季”是指朱光弼（字克相）、朱光霁（字克明）两兄弟，他们是时任贵州按察司副使朱玘之子。朱玘是云南蒙化人，闻王阳明在龙场授徒，便遣朱光弼、朱光霁二子前往拜王阳明为师。后来朱光霁成为云南昌明心学传播第一人，也是一位阳明心学思想的坚定践行者。

总之，在这三通书札里，王阳明做了诸多叮嘱和交代事宜，堪称是对他在贵州这两年生活的总体回顾，也透露出他对贵州人民、贵州弟子的浓浓情感。他像对待家人一样，叮嘱在黔友人的生活细节，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同时勉励弟子要“努力进修，以俟后会”，字里行间流露出深厚的关怀和不舍之情。王阳明离开贵州后，又专门写下《寄叶子苍》《寄贵阳诸生》等书信寄给黔中弟

子。当离开镇远后，王阳明在正德五年新正（1510年2月中旬）进入沅江中游的溆浦县，旋即奔赴江西就任庐陵知县。当进入湖湘境内，他在贵州的贬谪之旅就正式宣告结束。王阳明虽然离开贵州，但他的故事五百年来却仍在黔中大地不断续写流传。

## 后学兴建书院

明代以前，贵州尚未正式建省，虽与中原地区交往日益增多，但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又无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书院、生童寥寥无几，学校教育体系缺失，有“人亡文字，俗本椎鲁，未有学也”之说。直到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朱棣下令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一批饱学之士入黔做官，设官学、修文庙、办书院，贵州教育才渐有起色。之后，随着王阳明、张翀与邹元标“黔南三迁客”<sup>①</sup>的到来，贵州的教育水平才有了质的提升。

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在龙场创办龙冈书院聚徒讲学，开启了其在黔地传道授业之端绪。正德四年（1509年），王阳明应邀到省城文明书院担任主讲教席，其间提出著名的“知行合一”学说，自此声名远扬。在王阳明离开贵州后，他的弟子与王门后学不断兴建书院，贵州的书院始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书院讲学亦蔚然成风，几乎覆盖全省各地。他们之间相互论学，培养人才，从而促成了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阳明创建龙冈书院成为贵州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此前贵州仅有“铜江书院”和“文明书院”等几所书院，而到明末这一百余年时间里，贵州书院发展非常迅速，数量已增至40余所。

<sup>①</sup> 这里说的“黔南”是历史上贵州的代称，并不是今天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如民国时期任可澄等编有《黔南丛书》，收录了贵州较为珍贵的历史古籍文献。

明代贵州书院统计表<sup>①</sup>

序号	书院	时间	地点	创办人
1	魁山书院	洪武、永乐年间	新添卫（今贵定县）	指挥使叶凤邕捐建
2	中峰书院	弘治年间	程番府（今惠水县）	知府汪藻建， 蒋信、陈文学改建
3	草庭书院	弘治年间	兴隆卫（今黄平县）	周瑛
4	铜江书院	弘治年间	铜仁府（今铜仁市）	提学副使毛科
5	文明书院	弘治十八年	贵州宣慰司（今贵阳市）	提学副使毛科
6	龙岗书院	正德三年	龙场驿（今修文县）	龙场谪丞王阳明
7	天香书院	正德、嘉靖年间	黎平府（今锦屏县）	何志清
8	石壁书院	嘉靖七年	平越卫（今福泉市）	佥事朱佩
9	紫阳书院	嘉靖九年	镇远府（今镇远县）	知府黄希英
10	兴文书院	嘉靖十三年	黎平府（今锦屏县）	士绅捐
11	中峰书院	嘉靖十三年	平越卫（今福泉市）	谪丞陈邦博
12	阳明书院	嘉靖十四年	贵州宣慰司（今贵阳市）	巡抚王杏
13	安庄书院	嘉靖十五年	安庄卫（今镇宁县）	
14	南山书院	嘉靖十五年	偏桥卫（今施秉县）	知县王溥
15	正学书院	嘉靖二十一年	贵州宣慰司（今贵阳市）	提学副使蒋信
16	渔矶书院	嘉靖年间	贵州宣慰司（今贵阳市）	马廷锡
17	鹤楼书院	嘉靖年间	都匀卫（今都匀市）	张翀
18	月潭书院	嘉靖年间	兴隆卫（今黄平县）	
19	平溪卫书院	嘉靖年间	平溪卫 （今玉屏侗族自治县）	
20	普定卫书院	嘉靖年间	普定卫（今安顺市）	
21	大中书院	嘉靖年间	思南府（今思南县）	李渭
22	为仁书院	嘉靖年间	思南府（今思南县）	知府田稔

<sup>①</sup> 此表据《〔万历〕贵州通志》《〔嘉靖〕贵州通志》等资料，并参考张明《贵州“阳明书院”源流述略》一文汇总所得。

续表

序号	书院	时间	地点	创办人
23	明德书院	隆庆六年	石阡府（今石阡县）	知府吴维京
24	斗坤书院	隆庆年间	思南府（今思南县）	佥事周以鲁
25	平旦草堂	万历初	清平卫（今凯里市）	孙应鳌
26	学孔书院	万历初	清平卫（今凯里市）	孙应鳌
27	山甫书院	万历初	清平卫（今凯里市）	孙应鳌
28	学孔精舍	万历五年	清平卫（今凯里市）	孙应鳌
29	张公读书堂	万历初	都匀卫（今都匀市）	邹元标
30	南皋书院	万历二十二年	都匀卫（今都匀市）	陈尚象
31	兴文书院	万历二十四年	偏桥卫（今施秉县）	知县王溥
32	开化书院	万历二十五年	天柱县（今天柱县）	知县朱梓
33	中和书院	万历二十九年	思南府（今思南县）	同知陈以耀
34	西佛岩书院	万历年间	黎平府（今锦屏县）	
35	花竹书院	万历年间	瓮安县（今瓮安县）	
36	文明书院	万历年间	思南府（今思南县）	
37	青螺书院	万历年间	毕节卫（今毕节市）	兵备道陈性学
38	东西书院	万历年间	兴隆卫（今黄平县）	
39	镇东书院	万历年间	石阡府（今石阡县）	
40	思州府书院	万历年间	思州府（今岑巩县）	
41	狮山书院	万历年间	湄潭县（今湄潭县）	
42	儒溪书院	万历年间	绥阳县（今绥阳县）	
43	郑氏书院	时间待考	平溪卫 （今玉屏侗族自治县）	
44	凤山书院	时间待考	程番府（今惠水县）	

从地域来看，贵州书院教育发展最迅猛的区域当数贵阳。贵阳作为贵州的首善之区，也是黔中王门进行讲学活动的中心。嘉靖十三年（1534年），浙中

王门后学、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上任伊始，发现士民不断前往龙场拜谒王阳明先生，知先生影响之深。后来汤伯元、叶梧、陈文学等联络黔中王门弟子数十人，恭请王杏兴建“王公祠”。嘉靖十四年（1535年），王杏会同贵州左布政使周忠、按察使韩士英等，购买贵阳城东白云庵之址，建成第一所以阳明命名的书院，并建祠“以激劝边人”。王杏还亲撰《新建阳明书院碑记》，揭示阳明书院意在弘扬王阳明的学说，训迪黔中士民，并崇祀王阳明，还聘请王阳明再传弟子马廷锡在书院担任主讲，使贵阳一跃成为全省传播阳明心学的中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王杏对贵州教育事业贡献也甚大，他到任后即上疏朝廷，称贵州学子赴云南参加应试，路途遥远，十分艰辛，因此请求在贵州城内择址兴建贡院，大幅减轻学子长途跋涉之苦，并便利英才选拔。其与嘉靖九年（1530年）时任礼科左给事的思南人田秋题奏《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相呼应，两人的奏疏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力，为嘉靖十六年（1537年）贵州独立设乡试考场立下汗马功劳。

后来阳明书院几度迁址重建。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贵州巡抚王学益改建阳明书院于宣慰使司学右侧。隆庆五年（1571年），按察使冯成能等将其迁建到城东抚署左侧，也就是今天的贵阳省府路。明末，阳明书院毁于战火。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贵州巡抚曹申吉捐资在原址重建。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阳明书院”更名为“贵山书院”，成为全省最高学府。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贵山书院”易名为“贵州大学堂”，被视为今贵州大学的前身。

曾任贵州提学副使的蒋信，也深受王阳明学说的影响。王阳明离贵州的几年后，文明书院就荒废了，蒋信决定修复。修复后，在文明书院中主要传授阳明心学。由于前来求学的黔中弟子日益增多，书院已无法容纳。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蒋信在书院右侧新建“正学书院”，并作《新建正学书院落成记》。文明、正学二书院至明隆庆年间复废，其旧址位于明清时期的贵阳府署。黔中王门以阳明、文明、正学三大书院为依托，大兴讲学之风，风靡一时。



阳明后学在贵阳创立的书院，不仅分布在城内，在城郊亦有分布。贵阳人马廷锡是蒋信的著名弟子，认为自己学问不够，毅然弃官前往湖南常德桃冈向蒋信求学。学成后回到贵阳，在城南南明河畔渔矶湾建“栖云亭”。此处茂林修竹、渔舟唱晚，风景十分幽雅，素有“小西湖”之称。据《〔乾隆〕贵州通志》记载，马廷锡在其中静坐研究王阳明心学。嘉靖年间，贵州巡抚王绍元认为马廷锡学问好，能够精妙地领悟圣贤经典的要旨，并擅长通过静坐来沉静内心。王绍元希望马廷锡可以授徒讲学，所以扩建栖云亭，新建“渔矶书院”，院内有主静堂、栖云精舍，由马廷锡主讲。到隆庆、万历时，生员众多，学子云集，声名远播。马廷锡在贵阳研究和讲授儒学多年，培养出了许多学生，开创了一代学风，对贵阳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廷锡讲授阳明之学，从学者常常达到数百人之众，成就斐然者很多，而这样的盛况自王阳明、蒋信在贵州讲学之后难得一见。

除了贵阳，明代中期以来，贵州其他地方的书院教育也逐渐呈燎原之势。如思南，虽远离省城，但在王阳明再传弟子李渭回乡后，也发展成为王门重镇。李渭在嘉靖年间建“为仁堂”“大中书院”，开一方学风，培养出著名的弟子群体：李渭三子（李廷谦、李廷言、李廷鼎）、思南三贤（罗国贤、罗廷贤、罗明贤）。嘉靖末年，思南知府田稔在“为仁堂”原址建“为仁书院”，开黔南学风。后又在隆庆年间建“斗坤书院”等书院。因受李渭“仁”学的影响，近邻印江、务川的学风也蔚然兴起。这些地区的学风兴起，亦成为王学传播的历史见证。

凯里也开拓了一方王学天地。孙应鳌为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乡试解元，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登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是为贵州人入翰林院第一人。万历初年孙应鳌返乡后，建学孔精舍，授徒讲学，“远近问学者履盈户”。如明“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提学贵州时，亲晤孙应鳌于“山甫书院”；江右名士邹元标谪黔，也“首访清平孙应鳌、思南李渭，所至讲学必称两先生，以示圣贤为必可学”。万历中叶，清平的“平旦草堂”“学孔书院”“山甫书

院”盛极一时，从学者甚众。

都匀地处黔南腹地，既是当时战略要地，亦深受王学思想的熏陶。万历五年（1577年），邹元标因直言敢谏，弹劾权臣张居正而被贬至都匀。在此期间，他积极传播天人性道之学，与当地士人探讨王阳明的良知学说。邹元标还在都匀鹤楼书院讲学，吸引了众多学子前来学习。在书院中，他深入讲解王阳明的良知之学，与学子们共同切磋，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学者。其弟子中，陈尚象、余显凤、吴铤传道有功。

进入清代，贵州的书院教育依旧长盛不衰。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平远知州李云龙致力于文化教育，建立了平阳书院，有房舍30余间，后更名为凤西书院。同治九年（1870年），知州陈昌言重建时，山东巡抚丁宝楨（今织金牛场人）为家乡书院捐廉银六百两以为修葺之资。平阳书院为国家和贵州培养了无数人才，是维系古代织金人文命脉的重要场所。清道光十年（1830年），清代江西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吴嵩梁任黔西知州时，为了弘扬王阳明的教化精神，在水西地区创建了阳明书院，并开设课程，推广阳明心学。俞汝本在贵州任职十年时间，在任职地创建了多所书院，他敦学爱士，兴学培士，崇礼奉教，并积极倡导学习阳明心学，影响亦甚大。

清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曾在《阳明书院记》中总结和颂扬王阳明书院讲学情况和影响，称阳明之学是因谪官而成，其道由龙场入圣贤之境。吸引了众多学者前来求学，王阳明的教学方式生动且深刻，让儒家经典与心学思想深入人心。其教育成果显著，促进了黔中文化的繁荣和人才的井喷式涌现，甚至在民间留下了深远的文化印记。清季郑珍曾称，“今吾黔莫不震服阳明之名”，盛赞王阳明肇造贵州文教的功业。王阳明开启的贵州书院讲学之风，对黔地的教育与思想有着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他的一些教育理念与办学思想，依旧对学校建设有着很多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地方。

## 黔中王门兴起

“黔中王门”是明代贵州兴起的以阳明心学为核心的学术流派，亦是王门后学中重要的一支。作为一个较有影响力的学派，其必定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术团体，有明确清晰的师承关系，并且其代表人物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从以上这些因素来考察，黔中王门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其产生、兴起的历史过程也有相当多的史料可供考察。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贵州巡抚郭子章著成《黔记》一书，详细记载了当时贵州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等内容，并收录黔中王门的史料，为黔中王门的代表人物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作《理学传》，首次系统地介绍了黔中王门。然而作为最有影响力学术史著作之一的《明儒学案》并未提及黔中王门，致使其一度隐晦不彰。经过几代学者尤其是黔籍学者的不懈研究后，海内外学术界对黔中王门已形成了广泛共识和普遍认同。著名阳明学研究专家杜维明、陈来、杨国荣、李承贵、钱明等，著文对黔中王门及其学术地位给予肯定。如今，贵阳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王学重镇。

黔中王门的兴起肇始于龙场的龙冈书院。王阳明在此悟道传道、兴学化民，亲自开启了其在贵州传道授业之端绪。而黔中王门则光大于王阳明任主讲的贵阳文明书院，极一时之盛。王阳明在龙冈书院、文明书院讲学是其居黔活动的最重要部分，也是其思想形成、传播与实践的重要途径，更是他培养黔中王门的两大阵地。当王阳明离开贵州时，其亲传弟子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心学学术团体。据王阳明《镇远旅邸书札》记载，其在贵州有弟子陈宗鲁、汤伯元、叶子苍、张时裕、向子佩、越文实、邹近仁、范希夷、郝升之、汪原铭、陈良丞、易辅之、詹良丞、王世丞、袁邦彦、李良丞等数十位。这些还是有名讳可考的，更多的阳明亲传弟子则湮没在了历史中。乾隆《贵州通志》载：“诸

生环而观听以百数，自是贵人士知从事心性。”徐节《新建文明书院记》称：“各儒生学员之有志者二百余人。”足见王阳明讲学时的盛况，以及其弟子的众多。此外，阳明心学的地域传播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贵州形成了龙场、贵阳、思南、清平（今凯里）、都匀五大重镇。对此，有论者认为：“龙场悟道……预示了全国最早的地域性心学学派——黔中王门——的形成，影响后世可谓既深且远。贵州思想世界的形成与发展，实大有赖于王阳明在当地的讲学弘道活动。历代地方学者大量与心学思想有关的话语言说，已构成明显的价值与知识互动的连续性学术谱系。”

黔中王门的师承关系也是清晰、有迹可循的。具体而言，黔中王门后学至少有四代脉络清晰，传承有序。王阳明在黔的亲传弟子即为《镇远旅邸书札》所提到的陈宗鲁、汤伯元、叶子苍等；第二代弟子著名者有马廷锡、李渭、徐樾、蒋世魁等；第三代弟子中最著名的当数孙应鳌、邹元标、萧重望、赖嘉谟、徐云从、李廷谦、冉宗孔、胡学礼、田惟安、郭子章等；第四代弟子如陈尚象、余显凤、吴铤和艾氏三兄弟、陆氏两兄弟等，皆为邹元标弟子。由此看来，从龙场悟道到明末衰落，黔中王门无论是在时间跨度上，还是在学人系统和规模上，都不输于其他王门后学流派。

黔中王门中的佼佼者，对当时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力也不遑多让。黔中王门素有“前三杰”（即汤伯元、陈宗鲁、叶子苍）与“后三杰”（即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之说。陈文学，字宗鲁，贵州宣慰司（今贵阳）人，自号五栗山人，“年十余即能诗文，以诸生事阳明，乃潜心理学”。累官至耀州知州，因改简挂冠，回贵阳杜门不预世事，终日静坐，精究学业，证以师说。王阳明对陈宗鲁非常器重，有《示陈宗鲁诗》《赠陈宗鲁》等诗文予之。王阳明逝世后，他与汤伯元、叶子苍等联名上书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为王阳明在贵阳立祠。陈宗鲁还为龙冈书院何陋轩碑作歌，为惠水中峰书院作记，对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传播贡献巨大。汤昇，字伯元，贵州宣慰司人，祖籍安徽淮北清河县，明初祖上流寓贵阳。其父汤轸曾任贵州儒学训导。正德十六年（1521年）中进士，



历任南京户部员外郎和潮州知府。后因潮州势家流言，罢官归乡。汤昇 14 岁丧母，孝事继母，感动继母，性情为之变慈，郡中士大夫莫不称之。后世称，“宗鲁得文成之和，并擅词章；伯元得文成之正，具有吏治”。莫友芝也在《黔诗纪略》中评曰：“两先生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伯元为官以阳明为榜样，清正严明，政事裁决如流，监税租不一染指，曾写有“肠断九回情独苦，仕逾十载养全贫”以表心迹，受到当地人民的称赞。叶梧，字子苍，贵州宣慰司人，正德八年（1513 年）举人，官至镇安知县，著有《凯还歌》等诗。叶氏曾任湖南新化县教谕，人称“性醇厚温和，而立教严肃，诸生惮之。尝以学宫祭器多缺，竭力营备”，以学为教，以圣学接引后学。曾参与校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王阳明有书信《寄叶子苍》，就收录在此书中。孙应鳌，字山甫，号淮海，贵州清平（今凯里市炉山镇）人。历任江西按察僉事、陕西提学副使、四川右参政、大理寺卿、户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南京工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赐谥文恭。孙应鳌学识渊博，撰有《四书近语》《淮海易谈》《教秦绪言》《幽心瑶草》《督学文集》《学孔精舍诗钞》等。与当时江西的罗汝芳、四川的赵贞吉、湖北的耿定向一起被时人称为“心学四大名士”，海内以“名臣大儒”推之。隆庆、万历年间，筑学孔书院、山甫书院、学孔精舍，集一生学问，全力讲学，阐扬心学，为黔中王门大师。李渭，字提之，号同野，贵州思南人。历任四川华阳（今成都）知县，安徽和州（今和县）知州和广东高州府（今茂名市）同知，云南左参政，天府（治所在今南京）中南户部郎，韶州（今曲江县）知府。晚年归思南，讲学普济亭达二十年。万历年间建专祠奉祀，明神宗亲赐御联称：“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马廷锡，字朝宠，号心庵，贵州宣慰司人，大致与孙应鳌、李渭同时。嘉靖十九年（1540 年）举人，其祖父、父亲、子、孙皆为举人，是为五世举人之家。蒋信任贵州提学副使时，马廷锡从其学，从而成为王阳明再传弟子。历任四川什邡县教谕、内江县知县。隆庆五年（1571 年），贵州巡抚阮文中、贵州按察使冯成能于城东隅新建阳明祠，名“阳明书院”，聘马廷锡主讲其间。

总体而言，尽管《明儒学案》中未将黔中王门列入，但王阳明对贵州的影响，以及王门后学在贵州的传承与发展，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作为贵州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王阳明及黔中王门为贵州的文化和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浸润了一代又一代的贵州文人学士。今天王门后学也将在黔中大地践行“知行合一”精神，继续传承和发展好阳明心学。

## 第五章

# 王学胜境在贵阳

### 闲游天生桥

天生桥在今贵阳修文县谷堡乡哨上村，距离修文县城西北约十二公里，桥洞高约十米，宽约七米，进深约十四米。桥洞弯曲处有一块长五米、宽厚各三米呈六十度倾斜的椭圆形巨石横阻中流。自古以来，贵州山水一绝，来到龙场，对王阳明来说既是困厄，也是一次难得的自由，更是一次追问灵魂的契机。

驿丞作为一个没有品级的小官，具体工作任务有“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廩糗、庖饌、裯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支直于府若州县，而籍其出入”等等。也就是说，驿丞负责提供来往官员或客商的车马，安排食宿，管理马匹、马夫，保管粮草，管理驿站的铺陈、钱财。但龙场驿是一个很特殊的驿站，这里既没有驿马和驿务人员，也没有粮食。因此，王阳明不用管理马夫、马匹，也没有保管粮食的任务，甚至连管理驿务人

员的任务也没有。就当时情况而言，如果有官员或客商往来过境，王阳明只需要落实调度到某一百姓家去招待食宿即可；极度尽职的话，他会陪同往来官员客商抵达指定的百姓家。而带路的这项工作，王阳明的两个仆人加上后来新增的本地小苗童就可以完全胜任。再者，因为龙场驿不在主要的驿道线路上，来往的官员与客商实在少得可怜，所以就连调度和带路的工作也不常有。

几个月下来，王阳明越发觉得驿丞的工作真是轻松到几乎没事可做，让他自己都有些许过意不去，于是曾以“不得其职”而生出过离任的念头。他在正德三年（1508年）所作的《龙场生问答》一文中写道：“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窃也。今吾不得为行道矣。虽古之有禄仕，未尝奸其职也。曰牛羊茁壮，会计当也。今吾不无愧焉。夫禄仕，为贫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不得其职而去，非以谴也。”王阳明认为，君子做官是为了推行大道，不以推大道为目的的做官，就是为谋私利而窃取官位。现在他自己没有实质上为君王行道的职位和平台。古人也有为了俸禄而做官的，但他们也从来不偷奸耍滑。就像圣人孔子曾担任管理仓库的小吏，出入的数据都能核对正确；做管理牲畜的小吏，让牛羊茁壮地成长。可龙场驿驿丞这个职务让他无事可做，着实是很惭愧。他不是因为贫困而做官的，因为自己家里条件不差，完全不至于来到贵州龙场当小官。再退一步说，如果是为了俸禄，那也要把事情做好，但自己在龙场无事可做。看得出来，王阳明面对现实处境多少有些“怀才不遇”的牢骚。

于是，在生活和工作基本安顿下来后，王阳明便开启了对龙场周边山水的“打卡日常”，以便纾解心结。正德三年（1508年）秋天，王阳明经常带着他的小书童们出门游玩，他们一起造访了龙场驿站周边的多处奇观。据清代云贵总督爱必达《黔南识略》一书对龙场自然风光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修文境内有屏山；城西北有西望山，西望山前又有翠屏、目游、莫若三座小峰；城北有南望山；东南侧有龙冈山；城西有蜈蚣坡等诸多大小山峰，且每座山各有特色。如西望山山顶有宽达几百米的凤凰池，山水相间，风光旖旎；翠屏山垂直挺

秀，高耸入云，山上苍松虬结，满目苍翠；龙冈山则分布着大小不一的诸多山洞，王阳明曾在龙冈山的洞中默记五经，参悟大道，于蜈蚣坡埋葬惨死的陌生吏目三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一日，王阳明带着他新招的小苗童从龙场驿向西北方向出发，访山间名胜。在小苗童的陪同下，他们见到了一处山顶天然石桥景观——天生桥。这绝佳的景致对身处黔地的小苗童来说倒是习以为常，但对来自江南水乡的王阳明来说却是难得一见。此刻他的登临之意怕是无人能领会，他们从山脚沿着村民上山打猎的小路一直爬向山巅。阳光透过茂盛的植被洒落下来，留下一路的斑驳。小苗童一路为王阳明断断续续介绍着此桥的不凡来历：一说是古时候两位神仙在此下棋，无意间破解了一个难以破解的棋局，激动之余不小心掀翻了对弈的石桌幻化而成；一说是有位仙人垂怜两座山里生灵往来交通十分不便，于是将两个山尖捏合在一起，形成横跨两山的石桥。

王阳明与苗童伫立天生桥上，放眼望去，群山连绵，层峦叠翠，云雾在山间游走，时聚时散，变幻莫测。一阵清风拂过，对面不知名的山尖不时冲破云雾显露出来，远远望去，就像虚空中仙山飞驰，影影绰绰，蔚为壮观。桥下流水与山石不断撞击，形成瀑布飞泻而下，宛若白虹，美不胜收。王阳明再看此桥，立山中寂寥无闻，不禁长叹：“如此好桥，虚却于此，好生可惜！”遂吟《过天生桥》一诗，似倾诉，更似自述，吟哦之声在群山之间久久萦绕：

水光如练落长松，云际天桥隐白虹。  
 辽鹤不来华表烂，仙人一去石桥空。  
 徒闻鹤驾横秋夕，谩说秦鞭到海东。  
 移放长江还济险，可怜虚却万山中。

此诗大概描写了松树长长的影子落在白色绸缎一般的水光之中，高挂山巅的天生桥像一道隐蔽的白虹。城门的华表柱都已经腐烂了，白鹤依然未来，

造桥的仙人一去不返，只留下空空的石桥。听说鹊桥会在七夕夜为牛郎织女横架，休要再传秦代神人鞭石造桥的奇闻。唉，此桥若是能生在长江上还能为过江的行人渡过天险，可惜它却白白横跨在这万山丛中……



天生桥



作为因进谏获罪来到龙场的王阳明，看到此番美景，听得如此奇闻逸事，虽有震撼，但转念却是伤怀。他的思绪飞到东汉时为民请命、抗旨救灾而遭极刑的丁令威，他明白丁令威不会化鹤飞来，而他所处的社会，刘瑾等八大宦官当权，言路不通，如同古代君王纳谏的华表已经腐烂。牛郎织女七夕鹊桥相会、神人为秦始皇鞭石东海造桥，如今都只剩传说。眼前的天生桥看似没用却真切地横在山间……王阳明难免联想到自己的处境，他有满腹经纶，也有“欲为圣明除弊事”之初心，却没有支撑其施展才华的平台。犹如此桥，若是横跨长江，必能助人横渡天险，可虚立于此，注定少有人问津。天生桥不会回答，只是默默地完成自己作为山间之桥的使命。或许，它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抚慰着这位失意的文人。

天生桥给王阳明以雄壮的、粗犷的、有魄力的审美感受。他见桥如见己，不同的是，天生桥安之若素，静候万千行客。轻云缭绕，风起云涌，动静之间，天生桥以千万年的等待，遇见了为它惋惜的王阳明，而它也以自己持续而永恒的伫立让王阳明醒悟，无论身处何地，最应做的，是真实的自己，去完成自己的使命：是一座桥，就贯通两端，为往来者提供方便；是一个贤者，就去教化一方、安定一方，给生民带去更好的生命体悟。王阳明内心一开始多是怀才不遇的愤懑。但天生桥以独特的审美价值，为失意的王阳明带去莫大的审美转移。回到自然怀抱的王阳明，不用再去费力揣测人心和世事，与纯粹的自然相互感通，思索物与人最本然的存在意义。

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在剖析文与道的关系时曾言：“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王阳明所作诗文，正是他心中所守之“道”的承载，是对自《诗经》以来诗教传统的一种继承。王阳明为天生桥所发慨叹，实为吐露心声。从整首诗的核心抒情看，他放不下的始终还是家国，希望自己忠心能被觉察、冤屈能被洗刷、才华能被重用，有机会去建功立业。正是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忧国忧民的具体写照。王阳明是

大思想家，更是一个忠君爱国的优秀臣子，家国情怀贯穿了他的生命的始终，而他所悟之道，也在忧国忧民的实践中不断践行。

在龙场期间，王阳明以致信的形式劝诫水西土司安贵荣，先是打消了对方请求撤驿的不利边疆稳定的念头，后又规劝安贵荣出兵平定水东阿贾、阿札等人起兵叛乱，促成贵州少兴战火的无量功德。正德四年（1509年）秋，明廷由于种种原因，复用言官，王阳明被升为庐陵知县。从庐陵知县之任开始，王阳明的仕途发生巨大转折，在担任庐陵知县的半年后，他获准进京，得与亲友重逢，畅叙幽情。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吏部再次对王阳明下达晋升令，将其从地方知县升为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王阳明还未前往南京就职，吏部又于次年正月对他下达了新的任命，调任王阳明为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分管封爵、袭荫、褒赠、吏算等事务，此职为吏部的第二司。正德六年（1511年）十月，王阳明迎来了再次的升迁，升任为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掌管文职官员的升迁、改调等事务。正德七年（1512年）三月，王阳明又升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王阳明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进入正四品行列。

王阳明何以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从正七品知县，升为了正四品官员，完成了三品六级的连续升迁？是儒者家国情怀的精神引领，更是在龙场悟道后贯彻知行合一、事上磨、致良知功夫实实在在的政绩支撑。在江西庐陵七个月任期，王阳明从具体实际出发，先是火速免除庐陵葛布税收，又在巧妙化解庐陵百姓“健讼”问题后立即着手庐陵乡风民俗的整顿。接着，在面对庐陵遭遇的火灾、旱灾、疫病、盗匪等困难时，王阳明再次展示了他的治理智慧，将所有问题一一破解，实现了庐陵的长治久安，在一次次文治武功的具体实践中达成了他的圣人之志。

## 游渡六广河

今天的贵阳有一条河流叫作“六广河”，是乌江上游鸭池河流经修文、息烽两县境内的一段河流，又是修文、息烽、黔西和金沙四县的交界河，古曰“陆广河”。据《明史·地理志》和《平黔纪略》记载，因“滴澄河”（又作“的澄河”）支流汇入，又因地名叫“陆广”，所以那段河流也就变为了“陆广河”。在明代，陆广河（鸭池河）还是水东土司和水西土司的界河。《读史方舆纪要》中说：“陆广河，在水西南境。志云：水西之河，最大者曰陆广，其上流曰鸭池，下流东注曰黄沙渡。”以鸭池河为界，明代陆广（今修文县六广镇）属于“水外六目”之地（即今修文、扎佐、息烽、六广、九庄、安底），虽然地处水东，但却是由水西土司管理，因而陆广河又被称为“水西之河”。

陆广河上有一驿站，名为陆广驿，距离天生桥仅二十五里。它既是龙场九驿的第二驿，又是从龙场去水西（今毕节）的必经通道。尽管驿站由水西土司管理，但其本身并不属于水西，而是归属省里和朝廷。陆广河上还有一渡口，名为陆广渡。陆广渡之所以被选为渡口，是因为那两岸山崖相差不远处难得有一段豁口，又有一定的坡度，是旅人下行和上攀的好位置。作为交通要道，朝廷对此地的管理非常严格，在陆广河渡口设有巡检司，以保证渡口渡运的正常运行与基本治安。这个巡检司的职责就相当于现在地方维持治安的办事机构，同时又兼具军事方面的职能。《明史》载：“巡检司。巡检、副巡检，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于关隘冲要之处设巡检司，以警奸盗，后遂增置各处。”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又载：“陆广河，在治城西北一百五十里，当水西驿道，于此置巡检司，盘诘行者。”《读史方舆纪要》引《滇纪》言：“陆广河有水口寨，又有陆广城，为水西要地。”天启二年（1622年），在奢崇明和安邦彦发动的奢安之乱中，明军和水西军谁占据了陆广，就基本控制住了战乱的局面。凡此种

种，皆能看出陆广河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

除了占据重要的军事地位，陆广河还有着引人入胜的自然风景。陆广河两岸连山，山高谷深，河面狭窄。行人下去站在谷底水边，仰望两侧，天光一线。两岸峭崖上多悬挂飞瀑、流泉，山景与水景穿插相映，颇有“悬泉瀑布，飞漱其间”之态。从上游乘船而下，其间峰峡陡峭，雄奇险峻，古树苍翠，猴群出没，白鹭翔集，白马峡、猴愁峡、飞龙峡、赤壁峡、象鼻峡、剑劈峡、海马峡等著名七峡景区，融山水、洞瀑为一体，可谓一步一景，各显风姿，兼有长江三峡之雄奇，漓江山水之秀丽。正德四年（1509年）的某一天，王阳明经陆广渡河游玩，就曾题《陆广晓发》一诗，以抒发游兴：

初日瞳瞳似晓霞，雨痕新霁渡头沙。  
溪深几曲云藏峡，树老千年雪作花。  
白鸟去边回驿路，青崖缺处见人家。  
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无劳美九华。

《陆广晓发》写于王阳明龙场悟道后游历陆广河之际，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王阳明是在一个冬日的早晨出发的：朝霞升起，映红了天边，雨痕上还残留有渡头上的细沙。云朵在峡谷和深溪中玩起了躲猫猫，飘落的雪花在一棵千年老树上延续着“花期”。白鸟随着驿路盘旋远去，青崖的一处缺口居然住着一户人家……王阳明一气呵成地把陆广河的山光水色描绘得秀丽神奇，让人如临其境。首联先是以光亮的云霞、渡口沙滩上留下的雨痕，让人感觉到陆广河的清新和绚丽。继而又以千年老树、驿路飞鸟、青崖人家侧面衬出陆广河的曲折深幽与神秘古老。“溪深”“树老”“白鸟”“青崖”，浑然天成，对仗极妙。而四个各具美态与色彩的物体，不仅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还用它们独有的生命形态诉说着自己的故事，真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歌最后，王阳明站在陆广河边，感叹如此风光毫不逊色于他曾游玩过的九华山胜地，发出了不再

羡慕九华山的感慨，更是衬出陆广河的奇绝景致与壮美。

九华山是天下名山，风景十分壮美，吸引了众多文人名士游历于此。唐代诗人李白就曾多次游赏九华山，留下了“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的诗句。王阳明也多次登九华山，前后十几年里写九华山的诗作有几十首之多。而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与九华山相关的文字记载，称为“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之后此山更因佛教氛围浓郁而闻名于世，清乾隆年间，就正式跻身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相比之下，陆广河就显得默默无闻了许多，没人能想到王阳明会将其与九华山相提并论。而在他看来，九华山比之于陆广峡谷还较为逊色，这是对陆广风光极高的评价！更是陆广河历史上的高光时刻。而一宵觉悟之后，王阳明的心境也不同以往，因此发出了“江上无劳羨九华”的感叹。这句话从表层上看，说的是两种景色之间的对比，背面又隐含着王阳明已经走出了以往的生活和思想，从狭窄的山谷间游渡过去，意味着他思想的转变与升华，心情自然开阔。

再进一步去看，王阳明固然是被陆广的美景所吸引了，但陆广驿作为安氏水西的辖地，而水西土司同省里又长期存在着微妙而敏感的关系。王阳明此番前去，旁人难免会有猜想：王阳明到陆广渡干什么呢？他会不会要渡河而西呢？从诗歌的内容来看，王阳明只是徜徉陆广渡的风光，似乎并未远行。而安贵荣其时也未必在水西，朝廷规定贵州宣慰使不能居住在领地土衙，正职只能驻贵阳城，副职驻红边（今乌当）。作为朝廷直接任命的驿丞，王阳明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如此说来，王阳明应该不是要与安贵荣有什么私下的其他来往，更像是趁着空闲去欣赏美景罢了。虽然目前没有王阳明游渡陆广河的具体时间，但从《居夷集》的诗文撰写情况来看，可猜测大概是正德四年（1509年）正月，王阳明赴省城贵阳时所作。那段时日，贵阳城迎来了难得的大晴天，王阳明心情甚好，同贵州按察司副使陆健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和山城美景，陆广河就是其中之一。

同大批文人墨客交相称赞飞云崖，为其写诗题字不同，史书中与陆广河相

关的诗文寥寥无几。陆广河就像一个隐于世间的山人，故意收敛了锋芒，只为有朝一日向真正懂它的人敞开怀抱。尽管在王阳明的笔下，陆广河是何等秀美壮阔，但只有亲自走入那蜿蜒起伏的山脉中，才能体会到王阳明日之所及的陆广奇景。在王阳明来到陆广之前，明代还有一位官员丁养浩曾挥笔洒墨，用一句“滚滚来无极，滔滔去若何”捕捉到了独属于陆广河的那份雄伟壮阔。

以前的陆广河如今已经更名为六广河，查找相关文献发现，“六广”这一名称有史可载的最早朝代是在清代乾隆年间，如鄂尔泰等所修的乾隆《贵州通志》、爱必达所撰的《黔南识略》等。在乾隆《贵州通志》中，“陆广”和“六广”是混用的，王阳明的诗作《陆广晓发》也变成了《六广晓发》。而在《黔南识略》中则用“陆广”专指河流，“六广”特指贵阳城门“六广门”。到了清咸同年间，罗文彬、王秉恩在《平黔纪略》中，就完全使用“六广”一词了。此后“陆”“六”混用的情况时有发生，直到今天，“陆广”一词已完全被“六广”取而代之。实际上，在贵州的地名中，由于方言读音相同或相近而被讹传，从而成为现在通用地名的情况不在少数；也有为求雅化，从而符合书面表达和普通话交流而改名的情况。而在西南官话中，“六”（liù）的方言读音就是“陆”（lù），所以大可大胆推测因为读音相同后人将“陆”讹写为“六”，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谐音地名。

清代诗人潘文茵路过六广，曾撰《六广吊王阳明》一诗，用寥寥数语记录了王阳明在贵州的经历。其中“高风垂泰岳，妙句壮灵川”一句，指的就是王阳明渡陆广河，书《陆广晓发》的这件事。因《陆广晓发》这篇赞咏诗篇，如今的六广河码头，又名阳明码头。码头广场正中树立一尊高8米的王阳明石像，峡谷游船都由此出发。三峡飞龙峡有一尊高耸的石笋，当地老百姓传说其乃当年王阳明写诗作文时所用之笔，用后留于此变成石笋，所以被命名为“阳明妙笔”。走到六广河尽头，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凌空300米的六广河大桥，在曾经的“亚洲第一峡谷高桥”上穿梭古往今来，领略王阳明笔下六广河大峡谷的壮阔之美，真可谓别有一番滋味！

## 达德学校留诗

达德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是贵州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它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初是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团体，名叫算学馆。两年后扩大成为达德书社，并创办了私立小学堂，是贵州最早的私立（民办）学校之一。民国二年（1912年）正式更名为达德学校。“达德”之名，取自《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之意。作为贵州首批新式学校之一，达德学校不仅在教育事业上开创了先河，更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扮演了积极角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那么，王阳明为何会在达德学校留诗呢？原来，达德学校并非凭空而建，而是在元代遗留的南霁云祠旧址上，历经数次扩建改造而成。王阳明在被贬谪贵州期间，曾前往南霁云祠凭吊，并留有一首七言律诗《南霁云祠》，以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那南霁云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呢？据《新唐书》记载，南霁云是唐朝玄宗、肃宗时期的一名猛将，魏州顿丘（今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双庙乡南寨村）人，年少时身份卑微，靠为人撑船度日。其人骁勇、善骑射，能左右开弓，百步之内箭无虚发。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巨野县县尉张沼起兵讨伐叛贼，选拔南霁云作为将领。尚衡攻击汴州的叛贼李廷望时，又任命南霁云为先锋。后来几经辗转，南霁云被派到睢阳，在张巡手下为将。不久，睢阳被围，为了坚守孤城，张巡派南霁云向屯兵彭城的御史大夫许叔冀求援。许叔冀拥兵不救、无动于衷，南霁云无功而返，只好率领三十名精锐骑兵突围至临淮，向御史大夫贺兰进明求救。然而，贺兰进明也不愿出兵，不过他欣赏南霁云是个难得的将才，想将其留在身边，便设宴款待。面对满盘珍馐，南霁云难以下咽，情急之下，他拔出佩刀砍断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并坚定地说，主帅之命不

能完成，叛兵不能扫平，国家不得安宁，请留此指以示人之心。言罢，遂返回睢阳，继续追随张巡抵抗叛军。不久，睢阳城破，南霁云被俘后“亦不肯降”，遂以身殉国。南霁云感人至深的忠烈事迹，为后人留下了难得的精神财富。那么地处西南的贵州又为何会供奉南霁云这位中原名将呢？咸丰《安顺府志》卷三十七《人物志四》称：

南公霁云，临淮借兵，睢阳射贼，事业皆无与于黔，而又从未一践黔土，以子承嗣为清江太守，黔人因其子以见其父，犹本秉懿好德之心，所在庙祀不绝。

原来南霁云之子南承嗣曾任贵州清江太守，执政期间，因政绩显赫、为官清廉，深受百姓拥护，黔人也因此了解到南霁云的生平，于是立祠纪念其忠勇刚烈之精神。洪武年间，贵州都指挥使程暹，在贵阳建忠烈庙，奉祀南霁云，将其忠勇义烈作为全军之典范。

王阳明瞻仰眼前这位将军的塑像，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南霁云英勇杀敌、断指明志、刚毅不屈的一幅幅画面，于是写下了这首《南霁云祠》：

死矣中丞莫谩疑，孤城援绝久知危。  
贺兰未灭空遗恨，南八如生定有为。  
风雨长廊嘶铁马，松杉阴雾卷灵旗。  
英魂千载知何处？岁岁边人赛旅祠。

这首诗中，王阳明首先道破了张巡其实早就知道他们坚守孤城而无援兵的事实，并抱着为国捐躯、慨然赴死的决心。“贺兰未灭空遗恨”中“贺兰”指贺兰进明，安史之乱时，南霁云向驻军临淮的御史大夫、节度使贺兰进明求援，贺兰进明却说：“睢阳肯定是守不住的，我即使出兵，也于事无补。”贺兰进明

拒绝出兵救援。南霁云出城时愤怒地朝着佛塔射出一箭，箭矢射入塔身半箭之深，他发誓说：“吾破贼还，必灭贺兰！”遗憾的是，睢阳最终沦陷，张巡、南霁云等被俘，宁死不屈，惨遭杀戮。接着，王阳明把祠中的现实景物与自己的想象相结合：长廊里的铁马仿佛是南霁云那匹在风雨中嘶鸣的坐骑；而阴雾中的松杉，则像是在那战马前方翻卷指引的战旗。长廊、铁马和松杉，这些都是祠庙里的真实景物，王阳明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再借助风雨和阴雾的烘托，进行艺术加工处理，构成了一个形象生动、气势雄浑的壮丽场景。他这种融合现实与想象、具象与抽象的创作手法，着实令人惊叹拜服。结尾处的提问，则深刻揭示了他对于历史评判与个人功绩之间的独到见解。在他看来，无论后世史书如何记载南霁云的功过，那些真正为人民英勇奋斗、不顾生死立下卓越功勋的英雄，其事迹与贡献将永远镌刻在百姓心中，被后世铭记。这不仅是王阳明对南霁云的高度评价，更是他自身为官从政的崇高理想与追求。

整体来看，这首诗通过对南霁云的追忆与赞美，塑造了一个坚守孤城而无援兵，为国捐躯而无谩疑的英雄形象，表达了王阳明对南霁云的敬仰和怀念之情。“英魂千载知何处？”一句更是振聋发聩、耐人寻味，因为这不仅是对南霁云这位千载英魂如今在何处的提问，更是对当下“国难思良将”的殷切期许。大明王朝在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后，也一如安史之乱后的大唐，朝局混乱，国力日渐衰微，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局面。一方面，残余的蒙古部落不断乘机潜入青海地区游牧，甚至得寸进尺，深入“藏彝走廊”区游弋。《明实录》记载，蒙古亦不剌部于正德年间“屯松潘境上，掠番夷诸寨”，在松潘（今四川省松潘县）附近劫掠百姓。另一方面，正德三年（1508年），也就是王阳明刚到龙场的那一年，由于贵州两大土司水东宋氏和水西安氏的明争暗斗，导致领地之内发生了苗族阿贾、阿札的叛乱。

在当前这纷繁混乱、岌岌可危的形势之下，《南霁云祠》中的最后一句发问，更像是王阳明发自内心的一个呐喊，他急切盼望在这个危急关头，有一位南霁云似的将领能够站出来，救苍生于水火，拯黎民于危难。奈何刚到龙场不

久的他只是一个被贬谪的小小驿丞，人地两生，人微言轻，能否自保都是问题，又去哪找寻像南霁云一样的将领呢？此时此刻，王阳明或许会想到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一腔热血。他虽是一介文臣，但骨子里有着一股尚武的精神。他的人生知己湛若水，为其撰写的墓志铭评价他是“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中则说他年少时“性豪迈不羁，喜任侠”。十五岁那年，王阳明便游历居庸三关，与当地胡人共逐骑射，打听他们的御敌之道，展现出经纬天地之心，令胡人也深感敬畏。在塞外考察军情，学习骑射后，王阳明又梦见伏波庙，并赋诗：

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

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诗尚不磨。

可以看出，志学之年的王阳明对古代名将的敬仰和钦佩，以及他誓立驰骋疆场、矢志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26岁那年，面临着朝廷缺乏将才的窘境，王阳明深知武举制度只能选拔一些擅长骑射搏击的人才，却很难招揽到具备韬略统驭的将帅之才。于是，他又开始系统地学习兵法，对历代兵家典籍，悉心钻研，力求精通。每逢宾朋宴饮之际，更是以果核为兵，巧妙布局，模拟军阵对垒。

28岁那年，在熟读研习兵法之后，王阳明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军事战略思想，他在《陈言边务疏》中，所陈八事之一就有“蓄材以备急”，他说：“臣惟将者，三军之所恃以动，得其人则克以胜，非其人则败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他认为将领是军队行动的指挥官，如果选对了人，就能取得胜利；如果选错了人，就会失败甚至灭亡。因此，选拔和培养将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将领不仅影响着军队的行动力和战斗力，而且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此外，王阳明还在《武经七书评》中说道：要想国家强大，关键在于有好的将领，自古以来，“有治人无治法”，也就是说，只有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才，而没有一直

都奏效的法律制度。如果国家招纳到的将领在作战时心思缜密，计谋周全，临机应变，则军队必会常保有利之势，国家亦必因此昌盛。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王阳明在被贬龙场之后否极泰来，他在人生的后十余年里戎马倥偬、屡建奇功，军事才华得到了充分施展。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阳明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到任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饬军纪，铁腕除寇，最终成功平定了长期困扰四省的匪患，为朝廷廓清寰宇；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王阳明以一个过境官员的身份，临危受命，以他有限的权力，迅速召集起一支以乡兵义勇为主力的军队，他运筹帷幄，出奇制胜，仅用了43天时间，便以少胜多，破敌十万，使得明室社稷得以转危为安；嘉靖六年（1527年），朝廷命王阳明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前往广西讨伐思恩、田州叛乱。王阳明虽抱病在身，亦慨然赴任。他先是采取“以抚不以剿”的策略收服思田当地叛军，而后再巧袭断藤峡，破八寨，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战”。可以说，王阳明用自己的赫赫军功来回应在南霁云祠发出的呐喊。《明史》评价王阳明：“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万历年间，老百姓开始称南霁云祠为黑神庙，以后的几百年间里，黑神庙之名普遍为贵阳百姓所熟知，知道南霁云祠或者忠烈宫之名者反而不多。正如前文所述，清光绪年间，忠烈宫内开设国立小学堂，后改名为达德学校。如今的达德学校旧址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座庄严肃穆、古色古香、对外开放的庭院。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诉说着历史的过往，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络绎不绝的游客。这里也成了游客们缅怀革命先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尽管如今南霁云祠的实体建筑已不复存在，但阳明先生的七言律诗《南霁云祠》仍被精心刻于一处显眼的位置，让这份对于忠烈的敬仰之情得以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通过这首诗，人们不仅能领略南霁云的英勇事迹和无畏精神，还能感受到王阳明心怀天下、为官为民的情怀与担当。



达德学校

## 二游仙人洞

孔子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名句，在儒家传统里，山的崇高与君子之德相似，水的流变与君子之智相通，山水因而成了文人雅士情感的寄托。在历代文人的笔下，山川河流被赋予了浓郁的人文色彩，刻在了中国人的基因里。纵使时转势移，中华儿女对山水的热情与依恋从未减少。王阳明平生的一大爱好就是遍游天下名山大川，他被贬谪至龙场后，自然不会错过一路上遇到的“打卡”胜地。

坐落在贵阳市宝山南路与蟠桃宫路交叉口的东山山体公园，如今是贵阳著名的网红打卡胜地，究其原因，一则是山上底蕴深厚的古建筑群和摩崖石刻令人神往；一则是可以登高览胜，俯瞰林城美景。栖霞山毗邻东山、扶风山，合称为“栖霞胜境”，至今在东山路口仍留有一块“栖霞胜境”的四字牌坊。实际上，在500多年前，栖霞山就美名在外，成为贵阳人的游乐场所。来到贵阳后，王阳明自然不能错过这一黔中奇境。他怀着好奇的心情，身披漫天大雾，拄着拐杖，沿崎岖小道盘旋而上，登上了屹立于此的城东孤峰——栖霞山，俯瞰南明河，仿若置身仙境之中，即兴写下《栖霞山》：

宛宛南明水，回旋抱此山。  
 解鞍夷曲磴，策杖列禅关。  
 薄雾侵衣湿，孤云入座闲。  
 少留心已寂，不信在乌蛮。

该诗的第一句“宛宛南明水，回旋抱此山”，王阳明从俯视的角度，描绘了其所处的地理空间和山水特征。其中提到了一山一水，山便是栖霞山。据《贵

阳府志·山水附记》中记载：“栖霞山去城三里，横锁南明河中。”诗文内容与史实记载若合符契。栖霞山旁边还有一座名为“东山”的岑岭。伫立于今天的东山岔路口，便可见栖霞山状如伏狮，卧于东山之后。横冈直走，路缘腰肋，左边临近山峰、高峭险峻；从其右旁向下俯瞰，可一睹南郊景物，徜徉于贵阳城的美景，欣赏悠然的流水、浅绿的水色、如绢的波光。“南明水”便是当今的南明河，贵阳市的母亲河，从城垣南门前流过，原名为“南门河”。据明景泰年间官修《寰宇通志》载：“南门河，在城南。”弘治年间的《贵州图经新志》记：“南门河，在治城南门外，源出程番府界，东北流过境治，至巴乡，此流合乌江入蜀涪州界川江。”由于河水清明如镜，南门外的这条河流亦称为明河。1852年的《贵阳府志》始记“南明亦曰清水”。到了清朝，因河流从城垣的次南门和南门过境，为有所区分，地名称谓上往往要注明南门外的明河。由于名称过长，加上方言的发音“门”“明”相近，“南门河”到后来就演变成了“南明河”，而这一称谓沿用至今。王阳明为贵阳的山水所陶醉，即便山路难行、薄雾湿衣也阻挡不了他攀登眺望的决心。登上栖霞山，秀丽河山再次触动了他，在这美不胜收的山光水色之中，虽然深感孤寂、郁闷，但心态也变得更加超凡脱俗，于是他发出了“少留心已寂，不信在乌蛮”的感叹。

或是栖霞山的美景令人念念不忘，王阳明在贵州期间，不止一次来到栖霞山一带游玩，其中还包括了贵阳另一处名胜——仙人洞。此洞位于今贵阳市仙人洞路和水口寺路之间的山上。仙人洞在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叫作来仙洞，“（来仙洞）在治城东二里许栖霞山之半，中平敞可居，洞外松竹花草扶疏交荫，为郡人游乐之地”。山上植被丰茂，地势险峻，孤峰兀立，峭壁陡绝。登高远眺，高峰霞举，峻岭云回。俯视城郭，万家烟火，历历在目。而它毗邻的铜鼓山来头更大，传说这里是三国时诸葛孔明南征时藏铜鼓之地，因此得名。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铜鼓山在“城东二里，高百余仞，山半崆峒，每阴雨，闻其中有声如铜鼓，相传为诸葛武侯所藏者，贵阳八景曰‘铜鼓遗爱’”。铜鼓山和来仙洞在明朝时已经成为贵阳的名胜景观，有不少文人墨客兴尽之

余，也提笔赋诗记录“到此一游”。王阳明曾经两次前往来仙洞游玩，并留下两首诗作。第一首题为《游来仙洞早发道中》，写的是正德三年（1508年）初秋他前往来仙洞途中所见所闻。第二首题为《来仙洞》，写的是翌年初春他再次赴来仙洞游赏的情景。两首诗刚好构成一个完整的来仙洞游览指南，从中可以窥见明朝时来仙洞的大概情况。《游来仙洞早发道中》：

霜风清木叶，秋意生萧疏。  
冲星策晓骑，幽事将有徂。  
股虫乱飞掷，道狭草露濡。  
倾暑特晨发，征夫已先途。



从今仙人洞俯瞰南明河

浙米石间溜，炊火岩中庐。  
烟峰上初日，林鸟相嚶呼。  
意欣物情适，战胜羸色腴。  
行乐信宇宙，富贵非吾图。

此诗主要是描写前往来仙洞沿途的景致：霜风吹落了树叶，秋天的寂寥萧疏已渐渐显现。王阳明清晨迎着启明星策马前行，将去来仙洞探幽寻奇。寂静之中草虫乱飞乱跳，道路狭窄，草露打湿衣服。为避开秋热特意赶早出发，并叮嘱从役的征夫提前走了一步。在山石流水间淘米，在山间的小屋里烧饭。太阳初升，雾霭缭绕，树林间有鸟儿啼鸣。心情舒畅，觉得景物都很美，连瘦削的脸颊也渐渐显出了丰润。最后，王阳明表达了他的世界观，认为人世间重要的是行乐的自由，而不是富贵。

全诗动静相结合，极具匠心，小虫、草露、征夫、流水、雾霭、啼鸟，有声有色。王阳明寄情于山水，但对道即心学的追求却十分的执着，在这首诗的最后，他表示自己最终的追求不是富贵，而是践行道义和对自由的向往，从而使诗的主旨得到了升华。此外，诗篇景中有情，情中有意，景情意三者诗中交相辉映，巧妙地将自己深厚的主观情思蕴含在对景观的看似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中，将诗人乐观豁达的心境表现得生动传神、淋漓尽致。

王阳明《居夷集》中紧随《游来仙洞早发道中》后的是一首诗题为《别友》的诗作，此诗应与前者有着紧密的联系。王阳明这次去贵阳当是访友的，从《别友》中可知他是骑马去的。他出发前，有“征夫”先去打前站，极可能友人也是陪同王阳明随后去的。不过那晨炊也比较一般，反映了当时黔地人们生活水平。从《别友》看，他们应是相知很深的朋友，但具体是哪位，现在已经无从确考。

王阳明二游来仙洞的游伴则比较明确，是时任贵州按察司副使的陆健。在《居夷集》中，王阳明有四首诗是写给他的，从中可以看出二人的关系非常密



切。正德四年（1509年），正月初一，王阳明应陆健之邀，由龙场到贵阳城过春节，极有可能就是在陆健陪同下再次前往来仙洞游玩的。王阳明《来仙洞》诗：

古洞春寒客到稀，绿苔荒径草霏霏。  
书悬绝壁留僧偈，花发层萝绣佛衣。  
壶榼远从童冠集，杖藜随处宦情微。  
石门遥锁阳明鹤，应笑山人久不归。

这首诗描述的来仙洞洞内的景色。春天的古洞还寒冷，游人来得不多，苔藓绿小径，荒草色萋迷。悬崖绝壁上留有僧人书写的偈语，层层藤萝花开，好像绣的佛衣。童仆携着酒菜远随而来，拄着拐杖，随处都见到宦宦心意淡微。遥想家乡阳明洞石门锁着的那只鹤，应笑我这山人久久不回。

诗歌表现了诗人对山林泉石风光钟爱之情。诗的前半部分是对景物的描写，格调清新而优美；后半部分，则写游人，融入了作者的思乡之情。全诗色彩淡雅，写人寥寥数语即刻画入微，人融于景中，其诗情画意尽在字里行间，犹如一幅动人的水墨画。而最值得品味的是尾联：“石门遥锁阳明鹤，应笑山人久不归。”诗人喟然长叹：遥想家乡余姚阳明洞石门锁着的那只鹤，此时可能在笑我久久不能回去。看似是将鹤拟人化，嘲笑自己不能回到故乡，实则是将自己类比为“孤鹤”，被一道无形的“石门”锁住而久久不能离开。王阳明心中的孤寂、思乡之情，在春意盎然的来仙洞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更反衬出其思归的迫切心情。王阳明“居夷”时所写的诗作里面，归隐情绪常常在不经意中就流露出来，可以说“归隐”是他诗作中的一个关键词。另外，根据王阳明《来仙洞》“书悬绝壁留僧偈，花发层萝绣佛衣”句，有人推测“来仙洞”曾经或是寺院。但其中所写的“僧偈”指的是僧人在石壁上留下的诗句或名言，以及后句所比喻花开如僧衣一样，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此处原为佛教寺庙。翻阅相关史料，亦未见从佛寺到道观转变的证据。这两句诗只能说明王阳明当年看到

洞中有僧人留言而觉得比较稀奇而已。

今天仙人洞已成为贵州著名游览名胜与道教圣地。当人们走近它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洞口刻有“仙人洞”三个大字的牌坊，这也是贵阳市区较早的名胜古迹之一。自1984年起，贵阳市政府斥资百万元修复仙人洞的古建筑，改善基础设施。1994年秋，仙人洞正式对外开放。现在的仙人洞有老君殿、三清殿、三官殿、舍身岩、会仙桥等多个景点。老君殿、三清殿和三官殿依次位于悬崖半山梯级平台上，在三官殿后的悬崖上有“云山万里”石刻，题款为“宣统元年春月提督徐印川书”。悬崖上还开凿了石磴小道，直通山上的仙人洞，沿途有铁制扶栏；立于石磴上俯瞰筑城，蔚为壮观。道观内还矗立着王阳明的塑像，仿佛在凝望着他留下的足迹。“应笑山人久不归”，贵阳醉人的山水终究还是把他留下了。



## 春访太慈桥

贵阳多水，南明河自西南向东北奔流，一路吸纳小车河、市西河、贯城河，最后注入乌江。有水之处必有津渡桥梁，贵阳因多水而多桥，有桥的地方就有故事。在现在的贵阳城西南郊小车河上，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古桥，名曰“太慈桥”，别名“太子桥”。正德四年（1509年）初春，王阳明饶有兴致地前往太子桥春游寻芳，见到清丽的春景时他心情惬意，并留下了《太子桥》一诗以纪其事：

乍寒乍暖早春天，随意寻芳到水边。  
树里茅亭藏小景，竹间石溜引清泉。  
汀花照日犹含雨，岸柳垂阴渐满川。  
欲把桥名寻野老，凄凉空说建文年。

一阵寒一阵暖正是贵阳早春的天气，王阳明的郊游显得随性适意，他漫步于小车河边，一路寻芳，人随景移。只见那树林中掩映着一个小小的茅亭，构成一幅别有趣味的小景。竹林里，潺潺的流水沿着石涧欢快地流淌着，而河边的春花带着雨滴，在阳光的照耀下变得格外娇艳。春意渐浓，就连岸边垂柳投下的倒影，很快就要填满整个河面了。王阳明一时好奇，找来一个乡间野老，询问桥名的由来。老人说这座桥的名字与当年建文帝流落到这一带的传说有关。这首诗整体风格清新绮丽，在王阳明笔下，太慈桥的春景仿佛是一幅绝妙的画卷徐徐展开，可谓是一步一景，让人身临其境。然而王阳明的借景咏怀是这样让人猝不及防，如此轻松写意的笔调在最后一句却添上了一个重重的感叹号，徜徉于如此亲切可人春景之中的王阳明，此时的心情又一下子沉重了起

来。此桥传说中因建文帝而得名，王阳明是否会联想到同样是流落在这西南一隅的自己呢？

因为建文帝，也因为王阳明，太慈桥的历史一下子就丰满了起来，不免让人产生兴趣，想要一探究竟。现存的较早记录太慈桥的历史文献是弘治年间编撰的《贵州图经新志》，志云“太慈桥在治城西南五里四方河<sup>①</sup>之上，俗讹为太子桥”，可见该桥原名为太慈桥，民间讹称为“太子桥”，这个“乌龙”事件早在明孝宗时就已存在了。虽然在明代以来各种野史和地方志的记载中，建文帝的确与贵州有不解之缘，但其可信程度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建文四年（1402年），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夺取帝位。《明史》记载：“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既然建文帝朱允炆“不知所终”，燕王朱棣又是如何派太监“出帝后尸于火中”而葬之的呢？《明史》的记载显然有矛盾之处。建文帝的失踪成为明朝的一大疑团。关于建文帝曾流落于贵州的记载可见于乾隆年间修撰的《贵州通志》卷五“广顺州”条之下：“白云山在城东四十里……相传明建文帝常遁迹于此。上有罗永庵，前有杉二株，长数十尺，其一经帝手所摩至杪绝，无附枝。”乾隆《贵州通志》说建文帝曾经隐遁于白云山的罗永庵，庵前有两棵杉树，其中一棵经过建文帝的抚摸后，连细小的附枝都没有了。其实白云山的传说，在明代就流传很广，徐霞客游历贵州时曾到过广顺白云山白云寺，其日记中称：“有巨杉二株，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徐霞客听到的白云山建文帝传说也提到了两棵杉树，其中被火灼烧过的一棵还是建文帝亲手所植。对于这些传说，徐霞客认为是“皆神其迹者所托也”，完全是附会之说。他对建文帝流落贵州一事本就持怀疑态度，对于太慈桥的身世也抛出了自己的疑问：“此桥谓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建文帝在即位前是皇太孙，从未做过太子，

---

① 此为志书编撰者误记，实为小车河。

那么太子桥的得名必然与其没有关系。

尽管有种种不合理之处，但从古到今，贵阳父老对太慈桥和建文帝的传说深信不疑。纯朴善良但缺乏历史常识的普通百姓，或出于对落难天子的同情和好感，或以沾染皇家瑞气为荣，他们对这个美丽的民间传说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致使建文帝与太子桥的传说传得神乎其神，就连《贵阳市志·交通志》《贵阳市南明区志》《贵阳市南明区街道志》等志书和某些文史资料，也将这些传说“记录在案”。《贵阳市南明区志》说，扮作僧人的建文帝眼见小车河两岸百姓苦于修桥经费困难，便自愿出钱帮助。《贵阳市南明区街道志》说，建文帝流亡到小车河时，“遇百姓造桥，建文帝为之策划”。太慈桥桥头文化墙上面的文字说：“这座桥是经过千百次修砌才造成的，因为小车河水流湍急，桥基刚砌出水面，立即被激流冲垮，反复多次，桥基仍无法砌出水面。后来幸遇身披袈裟的建文帝从此经过，经他一指点，不久桥便建成了。”这些传说当然不能当成真正的历史来看，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早已指出，太慈桥被误称为太子桥，是“俗讹”所致。有人推测，导致“俗讹”的原因或与当地布依族居民说汉话有关。

明朝时期的贵阳城郊，汉族人口只占少数，少数民族人口反而占大多数。贵阳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布依族居多，苗族次之。布依族大多依山傍水，在河流附近建房聚居。今太慈桥村一带及小车河流域，当年的居民主要是布依族，他们以布依语为交际工具，但由于与城区近在咫尺，与汉人交往频繁，在此过程中，初步学会一些简单的汉话。布依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具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和语音特点，因此布依族人初学汉话时，发音不那么准确，说得别有特色。现布依族所说的不够成熟的汉话有个基本特点，就是发音时口腔内送气不足，容易把送气音“p、t、k、q、ch、c”说成非送气音“b、d、g、j、zh、z”，因此在语言学上，把太慈桥的“慈”（ci）说成“子”（zi）或是有理可据的。

事实上，王阳明当年所游览的太慈桥，其建造年代距他生活的时代并不遥

远。据文献记载，现存的太慈古桥别名叫“杨公桥”，是弘治年间镇守贵州太监杨某主持修建。与王阳明交情颇深的毛科写了一篇《太慈桥记》，详细地介绍了建桥始末：弘治十八年（1505年）九月十六日，杨某因秋粮即将成熟，前往贵阳西郊慰劳农人，完事后就在小车河畔漫步游玩。这时有一位老农告诉他，此处是“太子桥”遗址，去年春天河水暴涨，冲垮了桥梁。之后人们来往于两岸只能乘舟渡河，往往有倾覆之患。于是老农请求杨太监主持重新建桥。杨太监考察了太子桥遗址后认为，此地崖壁耸立导致水流湍急，进入汛期后水势如山崩，桥基不稳。他在河岸边徘徊许久，东行百余步后发现一段地形稍平，水势渐缓，于是就决定以此处为桥基重新建桥。杨太监不仅亲自规划设计，还带头捐钱，并向贵阳士绅募集款项。工程在次月动工，次年〔正德元年（1506年）〕二月竣工。新建的太慈桥高五丈，长一百二十尺，桥面上装有扶栏，来往的客商车马及附近樵采之民皆能通行，从此天堑变通途。当地士民为了感谢杨太监的恩德，将新太慈桥称为“杨公桥”。

据此记中所述，太慈桥在历史上至少经过了两次修建，一次为弘治十八年（1505年）之前，彼时就有了“太子桥”之讹称。另一次为杨太监牵头修的桥，即至今仍在使用的太慈古桥，于正德元年（1506年）修成使用，距今已有500余年，是贵阳保存时间最久的古桥之一。如今，太慈古桥早已隐入了民间烟火中，其交通功能亦被不远处的太慈新桥所取代。新桥车马喧嚣，成为贵阳来往于花溪的咽喉之地。王阳明的《太子桥》诗铭刻在新桥桥头，被人们反复吟咏着。500年来，圣人的足迹从未远去。

## 通济桥畔送别

通济桥是头桥、二桥、三桥的合称，见证了贵阳城的历史。嘉靖《贵州通志》记载：通济桥在治城北一里。其桥有三：通济为第一桥，又里许为第二桥，又二里许为三桥，皆宣德间建。“通济”一名，在明代贵州按察使胡器《（通济桥）记》中有详细记载：“作桥者何？贵州都、布、按三司，以斯桥适当要路，邮驿所经，宣上命、达下情，不可一日无也；名之者谁，巡按御史岳阳方公全，谓其所通者远、所济者博，故以‘通济’名之也。”通济桥在当时可北往巴蜀，西通云南，地理位置不言而喻。清人鄂尔泰等新修乾隆《贵州通志》时，在《地理志·贵筑县（附郭）》一篇将“通济桥”记为：“在城西北，往滇大路，有头桥、二桥、三桥之名。”自此，通济桥名逐渐消失，而以头桥、二桥、三桥进入贵阳人的记忆。此三座桥虽在一线，但却不在一地，因地处出城交通要道，成为人们离开贵阳的必经之路，许多离人在此与亲友分别，形成了贵阳独有的“送别文化”。

王阳明谪居龙场后，尽情体验贵州的山川风物，广结善缘，结识了一众好友，他们之中有当地居民，也有地方官员，还有前来向他求学问道的青年学子，以及和他一样来自浙江余姚的宦客同乡。王阳明与他们或朝夕砥砺，或讲学论道，或畅游山水，或一叙思乡之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这些挚友门生因故要离开贵阳、离开王阳明时，他总是依依不舍，时常亲自送至郊外，并留下诗篇以表惜别之情。在王阳明谪居贵州时创作的 100 多篇诗文中，送别诗达 10 余首，对应了王阳明谪居期间的十余次离别。

正德三年（1508 年）秋，王阳明从龙场赶赴贵阳送别和他一样遭刘瑾陷害的贵州按察使张贯，作《送张宪长左迁滇南大参次韵》一诗以记，诗云：

世味知公最饱谙，百年清德亦何惭！  
柏台藩省官非左，江汉滇池道益南。  
绝域烟花怜我远，今宵风月好谁谈？  
交游若问居夷事，为说山泉颇自堪。

王阳明在此诗中几乎不谈别愁，同朝为官的他们彼此都谙熟所处时代的世道，选择做一个正直爱民、留下百年清德的好官。清官、好官遭遇贬谪在中国历史上乃寻常之事，没有什么好感到羞愧的。相比王阳明的遭遇，张贯去云南也算不上什么实质性贬谪，只是地理位置相对更远一些。王阳明在龙场这种与世隔绝的地方，与张贯别后，他最先想到的是今晚绝美的月色无人共赏。如果说离别的不舍，“今宵风月好谁谈？”应该是最集中表达这种情绪的。但王阳明没有过多深陷在这种不舍中，话锋一转，他更关注若有故交好友问起其在龙场过得怎么样，希望张贯告诉他们贵州山水自然风光很美，恰好能满足他的泉石之好。由此，一种儒者的乐观豁达跃然纸上。

据乾隆《贵州通志》载“正德张贯，蠡县人，进士。”而被贬一事则在光绪《蠡县志》详载：“张贯，北大留人。成化乙未进士，授河南知县。慈祥乐易，不为苛政……弘治戊午，哈密犯顺承，命出师平之，赐彩币，升四川副使、贵州按察使。以持法忤逆瑾，谪官参议。”可知张贯乃因秉公执法而得罪刘瑾，由贵州按察使贬为云南参议，王阳明与他同病相怜，但王阳明实则比他被贬得更为彻底。张贯此行前去云南，王阳明诗文中虽未提及送别张贯的地点和路线，但我们却可以从王阳明正德四年（1509年）另外两首送别诗文和当时贵阳出城交通脑补出张贯出城大致路线：张贯当从贵阳城北门出，朝西北方向过通济桥一路向西抵达云南。

正德四年（1509年）春夏，王阳明因应席书之邀讲学文明书院而常驻贵阳，其间恰逢多位同僚好友因各种原因离开贵阳，于是王阳明在贵阳又写下了《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赠刘侍御》《送客过二桥》《次韵送陆文顺宦

宪》《先日与诸友有郊园之约是日因送客后期小诗写怀》等数篇赠别作品，其中《送客过二桥》《先日与诸友有郊园之约是日因送客后期小诗写怀》诗歌涉及“二桥”“三桥”正是通济桥的二桥和三桥，透过诗文所述，不仅能让人共情心学大师王阳明当时对学生、好友的寄望与别愁，也让后人再次感悟百年老桥的人文底蕴。《送客过二桥》：

下马溪边偶共行，好山当面正如屏。  
 不缘送客何因到，还喜门人伴独醒。  
 小洞巧容危膝坐，清泉不厌洗心听。  
 经过转眼俱陈迹，多少高崖漫勒铭。

从诗文可知此次送别对象大概是一名学生，且应是与其他学生一起去送别。诗歌开头他一如既往描摹贵阳山水，好山如画屏，送别场面融入其间。一行人骑着马到城郊的溪边，下马步行了一段路便来到二桥这个充满离别回忆的地方，王阳明直言要不是又一次送客出城，应该是没有理由会来到这里的，他很高兴在贵阳期间有如此多的学生认同他的学术思想，又和他一样在那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清醒，而不与俗流为伍。王阳明回忆起在那个恰好容得下大家正襟危坐的小山洞中讲学的场景，大家不厌其烦地聆听着那夹杂着清泉流水的话语，逐渐去除了心中的杂念。然而，昨日之事不可留，用时间度量之事，转眼间便会成为过往，多少高崖勒铭实属徒然之举，时间和世事的变化一刻也不停止。

《论语·子罕》记述了孔子在面对奔腾不息的黄河时所发的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王阳明在后续的讲学中还把“逝者如斯”与他致良知功夫进行了合理的阐述。有弟子请教：“‘逝者如斯’，是说自家心性活泼泼地否？”先生曰：“然。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泼泼地，方才与他川水一般。若须臾间断，便与天地不相似。此是学问极致处，圣人也只如此。”王阳明正面回

复弟子，面对“逝者如斯”的时与事，需要时时刻刻用致良知的功夫，才能使得心性如川水一样保持活泼，而不至于被稍纵即逝的虚无感所占据。因为即便是片刻间断，也会与天地不一致，良知不光明了。这是学问的最高境界，圣人也是如此。

诗中所言洞中“危膝坐”和“洗心”场景与《系辞传·上》第十一章中孔子解读什么是《易》颇有共通之处，“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易》蕴藏将来变化之理，暗合既往知识经验，圣人以《易》智慧洗涤修炼自我，退藏于深秘之处，与百姓同忧患。王阳明对学生们学而不厌的求知状态是很欣慰的，但认为所有经过转眼便是陈迹，高崖勒铭亦是徒然。在无边际的浩瀚时空中，人似乎很难留下真正的存在感，有时甚至会闪现出一种虚无感，让人觉得无论什么样的努力都终将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所以究竟要以什么立足于世呢？那便是儒家精神传统一以贯之的“吉凶与民同患”。王阳明希望他的弟子能时刻保持儒者的清醒，从精神层面获得持久的力量，遵循天道，不同流合污，与百姓同忧患，不去标榜功绩，用良知托举光明的本心。

另有《先日与诸友有郊园之约是日因送客后期小诗写怀》组诗，虽是写聚会，却两次提到“三桥送客”一事，诗云：

郊园隔宿有幽期，送客三桥故故迟。  
樽酒定应须我久，诸君且莫向人疑。  
同游更忆春前日，归醉先拼日暮时。  
却笑相望才咫尺，无因走马送新诗。

自欲探幽肯后期，若为尘事故能迟。



缓归已受山童促，久坐翻令溪鸟疑。  
竹里清醅应几酌，水边相候定多时。  
临风无限停云思，回首空歌《伐木》诗。

三桥客散赴前期，纵辔还嫌马足迟。  
好鸟花间先报语，浮云山顶尚堪疑。  
曾传江阁邀宾句，颇似篱边送酒时。  
便与诸公须痛饮，日斜潦倒更题诗。

在组诗欢快明亮的聚会氛围中，可以感受到王阳明从龙场到贵阳讲学传道的自足，以及与好友学生相处的惬意。因三桥送客赴约迟到，他在抵达聚会后便利用言语的艺术变着法儿向诸位好友解释未能如期赴约一事。“郊园隔宿有幽期，送客三桥故故迟”“自欲探幽肯后期，若为尘事故能迟”“三桥客散赴前期，纵辔还嫌马足迟”。特别是第三首中“纵辔还嫌马足迟”一语，直接说自己送完客人就一路快马加鞭赶来了，颇有当下好友聚会时对迟到者自罚三杯的意味。其实无论语言怎么技高一筹，但他送客三桥后依恋山水，迟迟不归，在山童催促下才匆匆上马赴约，真情流露，他终究是被泉石之好、被贵筑风光俘获了内心。

五百多年来，贵阳城伴随历史发展几度风云变幻，头桥、二桥、三桥虽早已不是昔日模样，但除通济桥改为头桥外，二桥、三桥古地名却完整地保留下来，它们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和贵阳的变迁。桥下之水自北向西，自西入城，最终汇入护城的南明河中，任时光轮换，河道几百年奔流不息。头桥原有专为行人迎送所设的亭子，名“山溪一曲亭”，贵阳人陈文政曾在桥柱上题有一联：“送别河头，说道一声去也，叹万里长驱，过桥便入天涯路；迎来道左，盼将今日归哉，喜故人见面，执手还疑梦里身。”对人生聚散、运道无常，阳明先生昔日送友至二桥、三桥，其中真情不舍，置身同一片山水之间，应是古今同感。

今二桥转弯塘路侧建有一亭，亭中有碑，书曰“卢焘先生遇难处”，记述了贵阳解放前夕一个感人的故事：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国民党人谷正伦率旧省政府西逃，邀请早已隐退的军政界耆宿卢焘出面维持治安。谷正伦走后，国民党八十九军接替贵阳防务，军长刘伯龙将卢焘骗至二桥杀害。谷正伦在晴隆得知后，感叹“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遂设计诱杀了刘伯龙。心存大义，快意恩仇，此等友谊，亦属人间一流。

民国时期，贵阳民间诗人聂尊吾曾作诗云：“积阴呼放晴，喜得一日假。西出第二桥，傍入山水罅。嵌空楼三楹，梅花绕其下。凡木罹兵劫，独得斧斤赦。年年逢花时，不阻游客驾。近年来差池，强半已凋谢。梅性本高洁，繁华甘避舍。宁随桃杏辈，红紫斗嫣姹。主人惠款客，行厨事燔炙。菽椒真有味，村沽不论价。传烽幸未及，行乐乘此暇。尽许迟迟归，金吾不禁夜。”可见民国时期的三桥还可赏梅，桥头溪边，年年花见，及时行乐，诗人对所行所见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想当年王阳明和他的学生们骑着马去送客人，沿途必是一路好风光，与友人学生侃侃而谈，回忆讲学盛况，寄望学生们树立正确的功名观、人生观，真正践行知行合一。



## 秋游翠微园

谪居贵州的第二年，王阳明已从贬谪龙场的沉痛打击中恢复过来，心态逐渐达观随寓，与黔中文化名人、官员的往来也逐渐多了起来。其间，他多次受邀来到贵阳城，一边讲学，一边观光游历，足迹遍布贵阳城里城外。其中，南庵就是王阳明多次游历的古迹名胜。

南庵，即今贵阳翠微园，位于风景优美的南明河南岸，紧邻贵阳地标性古建筑甲秀楼，约始建于明代宣德年间（1426—1435年），初名南庵，此后在历史的变迁中数易其名。正德年间王阳明居黔时期称为南庵，后改名为圣寿寺，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当时南庵周围山峰耸立、群山环绕，又有南明河自西而来，于南庵之北，回环漾绕。南庵园内生长着丰盛的草木，翠绿清幽，景色十分怡人。很多游人赞誉：贵阳诸寺之中，山水景致最佳的，莫如南庵。明嘉靖年间，巡按贵州监察御史胡琼将其改名为武侯祠，旨在祭祀诸葛亮。据传，诸葛亮在贵阳留下众多足迹，明清两代贵阳的一些政要出于对诸葛亮的敬佩，便在贵阳建武侯祠以祀之。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张献忠部将孙可望驻贵阳，将武侯祠迁至别处，改建为观音寺，供奉观音菩萨。清道光年间《贵阳府志》记载，南庵景色极佳，寺内增设了许多园林景致，可谓“琳宫璀璨，云木萧疏，山光水色，晴雨皆宜”，堪称贵阳市的“南郊胜境”。因寺内有千佛铜塔，故又有“万佛寺”之名。清道光八年（1828年），著名的大学者、云贵总督阮元驻节贵阳，尝登阁游息览胜，倚栏眺望，勾留清景，遣兴吟咏，并挥毫染翰，题写“翠微阁”三个大字，横额勒石。于是南庵改名为“翠微阁”，改名后更是声名鹊起，声誉倍增，从此成为贵阳最受青睐的风景名胜。民国时期逐渐破败，阁中明代铸造的千佛铜塔，抗日战争初期还存在，之后下落不明。至1990年，贵阳市政府拨款大规模修复拱南阁、“澹花空翠”园林、

翠微阁、龙门书院，并广植花草树木，翠微园才正式对外开放。

明清以来，南庵就是贵阳享负盛名的游览胜地。最初或仅是山寺，后经不断扩建与发展，现今形成的翠微园占地 4000 多平方米，已成为贵阳市一座规模较大的古建筑群，内有拱南阁、翠微阁、龙门书院三座阁楼书院，都各有乾坤，内涵十足。

拱南阁，相传为南明孙可望建，始建于永历九年（1655 年），高约 20 米，白墙青柱，飞檐翘角，金匾高悬，气势不凡。据说孙可望与李定国等率大西军余部南下攻占云贵一带，改投永历政权。后见南明王朝大势已去，孙可望有了自立为王的野心，命部将武侯祠迁至贵阳南明河北岸，并修建了拱南阁，意在“与北方清廷对抗，拱峙南方”，欲在此登基为王。阁内大梁上至今还保留着“永历己未孟秋月吉旦，火器营都督同知高恩建”的题记。

翠微阁，始建年代不详，坐落于拱南阁左侧的澹花空翠园内，造型古朴典雅，前临南明河，后枕小山，依岸邻水，灵秀飘逸。清代知府汪炳璈曾给翠微阁题联：“半面山楼，半面江楼，书画舫容我掀髯大笑，邀几个赤松、黄石、白猿来，一评今古；数声樵笛，数声渔笛，翠微天尽它拍手高歌，听不真绿水、明月、清风引，万象空蒙。”汪炳璈善工诗画，联语尤精，每到一处均有题咏，盛享“风流太守”之名，于是翠微阁也有了“半面山楼，半面江楼”之美誉。

龙门书院，建于明代，初为武侯祠，后为祀奉勤政爱民的贵州巡抚刘荫枢而更名为“刘公祠”。刘荫枢是陕西韩城人，“鲤鱼跃龙门”的典故便来自韩城，龙门二字，寄予了贵阳学子有朝一日能像鲤鱼跃龙门一样，高中举人、进士的美好愿望，故称为“龙门书院”。如今的翠微园，已是繁华喧嚣的城市中一处大隐隐于市的清幽园林，集寺、祠、园景于一体，既承载着贵州 500 多年的历史文化，又展现出江南园林动静相宜的雅韵风光，一直吸引着后人前来访古探幽。

而南庵的雅韵风光，王阳明在贵阳讲学期间也早有耳闻，授课闲暇时，他多次与友人一同游览，登临远望，抒情畅怀，留下《南庵次韵二首》《徐都宪同游南庵次韵》两篇著名诗篇，从此也让南庵美誉更增。王阳明写下的两首诗，

生动地描写了南庵周围的山林美景，前者是秋日抒怀，后者是夏日游览赏景。阅读这两首诗，可以领略南庵在夏日与秋天的不同风光，同时体悟王阳明不同时节同游一地的心胸情怀。

《南庵次韵二首》组诗，诗云：

隔水樵渔亦几家，缘冈石路入溪斜。  
松林晚映千峰雨，枫叶秋连万树霞。  
渐觉形骸逃物外，未妨游乐在天涯。  
频来不用劳僧榻，已僭汀鸥一席沙。

斜日江波动客衣，水南深竹见岩扉。  
渔人收网舟初集，野老忘机坐未归。  
渐觉云间栖翼乱，愁看天北暮云飞。  
年年岁晚长为客，闲杀西湖旧钓矶。

组诗第一首写于正德四年（1509年）秋，诗中描绘了王阳明秋日登高远望的所见所感。他沿着山石一路缘溪而上，看到近处的松林层林尽染，远处的峰峦连绵起伏，在秋雨迷蒙中一望无际。“枫叶秋连万树霞”，火红的枫叶与天边火红的晚霞连成一片，不知是枫叶染红了天际，还是晚霞染红了枫叶，王阳明生动地描绘出秋日枫林与天色相连的壮美之景。看到如此壮阔的景观，王阳明感到自己的贬谪之忧、生活之困，仿佛烟消云散。他于是感慨：“渐觉形骸逃物外，未妨游乐在天涯。”自贬谪贵州以来，他几经生死，早前虽抑郁低迷，如今已参透生死，荣辱皆忘，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他的心境如同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言：“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当王阳明看破物身之障碍，摆脱物欲之限，他也逐渐找到自己精神自由的彼岸，从心所欲。所以在看到南庵美景之时才能忘却世事荣辱，表现出悠然自在的心态。这也从侧面烘

托了南庵此地的风景之美，古木参天，竹林摇曳，晚霞暮色，山峰逶迤，渔家唱晚，飞鸟归巢。如此壮阔优美的自然之景，令几经生死的王阳明也抛却世事纷扰，忘却荣辱，心胸豪迈，排遣烦恼，乐以忘忧。

组诗第二首王阳明则笔锋一转，情绪低回，相比起前一首组诗的旷达飘逸，这一首则转而沉重起来。诗中他写自己看到斜阳映照江波远客的衣衫，打鱼的人收网归家，天边暮云翻飞，归鸟扑扇着翅膀，目睹此景，王阳明陡生思乡之情，心中泛起愁绪。诗末“年年岁晚长为客，闲杀西湖旧钓矶”一句则暴露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身处贬谪之地，虽有好友相伴同赏南庵美景，但内心中的思乡之情还是不时地会涌上心头，眼前的暮江之景，泛起的心头情绪，让他思念起故乡。也从侧面反映出王阳明贬谪期间，长年异乡为客的忧愁心境。

此外，王阳明在南庵还作有一首《徐都宪同游南庵次韵》，诗云：

岩寺藏春长不夏，江花映日艳于桃。  
山阴入户川光暮，林影浮空暑气高。  
树老岂能知岁月，溪清真可鉴秋毫。  
但逢佳景须行乐，莫遣风霜着鬓毛。

《徐都宪同游南庵次韵》一诗以生动的笔触，勾画了南庵附近夏日优美的景致。首联“岩寺藏春长不夏，江花映日艳于桃”，巧妙运用对比，描写了岩寺的清幽仿佛春天永驻，与外面早已进入盛夏的气候形成鲜明对比；江上的花儿在阳光的映照下，比桃花还要艳丽，明媚之景令人心情愉悦，此二句也将贵阳夏日凉爽宜人的气候与秀丽的风景展现得淋漓尽致。颔联“山阴入户川光暮，林影浮空暑气高”，通过细腻的光影变化描写，展现了夏日山林的幽静与林间消暑的清幽。颈联“树老岂能知岁月，溪清真可鉴秋毫”，更添几分哲理，老树虽不能言，却见证了无数岁月的流转，清澈的溪水如同明镜，映照出秋毫之末的细微。尾联“但逢佳景须行乐，莫遣风霜着鬓毛”，则充分体现出王阳明虽然被



贬但是依旧旷达乐观的心境。他说面对如此美景，应及时行乐，珍惜当下，莫让风霜染白了鬓发，留下遗憾，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王阳明在贵州的生活和思想。整首诗情景交融，意境深远，读来令人心旷神怡。

距翠微园不远，还有贵阳市著名文化地标——甲秀楼，是中国九大名楼之一，取自“科甲挺秀，人才辈出”之意，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矗立在南明河之上已经400多年。甲秀楼分上下三层，均以白石为栏，层层收进，由桥面至楼顶高约20米；南明河从楼前流过，汇为涵碧潭；楼侧由石拱“浮玉桥”连接两岸，桥上有小亭名“涵碧亭”，从远处眺望，半圆形的桥孔与它在水中的倒影合在一起，刚好是个正圆；桥、亭、楼的影子一齐倒映在水中，恍恍漾漾，给人以“镜中景，水中楼”的朦胧感觉。甲秀楼整体朱梁碧瓦，三层三檐四角攒尖顶，飞甍翘角，石柱托檐，这种构造在中国古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甲秀楼内外联匾诗碑、名家书画甚多，其中尤以清代贵阳翰林



甲秀楼

刘蕴良所撰 206 字的长联最为引人注目，这也是楼以文奇之处。全联气势磅礴，字字珠玑，概括了贵阳的地理形势，凝结了贵阳的历史文化，堪称一绝。

如今，经过城市景观规划，翠微园并入甲秀楼景区，与浮玉桥、甲秀楼主体建筑等串成一线，形成集寺庙、园林、古建筑于一体的独特文化景观。甲秀楼景区白天是闹市中的清幽之地，入夜后灯火辉煌，成为贵阳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会处，昂扬着“甲秀天下”的精神风貌。

## 叁 “三人坟”

三人坟，位于今修文县西北谷堡乡哨上村蜈蚣坡，为王阳明贬谪龙场期间为三名陌生吏目所垒坟茔，封土高 1.6 米，直径 3 米。在这座特殊坟墓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以及一篇流传千古的祭文。

正德四年（1509 年）七月，王阳明抵任龙场驿丞已一年有余，在此期间，他在贵州经历了绝粮之困，收获了安氏馈赠，通过自己书信斡旋劝诫而平息了地方土司的一场混战，他在为水西象祠作记文章里大彰人性之善，直言“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更在一宵大悟圣人之道时手舞足蹈，念念有词“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成为贬谪龙场的高光时刻……但最令其欣慰的，想来必定是“知行合一”教化一方的讲学事业。从遭贬贵州不能“致君行道”而转向讲学传道的“觉民行道”，王阳明始终将儒家“仁”的思想渗透到个人的生命实践之中。他往返于贵阳与修文的两大书院之中，与诸生郊游论道，与友人切磋琢磨，他似乎已经适应了贵州的日常生活，也找到了生存的意义。然而，一切的宁静最终还是被打破了，王阳明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感伤之中。

一个下着秋雨的黄昏，三名来自京城不知要前往何地赴任的吏目途经龙场驿时，被安排投宿在离王阳明住所不远的一户百姓家中过夜。王阳明本来计划第二天再向吏目打听一些关于京城的近况，可他还没来得及与之见面交谈，吏目三人在第二天早晨便早早启程离开，后来接连听到的却是吏目与随行的儿子、仆人相继殒命于蜈蚣坡的消息。同是天涯沦落人，王阳明万分感伤，不忍见他们暴尸荒野，于是叫上两名仆人一同前往蜈蚣坡，就地埋葬了客死异乡的吏目三人，祭奠一番后，为他们撰写了一篇感动千古的祭文——《瘞旅文》。王阳明于此文记事抒情，将儒者悲天悯人的精神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后人遂将此地称为“三人坟”。

《瘞旅文》开篇道明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吏目三人死亡的悲惨经过：“维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仆，将之任，过龙场，投宿土苗家。予从篱落间望见之，阴雨昏黑，欲就问讯北来事，不果。明早遣人视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来，云一老人死坡下，傍两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伤哉！’薄暮复有人来，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叹。’询其状，则其子又死矣。明日复有人来，云见坡下积尸三焉。则其仆又死矣。”在文言文习惯中，秋月即七月，所以这件事发生时间大致是正德四年（1509年）农历七月上旬。

蜈蚣坡的三人坟位置距当年王阳明常住的龙冈书院约有二十里路，即便当年他们走小路抄近道也要花费不少时间。王阳明与两位仆人带上简陋的农具，依照地势挖坑将三人分别埋葬，又以鸡、饭三盂对三人进行一番祭奠，方才开始正式的祭告。他在第一段祭词中说，“呜呼伤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吾不知尔郡邑，尔乌为乎来为兹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吾以窜逐而来此，宜也；尔亦何辜乎？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王阳明先是自我介绍，说他是龙场驿丞王守仁，和吏目一样来自中原，他不明白吏目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山中做鬼。因为古人不轻易离开自己的家乡，外出做官也不会到千里之外。这是传统农业社会安土重迁、浓厚的故土意识的真实写照，在户籍制度极为严格和交通极其不便的古人生活中，人们若非经商做官，或无战争和自然灾害等社会自然因素的驱使，无数普通人会世代繁衍生息在固定的地方，即便做官也不会去千里之外。而从对父母长辈的尽孝道出发，也会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俗定观念，“禁锢”着人们远行的脚步，所以王阳明对吏目的到来表示疑惑。

基于这样的文化伦理，王阳明继续发出悲叹：“尔诚恋兹五斗而来，则宜欣然就道，乌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盖不任其忧者？夫冲冒雾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厉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



三人坟

死乎？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谓若是其速，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尔奄忽也。皆尔自取，谓之何哉！”即如果吏目是因“恋五斗”而千里赴任，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便应是“欣然就道”，志在远方，乐观积极地完成漫漫行役，但王阳明又分明于前一日看见了吏目“容蹙然”。即吏目对前路的忧虑，这是一种对人生不自由、不自主的局促和无奈。因此，王阳明更加为吏目带着儿子、仆人千里赴任生出无限的悲哀和同情，这是儒家对弱者别无选择的哀悼。

可见，王阳明笔下的吏目是一个矛盾体，他的选择和结局既违背了家庭伦理的“故土意识”，又没有实现好男儿志在四方、守护边疆、保家卫国的社会理想，所以这一层的悲悯是对当时这样一类群体而抒发。王阳明其实也属于这个群体，言：“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二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王阳明自白来到龙场两年，能够历经瘴毒侵袭而幸免于难，是自己“未尝有一日之戚戚”，是强大的心态支撑着他。

接着，王阳明缓缓道出自己为此吏目三人垒坟的原因：“吾念尔三骨之无

依而来瘞尔，乃使吾有无穷之怆也。呜呼痛哉！纵不尔瘞，幽崖之狐成群，阴壑之虺如车轮，亦必能葬尔于腹，不致久暴露尔。尔既已无知，然吾何能为心乎？”异乡吏目三人一日之内相继离世、暴尸荒野，无论古今都是一个极具视觉冲击和极易引发情感共鸣的悲凉事件。王阳明就当时野外环境假设了他若不埋葬三人的结局，如果不将三人埋葬，那山间的成群的狐狼豺豹、大如车轮的巨蛇等各类野兽毒虫便会将三人的尸体分食殆尽，他们最终不仅客死他乡，而且还会尸骨无存。这种可以预见的结局，对自古以来注重逝者要落叶归根、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种会加重悲凉的程度。

最后，王阳明以略带安慰和自嘲的口吻结束了这篇祭文的悲情宣泄，完成了个人达观自适的形象塑造。他进一步告慰三人亡灵：“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宫？魂兮魂兮，无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与尔皆乡土之离兮，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兹兮，率尔子仆来从予兮。吾与尔邀以嬉兮，骖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乡而嘘唏兮。吾苟获生归兮，尔子尔仆尚尔随兮，无以无侣悲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离兮，相与呼啸而徘徊兮。飧风饮露，无尔饥兮；朝友麋鹿，暮猿与栖兮。尔安尔居兮，无为厉于兹墟兮。”他反观自我，觉得自己和吏目一样，远离家乡，语言不通，也不确定自己能活多久，于是自嘲说如果自己同样死在这里，就让吏目带着儿子仆人来与他共处，大家一起嬉戏遨游，登高瞭望远方的故乡。如果自己活着回到家乡，吏目在此也还有儿子和仆人相伴，让他不要因为缺少朋友而悲伤，路旁的坟墓一个接一个，他们大多也是来自中原的游子，大家也可以一同呼啸徘徊，餐风饮露，白天与麋鹿游玩，夜晚与猿猴栖息。安心在这里，不要去害人的厉鬼。此番表述是对吏目魂魄的安慰、劝诫，对个人生死的展望与剖析，以及达观随寓的精神写照。

此外，这段祭词还让我们洞悉了王阳明关于生死的一番见解，即活着要做个积极向上的君子，逝去则不要成为害人的“厉鬼”，而要做个自足的“快乐



鬼”，遨游驰骋，餐风饮露，甚至在“鬼的世界”呼朋唤友，与万物生灵同频共振。这是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境界的再次提升。王阳明的悲悯不仅限于死去的吏目，他希望吏目做个“快乐鬼”，而不是变成“厉鬼”去惊扰龙场百姓。这不仅体现了对逝者的仁心，更展现了对生者——龙场百姓——的满满善意。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释、道三家多少都会有关于“鬼神”的讨论，甚至他们都承认鬼神存在，只是都不以之为本，而是将其视为宇宙中的一种特殊的生命现象。作为儒释道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对儒家的鬼神观有一定的发展，他将鬼神视作良知的造化，他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并认为人为“天地之心”，言“天若没有人之灵明，则无以仰其高；地没有人之灵明，则无以俯其深；鬼神没有人之灵明，则无以辨其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王阳明埋葬三人，是良知之举，亦是存理去私的仁爱之举。

一百多年后，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叔侄在整理《古文观止》时将此文收录其中，并于文末附评：“先生罪谪龙场，自分一死，而幸免于死。忽睹见三人之死，伤心惨目，悲不自胜。作之者固为多情，读之者能无泪下？”其中“伤心惨目”一语，品评最为切当，既可指王阳明面对吏目三人尸体的伤心惨目，也是后代读者阅读此文所产生的共鸣。而清末民初王文濡则在其《宋元明文评注读本》一书中评：“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吊死哀生，不胜狐兔之感。”

后世诸多学者在阅读整理王阳明著述遗集时，还多以眉批、夹批的形式在古籍书页上留下评注。如万历年间年李贽辑录《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在《瘞旅文》篇末评：“不动心是先生一生学问。此文流连反复，不免咨嗟。侘傺之音，殆当境者情不自禁耶。于此，盖叹学问之难。”即言王阳明与吏目在面对同等至暗人生处境，以“未尝一日之戚戚也”迎来人生转折。再如崇祯年间施邦曜在整理《阳明先生集要三编》时，对此文评价以“读之令人哀感百集，读

到‘未尝一日之戚戚’，又令人忧思顿忘”。清道光年间李祖陶选辑《王阳明文选》七卷时，更是对此文细评入微。评王阳明所言“吾与尔犹彼也”乃“一语入骨”，认为文章的感人悲凉处在于“通篇以己合讲、总在插入自己，遂生出无端感怆，无限悲伤歌辞，濠宕悱恻，足以贯金石而泣鬼神”。感慨王阳明所唱第一段祭词“似东坡行儻、琼间时”。清乾隆间理学家罗有高读康熙年间俞麟辑录的《王阳明先生全集》中收录的此篇时，题眉批“文极怆惋，歌更高雅，仁心达观”。

还有人说，《瘞旅文》是王阳明的“心学之眼”，他于此间展现了因破除有待而“达观随寓”；已悟入心体，遂“未尝有一日之戚戚也”；持一体之仁，故对自己的小书童说“吾与尔犹彼也”，认为他们一行与吏目三人是一样的。诚然，王阳明在此文中所描写的吏目的种种处境，多数是就自己入黔两年以来切身经历有感而发，所以他能用丰满深厚的情感世界，以儒者悲天悯人的精神传统，以万物一体之仁的大人胸襟，层层剖析逝者的不幸与苦难，从而表达自己感同身受的同情与哀伤。但王阳明并不只就凄惨而述悲凉，其中蕴含的达观随寓、仁者爱人、敬畏生命、良知良能等思想，才是他留给世人化解苦难的最佳宝藏。

清乾隆八年（1743年），山东通判孙谔因办理公事路过修文，与修文知县王肯谷一道到了蜈蚣坡打听三人坟情况。由于是无主坟，年久无人管理，蜈蚣坡半山腰分三坎埋葬的三人坟已被荒草湮没，只见坟墓及四周被荒草荆棘覆盖，几乎不能辨别，不免感到悲伤。于是，孙谔捐资重新修筑坟墓，还留有一首七言律诗记录了他所见到的三人坟，诗言：

主仆扶男来瘞地，可怜同日葬幽云。  
史书已失三人姓，驿路犹存一尺坟。  
魂叫青枫天欲暮，骨缠白草昼常曛。  
蜈蚣坡下伤无限，痛哭当年《瘞旅文》。

据孙谔赋诗所言，乾隆年间的三人坟已只有一尺来高，后来史书中也没有留下吏目三人的记载。三人逝世时虽被王阳明埋葬，但此时驿路旁边的坟茔只有一尺来高，三人尸骨或早已暴露地表被野草缠绕，被太阳曝晒，他与王肯谷在蜈蚣坡下不免感到伤怀，想起王阳明的《瘞旅文》所记，依然痛哭不已。

乾隆十年（1745年）春，三人坟修缮后增刻碑立于坟头。王肯谷在碑文中自述当选修文知县抵任后，积极询访王阳明谪居修文的相关遗迹旧址，当时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等皆不可识别，只有龙冈书院遗址尚存，于是便请示上级对其进行了重建和扩建。而“三人坟”旧址几次踏勘皆未找到，在陪同孙谔一起拜访“三人坟”后，亦是感慨万千。在孙谔捐资下，对“三人坟”完成合葬重建，并在碑文中明文规定：“命居民封其墓，周围各留空地丈许，不得侵占，更必勒石垂久。”捐资者孙谔对这条规定赞许，言：“必如是，庶可使遗泽不致久而遂湮，且将与阳明书院不朽矣。”

时至今日，三人坟已扩建为“修文县谷堡乡三人坟景区”，这座无名氏的“三人坟”常有人前来祭拜，墓碑前摆满了盆花、野花、香烛、纸钱等祭品。听着景区专职解说人员的生动介绍，人们的思绪恍惚间穿越数百年，共情于吏目三人的遭际，更感动于王阳明的良善与慈悲。

## 贵阳阳明祠

王阳明逝世后，其弟子和文人志士感念圣人教化，纷纷为其设祀建祠，仅钱德洪所著《阳明先生年谱》所载较有名的阳明祀祠，就有十一处之多。全国各地纪念王阳明的场所中，以贵阳阳明祠最具代表性，声名远播。阳明祠坐落于贵阳扶风山麓上的灵秀之地，是贵阳人的精神高地，历经几百年风霜，依旧古韵悠长，文脉汤汤，成为后世缅怀先贤的文明坐标。

闻名遐迩的阳明祠，如今位于贵阳城东扶风山上，景区内除阳明祠外，还有扶风寺、尹道真祠，形成一个整体。据嘉靖《贵州通志》记载，阳明祠最早并非坐落于扶风山麓，而是建于贵阳城中，前身为“阳明书院”。嘉靖十三年



阳明祠王阳明先生朝服大像

(1534年), 监察御史王杏巡按贵州, 外出时却听到有歌声霭霭如浙江乡音。王杏是浙江奉化人, 他好奇地询问士民, 才知道这乡音是王阳明所教。他还发现, 贵阳士民们早已开始自发举行祭祀王阳明的活动。刚开始这些祭祀场所并无定点, 后来人们或遥祭龙场, 或亲赴龙场祭奠。另外, 王阳明在龙场的弟子汤昇、叶梧、陈文学等数十人反复恳请为其立祠, 这些举动让王杏深为感动, 他感叹道: “王阳明教化深入人心。”王杏认为, 如果能在贵阳建阳明祠堂, 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缅怀先贤的愿望, 还可以起到教化的功能。于是王杏顺应民之所请, 赎买贵阳白云庵之址建立阳明书院, 以崇祀王阳明, 训迪黔中士民, 并亲作《新建阳明书院记》以记之。

明隆庆年间, 阳明书院经历了几次改建, 《贵州通志》载: “阳明书院, 原治城东, 嘉靖十四年巡按王杏建, 二十五年巡抚王学益改建于司学右, 因设府, 权为府学明伦堂。隆庆五年, 按察使冯成能建于都察院前, 中为祠, 后为山斗堂, 外为昭代真儒坊。明末复圯。”此外, 巡抚阮文中《阳明书院碑记》也详细记录改建经过: “予奉命抚兹地, 抵祠下, 叹曰: ‘此岂所以妥先生灵者哉?’ 檄司府为改建之。于是方伯蔡君文、宪使冯君成能协其议, 命知府李濮董其役。择军门前左空基为之, 前为享堂, 后为讲堂, 俱六楹。前后为左右房各四楹, 前为二门, 又前为大门, 树桌楔于通衢, 匾曰‘阳明书院’, 未几, 工告成。”至此, 隆庆五年(1571年), 巡抚阮文中、按察使冯成能将王杏所建的阳明书院迁建至贵阳城东抚署左侧, 中为祠, 后为山斗堂, 这也是明代阳明书院最后一次改建。但可惜的是, 世代变迁, 嘉靖年间始建的阳明书院在明末为贼兵所毁, 已在历史的风尘中湮灭, 今已无考, 所以如今坐落于扶风山上的阳明祠乃是后来的迁建。

在清代, 阳明书院经过屡次重建, 后世不断在原址上加以增修, 最终将其迁至扶风山麓。康熙十二年(1673年), 巡抚曹申吉重建阳明书院, 并购书数千卷藏于其中;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巡抚杨雍建再次增修;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 巡抚田雯重修, 增建“合一亭”“传习轩”五楹; 康熙三十一

年（1692年），巡抚卫既齐增修斋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巡抚陈洗亲临书院课士。雍正十一年（1733年），贵州巡抚元展成奉旨将拥有200多年历史的“阳明书院”改称“贵山书院”，并发帑添建学舍50间，亲题“贵山书院”匾额和对联“天地之性人为贵，风雨不动安如山”。贵山书院一百多年间培养了不少的文化名人和文化先贤，如“黔滇第一状元”赵以炯等，成为贵阳学界重要的发祥地。可惜，清嘉庆时期，贵山书院圯毁。嘉庆十九年（1814年），有士绅拟择地建专祠。贵州巡抚庆保在扩建扶风寺竣工后，见有空基，便发动贵阳士绅捐献修建阳明祠。可惜祠堂尚未完工，庆保便被调往广西。五年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在贵州提督学政张轅的努力下，偕贵山书院山长王小亭、正本书院山长贺今甫、正习书院山长傅小泉合力续修。此次续修，阳明祠才迁至扶风山麓，与原本的扶风寺合为一景。

然而世事变迁，阳明祠逐渐破败，至光绪二年（1876年），贵阳名士唐炯、罗文彬来谒阳明祠，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特规模狭隘，久益荒落，祠门倚僧厨左厢，窘于圭窠，院落径丈许，不容于马。祠左屋二楹，限于址，檣木虚其下，若危楼。祠宇五楹，户牖不具，承尘摇落，椽桷欹斜。右偏夹室，山僧穴通庖屋，规其中为谷藏，舂臼簸磨，皆在宇下，罍且尘上，泥户木室，鸟鼠栖焉。”看到圣人门庭如此破败，唐、罗二人以重修阳明祠为己任，捐资重建。唐炯首先捐资扩大地基，再入蜀与四川总督丁宝桢商议筹款。罗文彬负责规划设计、采购材料、组织施工。此次重修工程自光绪三年（1877年）开始动工，直至光绪八年（1882年）才全部完工，历时五年之久，最终使得阳明祠在黔中胜迹中再展风姿。可惜后来世事多变，唐、罗二人的心血毁于战火。在经历多次战祸后，阳明祠屋宇残破，碑刻尽毁。

自20世纪80年代起，贵阳市政府持续加大对阳明祠的修缮与保护。1981年，阳明祠被列为贵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贵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阳明祠维修筹备小组”，开启对阳明祠的维修工作。按照光绪年间唐炯、罗文彬重建的遗构进行修复。经过三年努力，完成主体建筑部分修复，部



分塑像和拓片也得到了恢复。经过历朝历代文人志士的努力与保护，如今漫步在阳明祠庭院、走廊之间，才得以感受到百年文明风韵。

如今绿意掩映下的阳明祠，依山而建，坐东朝西，为四合院结构。东是享堂，占地势的最高一级，也是阳明祠的主体建筑；享堂对面、地势最低一级是正气亭和桂花亭；南北两翼沿墙建廊。进入祠堂，映入眼帘的便是门口的楹联：“道统何殊鹿洞，名山一席，扶风自昔赖先生；文明肇启龙冈，旧迹千秋，化雨犹及施我辈。”言简意赅地赞扬了王阳明的学问旨趣，以及他与贵阳结缘的由来。自龙场悟道以来，王阳明的教化遗泽至今，后人能有机会领略阳明心学风光，全仗此中因缘。也因此，王阳明去世之后，贵阳士民自发祭祀，辗转成就了阳明祠，也成就了扶风山，因此才有“名山一席，扶风自昔赖先生”之说。

阳明祠虽然不大，但文物荟萃。祠中文物大致可分为像、碑、木刻三大类。享堂正中塑有王阳明汉白玉雕像，是其当年谪居贵州的写照，从雕像的坐姿，微闭的双眼，可以感受到当年他静坐领悟“知行合一”心学的神韵。享堂左侧还有两方王阳明线描坐像碑，俱是罗文彬主持修建时，根据祠中原藏卷轴、画册摩刻。大者为朝服像。嘉靖初，因朝中小人作梗，晚年的王阳明受到不公正待遇。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为王阳明平反，明穆宗下诏追封王阳明为新建侯，谥号文成。王阳明恢复名誉后，王氏子孙作此像，祠祀。后《王守仁像》传入贵州。清嘉庆时期，敖芑坪从云贵总督百龄处得到《王守仁像》，放入王阳明祠祠祀。清咸丰时期，此像散失于市肆，由王玥购而复返，黄彭年作志记此事。像中的王阳明身着蟒袍，头戴七梁冠，冠上设有笼巾貂蝉，面目清癯，略带笑意，须髯过肩，左手摸赤带，右手托玉笏。王阳明在世时封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为新建侯，故此像所着为侯服。小者为燕服像。燕服，即今所谓休闲服。燕，通“宴”，安闲、安逸之义。像中王阳明神情安详恬淡，双手合拱于大袖中，身体微微前倾，似在家中与门生闲谈。此像或为王阳明生前其弟子蔡世新所作，深得王阳明本人的认可，其原因一是“立得其真”，最为传神；二是符合王阳明的讲学宗旨。王阳明高倡“良知”，认为人人皆有良知，通

过“致良知”，人人皆可成圣，因此他的学说具有亲近“愚夫愚妇”的平民性。燕服像所展示出来的王阳明，不是高高在上的“新建侯”，而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先生，深契其心，颇具艺术价值。

祠中的碑刻不仅有王阳明手迹，也有后世学子的赞辞、题咏。龛台两边悬王阳明草书自撰联：“壮思风飞冲情云上；和光春霭爽气秋高。”是据阳明墨迹摹刻。龛台左侧有日本国东宫侍讲、文学博士三岛毅诗碑，其诗云：“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冈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在塑像周围还有王阳明弟子及后世学者、文人的赞辞、题咏，小像册页前有莫友芝篆书“王阳明先生遗像”等字，后有郑子尹清咸丰年间所作跋语，考订二像的来源、流传。此外，龛台两侧还有楷书明隆庆二年追赠新建侯的敕文碑，未署“贵筑杜瑞徵捐立。修文袁思辔敬书。光绪七年岁次辛巳仲春月谷旦”。

祠堂的两廊壁上，镶嵌阳明手迹碑刻。计有《矫亭记》，行书；唐寅《十二景文》，行书；《答罗整庵书》，行书；《西湖诗》，行书；正德七年《家书》，行书。王阳明不以书法成名，因此存世书法作品数量不多，但价值极高。从这几方手迹碑刻来看，其水平之高，完全可以跻身于有明一代之大家。故清代朱彝尊称其“诗笔清婉，书法尤通神，足为临池之模范”。手迹碑刻之下是王门弟子王畿、邹守益、钱德洪，侄子王正思，及后学张岱、袁枚、秦瀛、唐仲冕、贺长龄、吴振械、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十余人的像赞，写刻俱佳，是阳明祠珍贵的藏品。

祠堂内左右两壁还嵌有王阳明的《训士四条》和《谕俗四条》木刻拓片。自龙场首创龙冈书院，直至带病抚平思、田之乱，王阳明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讲学活动。《训士四条》“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即为王阳明在龙场讲学时所提出的教学方法总纲。“立志”为立成德之志，“勤学、改过、责善”则为成德之功夫。追求人格的圆满，是王阳明教学的最高宗旨，对我们的现代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谕俗四条》为王阳明平定南、赣寇乱后，教化乡里的总纲。他深刻认识到清剿贼匪只是治标，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对民众进行教化，

令民众心生善念，不为妄动。王阳明的《谕俗四条》是社会治理的宝鉴。

近年来，贵阳市人民政府陆续投入人力、物力、财力，阳明祠不仅得到修复，还增加了部分内部陈列，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景区内一片苍松翠柏，掩映着一群风格古朴典雅的建筑，辟有花圃、绿地，间设石桌、石凳；参天的古银杏、古松、翠柏，清澈见底的放生池等，增添了景区内的清淡、幽雅的气氛，长期吸引着众多的文人雅士到此吟诗作赋。祠内还有古建木雕构件、民间木雕及傩面展，花卉盆景展，琴、棋、书、画活动室，松巖阁、尹道真祠内有品茶室，印社设有奇石展。另附设工艺品、旅游产品、棋牌娱乐、餐饮等服务项目，为游人提供了更全面的服務。游人至扶风山顶扶风亭，可将贵阳全景尽收眼底。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不断修葺、重建的阳明祠，规制齐备，藏书众多，继承了王阳明“龙场悟道”以来的“良知”思想和“知行合一”精神，在明清两代不仅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书院之一，也成为王阳明与贵阳 500 年时空的文明见证，不断流播激荡、绵延赓续心学之光。

## 第六章

# 王学研究 with 回响

### 阳明心学的贵阳声音

500 多年前，明代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默坐澄心，龙场悟道，“阳明心学”由此诞生。王阳明在贵州首论“知行合一”，大启文明教化，广开黔中学智，革鼎千年儒风，培育万民良知，为贵州乃至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500 年后，贵州依然延续着这一条珍贵的文化血脉。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秉承“坚守与传承”的精神，在阳明学研究 with 传播上首开先河：1987 年 7 月，贵阳师范学院发起主办“王阳明学术讨论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王阳明学术讨论会”，引起了省外专家学者的特别重视。之后，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到修文参观考察阳明文化遗迹。从此，贵州及浙江有组织的阳明文化研究活动逐步展开。1993 年

8月15日，贵阳市文化局在扶风山阳明祠举行“阳明祠修复开放暨王阳明像揭幕式”，并召开“王阳明在贵阳”学术思想座谈会。1994年，贵阳成立王阳明研究会，会址设在阳明祠。此次研究会也成为贵州阳明学研究的标志性事件，阳明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上对阳明学说开展研究的场所，许多学术性会议在此举办，揭开了王学研究的序幕。同年9月18日，来自中、日、韩三国的民间阳明学研究者30余人，到修文瞻仰阳明文化遗迹阳明洞、玩易窝，在阳明洞举行祭奠王阳明活动仪式，之后召开为期三天的“阳明心学暨良知工程论证会”，对创办“龙场国际阳明书院”、筹资维修阳明洞古建筑及塑王阳明先生铜像等进行实质性研讨。1995年5月，贵阳王阳明研究会与贵州省政协《文史天地》杂志社共同发起，邀请来访的黔、滇、川中华文化考察团和台湾《黔人》杂志社等单位，在贵阳阳明祠举行“王阳明学术思想座谈会”，海峡两岸同胞学者通过对王阳明学术思想的研讨，达成共识，认同王阳明是海峡两岸同胞共同敬仰的先哲，两岸学者在研究、传承和弘扬阳明文化方面加强了交流与合作，以文化促进祖国的繁荣昌盛。同年11月，贵阳王阳明研究会在阳明祠召开了第二次“王阳明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就王阳明的学术思想，特别是他被贬谪到贵州的情况进行了研讨，有学者用翔实的资料论证了王阳明贬谪赴黔，在黔东南、在龙场、在贵阳的行踪，纠正了一些资料的谬误。1996年7月，由贵州省政协牵头、联合省内外10多个单位共同举办的“中国贵州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贵州省政协会议室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同年11月，由修文县阳明学研究会引进日本将来世纪国际财团捐赠的王阳明先生铜像在修文阳明洞落成，举行了“王阳明铜像揭幕仪式”，著名国际阳明学研究大师、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和日本著名企业家矢崎又次郎、矢崎胜彦等日本友人专程从日本到阳明洞参加揭幕仪式，贵阳市相关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揭幕仪式，并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祭奠王阳明活动，成为推动贵州阳明文化走向世界的学术

标志。

此后，围绕如何打造阳明心学品牌，提升贵州阳明心学地位和影响力，贵州积极探索相关举措。1999年10月，在阳明洞举行“王阳明纪念馆落成暨开馆仪式”，纪念馆内布置“王阳明在贵州”大型陈列展览，多角度、多层次展示王阳明业绩。同年10月14日，由贵阳市政府、市政协、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单位联合在修文举办了第一届“国际阳明文化节”，深入探索和研究阳明心学的丰富内涵与时代意义，吸引了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进一步提高了阳明文化知名度。此后，阳明文化节成为贵阳市打造阳明文化城市名片的重要举措。2002年10月18日，修文举办第二届“国际阳明文化节”，并在王阳明纪念馆召开“王阳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9月14日，修文举办第三届“国际阳明文化节”，本次文化节，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瑞典、巴西、新加坡等国的专家学者共200余人，当地群众8000余人参与，专家和来宾探讨了王阳明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国际著名学者大师杜维明、成中英等人在“良知与和谐社会”高端论坛上做了重要演讲，不仅使贵州成为阳明学研究重镇，进一步提升了修文作为心学发端地的国际地位，更从专家学者到平民百姓进一步延伸了阳明文化的影响力，提升了贵州阳明心学的国际传播力。至今，修文共计举办六届中国·贵阳（修文）国际阳明文化节，期间建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阳明文化园，先后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参会，其中不乏杜维明、汤恩佳、成中英、矢崎胜彦、张立文、陈来、杨国荣、郭齐勇等国内外知名王学专家。每一届阳明文化节都亮点频现，取得丰硕成果。无论是举办规格，还是影响力、各界人士的参与度，贵阳举办的阳明文化节都实现了一届比一届办得好的目标。以阳明文化节为载体，贵阳还先后举办了“良知与和谐社会”“王学千古光”等高端学术研讨会，搭建了阳明文化研究、交流的高端平台，让阳明心学成为贵州最重要的文化名片。

在城市文化精神建设上，贵阳将“知行合一”实践思想纳入“贵阳精神”

首位，以知行思想引领城市生态文明建设。2008年，中共贵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府在《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贵阳精神，把阳明文化融入城市精神中去。贵阳市委将“知行合一”作为贵阳城市精神的一部分，正是在借用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思想内核和积极因素的基础上，赋予时代基础内涵，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贵阳在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过程中，重视阳明文化的历史作用，这是富有历史文化眼光的重要举措。此后，贵州在加强“知行合一”“致良知”思想的引导上还做了很多工作：2008年10月，由贵阳学院主办，阳明学与地方文化研究中心承办，举行“纪念王阳明龙场悟道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德国、韩国的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还举行了“《阳明先生集要》点校本首发仪式暨王阳明铜像揭幕仪式”。2012年3月，修文阳明文化研发中心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节目，包括乐队表演、编排舞蹈、祭祀歌曲、诗文朗诵等，在阳明洞隆重举办了“王阳明诞辰540周年祭奠活动”，并同期举行了研讨会，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在城市建设上，修文从2016年起积极探索并大力实施阳明文化“九进”工程——进机关、进农村、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部队、进景区、进家庭、进商铺，通过全面推进，在修文随处都可以看到明阳文化的相关符号：或巨幅墙绘，铺展在青山绿水间的民房墙上；或小小的阳明文化读本、绘本，摆放在读者的案头，潜移默化，浸润一方。围绕阳明文化，全力打造修文县阳明洞、花溪区孔学堂、云岩区阳明祠“三足鼎筑”核心文化平台。贵州省“十三五”时期文化建设中，加强对阳明洞、玩易窝等阳明文化遗迹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以阳明文化引领旅游发展，建成了集养心养智、避暑休闲、康体运动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成为贵州文化高地。坐落在云岩区的阳明祠，于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举行“走进阳明祠良知行——云岩阳明文化接力”系列活动，把阳明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在市民中接力传递“良知”之道。2013年成立贵阳孔学堂，为贵州国学传播树立了新标杆，也为阳明文化的普及教化提供了新

平台。贵阳孔学堂更是本地家喻户晓的传播阳明文化的精神殿堂。通过搭建平台、举办系列活动，贵阳丰富了“知行合一、协力争先”城市精神的内涵，发掘、传播、推广了阳明文化，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中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贵阳将阳明文化融入“一圈两场三改”规划中，充分运用“诗画”等表现形式，让阳明文化元素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

在学术研究格局上，高校共建了学术交流大厦。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阳学院等高校，均有专门研究阳明学的机构，以张新民、余怀彦、王晓昕、赵平略、龚晓康、邓国元、张明为代表的专家学者，相关的学术成果不胜枚举，积极推动着阳明学研究发展。早在2002年，贵州大学就设立了中国大学中最早的书院之一——“中国文化书院”，又相继成立了“阳明学研究所”“贵州地方文献研究所”“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等专门机构，将阳明学研究作为重要的基础课题，将不同高校的研究人员汇集到一起。2005年，贵阳学院挂牌成立“阳明学与地方文化研究中心”，下设9个研究所。2014年，“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成立，由贵州师范大学牵头，在贵阳孔学堂设立“阳明大讲堂”。2015年，由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与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中国阳明文化园合作共建的学术研究交流平台——“阳明学研究中心”——与世人见面，这也是贵州首个与浙江省合作共建的学术交流平台，吸纳了国内多位知名王学研究专家。研究机构将学者们聚在一起，提供了许多学术交流的机会，成果迭出。在2004年，由张新民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阳明学刊》第一辑面世，该学刊设有“王阳明研究”“儒家思想研究”“儒学与现代性研究”“佛学与中国文化研究”“近现代典籍与人物研究”“商榷与讨论”“文史考证”等7个栏目，以阳明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也兼顾国学的方方面面。而贵阳学院成立的“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也出版《王学交流》学刊，同样吸纳了不少学者的学术观点。此外，张新民主编的《阳明精粹》、余怀彦主编的《王阳明与贵州文化》《王阳明的五百年》和吴雁南主编的

《阳明学与近世中国》等著作，都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文化传播上，由贵州省、贵阳市倾力打造的多功能、复合型、地标性文化高地——孔学堂，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创新的传播手段，在推动阳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果。从第一场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开讲至今，孔学堂累计举办公益讲座超过 1000 场，成为全国坚持时间最长的文化公益讲座品牌，线上线下累计听众逾 500 万人次。开讲 11 年来，邀请了许嘉璐、王蒙、单霁翔、刘兆玄（中国台湾）、杜维明（美国）、辛正根（韩国）等一大批世界各地、学养深厚的海内外专家做分享，呈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景象，还先后推出“阳明文化”“考古文化”“游于艺”“贵州历史文化”“乡土中国”“生态智慧与生态文明”“美学漫步”“走进博物馆”“文化传播与文化遗产”“民俗与传统”等 25 个主题系列讲座，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许；并持续完善扩充“云学堂”，通过线下线上、直播现场等方式，为喜欢传统文化的贵阳市民、学子和游客提供了便捷、高效、不受限的爽心文化体验。此外，孔学堂通过常年举办公益讲座、教育培训、学习体验、民俗文化活动、入驻研修、课题招标、会议研讨、合作交流等形式，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研究、传播推广、普及应用和创新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业内专家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一致肯定。连续两年在《光明日报》推出阳明文化年度十大热词，连续 6 年与武汉大学共同出版《阳明学研究》，连续 6 年发布《阳明学研究年鉴》，孔学堂已经成为贵州省的人文地标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成为全国阳明学研究和传播的高端平台。

在出版成果上，亮点纷呈、成果丰硕。近年来，贵州省加大了阳明文化研究、转化和传播的力度，全方位地推进阳明文化的传承、研究和普及，其中最引人瞩目、最具代表性的工程便是《阳明文库》。2019 年，孔学堂书局在贵州省委宣传部的指导和贵州省孔学堂基金会、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的支持下，启动《阳明文库》的策划、编辑、出版工作。《阳明文库》

的编纂邀请了众多海内外学术精英参与，阵容堪称“豪华”：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清华大学人文资深教授陈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陈祖武——这四位顾问赫赫有名；郭齐勇、顾久、杨国荣、吴光、张学智、吴震、何俊、姚新中、张志强等一众委员，也都在列，国内外阳明学研究精英的加入，让《阳明文库》出手不凡。该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由五个部分组成：一是出版海内外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阳明学及阳明后学的研究著作；二是出版阳明学及阳明后学古籍善本、孤本的影印本；三是出版阳明学及阳明后学优秀历史文献的点校本；四是出版阳明文化的两创类图书（含学生、市民读物）；五是实现阳明文化的数据化工程。通过普及读本和数据化工程，让阳明心学的精神财富可以穿越时空，流传后世，惠及大众。作为集学术上的权威性和规模上的唯一性于一体的现象级新时代出版工程，《阳明文库》在全国出版界和学术界备受瞩目。此外，在古籍保护与文脉传承上，为持续保护好、传承好和利用好王阳明馆藏文献典籍，贵阳市委、市政府于2015年批准成立阳明文化（贵阳）国际文献研究中心，聚焦阳明文化文物文献，搜集、整理、校编了海内外大量阳明文献，在全国图书馆系统的12家图书馆普查王阳明文物文献，并对国家图书馆馆藏166种文献典籍进行高仿复制，其中绝大多数古籍文献系500多年来首次公开。出版《王阳明馆藏文献典籍普查、复制和研究丛书》《王阳明研究文献索引全编》（10卷）、《王阳明研究重要文献选编》（53卷）、《跟王阳明学修心》和《王阳明诗集全编》等著作。同时，创新新时代古籍整理工作模式，研发王阳明馆藏文物文献可视化智能编校平台，高效利用数字化智能技术，解决古籍校勘工作的难点，开展166种2100万余字王阳明文献典籍的线上点校，完成《王阳明馆藏文物文献全集》（600卷）的智能化研究、编纂、排版和付印。丰硕的出版成果，为推进贵阳打造阳明心学研究新高地夯实了文化基础。

王阳明悟道在修文、成道在修文，阳明文化已成为贵州乃至世界的文化财



富。多年来，贵阳市一直致力于挖掘厚重的心学资源，研究、传播和弘扬阳明文化，讲好阳明故事，实施一系列活动举措，打造阳明文化这张亮丽的城市文化名片，让阳明文化成为城市发展的最强音，使阳明心学精神融入社会生活，走进千家万户，成为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城市发展动力，推动文化强省建设，奏响贵州华美乐章。

## “四大文化工程”之阳明文化转化运用

贵州历史悠久、文化多彩，拥有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以不同方式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文化百花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年来，贵州在顶层设计上不断深耕发力，统筹推出一系列重点文化工作举措，“多彩贵州”文化名片日益擦亮，文化影响力日益扩大。

2023年10月，贵州省委宣传部重磅发布多彩贵州重大文化工程，明确大力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遗产弘扬、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四大文化工程”。“四大文化工程”从高质量开展文化研究阐释、推进文化保护与传承利用、提升展示展陈水平、集成出版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开展文艺精品创作、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推进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传播推广、推进文化队伍建设9大方面，系统科学制定了“四大文化工程”的128项重点工作举措。其中，在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上，强调重点把阳明文化作为贵州人文精神的宝贵财富，深入开展挖掘整理、研究转化和传播推广，擦亮贵州作为阳明心学诞生地的文化名片，打造阳明文化高地。把阳明心学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组织开展好共产党人“心学”研究。为此，将编制实施《阳明文化保护利用总体规划》《促进阳明文化保护利用实施方案》，开展阳明文化遗产资源调查摸底、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强化应用性研究，系统梳理贵州阳明文化遗址遗存、发展情况等，加强阳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组织实施好阳明洞文物保护修缮工程，优化提升阳明文化系列陈列展览。在贵州省图书馆专辟“阳明书阁”，丰富阳明文化图书馆藏。加强与浙江、江西等省份协作，组建阳明文化旅游联盟，指导贵阳市将阳明祠、甲秀楼、阳明洞等联动，打造阳明文化主题精品旅游线路。在全省打造“阳明·问道十二境”经典游学线路，加强阳明文化培训课程设计，创新开发阳明文化研

学、培训和体验度假业态，推进阳明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活化阳明文化传承，贵阳市百花齐放，全链发力，不断推陈出新，打造“阳明 IP”应用场景。2015 年 12 月，由中建四局出资赞助，贵州师范大学、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联合打造的原创话剧《王阳明》精彩上演。这是国内首台表现王阳明人生经历的话剧，历时 8 个月精心排演，通过几个特定的历史场景，将王阳明龙场悟道的经历精彩展现。2021 年，结合传统中式美学与西方戏剧手法，贵州省话剧团与浙江话剧团联袂打造的话剧《此心光明》，展现一代圣贤王阳明波澜壮阔的一生，作为 2021 年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的压轴大戏，在贵演直播和新华网直播两大平台同步直播，吸引 50 万余人次在线观看。之后在国内演出过百场，受到各地观众及专家的一致好评，曾获 2017 年度贵州优秀文艺作品、第四届丝绸之路艺术节最佳贡献奖、第十四届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2023 年，贵州京剧院以王阳明为主题创排的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道》在广州唱响，首次将阳明文化以京剧的形式进行转化，再现 500 年前的情景，磅礴处气势如虹、婉约处润物无声。不管是舞台的设计，还是管弦乐的加入，特别是服装的全新打造，让观众既享受了新编京剧独有的、全新的感官体验，同时也让观众更好地了解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贵州京剧院副院长冯冠博凭借饰演王阳明一角，摘下第 31 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桂冠。随后，贵州京剧《阳明悟道》走进北京、上海等地巡演，所到之处赞誉声一片，成为业内和票友热议的话题。还有大型原创歌剧《王阳明》、舞剧《王阳明》、正在筹拍的电视剧《阳明传》……现在，阳明文化已成为贵州艺术创作的热门题材。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文艺精品迭出，也让贵州的多彩文化随着王阳明的故事传播得更远。

此外，在王阳明龙场悟道、诞辰纪念等特殊历史节点，贵阳还策划了系列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2018 年，为纪念王阳明龙场悟道 510 周年，在中国·贵阳（修文）第六届国际阳明文化节上举办了“戊戌年祭祀王阳明典礼”，现场有超过 3000 余人参与了祭祀，参祭人员敬献祭祀贡品、花圈，上香、酌酒、诵

读祭文、吟诵《教条示龙场诸生》、跳祭舞《祭心秘境》和《良知之光》，行三鞠躬礼、献花，以示追思阳明、纪念先贤。这些“阳明 IP”活化应用的举措，不断让阳明文化走进大众、贴近大众、浸润大众，“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实际体验感知了解阳明文化的好玩、有趣、有益，成为与老百姓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精神纽带，对涵养广大市民崇德向善文明之风具有重要意义。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贵阳市依托中国阳明文化园、贵阳孔学堂等，不断擦亮阳明心学诞生地文化名片。作为多彩贵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围绕阳明文化在文旅融合上集中发力，聚焦“一堂两心三精品”<sup>①</sup>项目，打造阳明文化品牌。城市旅游路线上，2018年，贵阳南明区就发布“跟着名人游南明之王阳明篇”，以“王阳明留诗处”为缘起，重新梳理、整合区域内的文化旅游资源，推出五大游线，结合旅游标识创意设计进行“阳明文化复魅”。在王阳明留诗的翠微园、仙人洞、太子桥、达德书院等地，设置色彩典雅、字斟句酌的“王阳明留诗处”文创标识牌，让更多游客和市民直观感受并“读懂”王阳明与南明区的故事，同时也增添了南明区的人文底蕴厚重感、城市环境艺术感。围绕王阳明形象及其思想还设计了团扇、书签、镇纸等文创产品，构思巧妙，让“阳明 IP”不断新添文化旅游应用场景。

2020年9月，在第十五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新闻出版局、贵州省版权局正式发布了“阳明·问道十二境”文化符号及经典游学线路。这条游学线路，是组织包括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等在内的阳明文化研究专家及文化旅游专家重走阳明悟道之路后，通过提炼阳明在贵州相关标志性文化内涵而得出的。从“龙场悟道”的修文玩易窝，“兴隆书壁”的黄平飞云崖、月潭寺，“平越思隐”的福泉平越驿站、七盘古驿道，“古道心旅”的修文天生桥、三人坟，“陆广晓发”的修文县六广河、阳明古渡、王

---

<sup>①</sup> “一堂”即围绕建好用好孔学堂着力打造学术高地；“两心”即围绕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以共产党人的“心学”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着力推动传承转化；“三精品”即围绕党员干部党性教育、企业商道研修、中小學生研学打造精品线路。

阳明石像、飞龙峡，“水西论象”的黔西象祠，到“龙冈开讲”的修文阳明洞、龙冈书院，“贵阳传道”的文明书院、孔学堂阳明大讲堂，“南庵答和”的贵阳翠微园，“南祠咏怀”的贵阳达德学校，“东山遗韵”的贵阳阳明祠、东山来仙洞，“镇远留书”的镇远青龙洞、江西会馆、濠阳河，系统梳理了王阳明在贵州的行走轨迹和主要经历，受到游客、家长和学生的欢迎。

此后，为了加大对“阳明·问道十二境”的宣传推广，贵州省委宣传部勇于探索实践、积极创新融合，推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的阳明文化主题活动。2023年，贵州省委宣传部和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以“可感知的阳明文化”为主题，邀请阳明文化专家学者和千万级粉丝的知识型大V横跨贵州7个县（市、区），通过行走贵州独特的山河地理，感受王阳明悟道传道的心路历程，系统寻访并传播“阳明·问道十二境”这一旅游路线，全网传播量超3亿次。2024年，贵州省委宣传部在此活动的基础上不断升级、深化，联合地道风物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又组织开展了“问道向黔·探寻阳明悟道之路”贵州阳明文化风物之旅研学版活动。除了沿着大儒王阳明的足迹，深度探访贵州人文山水，还安排众多省内外研究王阳明的学者，举办以阳明文化为专题的“地道文化讲堂”。通过丰富的讲学、交流等环节，让活动参与者从学术理念、当代传播、文艺阐释等各个角度，发现一个内涵丰富的“王阳明”。同时，贵州省委宣传部与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共同整理推出《我的1508问道·十二境》阳明文化微纪录片，邀请知名文化学者董平，采用年轻人青睐的“微综艺访谈+微剧”方式制作，通过主持人与文化学者回溯，以1508年为叙事原点，以十二境为场景，在古今人物富有思想深度的时空对话中，循着王阳明的足迹，在真山真水之间感受王阳明悟道传道的心路历程，播放量超1.6亿次。

学在课堂，游在远方，开辟“研学游”文旅新阵地。为更好地让大众感悟王阳明心学“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理论，贵州在“研”字上下功夫，以全国研学教育基地——修文中国阳明文化园——为载体，面向企事业、公司、学校等，组织开展阳明文化研学实践系列活动，参观王阳明纪

念馆、阳明洞古遗址区、龙冈书院等重要景点，深入理解王阳明心学的精髓。2024年7月，在贵阳孔学堂举办“知行合一·心学寻源”贵州行——国际儒学联合会2024汉学青年学者研习营。作为国际儒学联合会的一项标志性人文交流项目，此次汉学研习营借用贵阳孔学堂平台，集合了来自5大洲15个国家的22名汉学青年学者，是历届汉学营中人数最多、构成最丰富、行程最长的一次研习营。以此次汉学营活动为新的契机和起点，贵阳孔学堂与国际儒学联合会开启合作新征程，构建国际儒学联合会贵阳孔学堂研修基地（中华文化国际研修园），开展“大成心境·爽心之约”2024国际儒学联合会会员活动，共同体悟阳明先生龙场悟道“大智慧·成圣贤·心即理·境无碍”之境。

数字化是文化发展的大趋势，面对数量庞大的阳明学文献，如何通过大数据技术，将多样化、分散、孤立、动态的文献资源进行关联、聚合、融合，让更多的阳明学爱好者、研究者便捷地了解阳明学，实现阳明文化数字化，是践行总书记“第二个结合”的优秀成果，也是推进阳明文化转化运用的重要措施。2019年5月30日，由阳明文化（贵阳）国际文献研究中心构建的数字王阳明资源库全球共享平台正式面向大众上线运行。这是一个以阳明文化典籍文献为核心的数据库。平台以实用性、全面性、国际化为目标，致力于收录古今中外与阳明文化相关的古籍、图书画册、研究报告、期刊文章、学位论文、影像等文献资料。目前，平台已建成典籍库、索引库、全文库、艺术库、专家库、阳明百科、藏书馆、事记等子数据库及一个APP，共数字化处理和存储古籍文献120种771册62335拍、碑刻12种376拍、法帖33种110拍、文献索引5万余条、核心文献2400余篇，全面系统地展示了阳明文化文物文献的现实状况和阳明心学理论研究成果。2024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之际，由贵州“修文阳明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的“阳明文化数字博物馆”正式上线。这是一个集文献整理、史迹考证、学脉传承、中外研究、动态咨询于一体，多元化打造阳明文化资源共享的数字化平台，包括“著作遗珍”“朝臣友人”“史迹遗址”“亲传弟子”“学脉传承”“中外研究”“动态资讯”等板块，将对阳明

文化传承与理论创新、阳明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发挥重要的作用。

贵州将阳明文化转化运用作为多彩贵州重大文化工程之一，是深入挖掘阳明文化的当代价值，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更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如今，游客循着王阳明在黔的行迹问道前行，可亲见贵州奇绝瑰丽的山水，感受贵州真诚包容的人文环境，不仅可从中洞窥阳明文化超越时空的独特魅力和时代价值，更能感受贵州的古今巨变与时代发展。

## 心学胜境，文明远播

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创办龙冈书院，主讲贵阳文明书院，大力传播儒家文化，开创了一代学风，黔中王门由此诞生。自此，阳明心学宛如一粒种子，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壮大……之后，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其不辍讲学中，日趋丰满与完善，对有明一代的传统儒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黄宗羲云：“姚江之教，自近而远，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龙场而后，四方弟子始益进焉。”《修文县志稿》亦有记载：“阳明王子当明中叶，迁谪龙场，验征其学，宏敷教义，良知之说，遂阐于西南万山间，而大播乎斯世。”

从时间上说，黔中王门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形成的第一个学派，之后王阳明升任离黔，一直从事教育讲学活动，开拓了一方文明。以王阳明为宗师、以王学为志向的一群读书人，他们人数众多，人才辈出，在明武宗年间出现直到明末百余年间，一直传承不断，遍及域中，流派纷呈，风靡一时。从地域上看，以其亲传弟子为核心，主要形成了八大分支：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泰州学案和黔中王门<sup>①</sup>，分布在浙江、江西、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山东、河南、广东、福建、贵州等明朝大部分行政区域。其中，以浙中、泰州、江右三系为大。王门学派诞生后，钱德洪、王畿、黄绾、王艮、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等阳明后学一方面继承、创新与发展了王阳明“致良知”的心学思想和圣学工夫论，开坛讲学，传授知识；另一方面不断记录王阳明讲学对答的语录和文集，收集、整理、编撰并形成了王阳明的系列学术成果——《传习录》《王文成公全书》《王阳明先生全集》等。

<sup>①</sup> 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以地区为分派的基本标准，将阳明门人及后学的思想主要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和止修八支。

通过书籍这一有形载体，让更多人更好地研习王阳明的学说与思想。

从正德三年（1508年），在贵州龙场诞生“黔中王门”，到最后一个阳明学派——“姚江书院”派邵廷采和江右李绂相继辞世（1750年），中国的阳明后学历经240余年时间。在这240余年时间里，王学一度风行天下，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思潮，取得了与官方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地位。《明史》称：“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然明清朝代更迭之际，其命运急转直下，在“尊朱辟王”的朱子学、顾炎武经世之学与尚习行、重实用的颜李学派三股力量的不断围剿下，被斥为空疏、无用、误国之学，随即便在中国传统社会沉寂了近300年。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盛世危机”，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被迫同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美、法、德、意、日、俄等列强纷纷扑向中国，并先后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让中国民众苦不堪言，有志之士纷纷要求变法维新，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在神州大地兴起，阳明学说中诸如“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有济于世的思想，成为近代政治家与启蒙思想家的关注焦点，阳明学也由此重新迎来转机。<sup>①</sup>正如唐文治先生在《阳明学为今时救国之本论》中所说：“以彼邦之国性，与吾国之国性相较，乃知盛衰之由，固大有在，而致良知之学，决然可以救国。知行合一之说，断然可以强国也。”对彼时贪鄙、昏昧的国人来说，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之说正是治理国民性的一剂良方。

近代以来的许多有识之士，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许多新儒家学者，他们发现并继承和实践着王阳明的理论学说，纷纷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用行动诠释着王阳明的思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曾国藩、康有为、梁启

<sup>①</sup> 值得一提的是，彼时日本阳明学兴起，为大洋的彼岸带来了蝴蝶效应，国内有不少学者都是从日本阳明学的发展得到了启发，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阳明学得到了新的发展，并成为当时的学术思潮之一。

超、孙中山、杨昌济、毛泽东等都十分强调阳明心学。梁启超大力宣扬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以阳明学知行合一之说论之，彼知而不行者，终是未知而已”。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导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也是王阳明的忠实信徒，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于1917年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对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做了创造性的阐发，把“阳明心学”与进化论的思想结合起来，从而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创造进化论”的观点。之后，毛泽东还把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运用到革命实践中，一次次引导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自诞生以来，阳明心学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还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从南、北两个方向分别向周边国家传播，影响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日韩、东南亚、欧美的哲学、政治、经济。我国著名学者朱谦之先生曾说，“日本阳明学开创于中江藤树，而追溯其始于禅僧了庵桂悟”。阳明心学在日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彼时作为正使率团入贡明朝的日本禅僧了庵桂悟，曾在浙江宁波与王阳明有过一次短暂的会面，之后王阳明还给他写了一篇《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德川幕府时代，受阳明学影响的日本学者中江藤树，全身心地服膺于王学左派的“良知”说，建立书院、培养弟子，开创了“中江学派”，对阳明心学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日本阳明学的鼻祖，中江藤树认为阳明学并非深奥的学问，也不同于其他空谈的学问，而是一种行动的、实践的哲学。在中江藤树等人的影响下，既具备实践特性，又具有自由、平等的人民性内容的阳明心学在日本逐渐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发展，并在江户时代成为主流思想，影响了熊泽蕃山、三轮执斋、佐藤一斋、大盐中斋、吉田松阴、伊藤博文等人，给日本的社会变革带来了新生力量，为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铺平了思想道路。维新志士如梁川星岩、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都是阳明心学的信徒。可以说，没有阳明心学就没有日本社会个体作为主体的全面觉醒，也不可能将日本由贫弱引向富强。阳明心学培养元气、人本和人文、多元和合、重在实践功夫的精神内核，对日本政治、教育、道德观念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

也仍能在日本看到阳明文化的痕迹，如中江藤树纪念馆及墓、藤树书院、阳明苑、大盐平八郎墓、佐藤一斋坐像、讲学处“治新馆”“昌平坂学问所”（东京大学前身）、山田方谷纪念馆、吉田松阴历史馆等。

除日本外，阳明学在朝鲜半岛历史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被称为韩国阳明学，又称朝鲜阳明学。16世纪，造访明朝的朝鲜使臣将《传习录》等书携带回国，自此，阳明文化传入朝鲜半岛。17世纪，朝鲜开始系统翻译出版阳明书籍。朝鲜王朝时期，心学逐渐在高官、学者和士人中得到普及。朝鲜的心学教育体系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形成了独有的朝鲜心学传统，主要注重个人修养和道德实践，强调通过内省和直觉来认识人性的本质，提倡思想与行为的和谐统一。朝鲜的心学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尚情感和道义，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共融。阳明心学对朝鲜王朝时期的儒学教育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朝鲜人民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韩国阳明学的集大成者郑齐斗，继承了王阳明“心外无物”“心即理”“知行合一”观点，提出了“中和论”。由他开创，经过李忠翊、李令翊、李勉伯、李是远等，到李建昌、李建芳，形成了以江华为中心的“江华学派”，一直流传至今。进入近代以后，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韩国阳明学也成为救亡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器。如朴殷植发起了基于阳明学的儒教改革运动，以期通过变法自强实现民族独立。江华学派的李建升在江华道创建“启明义塾”，并积极支持“大韩自强会”，开展救亡启蒙运动。江华学派李建芳的门人郑寅普也试图通过阳明学开展民族独立运动。所以阳明学者钱明认为，“阳明学乃是朝鲜实学思潮产生的重要哲学基础”。

作为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阳明学不仅是中国的、东亚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如今，在美国、俄罗斯、德国、瑞士等国家，阳明学研究方兴未艾，大家、大作不断涌现。同时，在明清之际“东学西渐”的洪流之中，阳明心学随着儒学文化思想传入欧洲，在一定程度上滋养了欧洲启蒙运动者的精神世界。如今，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已经过了500多年。在这期间，世界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贵州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日益增多，作为集儒家思想为大成的阳明心学，在对外传播上有了更多声量。世界各国学者研究阳明思想的学术氛围日益浓厚，王阳明及其思想精髓在世界上越来越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曾说，“五百年来，儒家的源头活水就在王阳明”，王阳明“继承和发扬光大了中国儒学特有的人文精神。他提出‘仁者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他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要创造人与社会的和谐；他提出‘致良知’，就是要创造人与自身的和谐”。日本阳明学大师冈田武彦也说：“阳明学最有东方文化的特点，它简易朴实，不仅便于学习掌握，而且易于实践执行。在人类这个大家庭里，不分种族，不分老幼，都能理解和实践阳明的良知之学。”

纵观王阳明的一生，可以发现他与贵州、浙江、江西、广西等地有着不解之缘，其留下和衍生出的众多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对后世影响深远。阳明心学塑造了贵阳“知行合一、协力争先”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核，在阳明文化发祥地的贵州修文县，这里的人们为这位“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先哲立了一块牌坊，上面镌刻着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鹏先生题写的“王学圣地”四个字。这块牌坊表现了地方政府对文化的敬重、对阳明先生的敬重，表现了地方百姓对阳明思想的崇敬，如今已成为修文的标志性建筑。浙江，作为王阳明出生之地、成长之处和归宿之所，近年来积极担当弘扬阳明文化的历史使命，坚持把阳明文化浸润到文化强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将阳明文化打造为浙江省重要文化标志之一，拥有了全国乃至世界级的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跨越500年的阳明文化，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赓续文化传承，成为代表贵州、浙江、江西等城市形象、城市精神的一张重要“金名片”。

阳明学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体现，王阳明以“龙场悟道”为其哲学思想的转折点，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心学命题。其中

萌芽于龙场而定型于晚年的“良知”和“致良知”学说，强调不分贵贱贤愚，人人都是可以成为圣人，赋予了人的平等性，为全世界建立了人性至善的准则。时至今日，阳明心学理论体系中的优秀成分仍然具有现实的、宝贵的价值，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净化人的心灵，规范人的行为，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走向更光明的未来。同时，作为一种经典而又具有普世包容的哲学思想，阳明心学“万物一体之仁”思想中所蕴含的对世界的关切和良知之要义，构成了当今世界认同和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逐渐为各民族所承认、接受、认同。

徐爱曾言：“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钱德洪赞师：“真如日月之丽天，大地山河，万象森列，阴崖鬼魅，皆化而为精光；断溪曲径，皆坦而为大道。”王畿则说：“我阳明先师倡明圣学，以良知之说觉天下，天下靡然从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始终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文化支撑、文化指引。未来，在解决世界问题，推动全球治理，多元文明的融合与共治中，阳明心学还将不断贡献独属于它的那一份良知力量！

## 附录一

# 王阳明大事记

### 瑞云送子

成化八年（1472年），浙江余姚竹轩翁王伦府上，儿子王华之妻郑氏怀孕十四个月仍未分娩，数月以来阖府上下担忧无比。九月三十日夜晚，岑氏梦到自己的儿媳郑氏马上要生了，此时一位红衣仙子脚踏祥云，将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送到岑氏的怀中。正不知如何是好时，突然一阵婴儿响亮的啼哭把岑氏从梦中惊醒。这声啼哭正是从隔壁儿媳屋里传来的——孩子终于生下来了。这位随着仙人送子之梦出生的婴儿，就是明朝一代传奇人物王阳明。后来岑氏把做梦的情况告诉竹轩翁王伦，王伦意识到岑氏所做之梦也许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神灵托梦，孙儿来自一片瑞云之中，当是上天所赐。于是，王伦为孙子取名单字“云”，他出生的楼房亦被称为“瑞云楼”。

## 五岁乃言

与其他的小孩不同，五岁的王阳明还不会说话，家里的人一直为此事着急。一日，一个和尚从他们家门前路过，恰好遇到王阳明在门外玩耍，和尚摸着他的头说了八个字：“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王阳明的祖父王伦听后恍然大悟，原来是名字中的“云”字泄露天机，于是王伦便张罗给孙子改名。中国古代文人最是讲究取名，正所谓“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给孙子取什么名好呢？王伦瞬间想起《论语·卫灵公》中的一句话：“知及至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于是便为孙子改名“守仁”，寄望他能用仁德守住自己不凡的命运。说来也怪，改名后不久，王阳明就开口说话了。不仅如此，当祖父王伦给他念书时，他竟能一股脑儿地把祖父之前诵读过的诗文很流利地背下来，且一出口便是儒家经典《大学》。王伦惊喜万分，再问一些其他的经典名著，王阳明也是信手拈来。原来王伦日常诵读习字都把王阳明带在身边，王阳明耳濡目染，便早将圣贤文章默记心中。

## 一鸣惊人

成化十七年（1481年），王阳明父亲王华高中状元，被朝廷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为迎养竹轩翁王伦，同时也担心王阳明长期不在身边会疏于管教，王华上任一年后，便派人去浙江余姚老家接王阳明和王伦前往京城一起生活。就这

样，王伦和王阳明祖孙二人乘船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北，前往京城。路过镇江府金山时，参加了一场宴会，客人们酒喝得尽兴时，有人提议以《金山寺》为题写一首诗，正当大家没有头绪时，王阳明在旁说：“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人们听后感，便又让王阳明作一首《蔽月山房》，他随口应声道：“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诗中的山和月，大和小，远和近，刚好都能一一对应，而且句式工整，充分展示出王阳明过人的天资。

## 自期成圣

成化十九年（1483年），王阳明父亲王华把他就近安排到了京城的一所私塾上学听讲，王阳明豪迈不羁的个性越发彰显。一日，在上学路上，王阳明偶遇一位相士。相士端详王阳明的面相后言：“吾为尔相，后需忆无言：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王阳明到学堂仍对相士的话感到不解，对着书本陷入思考。此时私塾先生正在上课，他突然很认真地问了先生一个问题：“何为第一等事？”先生思忖片刻回答道：“唯读书登第耳。”即好好学习，考中科举做大官，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想到，王阳明却不以为然地说：“读书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意思是，读书登第恐怕算不上第一等事，人生的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学圣贤，做圣人。十二岁的小孩也许并未真正了解“圣贤”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但“读书学圣贤”却是他确立崇高志向的开端。

## 巡居庸关

成化二十年（1484年），父亲王华被任命为廷试弥封官，王阳明也陪同其一起进考场评卷，对当时的政治局势、社会治理对策了然于胸。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出于对北方边境安全的关心，也出于对民族英雄于谦的向往，15岁的王阳明决定一个人私出居庸关，对边塞的地势地貌、风土人情进行实地考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王阳明登长城、逐胡人、思战略，用巡游的方式了解了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的防御措施。此时的王阳明内心慷慨激昂，不由得生出经略四方的志向。一天，王阳明梦见自己去拜谒东汉名将马援的庙，醒来后感慨赋诗：“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记述马援南征交趾凯旋时，在边界立下铜柱，刻“铜柱折，交趾灭”六个大字的历史事件，表达自己对伏波将军的崇敬之情，同时也凸显了王阳明面对外敌纷扰，决定要像马援一样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永葆忠诚担当的品格。

## 格竹七日

自与私塾先生讨论何为人生第一等大事后，读书学做圣贤的念头几乎伴随王阳明的一生。他遍求朱熹遗著尽读尽学，并对朱熹所言“格物穷理”展开实践。一日，王阳明约着好友钱氏一同去“格竹子”。他们每天对着竹子观察，看它有什么样的道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后，王阳明一无所获，还因为劳累过

度而大病了一场。他叹息道：“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安慰自己说，领悟圣人之道恐怕自己天分不够，还是去学习科考入仕的课业吧。这一次的亲身经历让王阳明不仅感叹圣贤的不易，而且对朱熹的思想开始产生怀疑，格一物都如此困难，要格天下事事物物得需要多大的力量啊？“格竹子”的失败，一方面使王阳明暂且放下圣贤之学，开始转向科举之业，也为他日后提出系统的心学观点埋下了伏笔。

## 铁柱宫论道

17岁时，王阳明从京师回到家乡余姚。同年在江西南昌与江西省布政司参议诸养和之女诸氏完婚。婚礼当天，王阳明看着大家觥筹交错，只觉百无聊赖，就信步走出家门透透气，一不小心竟来到了一个叫铁柱宫的地方。走进去后，王阳明见一位老道士正在盘腿静坐，这位道士虽然已年近百岁，但鹤发童颜、身体硬朗，王阳明觉得他定是得道高人，于是便向他问询神仙养生之术。王阳明此前对道家、道教也颇有涉猎，二人相谈甚欢，谈到天都快亮的时候，老道士突然问：“你从何处来啊？”王阳明这时才想起，自己来南昌是来结婚的，昨天竟把新娘一个人留在了洞房里，于是急忙同满城寻他一夜的诸氏家仆回去了。王阳明一生似乎与仙道有缘，此后的十余年间，他时常在闲暇之余游历道观和寺院，更于绍兴会稽山寻得阳明洞，在此静思修身，行道家导引之术，与好友王文轵、许璋等讲道论仙，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光。

## 研习书法

结婚之后的王阳明一直待在南昌，他发现诸养和的官署中有数箱书写纸一直空置，无人使用，于是便取来练习书法。王阳明喜临怀素书法，常在书斋中临摹怀素的《自叙帖》，习得怀素狂逸之气。在分享自己练习书法的心得时，王阳明曾直言：“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告诉众人，自己学习书法也是从临帖开始的，但只能掌握字的外在结构，后来学会从心里思考和感受字的内在表达，久而久之才悟透书法之道，意在教育弟子为学当从心上下功夫。王阳明在书写技法上做到了博采众家所长又自成一统，留下了楷书、行书、草书等各类书法作品，被后世学者争相临摹刻写。明代书画大家徐渭论阳明书云：“古人论右军（王羲之）以书掩其人，新建先生（王阳明）乃不然，以人掩其书。”

## 拜谒娄谅

弘治二年（1489年），在得知祖父竹轩翁病重的消息之后，王阳明带着妻子诸氏从南昌出发，返回浙江余姚。到达广信府上饶时，王阳明特意去拜访了当时著名的学者娄谅，向他请教宋儒的“格物”说。娄谅是理学大家吴与弼的三大高徒之一，他告诉王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即通过研习就可入圣学之门，此说正好解答了王阳明内心多年疑惑，也与他当时的内心情境深度契合。

这一次拜访，使得王阳明开始对儒学产生较强的兴趣，奠定了王阳明一生的为学基础。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姚江之学（心学），先生（娄谅）为发端也。”自此，王阳明坚信“圣人必可学而至”，始终以圣贤自励，一生未改。

## 会试落第

会试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中央考试，通过会试后才有资格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前三名将被赐“进士及第”的称号，几乎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考中头名（状元）更是前途无量。会试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但在弘治六年（1493年）和弘治九年（1496年）的会试考试中，王阳明接连两次落第。第一次落第时，旧识内阁首辅李东阳特来安慰，王阳明作《来科状元赋》表明自己坚定不移的成圣决心。第二次落第后，有同样落榜的同学来安慰王阳明，王阳明却云淡风轻地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在他看来，有上榜之事，就有落榜之事，不要过分在意，快乐和痛苦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可见，王阳明并没有把人人看重的科举应试视为人生第一等事，他参加科举考试的目的是切身修习圣学，获得一个“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平台。

## 钻研兵法

弘治十年（1497年），王阳明26岁，再赴京城。这时明朝的边境已有些动荡，朝廷也腐败滋生，遍求良将而不得。朝廷下旨命令地方官吏们举荐能带兵打仗的人才，但是应者寥寥。王阳明慨叹说：“武举之设，仅得骑射击刺之士，而不可以收韬略统驭之才。平时不讲将略，欲备仓卒之用，难矣。”他认为武官不应该只是粗莽之辈，更重要的是有文韬武略、排兵布阵的本领。于是，王阳明开始对兵法产生浓厚的兴趣。凡是兵家的书籍，他都会认真研究，细致钻研，以备一朝有用。会见宾客或参加宴会之时，他甚至用果核排兵布阵，向他人展示兵法。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积累，王阳明才成为“上马能战，下马能文”的全才，后来更是活用兵法，几番立下赫赫军功。

## 进士及第

经过两次会试失败后，28岁的王阳明重整旗鼓，顺利在南宫举办的会试中脱颖而出，名列第二。后来又在皇帝主持的殿试中取得二甲第七名，也就是全国第十名，可谓是一举成功。王阳明在会试答卷中，一是论述《礼记·乐记》，谈礼乐教化之妙，赞圣人制作之功，言乐不止于观听之美而为使社会敦和有序。二是论述“君子中立而不倚”，言独立于道，需君子之勇，中者难立，要守中，则需要择理而行，不被外物所诱惑……都获得了众考官的一致认可。进

士及第后的王阳明到京城，被安排在工部观政负责土木建设的工作，因只是实习政事，并没有具体的工作内容和考核指标，所以王阳明实际上是“闲人”一个。其间他时常与一众好友唱酬论学，学习诗文辞章。直到八月被派到河南主持威宁伯王越坟墓的建造事宜，王阳明才正式开启他的仕途生涯。

## 上陈边防策

弘治十二年（1499年），西北边陲威胁不断并逐渐加剧，朝廷急议西北边防政策。王阳明结合自己与父亲在京中多年见闻和所学兵法知识，向朝廷呈递了他人生第一份国事奏疏《陈言边务疏》。在奏疏中，王阳明言辞恳切，痛陈时政之弊，认为江山社稷已经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只有革除弊政，选贤任能，锐意改革，才能救大明于倒悬，救万民出水火，让江山社稷代代相传。他从“蓄材以备急、舍短以用长、简师以省费、屯田以足食、行法以振威、敷恩以激怒、捐小以全大、严守以乘弊”八个方面全面分析明朝边防改革对策，并对每一条策略进行详细论述分析。王阳明提到的八项军事改革建议，阐述了自己多年来对军事研究的见解，体现了高超的军事才华和治军方略。

## 悟二氏之非

弘治十五年（1502年），王阳明请假回绍兴养病，在会稽山阳明洞中修行导引之术疗疾，以静坐的方式修身静心，忘却自己躯体上的病痛，摆脱世俗的束缚，与大道融通一体。修行一段时间后，王阳明甚至可以预知未来。当朋友问起能够预知的理由，王阳明笑答：“只是心清。”后来时常有人前来拜访王阳明，向他请教吉凶祸福，他都能言中，众人称赞不已，但他却说：“此簸弄精神，非道也。”于是就准备搬到钱塘西湖去养病，开始转溺于佛氏之习。其间，王阳明造访了本觉、牛峰、净慈、虎跑等诸多古刹名寺，研究佛家经典，并写下数篇游览诗文。一日，王阳明去虎跑寺时听说有一位禅师已经坐关三年，不发一语、不视一物。王阳明以思念至亲乃人之“种性”，实不可灭，一语道破禅机，让这位僧人主动离寺回家看望母亲。至此，王阳明心中的迷雾一扫而空，他悟出了佛学和道家的不足，得出“种性”乃儒家与佛老二氏在成圣路上的毫厘之异，并始终心系家国。

## 主试山东

返乡养病的王阳明准备启程回京，还未被任命新的职务，就被当时的山东巡按监察御史陆偁聘请为山东乡试的主考官。山东是孔子故乡，人杰地灵，孔门的诸位高徒也多是出自这里，因此能够出任山东乡试主考官，对主考官本人

而言乃是至高无上的荣耀。据《年谱》记载：“其策问议国朝礼乐之制；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纲纪不振，由于名器太滥；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御夷、息讼，皆有成法。”他还特别为此次主考事宜撰《山东乡试录序》一篇。担任山东乡试主考官是王阳明仕途生涯的重要一站，透过《山东乡试录序》，可以窥见王阳明作为一名圣人的远大抱负，此时他已然从论禅学仙的心境中走了出来，远离释迦、老道思想。

## 始归圣学

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阳明被任命为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负责武官的考试选拔工作。当时的学人多沉溺于辞章记诵之学，而不知身心修行为何物。于是王阳明开始授徒讲学，向弟子讲授身心之学，希望借此启迪大家的心智，使他们树立圣人之志，祛除时代之弊病。当时已有很多人拜到他的门下，跟随学习，但也有一些人批判王阳明在提倡异端，为自己博取声名。同年，王阳明结交了同样提倡身心之学的湛若水，二人一见如故，时常讲论学问，成为莫逆之交。湛若水作为陈白沙心学的衣钵传人，与王阳明约定一同致力于复兴圣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王阳明在思想上的变化。

## 贬谪龙场

正德元年（1506年），南京科道官戴铣、薄彦徽等上疏朝廷弹劾宦官刘瑾，被逮捕入狱。看到戴铣等人被打入大牢，王阳明愤慨之情难禁，于是慨然上书《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劝说武宗皇帝宽宥忠臣、广开言路。王阳明上疏一举触怒了刘瑾一党，不仅没能改变戴铣等人的命运，反而导致自己遭杖责四十，被打入大牢，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王阳明离开京城后，因疾病缠身，先是在杭州养病，并产生了避世归隐的想法。身体好转后，他一路向南，沿富春江进入广信，途经建阳抵达武夷山，其间游九曲，拜谒武夷精舍，寻访天游观道士，二人促膝长谈。道士以“明夷”之卦，化解了王阳明心中之忧。王阳明深受启发，遂重燃信心，打消了归隐的念头，决定奉旨前往龙场。正德三年（1508年）正月，王阳明从绍兴出发，一路向西，经江西、湖广，跋山涉水两千余里，终于进入了贵州境内。

## 徐爱拜师

王阳明离京赴谪，徐爱一起陪同他南归，不仅以家君命正式执弟子礼，公开拜王阳明为师，在王阳明养病期间，徐爱更是一直陪伴在侧，为他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安慰。作为王阳明最早的及门弟子，徐爱还是王阳明的妹夫。当徐爱拜王阳明为师时，阳明学说还没有被世人所接受，徐爱于是为其疏通辨析，指

明要义，成为继承阳明心学真谛的弟子之一，也是最早整理《传习录》的人，为阳明学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王阳明对徐爱的评价极高，曾言“曰仁，吾之颜渊也”，徐爱由此有“王门颜子”之称。在王阳明巡抚南赣期间，年仅31岁的徐爱不幸逝世，王阳明闻讯悲痛不已，此后在讲席中常提起徐爱，并作祭文以表思念，感叹“子与颜子同德……亦与颜子同寿”。

## 居黔生活

正德三年（1508年）春天，王阳明经过湖南，终于抵达谪所贵州龙场驿，开始他的谪居生活。当时的龙场不仅地处偏僻、人烟稀少，居民也多为苗、彝、瑶等少数民族，语言非常难懂。面对龙场艰苦的环境，王阳明带着自己的仆人，搭建了一间极其简陋的茅草房栖身。后来王阳明在龙冈山发现了一处钟乳洞，将此洞命名为“阳明小洞天”，并移居于此。到达龙场后，王阳明虽然听不懂少数民族的语言，但在王阳明缺衣少食、居无定所的时候，当地的淳朴百姓给予了他最大的关心与帮助。闲暇之余，王阳明也会给少数民族讲中原故事和孝悌礼义。不同于被贬谪初期的彷徨，王阳明已经开始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每天在洞中、山中、村中尽情行走，看书、种地，过得还比较惬意。

## 龙场悟道

正德三年（1508年），是王阳明学术生涯的转折之年。王阳明居住在“阳明小洞天”时，在附近寻得了一个绝佳的修习之所——“玩易窝”，他在其中日夜端坐、静心聚神。在这个窄小潮湿的地下溶洞，王阳明彻底放下了功名利禄，不再以世俗荣辱为念，不再为凡尘琐事所扰，更不为远谪龙场而痛苦烦忧。终于，在一天夜里，于恍惚间，王阳明仿佛听到有人与他说话，他高兴得呼喊欢叫，甚至惊动了睡梦中的仆人。据《年谱》记载：“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一晚仿佛雨后初晴，豁然见到阳光一般，困扰他多年的格物穷理之问终于找到了圆满的答案，那便是——“心即理”。王阳明觉悟到原来圣人之道就蕴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一直以来所沿用的向心外求理的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龙场悟道”。

## 龙冈讲学

到龙场不久后，当地苗彝同胞见王阳明仍居住在阴暗潮湿的洞穴中，就上山砍树伐木，主动帮助他修建了几幢木构房屋，名为“龙冈书院”。修建龙冈书院前后只用了十余天。龙冈书院不仅成为王阳明遮风挡雨的住所，更成为他在龙场讲学的重要场所。王阳明在龙冈书院的讲学活动吸引了贵阳的陈宗鲁、汤

伯元、叶子苍等学子前来听讲，他们后来皆成为黔中王门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此外，还有不少苗彝同胞也赶来听讲。因王阳明非常重视对当地少数民族开展“讲学化夷”的工作，遂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王阳明教学方式独特，又不拘泥于传统的书院教育，而是运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边唱边学，点化弟子，还将教育活动进行总结，制定了“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的学规，对弟子提出具体的要求和期望。龙冈书院因讲学特色突出，一时声名大噪，成为影响最大的黔省书院，及至盛时，人来人往，这在王阳明来之前的龙场是不曾有过的盛况。

## 贵阳讲学

王阳明兴办龙冈书院，授徒讲学，一时声名远播。正德四年（1509年），王阳明应席书邀请赴文明书院担任主讲教席，席书亲率书院200余名学生向王阳明行弟子礼，师从王阳明。在文明书院讲学时，王阳明特别强调师法圣贤，要求弟子打好基础知识，重视品德修养，不要迷信、不要盲从，坚定方向，学文须学古，脱俗去陈言。虽然王阳明在贵阳主讲的时间不过数月，但期间从学者多达数百人，堪称贵州教育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王阳明在贵阳的讲学活动，培养了贵州及周边省份的一大批王门弟子，贵州弟子又以王阳明为榜样，纷纷在全省各地继续创办书院，设坛讲学、著书立说，逐渐形成了黔中王门学派。其中汤伯元的子、孙、曾孙三代，皆中举或成进士，世传心学，堪称贵阳百年心学世家。

## 始论“知行合一”

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后，王阳明便以“心即理”的思想，纠时风之弊，批读书人好空谈、虚谈之习。据《年谱》记载：“是年（正德四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如果说“心即理”是王阳明心学的基石，那么“知行合一”则是其心学重要的发展。“知行合一”说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为朱熹曾提出“先知后行”说，认为必须认清万物之理，然后才能去实践，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绝对的真理。在朱子之学一统天下的时代，起初众人并不能理解“知行合一”说的本意，甚至还有人将其视为异端邪说。在贵阳期间，席书曾多次来文明书院与王阳明论学，请教朱熹和陆九渊学术思想的异同，但王阳明却不谈朱陆之学，只谈自己悟到的“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之说。针对当时的学子只知死读经书，远离人伦日用的现实问题，王阳明在与席书的交谈中，首次阐述了“知行合一”之说的内容。在贵阳主讲的时间里，王阳明一边传道授业，一边精研学问，逐渐确立了自己“知行合一”的学说，阳明心学大旨由此而奠定，并名扬天下。

## 庐陵善治

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出任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当时该地讼风盛行，大小事件稍有不和，立即讼至官府，官府多疲于应付。王阳明上任后先

深入了解当地情况，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当地民生问题。七个月内，王阳明撰成并颁布《告谕庐陵父老子弟》，整顿词讼，肃清纲纪，劝民停争息讼，把主要精力放在农耕上。同时以德化民，劝诫村民恪守孝道，派遣医生下乡医治患者，减免折银，缓解百姓之困苦。此外，王阳明还针对盗贼防范、抗旱防火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与方案。王阳明在庐陵知县任上的时间虽短，却把这个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有效地改善了当地的乡风民风，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临行前，他发布最后一篇告谕，与庐陵父老乡亲作别，并不忘叮嘱教导庐陵乡民要时刻平息纷争，做到讲求礼让，以和为贵。湛若水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说：“起尹庐陵，卧治六月而百务具理，有声。”

## 京师讲学

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王阳明赴京师述职，暂住在大兴隆寺。大兴隆寺位置便利，成为众多文人墨客的聚集之地，非常适合开展讲学活动。湛若水、黄绾、顾璘等人常来大兴隆寺与王阳明讲学论道，王阳明更与湛、黄二人定下终身共学之盟。不久后，王阳明离京，又因升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再次返京，寓长安灰厂，与湛若水比邻而居。此后近两年时间里，王阳明常常在职事之余，与湛若水、黄绾、方献夫、穆孔晖、徐祯卿、应良、徐成之等人谈论晦庵、象山之学，辨别朱、陆之异同，剖析疑义，切磋圣学，教学相长，并讨论“实践之功”“儒释之异”“摄形化气”等方面的问题，吸引了众多学人前来听他讲学。

## 始论“朱陆异同”

自元代以来，“朱陆异同”论就成为儒学史上的难题，一直争论不休。朱熹主张格物致知，强调通过对事物本质的探究来达到理解天理的境界；陆九渊则强调心即理，主张从内心出发直接体会天理。在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朱子学是官学，极为昌盛。在贵阳讲学时，席书就曾对王阳明有“朱陆同异”之问。正德六年（1511年）二月，王阳明回到京师之后，又遇门下徐成之与王文轅的朱陆之争，据《年谱》记载：“王舆庵读象山书有契，徐成之与辩不决。”在《答徐成之》一信中，王阳明阐述了自己对于“朱陆异同”的观点，他认为很多人对朱陆异同的争论，其实是基于各自的求胜心，与其去争论他们的异同，还不如去克服自己的求胜心，并告诫弟子不要评价别人的是与非，首先要认清自己心中的是与非。王阳明并没有直接评论朱陆之学的优劣，而是告诉学生他所悟的道理，即无论是陆九渊和朱熹，还是他自己，在为学的目的上都是相同的，就是要成为圣人。可以看出，王阳明既不自盲从朱学，也不排斥陆学，而是从中吸取他们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阳明心学体系。

## 滁州讲学

正德八年（1513年）十月，王阳明到位于南京西北部的滁州上任，负责马政。滁州虽地处偏乡，名胜景点却不少。闲暇之时，王阳明喜欢在山水之间

交友、讲学，游历琅琊、让泉、龙潭等地。讲学初期，仅有两三人在此跟随王阳明学习，但随着声名的传播，问学弟子增至数百人。在滁州讲学时，王阳明围着龙潭布道讲学，与弟子们静思澄虑，游玩于山水之间。《年谱》记载：“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王阳明继承孔子、朱熹等前贤的教育理念，提倡快乐教学，寄情山水，重阐发思想，轻记问之学，又强调敬畏自然、崇尚先贤，注重实践与讨论相结合，其独特的教学方式吸引了众多追随者。滁州也因此成为王阳明讲学的重要之地、王门游学的发端之地、阳明心学的传播之地。

## 南京讲学

正德九年（1514年）五月，王阳明赴任南京鸿胪寺卿，很多故交与弟子闻讯赶来金陵相聚，王阳明讲学传道的事业开始不断壮大。在南京任职的两年多时间里，王阳明在政事之余，潜心学问与讲学。王阳明反对朱子学的外知为事的观点，主张在实践中通过省察克治来存天理、去私欲。他认为，《中庸》所说的“未发之中”指的是天理，而非心静，只有时刻不忘去私欲、存天理，才能真正达到心静。王阳明指出，私欲不仅指名利色欲，也包括所有的私人杂念等。他还强调，克己才能知天理，天理就存于人的心中，只有真正认识自我，才能知天理。并且极力倡导省察克治，批评当时的学者将格物致知局限于口舌之论，忽视个体对天理的认知与维系的现象。这一时期前来潜心问学者包括黄宗明、薛侃、马明衡、陆澄、季本、林达、陈杰等。他们每日陪伴在王阳明左右，切磋学问、交流心得，学术氛围十分浓厚。

## 巡抚南赣

明代中期，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赋税沉重，加上官僚腐败和地方官吏的压迫，使得民怨难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南、赣、汀、漳四个地区的匪患日益严重，成为社会治安的重大隐患。正德十一年（1516年），在兵部尚书王琼的推荐下，王阳明被任命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负责巡抚南、赣、汀、漳。上任之后，王阳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军队和打击匪患。他一方面精心挑选士兵，颁布严格的队伍法规，确保军队内部赏罚分明；另一方面，积极侦察贼匪情况，制订细致周密的作战计划，并运用心理战术，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逐一击破敌人。通过这些巧妙的战术，王阳明成功平定了长期困扰四省的匪患，为朝廷解除了威胁。在此期间，王阳明一直在思考地方动乱的原因，并深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强调了内心世界的重要性和对个人行为的指导作用。由于王阳明在军事上的杰出表现与屡建功勋，正德十三年（1518年）六月，他被朝廷晋封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成为正三品大臣。

## 刻《朱子晚年定论》

正德十年（1515年），王阳明收录了朱熹的30多封书信，写成《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三年后，《朱子晚年定论》初刊于赣州府雩都县。在此书的序

中，王阳明表明自己的学说与朱子晚年的观点一致，并从心学的角度出发，对朱子学进行了解释和阐述。王阳明认为朱熹晚年的学说已有心学元素存在，并且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有相通之处。《朱子晚年定论》一经刊行就引发了诸多争议，有些学者批评王阳明故意混淆朱子晚年的言论，使之与自己的学说相符，从而误导读者；也有学者认为王阳明的行为是为了消除朱子学者对他的误解和批评，而不是出于个人私利。总的来说，《朱子晚年定论》是王阳明试图缓和与朱子学者关系的一种手段。他通过强调自己的学说与朱子晚年的观点一致，进一步表明了朱子学和自己心学之间的相似性。

## 刻古本《大学》

在南赣剿匪期间，王阳明常抽空与弟子薛侃、欧阳德等聚集，一起研习学问，特别是对《大学》这部儒家经典下了大功夫。此前贬谪龙场时，王阳明就开始怀疑朱熹的《大学章句》可能不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原意，因此他亲自抄录并研究了古本《大学》。通过深入研读和思考，王阳明确信圣人的学说应该是简明易懂的，且《大学》原本是一个整体，不应被分割成经、传两部分，而应“去分章而复旧本”。他认为，《大学》的核心在于“诚意”，“诚意”是“致知”和“格物”的基础，因此没有必要在文本中增加“敬”的概念，也认为良知本身就能指示至善之道，无须依赖外在的感官经验。最终王阳明完成了对古本《大学》的整理、注释工作，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七月，在赣州刊刻古本《大学》。王阳明对《大学》的解析特色，就在于把心意、知物、明德、亲民、至善归为一事，这是其独创之处。现在《大学》有两个版本流传于世，一个是王阳明的《大学》古本，另一个则是朱熹的《大学》改本。

## 《传习录》刊行

正德七年（1512年），王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后，与徐爱一起乘舟返越，途中徐爱记王氏论《大学》宗旨，辑成初编《传习录》，为今之《传习录》所载首卷。正德十三年（1518年）八月，王阳明门人薛侃将徐爱、陆澄和自己所辑语录汇为一编，共三卷，于江西赣州付梓出版，此为初刻《传习录》，即现行的《传习录》上卷，经过王阳明本人亲自审阅。当时出版的《传习录》采用宋代以来较为流行的语录体形式，收录了王阳明师友弟子间探求学问、辨析学理的交谈记录和往返书信，是最能集中体现王阳明心学思想的著作。由于徐爱、陆澄所记阳明语录并未刻录，不利于保存和传播，因而薛侃的刻录具有标志性意义。此后《传习录》在流传过程中陆续增辑、重编，形成了多种版本。

## 平宁王之乱

江西省南昌府的宁藩王朱宸濠是明朝皇族，其雄踞南方，一直有异心。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借口明武宗荒淫无道，在南昌发动叛乱。叛军很快攻下九江、南康，并扬言要直取南京，一时朝野为之震动。当时王阳明正奉命从赣州前往福建剿匪，路过丰城时，从知县顾佖处得知宁王叛乱的消息，便立即返程吉安，与知府伍文定等征调粮饷，募集义兵。之后王阳明一面上疏言明局势，一面传假檄文，行疑兵计和反间计，使宁王兵留南昌

十多日，为官兵的集结争得时间。七月二十日，在一切准备充分后，王阳明乘宁王精锐都前往安庆，留守南昌的兵力空虚之机，率兵一举攻克南昌。七月二十四日，双方在黄家渡决战，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战败被俘。此次战役，王阳明运用了一系列攻心战术，将“心学”与兵法相结合，面对危险始终镇定自若、岿然不动，只用了43天的时间，就成功击溃宁王的十万叛军，充分展现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 释“良知”之道

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阳明50岁，正式提出“致良知”学说。在此之前，王阳明虽已向其弟子邹守益发“良知”之说，将《大学》“致知”解为“致良知”，但却始终心存疑虑。后经朱宸濠之乱，王阳明益发相信真正的“良知”足以令人忘却苦难，超越生死。正德十五年（1520年）起，王阳明便以“良知”为心之本体，立“致良知”为“心学”诀窍，通过致良知工夫以复心之本体，把“致良知”变成了他心学最后的归宿。正德十六年（1521年），陆澄书信问良知之说，王阳明作《答陆原静书》，从答陆澄养生之问入手，大阐良知之学。王阳明曾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可见“致良知”便是其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人生最大的智慧。在他看来，“良知”不为外物所扰，是亘古不变的，永远光明的，一个人只要认知和践行“良知”，便可以拂去云雾般的人欲，便能成为圣人。自此以后，不论是讲学，还是应事接物，王阳明都不再说其他，只提“致良知”三字。

## 白鹿洞讲学

白鹿洞书院历史悠久，南宋时期朱熹在此曾多次登台讲学。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出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时，曾手书《修道说》《大学古本》《中庸古本》等古籍，不远千里从赣州送至白鹿洞书院，借恢复古本之名，重新解释《大学》《中庸》，以阐明心学要义，却始终不得其果。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巡按御史唐龙命南昌知府吴嘉聪修南昌府志。此时，时任南康府教授的蔡宗兗是王阳明的弟子，负责主持白鹿洞书院的事务，他将编写府志的机构设在书院中，并召集夏良胜、舒芬、万潮、陈九川等人前来共同完成。王阳明于是在此集结门人邹守益等参加讲会，大力阐明心学，宣扬“良知”说，更成为一时盛会。王阳明一生与江西关系密切，他的“良知”之说亦从江西开始大力传播，这段时间的讲学也成为他传播心学的标志性活动。

## 开中天阁讲会

正德年间，中天阁由钱德洪辟为讲堂。正德十六年（1521年）九月，王阳明归余姚省亲时，钱德洪率钱大经、钱应扬、郑寅、俞大本等74人迎请王阳明到中天阁讲学，并拜王阳明为师。为更好地集结求学士人，传授“致良知”教法，嘉靖四年（1525年），王阳明定会于龙泉寺之中天阁，与余姚诸生约定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为讲会之期，除王阳明亲自讲学外，钱德洪、

王畿等门人亦时常参与其中，中天阁讲会成为明代最早的阳明讲会。同时，为使讲学走向正规，王阳明亲自订立了每周一次的聚讲之约，并书《中天阁勉诸生》于壁，对中天阁讲会日期、原则、操作程序和方法提出了具体要求，是阳明学讲会的最早规约。之后，王阳明奉命入两广征思、田，便将余姚、绍兴两地讲学的重任交付弟子钱德洪、王畿，此后中天阁讲学在二人的管理下日益兴旺。

## 筑阳明书院

王阳明一生爱好讲学，便拥有很多弟子。早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34岁的王阳明尚在京师，还未确立心学之说，他就以立志成圣为宗旨公开讲学，开门授徒。此后，王阳明一生辗转各地任职，他的讲学足迹也遍布全国，包括北京、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地。此间，濂溪书院、白鹿洞书院等众多书院成为王阳明讲学的场所和心学交流、传播的基地。嘉靖三年（1524年），王阳明居住在绍兴讲学，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云集于此，盛况空前。为更好地接待四方来学士子，王阳明的得意门生王良请筑书院，在绍兴府城北至大寺左建立了阳明书院。不久后，绍兴知府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执贽来学，又命山阴县令吴瀛在稽山书院原址增建明德堂、尊经阁，聘王阳明为书院主讲，择选绍兴各县生员修习其中。自此，各方才俊纷纷来学，王阳明于此阐述“致良知”之学，并撰《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论述了“经学即心学”的主张，确立了讲会在学术上的心学取向。

## 首揭“王门四句教”

王阳明晚年曾将其学概括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即为著名的“王门四句教”。自彻悟“良知”之说后，王阳明围绕其心学思想开展了更广泛的讲学论道。嘉靖四年（1525年），王阳明以心物合一、心理合一的心学体系陆续同湛若水、顾璘等士子学者展开了论辩，构成了他“心、意、知、物”的本体功夫论的逻辑结构。嘉靖五年（1526年）春，王阳明与门人朱得之、杨文澄讲论“良知”心学，阐发“致良知”的本体功夫论思想体系，提出“无善无恶者心也，有善有恶者意也，知善知恶者良知也，为善去恶者格物也”，这是王阳明第一次用四句格言来总结他的“致良知”体系，“王门四句教”已呼之欲出。之后一整年，他的讲学论道都是围绕着如何认识“王门四句教”而展开的。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与门人讲论良知心学，进一步修正诠释了“王门四句教”。同年，王阳明《大学问》著录成书，成为他对“王门四句教”的经典阐释和心学之总结。“王门四句教”借用《大学》的“格、知、诚、正”四目建构而成，是王阳明全部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 天泉证道

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在绍兴养病并开展讲学活动。这一年五月，朝廷决定由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王阳明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派他出征广西，平定思恩、田州的土匪叛贼。临行前夕，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与王畿关于“四句教”论学意见不一，于是请正于他。随后王阳明与钱、王二人在天泉桥上讲学讨论，史称“天泉证道”。在这次论道中，王畿认为“四句教”是师门立教针对不同人的权法，而非定本。若心体是无善无恶的，其发用也应是无善无恶的，因此意、知、物都应是无善无恶。钱德洪则认为“四句教”是师门的定法，不可更改。因为心体虽然无善无恶，毕竟被“习染”已久，便见有善恶在，所以须用为善去恶的功夫来复心体之明。针对二人的分歧，王阳明再次阐发了自己对“四句教”的理解，并对两位弟子的疑难进行了相应的解答，指出“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又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以后要传播我的学说，务必要依照我的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做到以此自修，以此接人。

## 严滩问答

王阳明自越城出发赶赴广西思田平乱，弟子钱德洪、王畿二人从绍兴一路追送他至桐庐县富春江上游的严滩。在严滩，王畿向王阳明请教佛教所说的实相与幻相的问题，王阳明回答了四句话：“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这一次，他们再次围绕本体与功夫讨论了“四句教”的问题，不仅是天泉问答的继续，还具有“究极其说”的意义。王阳明对“有心”“无心”的论述继承了其“天泉证道”中的“有”“无”立场。与“天泉证道”不同，王畿不再片面坚持“无”之本体和功夫，而是综合采取了自己和钱德洪的观点，被人称为“严滩问答”。

## 抚治思田

嘉靖六年（1527年），广西思恩、田州土酋卢苏、王受反叛，提督都御史姚镛无法平定暴乱，皇帝于是命王阳明领兵平叛。王阳明此时已是残病之躯，向朝廷表达了请辞之意，却未得到允许。在拖着病躯前往赴任的路上，王阳明已经把广西境内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他分析后认为思恩、田州应以招抚为主，而不应以征剿为主。王阳明运用自己的军事才能与聪明才智，给土匪头目卢、王二人写了招降信，又只身前往土匪大营向受降将士演说，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平定了思田。随后，王阳明主动为民请命，联合卢苏、王受等人率兵

剿灭了为害多年的断藤峡和八寨的土匪。跟思恩、田州平叛方略不同的是，王阳明面对此场叛乱，没有选择以抚为主，而是直接迅速地出兵平叛。之后，王阳明根据地方实际，采用“土流结合，以土为主”的羁縻政策，对广西的土司制度进行了微调。同时，大兴社学，创办书院，在传授心学的同时，也重视对少数民族的伦理道德教育。

## 落星南安

广西平叛后，王阳明的身体每况愈下，他两番上疏朝廷请求返乡养病，但一直未得到朝廷的恩准。这时的王阳明已经极度虚弱，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不多了，于是决定一边给朝廷上疏，一边坐船踏上归乡的行程。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王阳明从广州府出发，乘船渡过北江，北上江西。十一月二十五日，当船越过梅岭行驶至南安时，任职于南安府的门人周积前来看望，王阳明起身端坐，突然连续咯血不止。由于病情严重，王阳明在南安一停便是五日。离世的前一天，王阳明把周积叫入船舱，对他说道：“吾去矣！”周积眼泪立刻哗地一下流下来，问老师有何遗言，王阳明听后只是展颜一笑，淡淡说了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说完片刻，他便瞑目而逝。这八个字，是王阳明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完美诠释了王阳明的心学精髓。可以说，光明的一生，便是阳明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 附录二

# 王门后学

王阳明毕生广纳门徒，故阳明心学问世以来，王学便获得了极为广泛的传播与深远的发展。据《明史》所载：“（王阳明）门徒遍天下，流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在此过程中，王门后学作为阳明心学传承与普及的中坚力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后学精英或直接师承王阳明，或间接受其学说熏陶，构成了王学传承的重要脉络。黄宗羲《明儒学案》对王门后学八大流派进行了阐述，剖析了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在理学思想上的独特贡献与差异。随后，在阳明心学的发展与演进中，又形成了黔中王门。至此，学界普遍认同的阳明后学共计九大流派。

### 浙中王门

浙江是王阳明的家乡，是其学术思想的发源地，也是他讲学的重地。“浙中”代指浙江。而浙江一般又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东和浙西两大区域。浙中

王门是指在浙江流行的阳明后学，主要是余姚、山阴、会稽等浙东地区。《明儒学案》中记载，“姚江之教，自近而远，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指出浙中是王学的发源地和最早的传播地之一。

浙中一带在王阳明生前已形成了阳明讲学的中心，王门弟子甚众，影响也极大，王阳明弟子及门最早者徐爱，以及两大高足钱德洪与王畿皆出自浙中王门。徐爱（1487—1518年），字曰仁，号横山，余姚马堰人，阳明妹婿。正德二年（1507年）阳明出狱而归越，徐爱即向其拜师称弟子。次年中进士，官南京工部郎中，卒年仅31岁，王阳明称他为自己门下之颜渊。王阳明的良知之说，学者初多未信，徐爱为之“疏通辨析，畅其指要”，在以江浙为主要活动区域的学术圈内，接引来学，宣讲王学，为早期阳明学派的形成作出了特殊贡献。钱德洪（1496—1574年），字洪甫，号绪山，余姚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官刑部员外郎。王阳明平濠归越后，钱德洪与同县范引年、管州、郑寅、柴凤等数十人会聚于龙泉山中天阁，同学共进。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出征广西思田，他与王畿留守越中书院，此后“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王畿（1498—1583年），字汝中，号龙溪，山阴人，嘉靖二年（1523年）因试礼部进士不第，返乡受业于王阳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中进士，官南京兵部武选郎中，为王门左派之近禅者。王畿师从王阳明时间长，一生热衷于讲学，“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所到之处，听者云集，四方尊崇阳明心学者，皆以王畿为宗盟。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各地求学者纷至沓来，由于人数众多，无法一一接待传授，钱、王二人便协助王阳明教授来问学的学子，被时人称为阳明门下的“教授师”。二人周游四方，倡导讲会，使阳明心学在浙江和东南地区得到快速扩展。

浙中王门学派认为，“良知”说是当世学术的精髓，提到春秋时期，天下四分五裂，人心大坏，孔子提出“仁”，以唤醒人心，求“仁”就是孔氏学说的精髓；战国时期，孟子又提出“义”，没有“义”，则“仁”无由达到，“义”



便是孟子学说的精髓；晋梁以来，佛老泛滥，周敦颐、张载等宋儒追复古礼，执“礼”便是宋儒学说的精髓；王阳明提出“良知”，以“良知”启迪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学术的精髓。以上学术精髓都是因时而立的。浙中王门学派固守师说，坚持以“先天统后天”，以“正心为先天之学，诚意为后天之学”，“心”即“良知”，是内在的、本能的知识，是框定世界万物的规矩或标准；主张“和而不倡”，说“吾人之学，切忌起炉作灶。惟知和而不倡，应机而动，故曰‘乃见天则’。有凶有咎，皆起于倡”，认为学术研究应遵循自然法则，避免过分倡导，而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这源于他们对“正心”（良知）和“诚意”（后天实践）的区分。又说“良知是未发之中”，“慎独即是致良知”，“良知不由学虑而能，天然自有之知也”，认为“良知”是人心之本体的自然流露，无须刻意思考或学习。总的来说，浙中王门学派的学术主张建立在对王阳明学术理论的深入理解和对良知本质的深刻认识上，强调内在道德自觉与外在道德实践的和谐统一。

除钱德洪、王畿外，浙中王门的代表人物还有蔡宗兗、朱节、季本、黄绾、董沄、陆澄、顾应祥、黄宗明、张元冲、程文德、徐用检、万表、王宗沐、张元忬、胡翰、管志道等。他们对王阳明思想的理解有所差异，主要体现在良知工夫论的倾向上，可分为现成派与修证派。现成派代表为王畿、管志道等，他们的论学宗旨是心、意、知、物的“无善无恶”，批评钱德洪以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为定本的说法，提出自己的“四无说”，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主张直接参悟良知本体。王畿对良知学的独特诠释及对圣学工夫论的看法，与泰州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修证派代表是钱德洪、张元忬等，他们主张“四有说”，认为“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力辟王畿论学的空疏，恢宏师说，论学宗旨倾向于

王阳明晚年的“事上磨炼”。因为以往只讲良知本体，在心上做工夫，难免会使学问落空，离去人伦物用，导致道德虚无主义。所以绪山之学更重实践层面，是浙中王门学派的实干家。

作为阳明心学早期传播的核心区域，浙中王门思想和学说对后世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学术文化界拥有崇高的地位。阳明歿后，钱德洪、王畿等弟子以承宣先师之学为己任，讲论“良知”学说数十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培养了一大批王学人才。尽管浙中王门各弟子间学术思想存在分歧，但他们共同在编刊阳明遗著，建书院传承、弘扬阳明心学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使阳明心学的影响风行天下。

## 江右王门

江右王门是指江西一带的阳明后学，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王门学派之一，享有“王学正宗”之誉。江西是王阳明长期做官和讲学的地方，亦是王阳明建立“三不朽”功业的基地。阳明学在江西广为传播，从游者甚多，他们对阳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江右王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欧阳德等人，师事王阳明讲求良知之学，以王学正统派自居。邹守益（1491—1562年），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人，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邹守益是江右王门的开山祖和掌教，一生从未间断讲学，以传播阳明之学为务，讲学于庐山白鹿洞书院、安福孔庙、吉安白鹭洲书院、衡阳石鼓书院。其在安福修建的复古书院，是当时江右王门学者进行集聚、从事



学术传播活动的中心。聂豹（1487—1563年），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聂豹生前虽与阳明有一面之识，但并未执弟子礼入门。在阳明逝世后若干年，由钱德洪、王畿作为证人，设位北面而拜阳明，聂豹始称门生。罗洪先（1504—1564年），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明代著名地理学家，也是阳明学派的重要继承者和开拓者。嘉靖八年（1529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迁左春坊左赞善。罢归后，曾辟石莲洞，筑正学堂，终日著书讲学。罗洪先虽宗良知之学，然一生未及阳明之门。欧阳德（1496—1554年），字崇一，号南野，江西泰和人。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欧阳德师从王阳明后，到处讲学，弟子众多，“当是时，士咸知诵‘致良知’之说，而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

江右王门学派认为，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它可以密藏膏肓之间，也可充满世界，说“为吾一身之主，为天地万物之主，轨有外于心”，“心，固不出乎腔子里，然退藏于密者此也，弥满于六合者亦此也”。江右王门学派认为，“道”即是“中”，即是心，说“问‘道器之别’。曰：‘盈天地皆形色也。就其不可睹、不可闻、超然声臭处指为道，就其可睹、可闻、体物不遣指为器，非二物也。今人却以无形为道，有形为器，便是袭了宗旨。喜怒哀乐即形色也，就其未发浑然、不可睹闻指为中，就其发而中节、灿然可睹闻指为和’”，指明“道”即“中”。又说“吾心本体，精明灵觉”，“良知之教，乃从天命之性，指其精神灵觉而言”，认为“良知”即是“心”，是自然而然存在的。

除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欧阳德外，江右王门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何廷仁、刘邦采、王时槐、刘文敏、刘阳、胡直、邹元标、陈九川、宋仪望等。与钱德洪等人一样，江右王门讲学以弘扬师说、传授王学为指归。他们大力发挥了阳明思想强调“工夫”的方面，反对王畿和王艮等人只重本体、忽视功夫的“良知现成”论，主张“由工夫以悟本体”的路径，强调“致良知”的工夫，以阳明学思想理论指导自己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重视阳明学的应用价值。

但是，江右王门彼此之间对“致知”工夫的解释不尽相同、差异较大。其中邹守益持“主敬”说，聂豹、罗洪先等持“主静”说，欧阳德则主张“事上磨炼”的“格物”论。另有学者将江右王门分为“主敬”与“慎独”派、“归寂”与“主静”派、“研几”派、“主宰”派、“觉性”派等。

邹守益“主敬”工夫论，要求人们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自我警惕，注意克制自己，严肃认真修炼，以“戒惧”作为道德功夫的全部内容，这是王阳明“省察克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邹守益认为，“良知”是“精明灵觉”的本体，但它并非滞而不化，而是流行不息的。但是“精明灵觉”的良知本体，也会“有所障蔽，有所滞碍”，希望通过“主敬克己”的工夫，除去障蔽，达到良知本体的主宰作用。于是，邹守益吸取了程颐、朱熹“居敬穷理”思想，并把它改造成为“慎独”“戒慎恐惧”的“主敬”工夫，作为“致良知”的手段，颇得王门后学的青睐。他批判“归寂”说割离了动与静、未发与已发的关联。如果动、静分离，体、用为二，则分明是隔裂了心体。

聂豹、罗洪先等人则吸取周敦颐、陈献章的“主静”思想，大力发挥了王阳明的“心上工夫”，形成了自己的“主静”说。而聂豹的“归寂”说，是把“主静”工夫极端化的结果，亦是其学说最显著的特色。聂豹认为，作为本体的“良知”“心”乃是静默的“寂体”，“致良知”就是通过“主静”工夫以复归“寂体”。他说，“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不可遂以知发为良知，而忘其发之自也。故学者求道，自其主乎内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又说“夫无时不寂、无时不感者，心之体也。感惟其时而主之以寂者，学问之功也”。主张“归寂以通感”，就是不能让意欲遮蔽良知，而是直接充养虚寂的心体，这样“归寂”得到的空活心体发用后自然为善，主导一切。

与“主敬”和“主静”说发挥阳明的“心上工夫”不同，欧阳德论学以“格物”为宗，其“格物”说坚持和发挥了王阳明“事上磨炼”的思想，肯定“良知”就是天理，“知之良者，乃所谓天理也”，并认为“良知”产生万物，他说，“夫人神发而为知，五性感而万事出。物也者，视、听、言、动、喜、

怒、哀、乐之类也，身之所有，知之所出者”。欧阳德认为“主静”之说，难免流入枯槁之病；只从“动处用功”，亦不免坠入支离。因此，他主张良知上用功，反对“动静上用功”。

王畿曾说：“阳明夫子生平德业着于江右最盛，讲学之风亦莫盛于江右。”可见，江右是将王学推向鼎盛、传播王学的重要区域。江右王门后学人数之多，在所有王门诸派中可谓首屈一指，社会影响巨大而深远。江西是王阳明生前主要的活动地之一，王阳明去世后，其弟子邹守益、欧阳德等继承阳明精神，建书院，办讲会，使王学在江西极盛一时，传衍不绝。“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黄宗羲对江右王门评价甚高，认为只有他们得到了阳明真传，发展了阳明未尽的学旨，而浙江王畿等人流弊太多，唯有江右王门的贡献，使得阳明之道不坠。

## 南中王门

南中王门是指在明代南直隶地区，即今江苏、安徽、上海三地中的阳明后学。与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学派的兴盛繁荣相比，南中王门人数较少，弟子群体不及其他阳明流派久负盛名，代表人物有戚贤、冯恩、朱得之、唐顺之、薛应旂、薛甲、查铎、徐阶、黄省曾等。

最早接触阳明学的南中地区学者是全椒人戚贤。戚贤（1492—1553年），字秀夫，号南玄，江北全椒人（今安徽全椒县）。嘉靖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拜王阳明为师，一生坚持良知说，拒斥佛老，是一名纯正的阳明学者。戚贤年轻时虽听闻过王阳明在滁州的讲学，但当时对阳明讲学的主旨未能真正

体知认同。直至进士及第并授归安县令后，才通过书信向王阳明问学，正式拜入阳明门下成为弟子。阳明后学如王畿、罗汝芳、唐顺之等人曾多次前往全椒，与之论学切劘，并举办讲会，从而推动了南中王门在安徽地区的广泛传播。

此后，对南中王门心学传衍有重要推动作用的有唐顺之、查铎、徐阶三人。唐顺之（1507—1560年），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1529年）会试二甲第一，在文学与军事领域都卓有成就。因与王畿在南中地区周游不倦，随地讲会，阐发阳明心学意旨，唐顺之深受其影响，故而私淑于王畿，自言“于龙溪只少一拜”。唐顺之的心学思想与王畿共成一派，“无欲”说为唐顺之心学的核心命题。但就内心体验与外在经典的关系而论，“即经而心”“道器不二”是其心学传衍的一大特征，此说主张内心体悟与外在经典、本体与末用的合一，推动了阳明心学的思想发展。但由于唐顺之未曾任职于南中地区，故而其弟子较少。

查铎（1516—1589年），字子警，号毅斋，安徽泾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授德安府推官，后为刑科给事中，官至广西副使。“学于龙溪、绪山”，其学深受王畿影响，深契无善无恶之玄旨，墨守“致良知”说，但又能保持一种较为中道之精神，强调“彻最上之微机，兼中下之修证”的为学宗旨。黄宗羲说他为学主张“良知简易直截，其他宗旨，无出于是。不执于见即曰虚，不染于欲即曰寂，不累于物即曰乐，无有无，无始终，无阶级，俛焉日有孳孳，终其身而已”。此外，查铎是万历年间推动阳明水西讲学的关键性人物，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重建水西书院，积极恢复水西讲学活动，重新制定了水西会条，主持讲学，丛集者甚多。在查铎逝世后，其门弟子继之，犹数十年，延及崇祯年间。因此，查铎是延续水西讲学、推动心学在南中传播的重要贡献者。

徐阶（1503—1583年），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明代名臣，嘉靖后期至隆庆初年任内阁首辅，累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参与朝廷机要大事。正德十五年

(1520年)，王阳明的直传弟子聂豹出任华亭知县，发现本县秀才中徐阶是可造之才，便在公务之余向他传授圣贤之学，徐阶由此受业于聂豹，成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徐阶在内阁时，曾设讲会于京师灵济宫，使欧阳德、聂豹、程文德分主之，对传播阳明心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以自己所著的《学则》一书作为讲章，广招门徒，大力宣扬阳明心学，使得阳明心学的传播盛极一时。

在思想上，南中王门学派继承王阳明心学本体思想，认为“心”即“良知”是世界的本体，诸弟子对王阳明晚年“良知教法”颇为熟稔。戚贤主张现成良知，热衷于探讨心学本体论，认为历代圣贤的学问，无外乎探究本心。只是由于被个人的偏见所束缚，被过度的欲望所蒙蔽，才会导致偏离正道。但只要一念反省，便能找回本心。戚贤的思想主张也反映了南中王门的思想特征——恪守“致良知”宗旨。除恪守良知思想外，南中王门学人又能在阳明学与甘泉学乃至老庄学之间持较为开放会通之见，首屈一指的人物便是宜兴人周道通。王阳明在江西赣州讲学时，周道通曾前往受业，从学于阳明，其间二人多有书信往来。后周道通问学于湛若水，为学不死守门户之见。此外，南中王门学人对《大学》“格物”亦颇有新解。朱得之晚年对《大学》“格物”曾作一新解，以“通物情”来释“格物”，江阴人薛甲还提出“以感物为格，不能感物，是知之不致”，是为“感物为格”之说。

虽然南中王门人数较少，但其讲学活动与思想传播却极为广泛和深远。诸再传弟子身体力行，积极组织讲会，建院讲学，使得阳明心学在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响应者影从，开启了文化风气。尤其对安徽地区的科举入仕、书院教育、文化家族、学术流派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助推了良知思想在多角度、多层次的传播与发展。

## 楚中王门

楚中地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即荆楚（湖北）和湘楚（湖南）之地，正德初年，王阳明因上疏言事触怒宦官刘瑾，受构陷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往返贵州时曾两次途经湖南，先后开坛讲学，培养了大量湖湘籍弟子群体传播发展王学，从而形成了楚中王门。

楚中王门最卓有成就的学者是蒋信和冀元亨。蒋信（1483—1559年），字卿实，号道林，湖南常德人。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赴谪途中经过武陵，寄寓潮音阁，蒋信携所作诗文与朋友冀元亨慕名前来请教。在王阳明谪居龙场后，蒋信等亦抵贵州问学。正德五年（1510年）冬，王阳明调任庐陵县令，与弟子蒋信、冀元亨等人一同离开贵州赶赴江西，再次于湖南开展讲学。三十岁时因肺病入道林寺静坐养病，参透生死，悟“万物一体之仁”。嘉靖十一年（1532年），中进士。嘉靖十八年（1539年）升任贵州提学副使，继续推动贵州书院教育发展，为黔中王门的发展形成培养了核心人物。免官后回到湖南，与湛若水一道兴建甘泉精舍，并在多地游历开展讲学活动，后又在家乡常德创办桃冈精舍，聚徒讲学。蒋信心学的本体论非常独到精要，所以受到了黄宗羲的高度评价。蒋信依据先儒的思想理路与范畴，针对当时的思想背景与社会现实，提出“心气合一”“心道合一”“性气合一”，发明万物一体之仁，为心学的传播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楚中人称之为“正学先生”。冀元亨（1482—1521年），字惟乾，湖南常德人。前期与蒋信一同跟随王阳明求学。正德十一年（1516年），冀元亨乡试中举，其后一直跟从学王阳明。“赣中诸子颇能静坐，苟无见于仁体，槁坐何益？”在冀元亨看来，江右王门以静坐为工夫要义偏离了阳明心学的要旨。楚中王门以静坐为初学者的入门法门，以默识为工夫要义，是为了感悟本体真知真识，体认万物一体。

楚中王门学派注重在践履工夫中实现良知本体，践行阳明良知之学，得黄宗羲“实得阳明之传”“武陵之及门，独占全楚”评价。学者群体继承了王阳明与湛若水的心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调和了二家之学说，圆融了心学晚期堕入空虚的弊端，以圣学为立根处，以“万物一体”为宗，以“心”为本体收摄“气”“理”“性”，实现“心”“性”“理”“气”的贯通无二，在工夫上以静坐为入手处，秉持“慎独”“知几”，在“勿忘勿助”之间达到“默而识之”，从而体悟“万物一体”的圣人境界。门派在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三个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论学宗旨。

王阳明两次讲学湖南，在湘楚之地播下了心学思想火种，离开时撰文《与辰中诸生》总结其心学要义。除蒋信、冀元亨等著名弟子外，还形成了以刘观时、王嘉秀、萧琦等为代表的辰州弟子群，以及以王应奎、胡珊、杨杓、杨褊、何凤韶、唐演、龙起霄、龙翔霄等为代表的武陵弟子群。二代弟子有贺凤梧、向淇、艾而康、刘尧梅、周良相等，黄安之父耿定向虽籍在湖北，然就其师承学脉被划入泰州王门一派。黄宗羲评：“楚学之胜，惟天台一派，然自泰州流入。”三代弟子代表有吴道行，吴道行曾任岳麓书院山长，他以赓续湖湘学统为办学宗旨，推崇“有用之学”。四代弟子王朝聘，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平易儒者，其在理学上提出“诚意为省察密用”的思想，后逐渐回归朱子之学。楚中王门末代学者们或师承楚中王门前贤，或师承其他王门名儒，呈现出更为丰富的思想形态。

楚中王门是阳明后学中的重要流派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学派进行了交流与切磋，传播并发扬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阳明后学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影响。同时，楚中王门在湖南、贵州等地大力传播心学，兴建书院，大兴讲学之风，促使晚明时期湖南、贵州学术氛围愈加浓厚，在推动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上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 北方王门

北方王门是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具体指嘉靖以后，分布于陕西、山东、河南及北直隶一带的广大北方地区，以传播王阳明心学为主要活动的学术派别，主要包括陕西王学、山东王学和洛阳王学三大中心。

北方王门是王学门派中形成最晚的宗门，王门弟子较少，思想传承影响力也远不及南方。率先将王学之风引入北方的有山东的穆孔暉、王道，陕西渭南的南大吉，洛阳的尤时熙等几位学者，王阳明与他们皆有座主门生之谊。穆孔暉（1479—1539年），字伯潜，号玄庵，山东堂邑人。弘治十七年（1504年），王阳明为山东乡试主考官，录取了穆孔暉为乡试第一。正德七年（1512年），穆孔暉正式拜入王阳明门下，成为及门弟子。穆孔暉受王阳明的启发而研读佛老，又进一步与王学相印证，得出“儒与老释不可强分此疆彼界”的结论。他晚年在家乡修建书院，聚徒讲学，在北方地区传播阳明心学，成为阳明心学在北方地区传播的第一人。王道（1487—1547年），字纯甫，号顺渠，东昌府临清州武城县人。正德六年（1511年），王阳明与穆孔暉同为会试考官，取王道为进士。王道遂与穆孔暉、徐爱等人一同受业于王阳明。王道的学术思想并未局限于一家之说，而是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王门思想和甘泉思想兼而有之，最终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南大吉（1487—1541年），字元善，号瑞泉，陕西渭南人。南大吉与王道为正德六年（1511年）王阳明所取同批进士。嘉靖二年（1523年），南大吉出任绍兴知府，期间恰逢王阳明在家乡余姚为父亲守丧，两人交往更为密切。他协助王阳明开创稷山书院，对来自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的三百多名弟子亲自督率讲习。之后，南大吉又增收王阳明论学书信若干篇，于嘉靖三年（1524年）续刻成《传习录》一书。嘉靖五年（1526年）罢官回乡后，他带着对王阳明良知学说的执着和狂热，创建书院，

教授四方来学的生徒，为后来关中王学的传统起到很大作用。尤时熙（1503—1580年），字季美，号西川，又称西川先生、西川居士，河南洛阳人，是王阳明心学在洛阳传播的第一学者。他继承王阳明“心即理”的思想，主张心性一物。治学讲学注重日履躬行，倡导通过躬行而达到“致良知”的目的。

北方王门虽有王阳明诸及门弟子和尤时熙这样的后学作为先驱者引入奠基，但真正形成门派规模和广泛流传则要稍晚至嘉靖中期以后。山东张后觉起初潜心程朱性命之学，后师从泰州学派颜钧、徐樾等人，他发奋钻研，转而宣传王学，北走京师，南游江左，各处聚徒讲学，一时之间，士人云集，培养了一大批学生，门人弟子遍及天下。他进一步简化“致良知”表述，只提一个“良”字，进一步淡化“知”强调的人的认识功能，而强化人心自发的道德本体作用。他与著名弟子赵维新、孟秋等让心学在较短时间内在山东六府传开，将山东王学推向高潮。河南后学孟化鲤、杨东明师从尤时熙，三人在河南地区传播阳明心学，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洛阳王学”，成为阳明心学在北方传播的一大中心，促进了心学在北方，尤其是在河南地区的发展。陕西冯从吾师承私淑王阳明的许孚远，兼治关、洛之学，一生以聚徒讲学为急务，又与杨起元、孟化鲤、陶望龄等著名王门后学立会讲学，博采程朱陆王，享誉学界，对王学在关中的传统起到极大推动作用。此外，鹿善继、孙奇逢等人作为北直隶王学的重要传人，力破流俗，讲学论道，共同为后期王学树立了楷模，为阳明心学保留了一块重要阵地。

北方王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起步晚，规模小，发展也不平衡，直至明朝灭亡，北方王学只覆盖北方的小部分省份学者。另一特点就是重实践、重躬行。北方王学的众多学者无论是在学术思想中，还是在政治、教育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都是经世致用的情怀。在思想上有着与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共性，但在发展过程中又极具个性。北方学者继承并进一步阐发王学中“心”和“致良知”等核心命题，进一步充实阳明心学的内容。如尤时熙、孟化鲤师徒以“人情”“物情”之说来代替“良知即是天理”之说，使心学中“良知天理”之说的

解释更加通俗易懂，切合人们的生活实际，有利于心学的进一步传播。而山东张后觉认为体悟圣学，只说体一“良”字之要。北方王门学者在继承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同时，也吸收本地学术的精华，特别是后期北直隶王学学者，做到了立足阳明之学并调和程朱之理，结出新的学术果实。

作为阳明心学最晚形成也最晚退潮的王门学派，北方王门的兴起打破了北方理学一枝独秀的局面，丰富了北方的学术思想。此外，北方王门作为王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与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影响了当时整个北方地区的学术风气，而且对于后来明清实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 粤闽王门

粤闽王门是指广东、福建的王门后学。王阳明任南赣汀漳时，闲暇之余，讲学授徒。之后，众多来自广东、福建的士人赴浙江向王阳明求学，后又返回本乡传播王学，使得广东、福建的王门后学获得了较大发展。

明中叶以降，粤闽地区心学盛极一时，王门弟子甚众，粤闽王门在当地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氛围，影响广泛，其中不乏一些杰出的代表性人物，如阳明嫡传弟子薛侃、方献夫等人。薛侃（1486—1546年），字尚谦，号中离，潮州府揭阳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薛侃从学王阳明于赣州，是第一个将王阳明的心学向岭南传播的人。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回乡讲学，建立宗山书院，传播心学思想，从此阳明学说在潮汕地区落地生根、发展壮大。薛侃为学造诣非凡，在沿袭心学思想本身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强调“论



宗良知，以万物一体为大，以无欲为至”，并通过静坐、研几、无欲等方法唤醒自心的良知。方献夫（1485—1544年），字叔贤，号西樵，广州府南海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于弘治、正德、嘉靖三代为臣。方献夫是王阳明在岭南的第一弟子，对王阳明“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学说十分崇信，后为集中精力探讨阳明之学，甚至请辞回粤，在西樵山结草为庐，研读经史，钻研理学，并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创建石泉书院，成为广东士大夫重要的讲学之地，推动了阳明心学的传播。

除方献夫和薛侃外，粤闽王门代表人物还有马明衡、杨仕鸣、梁焯、郑一初、杨骥、周坦、丘养浩、郑善夫等人。其中，福建籍王学弟子仅马明衡、丘养浩、郑善夫等人。因明代福建地区，朱子学占据主导地位，故福建王学学者不多，并在学术研究上形成了兼容并蓄、折中朱王的独特风格。马明衡，字子萃，福建莆田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是王阳明的早期弟子，也是福建地区阳明心学的开创者之一。《明史》本传曾言：“闽中学者率以蔡清为宗，至明衡独受业于王守仁。闽中有王氏学，自明衡始。”

粤闽王门学派主张“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强调心是世界的本体，这一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阳明心学中“心即理”的思想体系。又说“学不明，世儒只在可见可闻、有思有为上寻学，舍之，便昏愤无用力处”，提出认识人应该从“可见可闻”入手。他们提倡舍生取义，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忘躯求道之意”，“重生是养口、体者也，成仁取义是养大体者也”，不惜以最大代价履行社会义务，而不是像佛老一样逃避社会责任。粤闽王门学派独特的理论视角为阳明心学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元素，使阳明心学的理论内涵更加多元化与立体化。

作为阳明后学的重要学派之一，粤闽王门学者的思想和学说，在弘扬、传承与发展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同时，他们对朱、王二人学说的调和与发展，还对地方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止修学派

止修学派本源自王阳明门下，但另以“止修”为宗旨，故而得名。《明儒学案》中，该派与其他王门后学论述稍显不同，重点讲其思想，不突出其地域。止修学派创始人李材，字孟诚，号见罗，江西丰城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官至云南按察使。李材原拜邹守益为师，学习“致良知”之说，为王阳明再传弟子。后变更其说，说“致知者，致其知体。良知者，发而不加其本体之知，非知体也”，转为“性觉”之说，提倡“止修”，“止”即“止于至善”，“修”即“修身”。自此，李材以“止为存养，修为省察”为其学说的精髓，并以此为得孔子、曾子的真传，创止修学派，学派门人有王尹卿、陈永宁、韦纯显、陆典等。

止修学派主张“我”是世界本体，而破“知”（“心”）本体论，认为“宰天宰地宰人宰物，运转枢机，皆是于我。离身之外，无别有本”，“以知为体，孔子不闻”，“从古立教，未有以知为体者”。又说：“知觉之知，德性之知，与夫或以独知为良知，或以独之一字为良知，总属闲谈，俱可暂停高阁。”同时，以“知止”为原则，以“修身”为目的，贯彻学派主张，并强调儒学之“实”，认为“儒者之论学，事事归实；释氏之论学，事事归空。事事归实，盖直从立教开宗，合下见性处便实，直说到无声无臭、不睹不闻、至隐至微处，亦无往而非实也”。还说“《孟子》道性善，《大学》说至善，《中庸》要明善，以为不明乎善，则不能诚乎身也。正是不知止于至善，则不能修乎身也”，认为《孟子》讲“性善”，《大学》讲“至善”，《中庸》讲“明善”，其主体都是“善”而已，所以“不知止于至善，则不能修身”。

李材的“止修”学强调“修身”和“知止”，对程朱学和阳明学都有所吸取，并有所批评，具有很强的独创性，其学术思想对中晚明哲学思想产生了重

要影响，并在后来的学术、教育、政治等领域中得到了广泛传播。

## 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得名于其所属地，因创始人王艮系南直隶泰州人，故名曰“泰州学派”。泰州学派不仅存世时间较长，且学者分布极为广泛，除江苏泰州一带外，还遍布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山东、四川、河北、河南、陕西、广东等地。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1483—1541年），江苏东台人，师承王阳明，初名银，王阳明替他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人称王泰州。王艮出身灶户，又是一名贩盐商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布衣儒者。王艮拜师王阳明前已创立“淮南格物论”之说，入王门之后，经王阳明点化，悟出了一套格物安身的理论，创立了独特的“良知学”：百姓日用之学。王艮从百姓生存、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说”，要求统治者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用”人欲需求，并宣称：“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王艮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小生产者、小市民阶层的要求和愿望，维护了劳苦大众的利益。他的人民性观点，具有反封建统治的进步意义。王阳明去世后，王艮回到泰州独立讲学。他长期在中小生产者阶层讲学，从者云集，又积极参与地方管理、推广教育，多次受到地方官的表彰和举荐，于是从全国各地而来拜师学习的弟子非常多，逐渐形成了心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学者既有上层官僚地主、知识分子，也有下层劳动者。他们大都致力于儒家人伦道德的普及和宣传，规劝人们孝悌慈让、安分守己，泰州学派一度成为晚明的显学。

从王艮开门授徒开始到明代末期，泰州学派精英辈出，共有五代传人，主要传人有王栋、王襞、徐樾、颜钧、何心隐、罗汝芳、杨起元、耿定向、耿定理、焦竑、潘士藻、方学渐、何祥、祝世祿等，他们对王艮的学说进行阐述、继承和传播、发展，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泰州学派思想。王栋，字隆吉，号一庵，泰州姜堰人。王艮的族弟。曾师事王艮，得家学之传。先后任县训导、教谕、州学正。开门授徒，主持过泰州安定书院。王襞，字宗顺，号东崖。王艮的次子。九岁起，随父至会稽，游学于王阳明门下。王襞受命王阳明师事王畿等，先后留越中近二十年，结交多位巨儒硕士。王阳明去世后，王艮回到家乡开门授徒，王襞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王栋与王襞在继承、发展王艮的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三人被合称为“淮南王氏三贤”或“淮南三王”。此外，徐樾三次在王艮门下受业，被誉为王艮的高足弟子，他接受了“大成之学”，并在云南任官期间，展现了王艮思想的影响。颜钧从学于徐樾后，又师从王艮，成为“泰州正传”，在家乡倡导耕读和孝悌之学，尽管遭遇严惩，但仍坚持传道，不断推动泰州学派的理论发展。

之后，泰州学派经过四传、五传，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文艺领域，以及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科学领域，将泰州学派思想发扬光大，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早期启蒙思潮。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历任翰林院检讨、詹事兼河南监察御史、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等职。徐光启在我国首先提出学习“西学”，“会通中西”以求富国强兵的主张，是开向西方学习风气之先的第一人。之后，至泰州学派的思想发展到李贽，进入了更全面、更成熟、更系统也更激进的阶段，亦即泰州学派的鼎盛阶段。李贽（1527—1602年），号卓吾，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李贽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早年拜王襞为师，并发展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一生反对封建道学，直截了当地提出“穿衣吃饭是人伦物理”“人即道”“人必自私”等命题，冲破了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推动泰州学派在理论上走得更远，影响更宏阔。

泰州学派是一个崛起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儒学派别，王艮作为一个早年身处社会最底层的灶丁，后因经商贩盐而逐渐富裕起来，开始发愤读书而学有所成。门人上自师保公卿、下逮士庶樵陶农吏，既有来自上层社会的封建官员，也有来自下层的普通老百姓。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弟子，对泰州学派思想的扩散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也因此，泰州学派的影响超过了王阳明后学的各个学派，成为晚明显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泰州学派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和鲜明的创新品格，反对束缚人性，发扬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不仅对阳明心学的传承与超越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的思想启蒙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 黔中王门

黔中王门是指贵州境内的阳明后学，是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全国最早出现的一个以学习和传播阳明心学为主的地域性学派。黔中王门历经了初创、发展，到明嘉靖、万历年间，黔中大地形成了以龙场、贵阳、清平、都匀、思南为主的五大王学重镇，心学思想影响到全省范围。

王阳明谪居贵州期间，创办龙冈书院，主讲文明书院，培养了贵州及周边省份的大批王学人才，而其在黔中亲授心学的嫡传弟子更是有数百人之众。王阳明离黔后，其学子在贵州弘扬师说，广为讲学，盛极一时。该派早期代表为汤伯元、陈宗鲁、叶子苍，被称为黔中王门的“前三杰”；成熟期代表为李渭、孙应鳌、马廷锡，被称为黔中王门的“后三杰”。此外，还有第四、五代的陈尚象、余显凤、吴铤、萧重望、胡学礼、冉宗孔、罗国贤、邵元善等人。

陈文学，字宗鲁，贵州宣慰司人，自号五栗山人。年少能诗文，“以诸生事阳明，乃潜心理学”，王阳明有诗文相赠。撰有《耀归存稿》等，门人编为《陈耀州诗集》。嘉靖十三年（1534年），王阳明逝世若干年后，他与汤伯元、叶子苍等倡议为师在贵阳立祠，得到时任巡按贵州监察御史、浙中王门后学王杏的大力支持。陈文学还为龙冈书院何陋轩碑作歌，为惠水中峰书院作记，对阳明心学在贵州传播贡献巨大。汤昇，字伯元，贵州宣慰司人。正德十六年（1521年）中进士，历任南京户部员外郎和潮州知府，后罢官归乡。为官以阳明为榜样，清正严明，莫友芝评其“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叶梧，字子苍，贵州宣慰司人，正德八年（1513年）举人，官至镇安知县。曾任湖南新化县教谕，以学为教。还参与校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等心学典籍工作，王阳明书《寄叶子苍》也被收录其中。孙应鳌（1527—1584年），字山甫，号淮海，贵州清平卫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中举第一，后中进士。历任多职，在京近十年。他少时受王阳明居黔所作诗文的影响，对阳明的思想产生崇敬和向往之情，先后受业于徐樾与蒋信。万历三年（1575年）因病告归，在清平创办书院，阐扬心学，悉心培养了众多学子。其著作《孙山甫督学集》为贵州最早诗文集，在黔省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李渭，字提之，号同野，贵州思南人，嘉靖十三年（1534年）举于乡。为蒋信弟子，深得王学真传，从而成为黔中王门的重要代表之一。晚年归乡讲学二十余年，各地儒子士人慕名前来求学，从学者众多。马廷锡，字朝宠，号心庵，贵州宣慰司人，嘉靖十九年（1540年）举人，为五世举人之家。马廷锡师从蒋信，为王阳明再传弟子。学成归乡后，被聘为阳明书院主讲，在贵阳讲学长达三十余年。继王阳明、蒋信之后，在贵州掀起第三次心学讲学高潮，门生遍及黔中。

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三人集黔中王门心学之大成，又各具特色。郭子章在《黔记》中单立“理学传”，将孙应鳌、李渭、马廷锡并称为“贵州三先生”，后世亦谓之黔中王门后学“理学三先生”。他们三人的学术倾向虽互不相同，但同宗阳明之学，同奉阳明心学为学术正宗。孙应鳌主张“以求仁为宗，

以尽人合天为求仁之始终，而其致功扼要在诚意、慎独”。以“天人合一”为求学始终，其学说的最终归宿则落实在诚意、慎独的道德修养上。李渭主张“先行其言”，要求人们在道德和事业中努力躬行，永不终止，永不停息，被誉为“躬行君子”。马廷锡则与李渭相反，他主张静中求道，“必极静极清，以至于极定，始长觉长明，以至于长存”，追求在一种清静的意境中完善人格。

黔中王门后学弟子以王阳明为榜样，在贵州各地讲学，从学者数千人，他们设坛讲学、著书立说、创新义理，形成了对阳明心学的代际传承，大大推动了贵州乃至西南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外，黔中王门的学者们通过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的，将心学的理念带到了更广泛的地区，对贵州乃至全国的学术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一、古籍类

- 1.〔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 3.〔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4.〔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 5.〔明〕王守仁：《居夷集》，明嘉靖三年（1524年）丘养浩刻本。
- 6.〔明〕王守仁：《阳明先生集要三编》，明崇祯七至八年（1634—1635年）王立准刻本。
- 7.〔明〕王守仁：《阳明先生道学钞》，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武林继锦堂刻后印本。
- 8.〔明〕王守仁：《王阳明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 9.〔明〕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 10.〔明〕席书：《元山文选》，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22年。
- 11.〔清〕唐树义等：《黔诗纪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 12.〔清〕陈田：《黔诗纪略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
- 13.〔清〕莫庭芝等：《黔诗纪略后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
- 14.〔清〕潘元炜等：《潘氏八世诗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
- 15.〔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16.〔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 二、史志类

1.〔明〕沈庠等：《〔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

2.〔明〕谢东山等：《〔嘉靖〕贵州通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

3.〔清〕卫既齐：《〔康熙〕贵州通志》，康熙十二年（1673年）重修本。

4.〔清〕鄂尔泰等：《〔乾隆〕贵州通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

5.〔民国〕刘显世等：《〔民国〕贵州通志》，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贵阳书局铅印本。

6.〔明〕郭子章：《黔记》，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

7.〔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

8.〔清〕爱必达：《黔南识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

9.〔清〕罗文彬、王秉恩：《平黔纪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

10.〔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黄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黄平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贵州省修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修文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

13.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贵州历代方志集成》，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

## 三、专著类

1.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2. 束景南:《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3. 龚晓康、赵永刚:《王阳明年谱辑存》,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
4. 赵平略:《王阳明居黔思想及活动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5. 连玉明:《王阳明诗集全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6. 张清河:《王阳明谪贬诗文漫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
7. 张清河:《王阳明贵州诗译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
8. 赵平略:《王阳明名言名篇赏析》,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
9.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10. 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全三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
11. 李国均:《中国书院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
12. 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史》,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

## 后 记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挖掘整理宝贵的贵阳历史文化资源，2023年7月，中共贵阳市委决定启动《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工程。

为保障丛书编纂工作的顺利推进，中共贵阳市委成立丛书编纂工作协调机制，从多方面做好工作保障，办公室设在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由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负责统筹推进，相关单位承担具体编纂工作；组建丛书学术委员会，对丛书编纂进行质量评审及学术指导；引入总审订团队，从整体性和规范性上进一步提升了丛书编纂质量。

编纂这套丛书，凝聚了各方智慧，汇聚了多方力量，得到了省内外多位专家的精心指导，得到了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时任贵阳市委副书记滕伟华同志的悉心指导。省内相关行业的专家及专业人士参与撰稿，以融政治性、历史性、文化性、地域性与普及性于一体为目标，力争将丛书打造为促进贵阳文化繁荣发展、提升贵阳人民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读本，让贵阳这片土地更加厚重，让贵阳这座城市更加灵动，让贵阳市民更加自信，让外来游客更加向往，让贵阳未来更加美好。

本书的重点是介绍阳明的贵阳足迹，旨在通过对王阳明曾驻足之处的介绍，传播阳明文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虽是大众普及性读物，但在撰写过程中，编撰小组始终秉持着严谨性、客观性的原则，充分利用正史、地方志等文献资料，合理推断和想象，既尊重史实，又描绘了众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努力做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结构清晰、内容精当，兼顾了内容生动、深入

浅出的叙事风格，还原一个鲜活、接地气的圣人形象。

本书的编撰，在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得以顺利开展，期间得到戴建伟同志的悉心指导与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是为记。



